未來世界


H. G. Wells原著
章衣萍
蘇若水合譯
未來世界
天馬書店印行

譯者前記

我很欣喜在這半年中完成這件很大的工作，是翻譯威爾士的未來世界（H. G. Wells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的出版。說起牠，是初春時節的事了。天馬書店經理韓振業先生，邀我在虹口的一家酒樓喫晚飯。酒酣耳熱之餘，韓先生問：

「可以弄點書麼？」

我說：

「好的。做不出，還是翻譯罷。」

因此談到威爾士的一部奇書，是他的大著未來世界。但，這部大著，實在太大了，是幾十萬字的巨著。這年頭，最閒適的事情，還是寫小品文。而況，閒人的著作，可以標點的正多啦！而我又爲了生活，跑在鄉下教書去了。於是一面教書，一面還要應付「主任」先生的暗算。匆匆又是一兩個月過去了。夜深人靜，想起韓先生在的酒樓上的囑付，捻開燈光，使悄悄地開始了。

而老友陳若水兄又悄悄地從遠方來到上海，一別也是十多年了。陳若水兄，還是沙灘時代的老朋友。記得那時，大家都把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責任，放在肩上，掛在嘴上。若水兄的淵博，是大家共佩的。他離開沙灘之後，又遠涉沙漠者若干年。而忽然大家都在上海灘頭聚首。若水是兒女成行的人了。正貧困得無以自聊。他在離我家不遠的亭子間住下。我每週三天在鄉下，四天在上海。在上海的時間，全化在這未來世界的夢想裏面了。而若水兄，他是我的唯一的指導者。我的半年的生命，多化在此書上卷裏面了。而若水兄，他也花了十足地半年的生命。他曾憤憤地說：

「我們還管未來世界做什麼？我們連現在世界也管不了！」

他終於憤憤地帶了老婆兒女，又到沙漠裏去了。復興世界的大業，於是全在我一人之手，其惶恐爲何如呢。只留下我一個人孤單單地在這未來世界中徘徊了。此書共分五卷，

第一卷：今天和明天，失敗時代的曙光。

第二卷：明天以後，失敗時代。

第三卷：世界復興，現代國家的產生。

第四卷：現代國家的鬪爭。

第五卷：在統制生活中的現代國家。

「現代國家」(The Modern State)是威爾士創造的名詞。他的理想是世界大同，現代國家是世界大同的產品。現代國家是威爾士理想的新世界。威爾士寫出過去世界與未來世界。他的主要目的是想改造世界。他沒有蕭伯納一般的機智與幽默(Wit and humour 正是我國流行的時髦東西。)他的思想是受過科學洗禮的。他的痛惡現狀和反對萬惡的戰爭的精神，處處可以見到。未來世界不是諸葛亮劉伯溫一類的燒餅歌和推背圖，而是從世界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工業各方面精密研究的預言書。威爾士的眼裏，未來世界有黑暗，也有光明。他所預言的是從一九二九年到二一零五年的世界。他想把這本書放到二一零六年出版的。所以書中有許多烏有先生和亡是公一流的人物。這些人物多是威爾士一手創造的。威爾士的文筆很生動，可是不容易譯。商務的世界史綱經過許多名人之手，還是那樣難懂。我們的翻譯，是以使讀者容易懂為

目的。文法結構，同原文略有出入。但總以不失原意為主。[illegible]的是第一次初版原本。前後修改共有五次，總算略盡心力了。韓振業先生又將原書仔細校正一次。在這樣熱到一百零四度的上海，這本書總算出版了。中國的命運也在這部未來世界中。我們大家來討論這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命運，或者比喫冰淇淋和西瓜還更重要些吧。是為前記。

一九三四，七月十六日，章衣萍，于上海。

目次



導言

拉文博士 (Dr. Philip Raven) 的夢書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拉文博士不幸死於日內瓦，這是國際聯盟祕書處一個嚴重的損失！從此日內瓦失去了一個身長背屈，步履不穩，斜首深思的熟人，全世界也失去了一個思想敏銳的頭腦。他的工作之無間斷的專一，他的異常的心理之活潑，正如在他訃文中所說，獲得全世界知名之士的讚賞。一般的公衆，也因爲他的逝世，突然都認識他的爲人了。

拉文的名字，不常見於報紙，以這樣生前無聞的人，死後能引起極大的震動，是很希有的事；從阿斯羅 (O.lo) 到新西蘭，從亞尼諾斯愛里司 (Euenos Aires) 到日本，幾乎每一種重要的報紙，都有關於他的記載。克里夫爵士 (Sir Go'frey Ciif'e) 做了一個簡略的但是很好的回憶描寫；他說拉文是一個非常樸素，坦白，專一和有力的人格。他的相片，在刊物上登出的有兩

種，這兩種相片並不相同；早年的一張看去像雪萊和馬克斯頓（Maxton）的混合物，後來一張，是用快鏡攝的，他斜倚在他的手杖上，正當國聯大會場的入口，和巴爾穆爾爵士（Lord Parmoor）談話，他的一隻長而瘦的手正伸出着，做一種特殊的說明的手勢。

雖然他的事情很忙，但他仍能省出時間來幫助同僚們共同思索和解決一些較廣的問題。在他死後的哀榮中，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關於他的幫助和忠告之所在的指示。人們都急於證明他的工作的重要，不願意公衆忽視他，所以將他的比較重要的文稿，報告，節略和演辭，編爲三冊，已準備印行了。

有些人要我出來，擔認刊行他的遺著，因爲他們知道我是他的好友；可是我個人對於那些死後的歌頌卻沒有參加。我在學術界的地位，並不足使我寫一篇頌揚他的文字，但在普通情形之下，卻不能阻止我將他的個人的態度，自然的和魔力的某些點素描出來。然而我也沒有這樣做，因爲我那時是異常煩躁。我們都沒有預料到他會死去，而且正開始共同進行一種事業，對於這意外的危險，一點也沒有防備。現在已快過了三年了，我和他的比較親密的朋友們作了極困

難的討論以後，才決定公布我們之間的這個特殊合作的事實和內容了。

這就是關於本書的問題。我很久地藏着一種草稿，是拉文博士付託給我的一捲紙。關於這些草稿，我以爲我的過去和現在的躊躇，並不是過慮，原來這正是一冊未來一世紀有半的簡單歷史！（我相信讀者見了這些字樣，一定會擦一下眼睛，疑心是看錯了，或者手民之誤。）這確實是草稿的原意，牠是未來世界的投影，同時也是現代的神秘的預言。到現在又已三年多了，三年來的事變，足以證明這預言上的一部份事情，因此我才有勇氣爲這書上未證實的部份，自許和我朋友的敍述連緊在一起，而找一家書局將牠出版。

讓我簡單地來說這本書的起源，和牠怎樣落在我手中的故事吧！我之與拉文博士締交，是在大戰完結的那一年，那是在他離開白宮到日內瓦去的以前。他在暇時，總是歡喜新奇的思想，恰巧我在一九一六年出版了一本預測的小書——將來怎樣？（What is Coming?）發表了關於貨幣的一點意見，引起了他的注意。在那本書中，我指出了戰事中資源的浪費和債務的繼續積累，一定會使整個世界的破產。換句話說，牠將任債權人階級得以宰割世界，解決這一世界破

產和使牠在有希望的基礎上重新開始的唯一辦法，就是公平無私地削減一切債務，降低金鎊中金成份和同比例地降低金圓以及一切其他金貨幣的金成份。那時候，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一極爲明顯的必要；但現在我承認，這是不成熟的觀念——顯然的，我沒有去掉貨幣的價值是內在的一種觀念——可是那些日子，我們誰都沒有凡爾賽和約以後所起的貨幣和信用的動搖的實際教訓。我們缺乏經驗，那時一想到錢幣，就覺得不自然，好像有宿慧的兒童們想到牠時一樣。十七年以後，這個安定金價的觀念，有好多人們認爲是明顯的事實，但那時候，人們認這種觀念，不過是一個無知識的作者對於「貨幣專家」的神祕事情所發表的外行評論。但我的這種意見，喚起了拉文的注意，他到我這裏來談談那個問題的可能，和我所提出的其他一二戰後的問題。這樣一來，我們就熟識了。

拉文和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一樣，沒有智慧上的驕傲，他對於坦白的思想，能夠坦白地接受。他能夠對一個藝術家或一個新聞記者談他的問題；假使他認爲同一個聽差談話，而能得到新鮮的觀點時，他也會這樣做。「明顯」這一字眼，是他口頭所愛說的。「這事，我的

愛親的朋友……」他在見着我的五分鐘以後，就這樣稱呼我了，「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可是大家都自以爲很聰明，不肯去考慮一下；到後來再去追悔，可惜已竟遲了。在這次戰爭後，將有鉅大的混亂——金融的和貨幣的，若去告訴負責的人們叫他們相信，那是不可能的。勝利的國家將搾取復仇的罰金，失敗的國家自然須擔認償付；但他們中間沒有人理解，他們如果那樣做時，貨幣會對他們做出最非常的事情來。他們只注意了他們相互間的應當怎樣做，至於貨幣將對整個的他們會做什麼，却沒有人去理會！」

我現在還能想像他的大着喉嚨的抗辯。老實說，在與他交談的最初半點鐘以內，我是很不喜歡他的；後來我漸漸看熟了他的這種樣子。他太自滿和太自信了，對於我這個緩慢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性情比較起來，是太快，太生動了。我不喜歡他的談話的明白的準備，也不喜他以異乎尋常的姿勢幫助他的說話。他是從不坐下來的，在我的室中蹀來蹀去；當他用破碎而勉強的嗄聲談話時，同時也四處窺視着書籍和圖畫；揮舞着他的長而瘦的兩手，好像在他的談話問題中間游泳一樣。我上面比擬他爲葛萊加馬克斯頓，但在最初的時候，我想起的是度莫利亞（Du

Maurier）的有一時候很出名的 Tri by 中之斯文加里（Svengali）——一個修了面的斯文加里。我感覺他是個外國人，在我的本能上，對於外國人是很驕傲的，正如我的原則是大同主義一樣。他是 Ba liol 的一個學者，而在他到日內瓦去以前，他是我們的外交部中最明亮的裝飾品之一，這在我看來，似乎有點不調和。

在根本上，我以爲我們英國人的羞怯是一種過大的謹慎。我們疑心別人也是同我們一樣講究那細微的道德。我們約束我們自己，常常到不誠實的地步。我在用筆時或者是一個魯莽的人，但在社交中，我是和我們同胞中任何人一樣的小心和掩飾。拉文的直率，襲擊了我的思想，我幾乎覺得他有點無禮。

他要將我的思想認爲不成問題來做談論的資料，但至少，他也應該將他自己的思想同樣認爲無問題地來談。我有時疑心他到我這裏來談話是談給他自己聽的，利用我作爲一個「助音板，」聽他的談話如何發音而已。

他稱我爲「淺鮮事情的發揮者，」當我們會過幾面時，他重複着這一個不很恭維的名詞。

他說：「你的缺點，也許就是才能；對於事情之迅速而不精確的記憶，靈敏的把握住分寸，不耐煩去知道詳細之點，而急情地求了解整個的東西。事業家如果聽見你的話，他們一定十分恨你，他們一定想你這個人是可怕的簡單，然而你知道，你也和他們一樣複雜是他們的生命，你想將一切的複雜除開。你是一個喜歡追根問底的人，不耐煩的窮究一切。假使我沒有必須要做的職業，我也要這樣追根問底了。但是花費有暇的時光來同你一道窮究事變的眞相，是很有意思的。」

讀者請恕我的自大，引用了他對我這樣的評論，但假如要明白我和拉文的關係，要明白這本書的精神，則這些引用是不必可省的。

實在的，我是他的心理的活力的洋溢之出路，這是他從前努力壓迫過而很感痛苦的。我在他面前時，他能丟掉 Balliol 和外交部，在以後是丟掉祕書處、隨意地談話。就本性和出身說，他是東歐的大同主義者，他恢復了本來面目，我簡直成了他的想像中的伴侶，他的無名譽的朋友，一個智慧不如他的助手，他的華生。我漸漸喜歡這種關係了，我習慣於他的外國體質，他的姿勢。我漸漸同情他，當凡爾賽的和議展開時所表示的痛苦和憤怒。我的對異族不信賴的本能，在他

的智慧的，好奇的，強烈的熱力之下溶解了。我們發覺了彼此之間可以獲益：我有一個現成的清淨的想像，而他有智識，我們能共作一件思攷上的遊戲。

那有才而且有創見的朋友，不常來和我談話的鄧恩 (J. W. Dunne) 他在若干年前發明了最早的和最（不同）的飛機，以後曾極力思索時間和空間對於意識之關係的問題。鄧恩所抱的意見以為我們在某些地方可以預料將來。他在他的有名的經驗與時間 (Experiment with Time 一書中，舉出了極可驚的觀察來做佐證。那本書出版於一九二七年；我覺得很可注意，很刺激人，所以也曾為牠寫過一兩篇論文，全世界的出版物競相轉載。

拉文在看過我關係這本經驗與時間的介紹以後，找到那本書來讀，他就寫了一封信給我。平常他與我的通信只是最短的條子如說他將到倫敦，告訴我他的地址有改變，問我的行動等等；但這次是一封很長的信，裏面說，像鄧恩那樣的經驗，不足為奇，他對於書上所說過的還能增加許多上去，換句話說，他能擴張這些經驗！在睡與醒之間，所預料的事情，不應只是明天或下星期的小事情；時間的距離，大可以加長些（鄧恩的試驗，主要是講在清醒和遺忘之間的微睡的

頃刻中的預告）這就是說假使你有長路程的思想的習慣。但這正是懷疑主義須要得罪迷信的日子，爲公衆作事的人，關於這些較弱的暗示，不應做鹵莽的聲明，這些暗示很難和幻想區別，除了一個人自己的心中明白假使有人對這些預料的事情表示很活潑的興趣，他或者要犧牲大部份的勢力的。

他說了一大堆這類聰明的抽象話，後就突然完結。看了這封信，使我有一種印象：他在開始想說的話比他已說了的還要多

後來他回到倫敦，忽然來到我的研究室，將意見說給我……。

「這個鄧恩的事情——」他開始。

「怎樣？」我說。

「他有一種方法，可以把不自覺的睡眠和淸醒之間的流動的夢捉住。」

「是的。」

「他在他的牀邊放一本雜記冊，在醒的時候，馬上寫下他的夢來。—

「就是那種辦法」

「而他發覺他夢中有幾項是從幾日，幾星期和甚至幾年以後的現實到他心中來的事情的預料——有時候是十分明白的。」

「那就是鄧恩！」

「那不算什麼？」

「怎樣，——不算什麼？」

「我也做了好久了，自然算不得什麼。」

「那末……」

他凝視着我的書籍的背面，似乎找不出相當的話來回答。

「怎麼樣？」我說。

他回轉來用一種欲言不言的神情望着我，以後又微笑起來。他似乎是在準備坦白的談話。

「我應怎樣說呢，除你以外，我是從不告訴過任何人的。這幾年以來，我不時地在睡與醒之

間，實際是在讀一本書——一本看不見的書，也可說是夢書。常常是一本同樣的書，真的，牠是一本歷史。」

「是關於過去的事嗎?」

「很多是關於過去的。也有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比如關於北印度和中亞細亞的非常事件。而且，牠是在前進的，繼續着向前進行。」

「進行?」

「是的，牠正要從眼前的『現在』中經過。」

「一直駛進到『未來』的境界去嗎?」

「是的」

「牠是……牠是一本紙的書嗎?」

「不完全是紙的頗像你的朋友白朗路(Br wnlow)的報紙。並不和我們所知道的印刷一樣，是生[illegible]的地圖，但很容易讀，雖然那字母和拼音都有些古怪。」

他停了停：「我知道這是胡說。」

接着又說「但是，牠是可怕的眞實啊！」

「你翻過那書中的每一頁嗎？」

他想了一下：「不，我不敢亂翻，爲的是怕驚醒了……夢。」

「夢還在繼續着嗎？」

「是的。」

「直到你知道你是在做夢。」

「我以爲，——是的，像是那樣。」

「以後便醒了嗎？」

「正是，牠就不在那裏了。」

「那末，你是常常在讀牠的。」

「一般的——很確定的。」

「但有時候呢？」

「啊，正是人在醒着的時候讀書一樣，假使內容是生動的，人們就容易看見好像在書上看電影一般。」

「這書還在那里嗎？」

「是的，我想這書是永久在那里的。」

「你偶然也把這些寫入了筆記嗎？」

「當初是沒有的，現在却記起來了。」

「立刻記下的嗎？」

「我用速記法……你知道，我已有那樣高的一堆筆記本了。」

他又開兩腿，站在我的大鐘傍邊，凝視着我。

「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了。」我說。

「是的，我可以告訴你。」

「但是太草率了，我的先生，除我以外，別人是看不懂的。你看不懂我的速記符號，就連我自己，在寫後的一星期，也認不得了。最近我已將牠抄錄出來，有些是我口授，叫旁人記下來的。」他說。

「你想，」他說下去，並且站起來在我的室中踱着，「假使這是眞實的，這便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了。可是我沒有絲毫證據，一絲一毫也沒有。你呢，你相信這事是可能的嗎？」

「可能的吧，」我想。「我相信是可能的，雖然到底什麼一回事，我還不十分明白。」我說。

「除你以外，我是不去告訴任何人的。自然我若告訴他們，他們要說我瘋了，或者說我是一個騙子。你知道這一類爭吵的，只要看看洛其（Oliver Lodge），看看李卻（Charles Riched）這一定會斷送我的工作，我的地位的。然而，你要知道，牠確是可相信的材料……我告訴你我是相信牠的。」

「假使你抄錄一部份出來，假使我可以看到牠。」

「你自然可以看到」

他似乎在猜度着我的意志說，「最壞的是我太相信那里的話了，似乎是我自己說的一樣，唉？」

他沒有將筆記寄給我。但當我下一次在柏爾尼（Perne）碰到他時，他把夾在彈簧護書夾裏的草稿交給我以後又給我了兩册。這些草稿大體是用鉛筆寫成的有些顯然是他在書桌上用墨水寫的，並且有五十頁已打好字，自然是出於他的口授。他要我好好地保存，細心地閱讀，用打字機把全稿打出來，寄還他一份。這一件事是我與他之間的一個祕密，我們兩人都想着，最好將來出版時，不署作者姓名，在此期間，且讓事變來證實或者駁斥這本歷史中的種種意見吧，事實的輪子，會給牠以確定的估價的。

以後他死了。

他死得很突然，是施手術後的結果。

我聽到他的死耗，即刻趕到日內瓦，告訴他的繼承人和遺囑執行人——里拿先生（Montefiore Renard）——以這個夢書的故事。我很感激這位先生的客氣和他了解世界大勢的

迅速，他很辛苦的在可能範圍中收集了斷片材料，統交給我處理，除了拉文已給我的三個護書夾裏的以外，另一夾子，寫的普通字；還有一疊子的稿紙却用他那特殊的速記法寫的，就是這本歷史了。第四個夾子中所有的材料，是構成現在這本書的末一冊，那用速記寫着的，（甚至連頁碼也沒有標明）編爲倒數上第二冊。拉文似乎是盡可能快地，趕着在記憶消失之前，記下他的夢書中的印象。他準備自己重謄一過，他沒有計及將來有人要讀牠，這種材料只是供他個人之用吧了。牠是一些極簡單的（並不精確的）速記之混合物，人地名等專門名詞則用普通字，所有標點僅用空格，常常用一個字來代表一整句，甚至一整節。三分之一的速記材料，已竟用普通字重抄過了，或是已用打字機打出，要是沒有這些來做嚮導，恐怕這整部的材料，更沒有方法整理出來。因爲這樣，我不能爲牠做成一本無間斷的敍述，打成一片，使這冊歷史首尾完全。原稿中，有幾篇很明瞭，有些則是混亂與隱晦，我已盡可能的將牠抄錄一過，在不能銜接的地方，就自己寫了幾段補充。我以爲我已將一九八〇年到二〇五九年中間世界政府所進行的鬬爭和變化的許多事情，作了一本完全的歷史。在二〇五九年空中獨裁時，即讓位於世界範圍的一現代國

家，一牠在這本歷史出版時，一定是很熱鬧的。讀者將在那一部份看出很大的缺陷，很大的省略，但並沒有使世界團結的歷史的主要道路發生疑問的地方。

現在讓我再略說一下這個古怪的「將來的大綱」的眞實價值。

有些小小的意見，反對將以下的歷史單說成爲一光輝的政論家的想像的夢。我將這些意見放在讀者之前，但我並不强讀者接受牠們。第一，這本歷史中有些地方現已證實草稿的最後一部份上面的日期是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其中好多部份，寫的時間還要早些。然而牠明白指出後一年的火柴大王克魯格（Ivar Kreuger）之死；林白（Lindbergh）的嬰兒被綁的悲劇，發生於一九三二年的春季；同年，莫利遜（Mollison）的世界飛行宣告成功；德國的希特拉（Hitler）政府的成立；同年十二月美國戰債的討論；日本於一九三三年侵入中國本部；羅斯福第二（Roosevelt）當選美國總統；倫敦的世界經濟會議：這種種的預測是如此詳盡，使我有點難以解釋了。我以爲這些不是屬於能預告的一類性質的事情；牠們也不是從任何從前的形勢中能演繹出來的，拉文在一九三〇年怎樣知道這些事的呢？

第二：有一件使我不安，比讀者更不安的，就是拉文完全沒有理由要想對我神祕，無論在天上或在地下他沒有理由對於這個材料如何到他那里和他如何將牠寫下來的情形說謊。

假使沒有這些考慮，我想我是準備和一般人的意見一致，認這本歷史之著作，是拉文有意選擇以發揮他的想像的。這實是日內瓦祕書處的一個自己所虛構的故事，他有異乎尋常的機會來對於事物的趨勢下判斷。或者讓我們說他是希伯來式的有條件的預言，是在一種假的受靈感的情緒之中產生的。當這本書的體裁，完全是拉文的體裁，在距今一百七十餘年以後的字彙現在所用的很少分別，這與我們的期待，以爲將來的文字中應當有些改變者不合。表現的態度，是和拉文在公共場所中完全自覺的發言絕不一致；至少，思想的習慣不是他的，無論那說話的習慣怎樣。或者是他的夢景凌駕了他清醒時的信念，或者是我們被壓迫的思想的上進的一個明顯的例。難道歷史眞的會同這一本書所說的一樣嗎？

我得承認，最初，我的印象還以爲這整個的事情，是一種推算的練習。我很想對於拉文的正文大加註釋，我也想參加在這種遊戲中間，因此我在這工作上很費了幾個月的功夫。後來，我的

註釋，竟比他的正文還要多了，但當我修正牠時，我又認為這些註釋大部份是庸人自擾的穿插，很少對於聰明而多見聞的讀者有所幫助。讀者如果對於本書發生趣味，他多半能夠自己構成意見；假使看不起本書，他將更看不起贅在上面的註釋；那我的註釋，或者會像在公共圖書館的書籍中所看到的鉛筆寫的東西一樣討厭。假使這歷史只是推算的歷史，那麼註釋也是不適當的，假使本書裏面有較多於推算的東西，那麼註釋實在是一極嚴重的無理。最後，我將那全部的註釋都刪掉了。

但我也需要將這些章節排成次序，有許多不可省的穿插，仍得保留。我已試了幾次的安排，因為這些章節在拉文寫下來時並不是依照牠們的適當的編年次序的。我已竟使過渡的地方變成更平坦，但我仍希望將拉文所選下來筆記照原樣的發表出來。

我們在這裏開始揭開歷史中的一本新書，雖然牠並不是他交給我的夾子的第一張紙，牠順利地略述最近諸年世界事變的進行，在我看來，牠述說的樣子是很新穎而且很動人的。牠從一個新的觀點來分析大戰的主要因素，由述敘「失敗時代」的故事（我們處在牠的開始的

諸年）便自然地連續地流露出來。除了這篇「導言」以外，眞正的敍述所包含的時期大約是從一九二九年到二一〇五年的終了。最後登記的事變，是在二一〇六年的元旦，牠臉便提到了那正是劃平紐約的高樓的燼餘鋼架的一天。本書的印刷及發行當在新年（二一〇六）之初——或者說將在新年之初更妥當些。

著者H·G·W。

卷一：今天和明天

二 紀年的標誌

這一行星上的人類歷史，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中間，有了一番變遷。歷史的範圍是擴大了，並且是統一了。從前牠不過是相互關係日漸密切的集團歷史之結合；現在則明白地和自覺地變成一整個了。許多種族，社會，和政治的命運，都完全匯合在一氣。於是從前所想不到的一些可能的事情，現在牠的遠景在人的想像中展開。這一遠景又使人們的思想隨之發生了無限的變化。

思想變化的第一階段，一定是破壞的。有些生活的，義務的概念，從前曾指示過或滿足過最有能力和最有智慧的人物，這些概念自然有些偏狹和武斷。過了十年，人們就開始不相信牠們了，牠們也失去指導的力量，思想本身沒落了，價值也就減少了。舊信仰失了勢力後，人們的心理

遂感覺不安，只好盜名，欺世，自棄，浮躁。從前，每一個人所屬的民族或地方，都有一種文化，成為特徵的行為方法，他們相信這些文化最後的或無可非難的正確。現在，這些文化都成了解體和破碎的簾幕。生活在這個單一的世界社會中的我們，所必要的一種行為，隱隱地出現在舊概念的後面，最初不免模糊，時說產傳統面罩的漸漸地溶解歪曲和潛折。

現在紀年學院還沒有完成改訂的工作，還沒有確立社會進化的重要日子，於是對於人類經驗的這一個熱烈時期，人的心靈和意志的發展，我們的徒運，最好仍用現時通用的世紀做單位，來計算基督紀元以前和以後的時期，雖然這算法是呆笨和不合宜。我們是從基督教世界繼承的這個鳥籠個制度，那種以百年為一方塊的任意分劃，在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書籍中，採用了有兩千年。牠使許多人（除了最謹慎的以外）的歷史見解不正確；青年學生須常留意於這種謬誤的分劃。萊特佛特（Peter Lightfoot）說過，我們說的是十八世紀，我們想的是從西元一六四二年「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條約」到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大敗的時期的風俗，時尚和態度，我們說「十九世紀」，在心中引起的畫圖和想像是煤氣燈和蒸氣運輸時代的東

面，從革命前後到秩序恢復的窮苦諸年，以至一九一四年引起無限震驚的世界大戰。二十世紀階段所喚起的想像，是飛機，世界的電氣化，及其他；但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飛機是一極稀有的東西，（第一個飛機是在一九〇五年升空）而用蒸汽開門的火車和輪船，到了一千九百四十年代，還未完全為電氣所代替。要每一代的青年，首先去記那些無意義的世紀之型式，以後再去糾正牠，認為那是不成熟的辦法，這是多麼麻煩和費力呀。所以我們的紀年，如果有人修正，一定為每個教師所歡迎。到了那時候，那修正的紀年使男子或女子，能將我們人類的歷史，列成重要的集團。

紀年學院正公開的提出牠的任務，請人們從各種觀點來討論牠提議將我們人類的已知的和可以用年計算的歷史分為若干長短不等的時期。這些時期的劃分，自然要引起極熱烈和有趣的討論，我們對於事變的價值，大都有自己私人的估計，關於古代文化社會也有許多爭論，在興奮的討論和未解決的狀況中。我們的紀年對於過去四千年來某一年發生某一最重要的事件，是可以確定的。又由於進行沖積層研究的 Selwyn Cornford 委員會細密而耐煩的工作

的貢獻，我們也可以確定另一個一百世紀內重要事變發生的十年期就過去的三千年說，我們現時無疑地應採用的分劃點，第一是亞力山大和希臘征服的時期；西方世界偉大的希臘——拉丁的貨幣帝國主義的階段即從此開始；這是由亞力山大大帝度赫勒斯滂（Helles ont）開始，其終點或者是衛木克（Yarmuk）戰爭（六三六年），或者是在耶路撒冷城陷落於阿瑪(Omar) 教王時（六三八年。）以後就是回族和蒙古人壓迫西方的時期；這才開始了基督教封建主義和伊斯蘭（Llam）封建主義相對立的時代：即亞細亞稱霸的時代。到了勒潘陀（Lepanto) 的一戰（一五七一年）就完結了。以後第三時期就是新教和舊教（反）改革的時期，主權的國家，用有組織的常備軍互相競爭的時代，就從此開始，即所謂歐洲稱霸的時代，或稱國家主權的時代。最後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浩刦到來，這時候大西洋文明的新經濟方法之向外擴張，為歐洲內部的國家主義緊張所代替。戰爭及其所得之結果，對於人心啓示了一個不完全歐化的世界中所伏的可能和危險。這個世界不自覺地已打成了一片，成了一個系統，然而仍為「威斯特伐里亞條約」為帝國相互競爭的思想所困。這個心理的驚恐和覺悟，為一現代國

家一時期開始的標誌。這個最近的時期的開端，即是我們現在準備研究的失敗時代。牠是一「現代國家」時期的第一期。第二期，不是一個新時代，是以麥吉飛（Mé e e）的宣言開始。四十五年前，這個宣言成了人類的普通常識，失敗時期由此就結束了，這時期繼續了百五十年。

這部歷史初次出版的日期，是在耶歷(C.E.)二一〇六年。在銷完好幾版以後，牠的出版日期將改爲現代紀元（M E）一九二年，一八九年或一八七年。依我們的紀年家決定，是以大戰爆發的一九一四年，或俄國社會革命開始的一九一七年或凡爾賽和約簽字的一九一九年作爲失敗時期，和爲世界統一而衝突的時期之決定開始。第二個日期，現在看來似乎是更合實際。

耶曆一九一四年，有組織的世界制度的概念，大家都以爲還不是人類所能實現，然而一九一九年，這個概念的力量很大，竟盤據在許多人的腦中。人們想出「現代國家」的概念來。這些概念正在萌芽中。俄國的蘇維埃制度已自稱是一種世界制度。在大多數身受過大戰痛苦的一代人看來，認大戰似乎是純粹的浩劫和損失，但我們在前途中已看到那可憎的數年（其可憎正與衝突所起的一般的沉悶和卑賤的害怕成正比例）的人，則認爲在大戰中，物質向生命的

破壞，雖然是空前，却完全不是那種不可抗的浩刦。我們認大戰供人脫離一些破舊的見解，却是一種呆笨的和不由自主的脫離，把這些見解變得荒謬而可悲，所以戰爭是人類命運辯證發展中實際不可免的步驟。

二 「現代國家」觀念的出現

大戰以前和大戰以後的世界，有重要的不同。在那使人窮困却也使人清醒的風暴發生以前，明瞭地認識，無論當時如何貧窮，人類總能在世界上建立起秩序和快樂來，有這樣見識的人，不過是極少數的卓識者罷了；可是在浩刦之後，這個思想已傳播到日漸增多的羣衆，成了大家的希求與慾望，最後成了能促進有組織的羣衆行動的工作信念。

大戰以前，能預感到這個觀念的人而宣傳牠的人，在我們今日看來，似乎是不可解地膽小和軟弱。除了雪萊(Shelley)以外，戰前的人說到世界制度有改革可能的話，都帶有不能現實的氣味。在他們大多數中，維多利亞時代的「放浪」的恐怖，正支配一切，作家用得意的神氣，笑他自

己的提議，這些先知者中沒有一個能够相信他們自己的推理的。白朗（Maxwell Brown）最近發現一小冊子，偉大的分析（The Great Analysis），出版期爲一九一二年，裏面預言「現代國家」的基本結構。這在當時，是可驚的，有先見之明的著作，可是說得極其小心，甚至書中不敢署作者的姓名。以這樣一個可以使世界革命化的計劃，而至於作者不敢署名，據他自己說是因爲怕人非笑得使他難堪。

到了現在，這個成爲我們現代生活的基礎，牠漸漸地把反對的人的戰爭的愛國主義驅逐了，在一世紀半以前，即成爲志士們所想實現的理想和奮鬬的目標，這是依了怎樣的心理和行程實現的。白朗的有趣味的大戰前現代國家的預言者（Modern State Prophets Before the Great War）一書，曾作了一詳盡的研究。他追溯這一概念，談到這一概念的萌芽期，他指出牠的最初表現，完全不是和平的而是征服世界的夢。他說到牠和尋常習慣及實際常識作了長時期的鬬爭。在他的鉅著的諸附冊中的第一冊，他引了幾千種引語，遠溯到基督紀元的初期以外。一切一神論的宗教，在精神上都是「世界國家」的宗教。他攷查巴倍爾塔（Babel Tower）的神

話，認這是最古的世界大同論者，或曙光以前的先知，企圖解釋人類區分之謎，（現在我們很有理由認此神話是尼普爾（Nippur）的古德卡，（Eme al Gudeka）即古時蘇馬（Sumeria）人的寓言家作的。）

白朗指出由於古時諸帝國的生長，和那時官家將諸神祇集合在一齊供奉，混合的宗教發展，必然引到一神主義，至少從釋迦時起，人類大同的理想成了一種活的信仰，這種信仰，好像是一種感情，總在世界上某一處存在。但牠的最初，只是一種簡單的情感和對於生人一種動搖的同情。從這情感進爲一種實行的事業，實在是最近時代的事。必要的條件，至今還沒有完全。

白朗在對於人類歷史作更重要的貢獻以前，簡單地研究了一下人類的發明。他指出至少在過去一萬年，自從克魯馬囊（Cro Magnards）人將他們的革袍和帳幕印花以來，印刷的藝術，時現時滅，在十五世紀以前，從未達到印刷書籍及普及文化的階段。這些事件也從未在人類行爲中佔重要的地位。他集合了關於人類屢次要求飛行而未成功的佐證，如在貝得拉散（Bedrasho）最近被找出的第四時代的滑翔機，去年在米拉貝拉灣（Mi ra el a Bay）發現的被

擣壞的禹州•(Yu·chow) 機和有趣的毀損的裝飾品和人的遺骸，（這些劫後的東西是在二一〇四年地震之後，測量飛機克勞福 (Crawford) 的深海照像中初次被人注意，以後又爲那普爾斯 (Naples) 生物試驗場的潛水艇 Sal e nin 號的潛水者所尋得。現經 G ul o M ari etti 教授證明爲 Daedalus 和 Icarus 的神話的滑翔機的遺骸。）白朗又追溯從愛爾遜 (Aalesund) 的碑文和古代中國近 Bahia Coqui 處石穴的刻文起，到西歐人在十五世紀最後建立渡大西洋的不斷交通爲止，美洲是在不斷的被人們發現：有時從東方，有時是從西方，這樣的發現共有十六次之多，都是依據現在的記載。但是無效果的單獨的發現，也許還不止這幾次，不過沒有留下遺跡罷了。

這些古人的用進取的精神而能力不足的成例，幫助我們了解失敗時代的長期鬬爭。在我們現在看來，地球上如此明顯和唯一清醒的人事安排，不知道我們的祖先，在完成牠時，是經歷多少的困難啊！

我們極容易解釋這一切流產的，無結果的發明。首先就橫渡大西洋航行的例來說：或者古

時到了美洲的航海家從未回來過或者他們在回來後，找不到必要的幫助和資斧，能在他們死的以前再去一次；或者他們遇着許多險阻；或者他們在第二次企圖中喪失了生命。他們的故事被訛傳爲離奇的神話，人們就對實質也不相信了。人類在沒有很好的帆船，航海科學，水手的羅盤時，要想跑到美洲去，確是一種徒勞的冒險。

再就印刷術說，自從中國人發明了系統的製造廉價的標準紙以後，印刷書籍及知識的普及才成爲實際的可能。最後人類達到飛行的遲緩，是沒有法子的，因爲在人們進步得超過偶然的飛翔之前，必須冶金學達到能做內燃機的一點。不到這時候，人們是不能建造又强又輕的東西去和空氣的迴旋搏鬬，而達到升空的自由的。

對於公共幸福作集體的服務而組織單一的人類社會，這一概念同樣要等待交通器具迅速進化能戰勝地理的隔離之破壞的影響的時候。這一迅速的進化，在十九世紀時方纔達到。蒸汽，石油，電力，鐵路，輪船，飛機，有線電和無線電，很迅速地接踵而起，牠們將人類織成從未見過的一片，不知不覺地在不到一世紀的期間，那絕對不能實行的組織，不僅變成可能的，而且變成非

行不可的組織，如果要文明繼續着。

大戰之在歷史中所以佔最特出的地位，就在牠指出那一組織的必要。從前是不曾有人認爲必要的。凡事必先有完成而後有承認。大戰以前，主張將全世界組成一個國家的預言者，從未感覺牠的必要。他們對於人類的統一，表示他們的有禮而羞怯的姿勢，認爲漂亮而有益，但並不是非做不可的。大戰以前，世界合作的最明瞭的要求，出自第二國際，大戰以後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把國際聯邦的超國家弄成了模糊搖曳的暗影，由此甚至大多數最先進的作家，亦以爲所需要的最後的組織，就是將現行制度加以補綴，以便阻止或和緩戰爭，並阻止無產階級暴動的衝動。

共產主義運動，由於某些偶然事件之結合，奪取了俄國，在那里並且證明了牠的理論價值。可是牠從來是從世界大同的社會主義立場退却，並不是由這立場前進了牠的理論爲了實行的需要是很不夠的。牠的觀念的發展，爲馬克思的自大主義所妨害，並且加上俄國式的保守的武斷。馬克思的不容忍，固執的壞樣子，虛榮的堅持，創造了一個是與達爾文主義相並列的絕對

的學說，這學說對於以後共產主義的發展，投了一個不耐和倔強的暗影。他最嫉視社會主義的烏託邦派，所以在列寧迫切地要求政權以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無計劃的前途表示十分過駭的驕矜。「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說，「推翻資本主義」除了千萬種的幸福以外，還能有別的什麼？共產主義堅持經濟的社會化的必要，但牠在俄國獲得政權以前，沒以顧及牠的技術的困難。牠只在一九二八年，即取得政權後的第十一年才產生出牠的遲緩而不均衡的「五年計劃」，這以前，爲實現社會主義，牠沒有任何概括一切的工作計劃。牠在試驗的過程中，不得不訴諸臨時的權變，倉卒想出的辦法和戰線的改變，用華而俗僞而辯的怨辭來自圓其說，說整個世界的運動，牠以前並不曾有過。

這本世界史的讀者，已知道列寧死後共產黨的精神的和智慧的力量，監督不住或抗拒不了那一有力的，專一的和才能有限的喬治亞（Georgia）人史太林（Stalin）之獨裁。在有創造才的和機智的列寧早死以後，史太林就急速地壓倒這樣一個聰明的，風頻的，但是必須有的人如托羅茨基（Trotsky）——他若非缺乏權變和主要的尊嚴，一定做了列寧的繼承者。這使我

們拋棄「現代國家」能夠在俄國最先湧現的希望了。有創造能力的人的忠實信徒是可怕的。列寧將馬克思的教條弛緩了一些，並且弄反了一些，史太林將他所想像的列寧主義做成新的而且更僵硬的教條。以後就是政治的教條主義者在一個急需技術能力的鬪爭中，支配並且妨礙技術家，正如好幾世紀間，基督教世界之神學的爭論，陷歐洲於貧弱和荒廢，縮小牠的統一影響的利益到零度一樣。所以在俄國政治理論家的迂闊，阻止了組織上的效率，青年人被訓練得虛驕，並仇恨外人。其實際的影響和法德意大利或蘇格蘭的陶醉的愛國主義並沒有分別。

俄國，因為心理的發展，隸屬於政治，其所處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階段，一般的貧弱和缺乏批評的活力，可與洛斯托夫柴夫（Rostovtzeff）在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所指出的戴奧克利興皇帝（Diocletian）時代一樣——有好的意思，可是沒有精神來實行專制。俄國革命，抱有領導人類的野心，但是一開始就失敗了。牠的世界大同主義，比一百二十年前法國大革命的世界大同主義不見得會支持得長久些。

俄國建設的運動，幾乎不可免地要落在西方發展的後面，早為列寧的銳敏而深入的頭腦，

於俄國表面處於領導地位時，就預見到了（見歷史文件集中的左翼共產主義。）但他的觀察係出於馬克思主義傳統，而不是自由思想中的回聲。

「世界國家」的概念之爲，革命的目標，終於在西歐成長到完全的程度。最初牠是暗中生長着。一九三三年任何觀察者看見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制，德國國社黨之紛擾，類似的別國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到處關稅壁壘增高和其他對貿易之限制等事實，會得着錯誤的結論，認世界大同的觀念，到處都在種族信仰和國家主義之前退却。然而在這個期間，「現代國家」的萌芽正在生長，牠的崇信者到處在學習和集中力量！

「世界國家」的預言者需要有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的金融風潮，以及全世界經濟生活之不斷地走向崩潰，（金融風潮僅爲其序幕）這樣，他們的信念才有了勇氣。那時他們才開始發言；他們從前是局促地，部份地和不得結論地批評公共事務，並且引此爲滿足，現在總明白堅持着要改造全世界，換句話說，就是要世界革命，雖然他們仍避免「革命」這一名詞。這一個目的和意志是怎樣弄得更確定的，很可以說明社會生活的性質的改變，並不是一個或兩個

特出的人，突然在覺醒中成爲領袖，爲人們所傾倒而推舉，就可以行得的。領袖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世界國家」這一概念，是人類思想中傳布得很廣的一種運動。

白朗在第二本附冊中，集合了對於歐美五十個典型的演說家和著作家的精確的研究，他列了近兩千人的一個表，兩千人所產生的結果是平行的，這些結果都擺在百科全書圖書館供參考。在每一例中，那些慎重，秩隆和有所保留的意見，都變成更高聲和明瞭的講世界形勢的話。自一九一七年以來，這些模範的人只是說，「應當做什麼？」說了幾乎十年之久，都帶着溫和的聲調。以後他們突然起來說：「必須做什麼！」並且漸漸說得明白起來了。這是一種普徧的公論的運動，影響世界上一切較聰明的人。思想的變換，是否發生過，現在是不知道了。發展是很快的，幾乎辨別不出什麼先後來。

一切聰明人的結論，可簡單敍述如下：他們認識人類社會業已變成一種不可分的經濟系統，其中有無數的衰頹而潛伏的幸福的可能性。一九三一年，這一概念就在思想很頑固的法國也出現。一個不知名和短命的法國內閣總理賴代爾（Laval）在告別美國（他於那年爲了何

種使命渡大西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的演說，卽其一例。而我們看見著名的大聲演說家如美國的胡佛（Hoo er）總統和英國的首相麥唐納都響應他。

這種思想既然有政客們對牠作幾句口頭的恭維，也很夠時髦了。可是努力實現牠到邏輯的結果的人，還只是聰明的少數。這些邏輯的結果必須是否認現代許多政府的主權，建立有權力的中央統制機關以補充或代替牠們，使軍火的生產，主要經濟物品的生產脫離利潤尋求者的管理，並保護工人，使他們得到適當的工資。

然而一九三二——三三年的了解這道理的少數人說得很明白。他們提出這些無限的改變來，不再看爲有利益的事情，而看爲挽救文明，免於浩刼所迫切要做的事情。並且不僅挽救而已，他們那時就已經看見免除災難之後，不必就是一種淒涼而恐怖的安全。這是很不可以相信的，與現時的秩序混亂和貧寒對立的前途就是人們以前所從未知道過的「這樣一種豐足，繁榮和機會的富有。」一九三二年的明瞭的人，相信世界的秩序，普徧的富足和人類創造力之不斷地增加等事，在將來都是可能的；同樣相信我們今日活着的人，在實際上實現那一可能時，會

充滿了生氣與活力。

文明的人們，並不由於明瞭的遠見而得到快樂。他們不僅爲了同時代人的恐懼和貧窮所苦惱，他們確信自由世界，本爲人力所能達到，可是被魔力所阻住了，所以不能實現，這是他們所感着痛苦的。他們看見數萬萬的生命發瘋，變成殘廢，生活可憐，犧牲不正當，可是他們看不見人類生活這樣受摧殘和受饑餓的根本必要。他們看見數百萬青年生活傾向於使用暴力，折斷肢體，過早和可厭的死亡。他們想在這種狀態以外，建築他們的安全，他們的快樂和他們的自由世界。

白朗在稱爲「一九三二年的「Tantalus」」（希臘神話 Zeus 之子，被罰立水中，水高至下頷，但低頭欲飲則水已退。——譯者）的一章，引出這樣的四十個例。但神話的 Tantalus 是被不可違抗底上帝的命令放在外表可以達到而其實是不能達到的地位。人類並未受這種可憐的命運的支配。包括全世界的「現代國家」在大戰的十年內在我們人類的活的想像中大放光明；一面看來是荒唐地近而另一面看來，似乎是離奇的遠過了一世紀的熱烈的昏亂和

無秩序，那個「現代國家」才可以從潛伏的可能中漸漸抬起頭來。

我們現時必須從這些戰鬪的，犧牲的和受苦的一代人，「半光明的一代人」的故事講起。

在歷史上，這是人類第一次眞正企圖統制他的命運。從前是風俗，傳統，外部的需要，偶然的事情等做成了不可抗的結構，他只有在裏面想他的解釋和他的安慰他關於自己的天性不願有何明瞭的智識，關於他的命運只有作傳奇來歌詠。他信奉統治在他上頭的上帝，藉此來逃避對於他的辛苦和患難的責任。他固守着反對理智的成規，他迫害和企圖毀滅每一懷疑的思想家和那說的試驗家，因爲這些人妨害他恬靜的卑屈。他寧願安貧若素，不願由新努力而得着痛苦。現在由於許多顯明的意外事件之複象，特別由於一百種不同的和不協調的文化在世界的範圍內相互不信任和相互破壞，使他不得不看見現實。在變化的氣勢愈益廣闊時，就是卑屈也使他感覺到不安了。努力是在他的前面，激勵是在他的後面，他不自主地被迫問他過去是什麼，不顧他的深刻的保守而開始認識他「應當怎樣」的使命！

現代「世界國家」的觀念，當我們回顧那些分散的和各種不同的人表現出這種意見時，

當我們估計他們最初為實現他所從事的努力時，我們在公道地判斷他們之前，需要知道愚昧，成見，和惰性的深度，不僅在他們生存的社會中，而且在他們自己的內心也需要和這些東西爭鬪。我們要描寫的，不是光明與黑暗的衝突，而是在盲人中瞎眼的人的鬪爭。我們需要了解，雖然他們因遠見到今日的文明世界而被迫害，他們仍非屬於我們的時代，而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心內所想像的，與現時實際發生的大不相同。白朗的書，有幾章專門研究早年的「現代國家」預言者同時又是事業家的人，他的結論，指出二十世紀的三十和四十年代，對於「世界國家」的可能，有明瞭的總概念的男女，增加得很快。他舉出他們的文字和口頭語，常存可驚的先見。他又尋出他們在發言之後的生活情形，信仰和行動之間的矛盾充分顯示了個人生活之條件性。

他寫着：「在安全和莊嚴的研究室中，這些男女們能夠看得明白。在那退休的時間內，柔弱精細的腦筋能逃出直接的生活，各方都感悟到因果關係，能看出社會事變在時間空間的經緯中的永久價值；但外面擾亂的喧嘩聲侵入了書齋，把書齋的門直接撞開了，此後，同時代的生存，

歡樂，騷動，戰爭和市場等等吵鬧的聲音一齊闖了進來，當天需要做什麼的急迫問題將關於我們的共同命運的美麗思想驅逐得煙消雲散了。

白朗對於這一段的說明，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就是美國進步黨領袖彼得勞特（Petor Raut）一九三七年革命宣言的草稿的真蹟，這無疑在當時是一種令人感動的文件。勞特以勇敢的殉難來最後證明他忠於他心中最好的思想，但在這草稿的旁邊有一堆小數字——乘和加的小數字，喚起了人們的注意。白朗找證據的本領真好，又有他的一組勤勞的助手幫着他，於是他便能精確地指出這些數字是什麼。原來當勞特在他預見許可他為我們計劃一新世界時，他的思想不完全集中在這一目的上面，他的思想是游離的，有一時候他就忽視宣言而去計算這些數目，他是正在從事於工業證券的投機，他腦中活動的大部份正在考慮抛賣出的時候是否到來。

二十世紀的智識分子如社會心理學家所稱的「分心」的例子，比這更動人的，我們還找不到。十九世紀中葉，在西歐和中國有一種原始的娛樂，叫做：「散光幻鏡」，將透光鏡排成雙圓

筒式，使塗着粗疏顏色的畫片投映在幕上，亦稱「幻燈」，一張畫片起初爲怪機器的右邊的透光鏡所投出後又把光移到左邊，這樣，器械的一半所投的畫就散失了，而另一半變得明亮。眞實的變成幻景而消失了，幻景的微弱暗示，最後變成唯一可見的眞實。這顯然是我們的祖先所認爲「幻」的效果。在某一階段，我們很難決定那些部份是前進的，那些部份是後退，或者決定全體中的那一部份是眞的。人們對於既成的習慣和制度失去了信仰，「現代國家」的思想就在人類智慧中誕生，正如這個無甚機巧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玩意兒是差不多的。

三 舊制度的不平衡之集累

我們將失敗時期擬之於舊式的「散光幻鏡」不算太過。「現代國家」實在已日漸自覺，而且自覺地努力實現自己。但是那瓜分世界於他們之間的六十個以上的主權國完全不預備使自己消滅而來擁護這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並不是一件永在增强的東西，而那些主權國也不是從此一直衰弱下去，永不抬頭。二十世紀開始的十年間，確有這種和平的，有秩序

的新陳代謝之時示，有許多東西可被解釋爲在許多政府和文化之形式的分歧中，人們能逐漸建立起一世界的社會來。但這些暗示比起立卽準備抵抗牠們，和將牠們弄反過來的謀劃，是表面的而且不重要的。

我們且考慮那時候有什麼主要現象使許多人心裏在期待着一個世界大同的社會。那時已完成了極大部份的金融統一。倫敦的「西提」(City)區的放款遍於全球，金鎊實際是一世界的貨幣，在可與各地方的貨幣交換變動率頗小。各地的經濟生活都變得一致了。在大部份地域的貿易進行，障礙很少，而英國人還希望他們的自由貿易的世界主義能爲全世界所接受。羅馬的國際農業院正發表農業生產的每年統計，向商品運輸的世界統制在進一步。人口的大移動和從新調整正進行着，任何政府都不加干涉或妨礙。比如說吧，成羣的俄國人，波蘭人，在收穫時漂流到德國東部去做短工，收穫之後又回來了；幾十萬意大利人到美國去做過幾年工作，賺了錢又回到他們的故鄉；一個普通的旅行者可以到全世界的比較安定區域，人們從不問他要護照，除非他到郵政局去領掛號信或旁的事情要證明他自己是什麼人。

有些小的但是重要的聯合服務已經成立了，而且在全世界已有了健全的法律地位，郵政聯合，即其一例。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一件寫成的文件，交到收件人的手中，無論他在世界的任何一角，和今日是一樣的可靠，雖然不及今日的迅速。（歷史文件部最近重印一本小書國際政府，是烏爾夫（L. S. Woolf）在大戰期中爲老費邊協會準備的，對於這樣的辦法總結果一回。他列二十三個重要的世界協會，關於貿易，工業，財政，交通，衛生，科學，藝術，文學，毒物，妓院，罪犯，移民，和一些小的政治事件。）這些世界範圍的合作（尤其對於英語的民族）似乎預示由十九世紀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結構的聯合能平坦地過渡到人類的安固的聯邦。「世界國家」的觀念，那時候已有很多人知道，如騰尼遜（Tennyson）爵士早在其一八四二年出版的 "Locksley Hall" 中有過這樣的思想。但那時候卻沒有任何努力去實現這觀念，並且也沒有感覺這種努力的必要。大家期望由事物的內在力量的發展，可以自動地實現牠。

人們對於沒有系統的事變，頗相信其內部有某種潛在之善力的存在，這雖是當時的普通錯誤，但也可以說是唯一普通錯誤。牠影響各派的思想。馬克思的信徒（當列寧還沒有威風地

走進世界，並且還沒有「布爾雪維克」的改進共產主義以前）也是認他的世界共產主義的夢是必然的。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學生們，在「自由競爭」中，也找到了一個仁慈的天意。極端的社會黨和極端的個人主義者都說：「信賴進化」正如基督徒虔誠地信賴上帝一樣。二十世紀唯有「布爾雪維克」運動能夠將人類的意志放入共產主義中。在十九世紀，無論是革命的，或者是反動的思想，都爲那種有把握的不負責任的懶惰心理所溶化了。孫教授（Prof. K. Chandra Sen）曾說過，維多利亞時期中的希望，不是興奮劑而是麻醉劑。

我們現在是生活在有紀律的制度中，也是辛苦戰鬭中鍛鍊過來的勝利者。我們知道，從一切外表看來，有希望的事情是如何的空虛。我們關於試驗科學從演繹的智慧主義中如何解放出來，已有過一般的序述了。在那里我們描寫着機械發明的偉大行程是增加每一有作用的物質之能力，完全不管牠對於人類起如何的影響。這些發明是大公無私的，在人類中間，可以促成世界範圍的理解，也可以促成世界範圍的屠殺。

這些發明家和研究家所創造的新機會，已竟爲人們所濫用了，却並不是發明家和研究家

的過失，那是屬於他們所管領的範圍以外的。他們還沒有他們自己的共同文化。各人都在各人自己的領域中工作，他們對於他們所發明的東西，爲人類作斷片的不規則的使用，也不能負責任。生物學的尤其是社會學的發明，比起物理學的和簡單科學的實際進步，本來落後得多。生物學和社會學的發明之應用，亦較爲困難。牠們所影響的事物，都是在社會習慣中根深蒂固，所有新奇東西不能自由地加入。我們在沙石鋪的路上，很容易用汽機或鐵路來代替馬車和馬，因爲這樣的改變，用不着把路同馬草或馬去處分。當鐵路代替馬車的時候，人們也一樣任馬和馬車去競爭。但人們却不能把新的社會制度，新的社會政治和工業的關係，建立起來，使牠和舊的同時並存。這確是一個更麻煩和緩慢的事情，因爲不僅是一個驅逐的問題，而是改造的問題。舊的要變成新的，可是社會的進行不能停止片刻。由於時間上的差異，生物學上老的東西被機械上新的東西所擠出，是不可避免的，這種事情，在二十世紀正達到了最高度。

我們也可以用一個病理學的比喻。人們從前沒有研究過活的機體之相稱的發展，那時候如果人的身上有某種不規則的生長時，他們是很痛苦而且沒有辦法的。那時的醫生，照當時的

程度，完全不能治療這樣的毛病。這些病症中有一種是由於血液中的所謂 Mrni 的比率，使骨節無論局部的或全部的都生產過剩。患者的外形逐漸改變，變得不像他過去的自己，成爲他過去自己的諷刺畫。他的舉止粗野和笨重，他的頭蓋骨古怪地擴張，他的肢體的比例改變，他的肌肉也失了常態：總之他是變成了一個怪樣子，並且殘廢，最後自然是死亡了。大戰前的一百年間，人類社會也發生了與此絕對相似的事情。在機械發明和實驗物理學的刺激之下，社會的骨骼，肌肉和胃腸都腫脹了，牠的神經的統制不能與牠相符合地擴大，而成了畸形的狀態。

大戰以前的時期，許多觀察者已模糊地認出：這個世界是不相稱地發展。大家喜歡說的，就是「精神的」進步趕不上「物質的」進步。那時節，原始的和簡單的精神與物質之對立，還爲人所承認。平常說這些話的人，總帶着一種他比起全世界來，精神要高明的神氣。有時候，說這些話好像有許多模糊的暗示：什麼使別人抑制自己啦，不要使現代的發明用得太快啦，或者多去幾次禮拜堂啦，或者早些和簡單些結婚啦，或者多讀些偏向「精神的」一類書籍啦，或者不要男女混合洗澡啦，或者是工作得辛苦些而工資反拿得少些啦，或者裝得更紳士樣子的服從法

律啦，好像那麼一來，一切都好了。大家只知道這些事情，很少有人認識社會機體的不調和正在擴大和增加，直到大戰以後，人們才有正確的認識。

青年的讀者將問道：「中央觀察局在什麼地方呢？牠應當登記這些不規則的事情纔好；教授和學生的團體在什麼地方呢？他們應當想出些調整的計劃來纔好。」

那時並沒有中央觀察局，是過了一百年才成立的。精密的討論，計算，批評，和預測的複雜組織，在那時的人是未曾夢見過的。那些有思想的，充滿嚴肅的活動的城市，只是當二○一○和二○三○年之間，在空中獨裁之下，歷史博物館和圖書館如網一般的組織以後才存在的。甚至思想的母親，世界百科全書機關，直到二○一二年才建立。在二十世紀之初期，人們對於經濟的許多力量及牠在社會所起的影響還沒有適當的估計，那時只有幾十個教授和對這些基本研究有興趣的若干人們散處在全地球。就各種意義說，他們都是分散的，他們的交通也沒有系統。他們沒有研究的權力，沒有適當的統計，威望也很小，很少的人注意他們所想的或所說的。

也許，他們只值得這樣漠視，而不能得着更好的待遇。他們之間，愚蠢地相爭和相輕，他們相

互涉視並且故意誤解。當我們讀那時期所出版的社會和經濟的論著時，我們不能不認識出世界智慧的生活，在那方面是異常的落後。那些出版物的作家，寫得嚕囌而繁冗，並且不可信地空虛。至於試驗科學領域內的許多工作者，則每天都在增加新智識和改造舊智識以達到新鮮的和實際的勝利。這兩種人竟生在同一時期，在我們現在看起來是很難相信的。自從一八一二年，城市初用公共的煤氣燈時起，直到大戰爆發，這世界先後為煤氣，蒸汽，石油，電氣所改造。電氣科學更有長足的進展，地球上為人所不認識的地帶，也被探險家所找出，並且繪在地圖上。以前從未想到的一堆原子和化合物和幾千種物質現都為人所利用；瘟疫也為人所遏止和克服了，死亡率只當從前的一半；生命延長的平均時期增加了一二十年。人類在物質上雖有了這些成績，可是社會和政治科學實際上仍是無用和沒有進步。在那一整個的世紀裏，沒有一件事表示人類應用社會的，經濟的，或教育的原則，是有過什麼的成績。

那將社會制度作為純粹的科學的檢討的工作，直到大戰以後才開始，「社會生物學」的講座，也一直到一九三〇年才在倫敦社會科學院設立，而且在該校設立社會心理學的講座的

主張還只有一些暗示，以後好像連消息的紀載也沒有了。一九六八年倫敦由於北部斜坡上的新建築壓力太重，以致引起土地的崩陷，泰晤士（Thames）河的河道也變了形，接着又是倫敦的第二次大火，一大堆的材料被焚毀，英國博物院的無價的材料也在內。至於其他處所的損失，雖也嚴重，但比較還算小。克萊爾市場（Clare Market）的有趣的機關的一切文件也包括在內。但那一個社會生物學的講座確實是歐洲的第一回呢！

因爲社會科學出現得遲，十八和十九世紀先進國家的精雅的，雖然爲社會所限制和不安的文明，也繼續解體，同時候的人沒有一個知道是什麼緣故將牠裂成碎片的。二十世紀初期的歐美人，對於破壞他們生活的社會政治力之了解，不見得比羅馬帝國的國民在她滅亡時了解得更清楚。豐富和表面的安全是發生了，以後就是毀滅的發生。那時人們對於這些現象的原因沒有分析；若干年來，連十分勇敢和先進的思想家也只是跟在事變的後面。他們把握不住當時發生的是什麼？只在好久以後才了解那已經發生的事。所以他們從沒有預先見到那時的沒有先見，所以也說不上任何理智的統制了。

四 馬克思和亨利喬治的批評

人類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時候，對於一般事情是沒有診斷的能力，然而有一二個例外，這是一般歷史的讀者所不能忽視的。其間最顯著的是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他的同志們關於經濟發展的分析和預測。

無論如何，馬克思主義總值得我們的注意，牠對於十九世紀與他同時的生產方法中自己毀滅的元素，是理解得很特別的。沙皇覆滅後，牠偶然被革命的俄國選擇為炫耀的信條，所以就使牠在動的思想史中占極重要的地位了。

馬克思是特里弗斯（Treves）的一個基督徒的猶太律師的兒子，這個律師在社會上頗有地位馬克思在邦恩（Bonn）和柏林受過很良好的大學教育，融化了他當時的急進思想。他又是蘭開夏（Lancashire）的布商恩格斯（Friedrich Engel 1820—1895）的知己朋友。恩格斯比馬克思謙恭得多，而且能幹得多。在恩格斯和英國歐文（Robert Owen）派社會主

義運動的影響下，馬克思整理出關於經濟發展的理論，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質。這些主義包含在一部鉅大而不曾完成的著作——資本論中，其大略也見於恩格斯和他自己所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他的主要功績，就在明白地認識社會的和政治的方式及其影響，終須依賴於物質的需要（「唯物史觀」）。他的主要的錯誤，是他瘋狂地仇恨中產階級（布爾喬亞 bourgeoisie），這原因是由於他是一個破落的貴族，或者因為他在物質和智慧上，均須依賴商人恩格斯，所以對於中產階級仇恨更深了。他企圖以陰謀和政治行動應用他的理論，結果是徒勞無功。他死在倫敦時是失望而且憤怒，完全不曾料到他的學說在他死了以後會出名，這因為他的信徒遵着他的主義組成一個有紀律的共產黨，更由於列寧的天才，將他的學說現代化，他的名字纔能在歷史中永垂不朽。

現在我們在已完成的事變的燭照之下來考察他的一般的主張。我們看他的英勇的思索，那些是說中了的，那些並沒有說中。這里所謂英勇，是就當時他的心理的氣概而說。

現在，每一個小學生都知道生活中的主要的和永久的衝突，是在過去和將來，也就是已完

成的過去，和向前進的努力之間的衝突。生物學的初步課程是教他了解這個衝突。他在那里開始看見，並且了解已完成的東西繼續的自動的鬭爭，想將新東西，新生的個人，新生的觀念，人種的擴大的需要都束縛住。人家告訴他，這樣的衝突，通過了全部的歷史。在古典的神話中，保守的 Saturn 吞噬了所有的孩子，只有一個逃脫，變成 Jove 神。後來 Jove 神自己又如何將 Prometheus 束縛住，這是每個雪萊的愛讀者都知道的。我們只須向學生舉出羅馬共和國和猶太國的歷史中所記載的債務人和債權人的鬭爭；羅馬的平民脫離，(Secessions) 和猶太恢復舊土的紀念祝典 (Jubilee)，約瑟夫 (Joseph) 在埃及的神話；英國關於死守耕地 (Mortmain) 的法律；里夫來特 (Austen Livewright) 的歷史上的破產 (Bankruptcy Through the Ages)（一九七九）一書中研究得都很明瞭；這些都提醒學生們，生活中的種種鬭爭是永久的。但是馬克思和他的同時代的人一樣，不懂歷史科學，慣於用假哲學家黑格爾 (Hegel) 所想出的奇怪的「辯證法」。他的心理研究不完備，將這種永久的對抗，只用他周圍的工業生產的話來表示。企業家，資本家成為他書中的丑角，用他的資本優先利益去處分生產的「剩除價值」由此他

所有的購買力增大，愈覺得不平衡。

馬克思似乎總分不淸「限制的所有」和「生產的所有」二者的區別在我們今日看來，是十分重要的。爲利潤而剝削和爲支配而摧殘，急進的兒子和保守的父親，在他看來，是一個東西。他的沒收那尋求利潤的「資本家」的主張，是很空泛的，似乎一點也不了解經濟活動的眞正心理。他不感覺，假如我們要找東西來代替爲利潤而生產的粗野刺激，就要將各種複雜的動機來加以組織。他，有一點實際能力，如果我們知道他從沒有謀過生活，也就毫不足怪了。他享有一個先知者的一切特權，他因爲自己是一個天才，就很弛緩和懶惰；他是不曾完成他的鉅著的。

列寧（Lenin 1870—1924）於一九一七年後在俄國當權，他比馬克思有能力得多，他的思想也細密得多，把共產主義的革命力量實際組織起來的人，不是馬克思而是列寧。寧使共產黨（在斯太林佔有的時候以前）成爲世界上最有活氣的創造力量。至於馬克思和列寧這兩個人在智慧上的主要差別，早有伊斯特曼（Max Eastman 1883—1980）在他那很厚的有

研究的著述——馬克思和列寧一書中講得很清楚，這書到現在還值得一讀。列寧自己，總將他自己說成一個馬克思的門徒和代表者，後來人們的批評，才啓示他的努力之細密的光輝，他只是想從一個較老的先知的陳舊學說中，攫得一些實際的常識。

十九世紀還有一個著作家，對於限制的財產之摧殘的影響應該同剝削之刺激的效果分開，或者了解得更清楚些，那就是亨利・喬治（Henry George 1839—1897）。他是一個美國的印刷工人，由於對經濟問題的著作而很出名。他看見人類的生活進步爲地租之增高所限制和阻遏，他的簡單的救濟方法是征收土地稅。正如馬克思的簡單的救濟辦法是沒收資本家的財產一樣，至關於被沒收的財產和世界的資源，應該怎樣能幹地管理，則馬克思從未給他的門徒以一點觀念。同樣的，亨利・喬治也從沒有指出在他所提倡的不可馴服的個人主義的世界，這征稅的當局對於牠的不斷增加的稅收如何使用。

我們在今日，對於這些前輩的短處，只有微笑。但我們笑的，只是因爲我們比他們出世的遲些，比他們多兩世紀以上的經驗。我們應該向他們表示很大的感激，因爲他們畢生的工作是勇

敵而無　的。

整個地說來，我們所感激的並不是他們所做的事情，而是感激他們替我們去掉了一些東西。我們今日看見明白暴露的世界經濟生活的廣的輪廓是很簡單的，但我們應該想一下這些人所生的時代的氛圍，那時的風俗習慣，都未經過批評，錯誤概念是從古受人崇敬，迷信的拜物教，符咒和巫卜的盛行，當權者對於思想和言論，幾乎瘋狂地壓迫着。他們不得不用的術語，是成問題的術語，他們的心不得不通過一種複雜的心理和道德的糾纏，來表示實際的問題。人們對於既成的制度和習慣，總承認永久不變，這些流行見解，到了他們才敢破壞，雖然這在我們現在看來，也許是一件小事，可是那時却是一重要的解放。在他們的日子，假定事物是一成不變的幼稚習慣，幾乎是普偏的心理。

馬克思主義至少已經指出了經濟發展之必需通過尋求利潤的時期，這時期內，財產集中，失業日增，購買力銳減，而至於市場縮小。一九二八年以後的人類活動之迅速的停滯，很多人認爲是馬克思的預見之證實，於是大家認爲這是共產主義已解決了社會問題的明證。

我們現時既不爲我們先輩的心理混亂所累，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和四十年代，艱難的幾年內的活動的基本行程，依我們看來，是很簡單的。我們知道，人類幸福的永久條件，是價値的一般水準之永不跌落。我們在通貨委員會中有一頗爲幹練的和力求進步的世界機關來保障牠，使一個金圓一年到頭都有交換同量貨物的價値。牠的價値的減縮是最小的，同樣，也不許價値的增加。有錢的人既得不着不勞而獲的利益，也不會受不應受的損失。當我們人類的生產能力增加時，我們使全部財富的金圓價値也依比例地增加。債權人既不能致富，他的合理的期待，也不致被剝奪。負債人也不致被人要求出乎他的能力以外的償付。

那時候，人們沒有辦法能夠消極地變成富翁了。在空中獨裁下，賭博是嚴厲地被禁絕了；高利貸是和造僞幣一樣的被列爲罪；給金錢於人，是使他得到他所要的，而不是使他去得到更多的金錢。我們認爲賭博的精神，是教育家和心理學家的問題，牠暗示對生活有根本的誤解。我們沒有投機者，股東，高利貸者或收租的地主。一切這些「獨立的」典型，在地球上都不見了。土地和其天然的資源，現在是屬於我們全人類所有，直接或派代表組織各級的管理部。有租田

的耕者，和開發的公司，無轉租的權利，也不許永久地私有其資源，由積累地租而得到自動的利潤的種種事情。因爲現時我們平均的個人生產效率之不斷進展，只是使全社會得益，由此我們的集體企業將不斷地擴張，而閒暇的時間反日益增加。我們個人的生活享樂將被提高，否則，進行世界工作所需要的人力的數目將因之減少。一旦生產效率增加，人類社會必須提高牠的消費力，並且年復一年地擴充牠的活動，否則牠就崩潰了。假使牠的進步不繼續時，牠將墮落到呆板，煩慮，惡行和衰敗中。物件的量與類必須逐漸增加。

這些必然的條件，構成現有秩序的ABC，今日似乎很明顯了，於是我們很難設身處地在那二十世紀的人的地位上，因爲他們看來這都是新奇的和陌生的事情。他們還沒有整個地人道化，他們還有「生存競爭」的心理。我們如果用一世半以前我們祖先的眼睛來觀察事情，則心中就須費很大的力氣，我們要想着文明的心理原是從最初極不社會的動物的混亂衝動和競爭中，逐漸進化而來的。

五　自由競爭和貨幣紊亂的陷舊社會於不安

在基督紀元的二十世紀，這世界的經濟交換尚無共同的通貨。交易不僅因之不精確，且容易有偽造的弊病。那時似乎想不出一種有效的方法。固然，在那曾備繁榮的第一時期（一八五○——一九一四）有過一種通貨和信用的臨時的世界系統，集中在倫敦的西提區，用金鎊為基礎。但這不過是偶然的生長，這種制度之得以實行，由於黃金的繼續發現；當生產效力增加時，這些黃金出來阻止了價值的暴跌。其次是各種環境幫助英吉利島國使她在海陸蒸汽運輸的發展中居於領導地位，且有利於世界自由貿易之發展。

世界大同主義的盛衰，一如天上月光的圓而復缺，然同時代的人却不能了解，究竟是什麼真實力量在起作用，也沒有企圖去把握這些力量，將牠們組織起來，維持永久。倫敦的西提區在世界金融界的雄長地位，不幸於大戰後崩倒了，又沒有新的東西起來替代牠。這種以金鎊為基礎的假大同制度所以得到一時的成功者，前面已經說過，是由於現有的黃金不斷地增加，如果

全世界的黃金來源告盡，則這一制度，必然地失敗。大戰後世界工業的衰落，就爲了美國人和法國人把一部份的黃金窖藏起來的緣故。

在那一階段，是有很多的機會的，然而沒有人切實地努力去取得這一行星上的全部領土和天富的資源，將牠們從另碎的，混亂的和浪費的開發狀況變成一整個的系統。世界上還是有着六十個以上的「主權國」每個國家對於在國境內的天然富源，有絕對的統制權。在這些政府之下，公司或個人，也都有權利自由處分他們所攫得的一小塊雖然處分的情形各國不同。各處礦產的開發，地球上的陽光和能力資源的使用，根本的原則，只是爲了個人的或聯合的個人的利潤；而當時各種各類的政府之干涉利潤的爭奪，也只是爲了他們的本國人反對他們的國外競爭者。在近一百年的時間內，幸而黃金與發明源源而來，尋求利潤的制度，因其與金屬貨幣制度相連鎖，足以使人類生活極度擴張和繁榮。那時我們很難使多數的人相信，更難使那些支配公共事務的製造業者，商人，礦山主，農業家和金融家相信：說這個制度不是一個永久的制度，世界急於等待我們將經濟方法作重要的改變。人們是需要經過大批的破產，失望，害怕和困難

的階段，才醒悟過來的。

十九世紀的標語，是「個人進取，自由競爭。」但一切競爭之天然的結局，是一個競爭者勝利。大量生產的現象初次在美國出現，證明了這一自利的力量。競爭勝利的團體，在一二十個地方壓倒新競爭者，凡足以危及他們統治的新活動，這些團體都要破壞或限制牠。歐洲各國的政府對於那種限制競爭的工業同盟和工業集中也很少抵抗，牠們的規模迅速發展到超過政治的疆界以外。美國曾切實努力，阻止企業向獨占方面走。爲這種阻止而努力的著名領袖，是第一個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23）總統，他的主要結果，爲雪爾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1890)。在以後數十年，這個法律是律師們常引徵的武器。

這些結束自由競爭的聯合，頗能統制貿易和阻遏新發展。胡克爾 (Hilary Hooker) 在他的初期繁榮時代中之事業的遏阻 (Studies in Business Coagulation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of General Prosperity）一書中，引出了兩千以上的例子：由罐水果和食物到收音機，汽車，房屋的改建，鄉間路旁的人造燈光，舒適而經濟的鐵路工廠，在這一切事例中，豐富的供給和有效的

改進的祕密，都爲了尋求利潤制度的關係，陸續被收藏起來，不宣布於市場。一九〇〇以後，全世界新的日報的創辦停頓了，這就是言論自由的收縮。報紙和通信社都落在强有力的集團之手，他們能夠破壞任何新的刊物，或摧殘與他們意見不合的學校。他們使公共[illegible]見成了千篇一律的文章。

這樣的求利潤的制度，如果遇着他們不能完全操縱的國家來的競爭時，也要起極大的取締作用。取締的辦法，是收買政黨的行動使其主張保護關稅。樂觀的理論，總說自由競爭制度，是無止境的進步方式；但在世界的顯著崩潰之前，普通消費者的經驗，就同這種理論不符合了。他現在住的房子，穿的衣服，用的器具，旅行中的運輸工具，以及他所受的教育，依照當時已知的和已有結果的發明的標準說，依胡克爾的計算，在平均二十五年至五十年以前，早就應該更換了。所以還沒有更換的原因，並非爲了失業的勞動，和現存的豐富材料的缺乏，而是搾取地租和尋求利潤的制度，妨礙了這些東西的利用。

這種現代化的遲緩，是因生產效率增加以後，許多解雇的工人也增加了，工人就更陷於貧

困，失業的人到處都可以看見。當二十世紀走進牠的三十年代時，這可憐的人們好像是從病體中排洩出來的東西一樣。

六　生產過剩的難題與戰爭之關係

在「戰後」時期，有一個在各處討論中占重要地位的所謂「生產過剩難題，」就實質說，無非是一極簡單的事情，正如自由競爭過程的完結，是由於勝利的競爭者團結起來，和企業的停頓，所以生產中尋求利潤的必然完結，是由於效率增加而成本繼續減輕，換句話說，僱工對於生產的比率不斷低降。這些是現在表面的事情，我們的祖先，無論有意無意，竟沒有顧到，這在我們看來是奇怪的。這些企業僱工之必要的收縮，會引起失業人民的比例增加，也是同樣的必然事。土地的擴張，僱工階級和所有階級之生活程度的提高，以及黃金源源而來的刺激的效果，將一部份被擠出在一般經濟生存以外的人類之日見增加的現象，隱蔽並且中和了五十年。然而那時還是有波動，即所謂「貿易循環，」機器的輪軸因一時的阻滯而停止不走，及至困難沒

有了，又繼續走起來。但在二十世紀之初，人們逐漸地認識用公開競爭利潤的方法來進行人類事務，實在不是一個可以持久的方法甚至那些由這方法獲利最多最有利於永久維持這方法的人們也不得不承認這點，實在的，若就他們整個階級說，他們完全不知道有馬克思的分析。

我們知道，管理世界的首要任務，就在利用繼續擴張新的大企業的方法，來阻止將人們從積極的經濟生活中排出。但這樣的思想在那時已經為人們所討論。平民們的本能要比政治經濟學家的智慧來得聰明，他們可以贊成浪費和奢侈，只要金錢由此可以「流通」，工人們由此可以找到「工作」。然而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是需要無報酬的公共支出來調劑牠的，所以這個時期，世界上都容忍軍備擴張或戰爭準備。已經節省的能力須在某地方發洩，私人經濟的世界，是不願意那時的政府用節省下來的能力去建築大規模的住宅並進行教育和社會建設事業的。社會中建設只應供給利潤的集累者享用。由此，人類的不斷增加的生產率在古代戰爭的傳統中找着了出路，牠容納從生產中退出的大部份男性人口，只需一年的樣子，就分泌出大宗的砲臺，軍艦，機關槍，潛水艇，炸藥，軍營和其他等等。現在仍能使我　喫驚，如果不是陸海軍的這一

個惡毒的生長，則競爭的私人企業中所潛伏的生產過剩難題，在十九世紀末年多就會表現成爲極大的羣衆失業，社會革命也許在那時早就爆發了。

然而軍國主義對於大宗利潤的生產，供給了浪費的出路，緩衝了革命的危機；牠也強固了社會壓迫的力量，破壞的手段之集累，牠的規模幾乎與人類潛伏財富之增加並駕齊驅。所以人類之爲軍事專制所奴役，正是爲利潤而自由競爭之不可分離的一面。自由競爭制度是軍事專制發生的條件，並且因爲有了自由競爭所以產生了軍事專制。自由競爭制度之需要軍事專制正如一隻船在開始沈滅時需要將所載爲壓艙而用的沙袋去投給破壞和死亡一樣。二十世紀之初的軍國主義階段和生產過剩的難題，是同樣的現實有關的兩面，這個現實就是社會機體的無計劃的擴張。

人類的能力，在好戰的準備中病態地集累着，找不出別的方向去宣洩，這在二十世紀前進的時代中，怎樣在世界的面容上變得日益明顯，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人類的各種集團漸漸都有穿制服的人參加。那些着色的畫冊叫做歷史大觀（Historical Scenes in a Hundred Volumes）

的，現在在我們的一切學校和陳列所內都有着，並且自由發散於每一有兒童的家庭。這些書籍極有興趣地顯露我們祖先的日常生活中，軍事的偏見是怎樣地開始，怎樣地稱雄和怎樣地完結。這些圖書都是眞實的圖畫，雕刻或者照像。軍事行動，是自古以來吸引了畫家的注意，每一時代各有關於戰爭的圖畫，從中世紀小規模的戰爭直到上次大戰的百哩戰爭。但我們研究的興趣，不是關於戰爭，而是關於社會生活的狀態。在戰爭最多的十七世紀，一般生活之受兵士的擾亂者很少。戰爭是一種特殊職業。第一次的英國共和國（一六四九——一六六〇）是在英國國內戰爭中建立起來的，可是在戰爭進行時，我們在聽到槍聲響的地方，還可以看見有人在打獵遊戲。英國奧斯頓（Jane Austen 1775—1817）的小說對於當時的海陸戰爭沒有一點微弱的回聲。在韋馬（Weimar）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他是歐洲文壇「大人物」時期的德國大人物，不顧耶拿（Jena）戰爭以前德國軍隊如何需索木材和飲食的供給，在戰事進行中，很喜歡同他的「異族敵人」拿破崙作社交的會晤。

我們很少看見十八世紀的帝王，是畫成穿軍服的樣子。那時的裝束是尊嚴的長袍，不是戰

士般的戎服。只是冒險的拿破崙之空前的威嚴，才將歐洲的社會生活弄壞了，到處都是軍服，連女性也傳染了這種時髦，甚至肥胖的女親王也戎裝上校，腰裹纏着金黃色的帶子，手裏握着明亮的指揮刀領着軍隊前進，當走在軍隊前面的時候，腳步還跨得不大穩。自「家庭國王」一如法國路易·腓利普（Louis Philippe）和英國的維多利亞（Victoria）女王即位以來，有一短時期回到文雅的服裝，爲對於拿破崙時尚的一種暫時的反動。但從十九世紀的中葉以來，兵士又恢復了他們的威望，軍人的制服在社會上又漸漸占起勢力來。一八七〇年以後，書出來的歐洲羣衆，沒有一堆中間沒有兵士的。

世界大戰不僅是歐洲的，而且美國的街市人口中，加强了許多軍事元素。那時候招募了許多輔助的女兵團，後來又在世界上穿着誘人的兵士服裝遊行。在戰前的美國，除了在華盛頓或者除了退伍兵的遊行以外，平常的時候，要看見一個穿軍服的兵士在街上走，像最少見的鳥一樣。他自己也感覺得生疏和不自然，因他容易使一個覺得已解放了的人民起疑心。大戰將這一切都改變了。德國在戰後被解除了武裝，國社黨的運動和共和國徽團的運動就應時而生，在力

爭德國人應有穿適當的制服的自由。至於半軍事的半公民的穿制服的童子軍運動，在南非洲戰爭（一八九九——一九〇一）和大戰之間就已傳播於全球。

我們在下面至少還要講國社黨運動——意大利的法西斯和波蘭的類似的運動。我們在這里引用黑衫隊和褐衫隊只是說明在世界大戰中間和大戰以後的軍人和公民的生活界限的泯沒。

以前戰爭是在邊界上的事情，是在「前綫。」後方一般公民的生活尚不致有何危險，但是投炸彈，散毒氣的飛機的出現，却將這種情形改變了。而且人們會用宣傳來做武器，在戰爭的危機下，社會叛變的危險增大，也是使交戰國的整個面積都變成戰爭區域的一元素。起初在實際戰爭的困難中，以後又是鑒於戰爭的危險，任何公民自由的遺跡，都被廢掉了。各國政府，日益感覺使個個人都聽調遣，宣誓効忠，受迅速的紀律手段之制裁的好處，而努力使之實現。

在這一世紀以內，人羣的外表，從不整齊的個人的自由集合成為一團制服的混合。以後每個人的衣服上，都表示出官職，義務和準備。歐洲社會的軍事化在波蘭的戰爭中達到了最高點。

在一九四二年時，毒氣面罩一時很普偏，人們有的是眞正戴着，有的是掛在頭頸上。同樣子的鞘刀也很普偏，準備飛機上面的人跌下時如果還活着就刺死他，爲保護頭和身體，拿來抵抗如雨的毒針的金屬帽和金屬肩章也出現了。有些公民的樣子，看起來比兵士還可怕得多。

那時的軍事當局遇着一個十分爲難的問題：就是要給一般人民以保護的器械和輕武器，怎樣才可以使他們在反對敵人時是有効力；而在暴動時就變成無用呢？因爲在擾攘的那幾十年中，壓制煽動雖然最起勁，可是職業軍人感覺人類爲反戰爭而暴動，「軍紀完全喪失」的這些可能和危險也日漸增加，雖然牠們是反乎邏輯和不聯結。

舊世界的大多數城市的街上，立刻出現了成爲特徵的黃色（在法國是藍色，在美國是紅白相間的顏色）的爲應付空中侵略而設的警柱，警柱的表面是玻璃的，當正式的警告發出以後，就被打破了，裏面有呼吸器和救生器具，是爲中毒氣的犧牲者用的。在這同一個時候，我們看見街上每一角都增加了顯而易見的無數指路牌，牠們向上的光亮最少，是爲指引到煤汽室和醫院的路而設。這麽一來，街上其他明亮輝煌的標記，實際上被停止了，這自然是連帶而來的事

情。

二十世紀上半期的城市，爲廣告照得通紅。這具廣告最多的時期，紐約的 Great White Way，倫敦的 Piccadilly Circus，巴黎的 Grands Boulevards 還有許多其他的地方，都是多色的圖畫，熱鬧娛目，我們想起來，還感覺得美麗動人，一九二八年以後燈光是照徧大地了。當空中的威嚇襲來時，「滅燈」是變成必須的事情，除了我們上面所說過的那閃爍的偷偷地指示避難和救生之所的燈光。

戰爭的恐懼，在一九三〇年以後傳播得很快，黑暗從新籠罩住夜的城市。「夜生活」變成偷偷摸摸地在黑暗中進行。犯罪的事情也增加了。在一九四五年時，一切民間醫院和醫生都因歸併入軍隊而不容易看見，衞生事業只在二〇一〇年以後才在法律上重新成爲民營事業。陸軍和市民的醫院及藥房早在一九三三年的法國開始合併了。在一九四五年時，舊世界的每一個醫生，至少在理論上是屬於軍隊的，他穿着易於識別的制服，服從嚴格的紀律，他的住宅和他的醫院都掛有特殊的黑和黃的方格。一切看護婦也是同樣地登記了，就是公衆來看病，也和軍

隊一樣辦法。一九四八年，那些徼倖逃脫了一般的社會退化的命運而能實行這些規則的城市，受了涼或者打破踝骨的人們，不能不立刻屬於病人的範圍以內標明號數，穿上黃黑的軍服走去或抬去就醫。在理論上說這醫治的系統是普徧的，而實際上則制服和醫生都不容易找到了。因爲那時候，社會正在瓦解，而軍事化的進行，正是爲了克服這種瓦解呢。

波蘭的戰爭以前普通建築受軍事需要之影響甚少。衣服的軍事化是在佈景的軍事化之前，甚至軍隊建築師所造的軍營和類似的軍事建築，只是尋常的房屋型式之簡單庸俗化，換句話說僅僅把普通不結實的房子變成堅硬罷了。現在還有些圖畫存在着使我們驚異，這些圖畫上的房屋是「維多利亞的軍事歌德式」和「維多利亞軍事條多式」都是在英國陸軍部之下產生的，牠們表示爲適合於教練官用的家庭。軍隊中人只是被波蘭衝突的經驗所喚醒覺悟到尋常的城市有大加改造的必要，假使我們還重視這些城市的話。以前砲台建築甚少有影響於城市生活的，雖然那里是需要有砲台防禦的城。從前的要塞是在城外三哩至五十哩的地方的砲台，壕溝和其他的軍事設備都離城很遠。現在，首先柏林，以及在但澤，華沙，巴黎和吐林（

(…rin)差不多全世界的議會中戰爭不僅要在城的周圍築砲台而且更迫切地需要在城市之上築砲台。一九三〇年的世界太窮了；不知道如果要脫離經濟困難有一條好路，就是投資於房屋摩登化和改造。一九四二年以，在戰爭的驚恐狀況中，為抵禦炸彈和毒氣，不得不將城市的建築完全改造不過那時的大城市，已經很窮了，牠不願為了繁榮而做的工作，終於不得不為了害怕而設法進行。

首先最明顯所要做的事，是建築那為避難用的三合土的地窖。牠的遺跡，到後來還為好奇的旅行家在巴黎和柏林憑吊着。（至於倫敦的地窖已崩壞了，由於地陷和大火。）接着就是停止商業的建築而集中設計於巨大的（當時是危險的）有甲的屋頂及其巨大的支柱。只是因為當時的貧困日深，工業破壞日甚和那一最後戰爭階段沒有支持得長久的關係，使世界上的一切城市得免於完全堆積在這一整個的畸形的大覆蓋之下。

那時的影響是這樣普徧。到了二〇二〇年，建築設計的傾向仍是畸形的。一九四五年和二十世紀末年之間，所興造的大建築，很少有抬起牠的頭來睥睨着世界的。人們稱那一時期為第

二埃及時期，並非偶然。那時很有許多機會可以將堅實而具有彈性的新三合土材料，來代替鋼骨的建築，使建築物更加典雅和輕巧，可是建築竟是那樣不行。那時人們是如何怕用這新三合土材料啊！我們今日住在高入雲霄而又時常改進的家庭裏，這些房屋假使被我們的曾祖父們看見了，也許要恐怖得抱頭往地窖中跑咧！

七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

記載大戰的書籍是很多的。在阿塔卡碼（Atacama）所藏的歷史材料的目錄，到最近止，共有書籍和文件二百三十六萬二千七百另五冊，其中有十八萬二千冊以上是專門研究或者是大部份研究關於戰爭的原因。我們如果到過那個收藏着已死的辯論和幾乎全部被忘卻的記載之大圖書館，憑弔那長而靜寂的走廊，沒有旁的比那里能使一個學生了解我們與那時候的人的中間心理差異之多的。沿着那發亮的書籍的長列中，看不見一個閱覽者，也許能看見一個靜悄悄打掃的人，考查材料的是否損壞，或者一個青年學生正在耐煩地校對某本流行的

書上的提要是否正確或者是看見了一隻黑貓，除此以外，上下左右是清淨明朗，寂靜無聲，書籍都悄悄地在休息着。

在這乾枯的蜂巢中的很多地方，一個學生會找到「戰爭或者爭論」的紀載，這是凡爾賽(Versaille)和約以後，全世界爭吵了幾十年的問題。那學生姑且坐下來，隨手取下幾卷翻一下。他今日可以讀牠的全部了，因爲無論這一類書的原文是什麼，早已都 基本英語的譯文在裏面。他會想到他是在讀瘋人們的記載吧，像那時候普徧的惱人的問題，現在是已竟在人的心中完全消失了。

「德國是戰爭的計劃者嗎？法國是戰爭的戎首嗎？英國要負很大的責任嗎？這個學生很困難地將他的心放進了幻想的世界，其中有希奇的人物化身，如「法國」「德國」等，和印度古代神祇一樣的怪誕和不可信，然而卻被當作眞實的，和道義上負責的個人一樣，爲人所痛恨所信仰，所恐懼，並所愛好。就戰爭的直接的事實說；在這些偉大的神祇的祭壇之上的無目的和無結果的屠殺，死的，殘廢和負傷的約有二千萬人，還有無數物質的財富被毀滅，這在我們祖先的

瘋狂的想像中，是一次偉大而有意義的鬬爭。幸而我們在這里無需將他們的瘋狂復活。「戰爭戎首」的問題從未解決過，但再也沒有人去研究了。大家都渺視這個問題，讓這個問題漂流到荒謬的領域裏去，除了那三百尺高的被忘記的書和文件留下來證明牠以前的重要外，再沒有別的東西餘下來了。

戰爭的原因是十分簡單的：人類的器械，比起牠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智慧之擴展起來，是進步得太快和太不規則，前者和後者快不相稱了，因此，天然地和必須地發生了戰爭。

交通和運輸的新手段，以及需要各地產品消費的新經濟生活，正催促人類去重新組織一個「世界國家」，因爲這世界已爲六十個以上的主權國所瓜分了。人類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是靠條約和合理的安排，使這些主權國聯盟起來以應新的需要；或讓不斷的強烈化的相互壓迫，發展成爲世界征服的企圖。大戰前數十年，英，法，德，俄，美和日本的制度都是如當時所說的「帝國主義」的，就是說在這個行星上顯然只許有一個「世界國家」，但是大家都想變成「世界國家」。當歐洲的治國方法初次想出時，大家都不會料到有這樣的事，這些廣大的可能，

到後來展開了。十八九世紀的戰爭，地域有限，而且所謂利益的也少得有限。二十世紀戰爭的規模，擴大得超出任何限度，由戰爭所獲得的利益，絲毫不見。但是政客們和外交家們繼續玩着舊日互相反對的把戲，使戰爭的爆發，成爲可怖的必然。他們是被逼迫得這樣的，他們不能統制，或者至少他們中間沒有人有活力和想像來企圖統制。他們是被經濟的需要所驅使，他們要反乎常理地武裝起來。他們要威嚇，他們要將這事硬幹到底。

這些力量可以說明大戰的發生和牠的普遍性，但不能說明牠的特殊可怕性。爲說明這點，我們必須理解，雖然國家領土之擴張是被相互間的壓力所限制，然而財政的和工藝的企業之膨脹是無限制的。後者是在無情的和無限的進步；牠們擴張，發明，催促，售賣；牠們將奇異而利害的可怕的武器拿出來解決比較小而陳舊的爭論。我們將即刻說到關於軍備的膨脹，因爲大戰實在只是第一次啓示經濟和政治之間的特殊的不相稱。一切鬭爭在凡爾賽和會（一九一九年）作了形式的結束以後，壞事仍繼續，比以前還擴大。但我們且先關於大戰中我們應知道的那些詳細情形。

現在，想起上次大戰的人是很少了。關於大戰，我們有極多基於經驗的小說和個人的回憶。有些寫得很好。我們讀任何一本書，都有點興趣和教訓，但每一本書都不十分精確。大戰爆發時的書圖仍能使我們發生感慨那時的人們，完全不覺得事變的嚴重和危險，甚至幾千萬命定地受苦和幾個月內就死去的人們也是這樣。許多講牠的小說，開始是敍述假日的郊游，或是俱樂部的集會，或同樣漂亮的背景。一九一四年八月的天氣是異常晴和的。

戰爭本身的詳細情形是可憐，可哀並且不聯結的。除了專家以外，別人沒有詳細熟悉那些聯結的必要。舊式的歷史，其中充滿了人名，日期，戰事等等，是為了供給便於記憶的材料，準備着在為考試的時候用的，並非使人了解歷史的行程。考試早該在教育中廢掉，牠應該同地球儀算盤，石板，竹杖等東西一樣，陳列在學生的舊貨攤中。但為了保存對牠的記憶起見，我們可以發明一種「考試」的通俗游戲，這是使人們在突然選擇某一題目時，比賽誰寫得快和寫得多的一種游戲。

我們中間，很少有人能寫出世界大戰的簡史。我們隨意舉一些將軍的名字，如海格(Haig)

吉青納 (Kit hener)，佛倫齊 (French)，霞飛 (Joffe)，福煦 (Foch) 和路登道夫 (Luden-dor f)。又如譚倫柏格 (Tannenberg)，瑪恩 (Marne)，松麥 (Somme 帕興兌爾 (Passe n-dae'e)，法克蘭羣島 (F lkland Isleo)，巨特蘭 (Jutland) 等地的著名戰役。這些對於今日普通的公民，是沒有一點意義了。他不知道佛倫齊 (French) 是否眞是一法國人，福煦是一法國人還是德國人。他還以爲福煦是德國人，佛倫齊不是法國人呢。他不知道也不管誰在這些衝突中打過勝仗，或者是誰打敗了。他甚至把戰爭看成游戲的興趣都沒有。那些戰爭並不是活潑的戰爭。那些司令官的才能，都很平凡，引不起人的注意，應付不了這些戰爭。他們的動作大都是愚蠢的結晶，無論就計畫和執行說，都是昏頭昏腦的。他們的回憶錄常是充滿了自辯，個人的憤怒和惡意，人們讀牠們時，覺得還不如傾聽小兒敍述他玩軍棋時所說的假話。這些應使後代驚奇的戰爭在人們心中已是暗淡的，模糊的，凋萎的和遼遠的悲劇，除去在幾個專門家的心中以外。其餘的人們對那次大戰的記憶快完全消失，那次大戰在我們的集體的意識中的生動亦猶之帕羅邦內蘇士的戰爭 (Pe'oponesian War)，或帖木爾 (Tamerl ne) 的征伐和武功一樣，征

們完全不像成吉思汗的偉大的軍事觀念有歷史的重要和戰略的光榮，在我們的日常教育課程中還佔一地位。

關於這個衝突的曾經說過什麼大話，好奇的人最好一讀邱吉爾所著的世界危機（World Crisis）。我們在這本書裏找到一切英國觀點的十九世紀歷史的呆板的誇耀和英勇「歷史劇」的富麗的辭藻都集中在鬥爭中的最小心的一個人物身上。他顯出一種活潑天真的稚氣使他的故事能夠動人，可以補足旁的缺點。他和十三歲的兒童的感覺一樣的不靈敏。他的兵士都是玩具的兵士，他愛整排整排地將他擊倒。他視戰爭為樂。他把他自己和一切被忘卻的將軍們和戰爭的政治家，看得孩子氣的認真。他對他們的可悲的愚蠢下過嚴厲的判斷，對有些人恭維，對有些人責難，滿臉守正不阿的樣子，自己深信是為後代的人著歷史，深信後代的人讀了牠，是會崇拜和妒羨牠的作者的。他相信他作下了孩子，就是創造了讀者。他興奮的讀自己的歷史，以為別人也會同樣興奮。我們從他的書，不僅看出他的時代和我們自己的時代，心理上有很深的鴻溝，而且他使我們能以好玩的和寬恕的同情來渡過那鴻溝。

路發道夫克來孟梭（Clemenceau）費歇（Fisher）；福煦，這些人物的，以及其他大戰領袖們的回憶錄所表現的精神，不能那樣有吸引力。在這許多人的多數生活中，戰爭是一得意的大事件，他們後來顯然想不到旁，事情他們不像邱吉爾那樣的大膽，使人讀了能恢復疲勞，也不像獵犬樣的對各物都有興趣。他們在他們的衰老的年齡中，發憤的寫作，如果有別人用筆來咒詛他們，也不見得有這樣的遇到。他們是長成的人，然而又是不發育的人。

關於戰爭的更嚴肅的現實，有很多的和清醒的書籍。過去十五年，歷史館在牠的留給後人的戰爭畫片（War Pictures for Posterity by Fon, Penci and Camera）一書中已撮了一個大要，每人都該翻閱一下。牠對於堅忍，無情，忠誠，和瘋狂的勇敢等奇異而不可信的紀載，以便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人，如果受了社會的殘酷的力量所強迫，也是能走到極端的。

頭幾條，主要是說，在大西洋和北歐諸國，突然捲入破壞的旋渦以後，牠們國內半數以上的文明國民的心理。我們看見羣衆在首都城市的街上示威和歡呼，潮水般的青年從他們的工作中出來加入，這是戰爭開始的熱鬧和不可想像的兇猛和英勇。以後就是第一次的接觸，鄉村中

的大火；好奇的旁觀者，被捉去認爲偵探和便衣隊，而遭野蠻的槍殺；許多可怕的事情的出現正如一陣恐懼的浪。被侵入的地域的人們到處逃跑，無數的羣衆背負着小而可憐的行李，在黑暗的街上奔波，不知往那里走。來復槍和機關槍的「拍拍」聲，前進的軍隊，盲目的同敵人接觸，最初是踴躍地歡呼，後來又變成可驚的兇暴和艱苦。新的戰爭非從前的任何戰爭可比，在東方戰線的法國人以無限的狂熱向前去進攻，穿着明亮的軍服，並受了歷史上「馬賽曲」的感動。他們遭了屠殺了。三星期內，他們損失了三十餘萬人。德國的軍隊大批通過比利時，百萬以上的軍力，快到巴黎了，忽然被堵住了。在這些圖畫上，我們看見東比利時，法國，和東普魯士在一九一四年七月時的風景是如何美麗，而這同樣風景在兩月以後就被毁了：彈丸洞穿，壕溝縱橫，到處是流血的死屍堆積，無數萬不潔的，飢餓的，耗竭的和殘忍的人類的呻吟。

這些接觸的地帶，這些汚穢的痛苦和擾亂的區域都擴張了，片時之間，通過東歐，從北海到阿爾普斯（Alps）都成了「戰區」，每一所房屋都是一廢址，每一株樹的樹幹都有樹皮發爲薄片落下的遺跡，幾百萬的蹲伏的人像老鼠一樣的在戰壕中偷偷地走來走去破衣的死屍躺

在地上不能埋葬。這樣，求厚利的經濟制度，使人類剩餘的精力，受牠的成見和牠嚴格的歷史傳統所束縛，不許有別的出路，日夜不休地在不斷的地雷，炸彈，機關槍的轟炸和人命的隕滅中消耗。

新發明和從前未試驗過的武器，很快的加進來，使鬥爭擴大和增強。原來爲「航運」用的徐柏林 (Zepprelin) 飛機飛到敵人的後方去進行戰爭，進攻城市中的無武裝的人類。我們看見炸藥和開花彈落在污穢的小城市人家的屋上，將病在床上的祖母和睡在搖籃中的嬰兒炸得粉碎，我們看見人羣驚恐地尋找地窖地道和洞穴去躲藏。空中戰爭的最初階段，還只是用炸藥和引火物，但是戰爭在進行時，用毒氣炸彈的藝術也發展了。首先，非交戰的人口是暴露於夜間起火，爆炸和死亡的命運，現又加上痛楚的窒息。潛水艇也是大戰中的一個新奇怪物，最初是用來沉沒作戰的船隻，以後又用來攻擊商船關於無警告的擊沉琉息退尼亞 (Lusitania) 號和淹死了一一九八男女兒童的事件，都有動人的描寫。依照那時的標準，琉息退尼亞號是一隻奢華的大船，她之從光明，舒服和信任中突然降落到黑夜的水中作拚命的和無希望的爭鬥，這

個時代的作者，認這是一種時代象徵。十九世紀文明的一切成績，在許多人看來，是在走琉息退尼亞的下沉的路。

在這些早年的潛水艇中服務的人，不安的情形，是到了極度了。這些潛水艇實在是戰爭的機器，牠們初發明的時候，有許多的缺點。我們如今所看見，沿地中海和大西洋的礦山用的，或者是深海探險用的大潛水艇的安全和舒服、從前的潛水艇是一點也沒有。這些潛水艇的美麗配置的壓力系統，和無限的垂直射程，都只有使我們誤會，而不能了解大戰時的潛水艇究竟有什麼能力。那時，潛水艇的下沉，只能到一百米突深，再下去，就受不住壓力。牠很容易漏水，當牠漏水的時候，鹹水易於影響電倉，綠氣又放了出來，使水手痛苦和不能呼吸。在一百五十米突的海底，這些脆弱的器械就完全變皺並且毀滅了。牠們下沉的時候，他們裏面的空氣變齷齪了；雖然他們也帶着壓縮的養氣，可是呼出的濕氣的繼續凝集，使他們感覺一種特殊濕冷的不舒服。由於他們的電池，他們能在水中潛伏一兩天，以後就要出現到水面上，開動牠們的燃油引擎幾小時，以便重裝電池。那些潛水艇有武裝的機關槍，還裝有水雷，炸彈和其他的炸藥，於是開始去追逐

和毀滅敵人的水面上的船隻。

這是一個困難而且極危險的任務。潛水艇沉下去時，什麼都不見了，潛水艇中的人們也同盲目一般，近水面的時候，牠們能用一種周視鏡，看周圍有什麼事情，可是能看到的距離很有限。在水面上時，牠們和任何別的水面的船有一樣的望遠力，可是牠的危險，同水面的船也是一樣。所以怪可怕和怪脆弱的潛艇中的水手，是在極不舒服和半窒息的狀態下，摸索他們的道路，去擊沉他們的敵人的。為了看清楚被追逐的船隻，牠們必須到水面上來，這就給了敵人以砲火攻擊牠們的機會。牠們的鋼皮很薄，只要一個彈丸穿破，牠們就不能潛伏下去了。常常牠們在沉下去時，因為煤氣的泡，和油的煙，洩露了牠們的所在地。

潛水艇最初雖然有許多缺點，却是一種極厲害的武器，尤其在中歐國家的手裏。牠們毀滅了很多的船擊沉了幾萬人。後來攻擊潛水艇的方法也慢慢進步了，有一種小艦隊中有許多船，是假扮成商船的模樣，這樣的船隻引誘潛艇到水面來，以後，就向牠們開火，所以有一個時期，牠們不敢再出現去攻炸那些甚至毫無危險的船隻。爆炸的水雷埋伏在牠們的某條航線上，在港

灣中也安着水雷的網。有時是飛機和特殊的飛船偵察牠們，用信號引導驅逐艦去追擊牠們。人們又發現了巧妙的偵探器具，以發覺牠們的所在。在水面上牠們被砲擊和猛擂，在海中又有深海的爆炸物對付牠們，能將牠們的薄片炸裂，甚至二者之間相距只有數十米突。

這就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潛水艇戰爭的簡單情形。可憐，一直到戰爭終結時，人們還進行這種戰爭，毀滅和擊沉別人，自己也爲人們所追擊和毀滅。潛水艇之建造和下水，從未有停止的時候，人們坐在裏面下水到發冷的地方，常常担心水雷的衝撞，担心前面有深水的轟炸物埋伏着，隨時有無救的可怖的死亡之可能。很少的潛艇能有回轉過海港十次以上的，大半是出去過一次就不再回來了。單是德國人就喪失了潛艇二百隻，每一雙的損失，都是深海中憂愁和失望的悲劇。直到末了，潛艇的反對者，指出潛艇裏面的士氣動搖，一隻未損壞的潛水艇受人追擊，逼得投降了。這樣，有一兩次，新的潛水艇指揮官，就故意用潛艇的修理爲理由，或用其他的藉口，將潛水艇駛回軍港。可是，大體說來，我們人類平凡的、英勇的服從，使這樣的戰爭仍繼續進行。德國人在這特殊的祭壇上犧牲的血肉最多，他們的孩子們是志願的而且服從紀律的，在向國

旗行禮後帶他們的小行李下梯子進這一輕輕搖蕩的笨的殺人機器中，這殺人的機器後來就做了他們的棺材。

他們的服從，使我們了解大戰給我們的最根本的教訓之一，人們對於新的情形雖然認識得最明顯，但此種認識，侵入習慣的道德中是異常緩慢的。數百萬的人睜着眼睛爲人奴役，恐嚇，歷盡艱辛和被人屠殺，沒有一點怨言，帶着一種宿命的驕傲。他們爲服從最盲目的成見之命令和表示最愚笨的忠誠，盡力去殺。和他們毫無仇怨的人，而他們自身也慷慨地任人屠殺，作戰到底。戰爭畫片的篇幅繪出一批一批的屠宰那些面對敵人而死的人，許多屠殺是很大的規模，實令我們寒心。自戰爭開始時，法國人大受屠戮以後，又有譚寧柏格（Tennenberg）及馬蘇廉湖（Maurian Lake）俄國人大規模的被殺。此後又有所謂僵局的時期，就是戰壕戰爭時期，在西方的損失減少；兩方的敵對行爲變成炸彈拋擲，來復槍刺殺，和大頭棍短兵相接，狂風一般的衝突。然而在東方，俄國人的軍火用盡了，只靠犧牲人的血肉來維持他們的陣地。他們在一九一四年終了以前，損失一百萬人以上，然而他們繼續服從命令，在距接觸的主要中心較遠的地帶，還

爆發了許多小接觸。戰爭畫片中關於英國數千普通兵士在美索波達米亞（Mesopotamia）的苦特（Kut）被俘後的苦楚，也有可怕的敍述。（然而辦理那些投降俘虜的將軍和其他官佐，被他們的土耳其之勝利者款爲上賓。）在紀載上關於英國軍隊之憤怒，沒有有效的表現。

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在法國境內的英軍和法軍斷續地恢復了大規模的敵對行爲。新受訓練的英國軍隊受了他們的將軍們的命令，密集地前進，這些將軍要不是可憐蟲，那麼對於他們調動去這樣作戰的人的命運不至於不明瞭。假使他們不是可憐蟲，他們不願增加他們的罪過，這樣對於士兵的痛苦及生命之浪費，眞是毫無心肝啊。這些人的心理是很可以討論的問題，他們指揮可憐的孩子們肩挨肩的前進，前仆後繼地進攻，以致被敵人的機關槍掃光了。六七百人的隊伍中或者有一百人能衝進防禦火線，去擲炸彈，作白刃戰，並且在德國的戰壕中投降。他們中間分離了的小羣，在炸彈炸毀的洞穴和被奪得的地位中，仍舊戰鬬了若干日。從幾十萬家庭募集來的一代青年的精華，怎樣爲人們所愛，爲人們所保護，和受過多少敎育，却這樣毫無意義地犧牲了。這一代人毀了極大的代價招募來了，受了訓練，又派到戰場上去，最後被拋棄

在荒郊，屍骨成堆，腐肉喂給蟲鼠。那時的攝影的遺跡又告訴我們，以後的幾個月，幾千兵士在他們倒下時，成行列的躺着，他們的隊伍好像還準備跳起來再進攻的樣子，但走近前面一看，他們已在腐爛了，很多膽有白骨的手，沒有眼珠的眼眶，全是已腐壞的骷髏。

英國的總司令發出報捷電，竭力贊揚他的受損失的旅團之英勇：把這些怪誕的事說成勝利，說那次七月大進攻，佔地一哩餘；俘敵近一萬二千。但這捷電完全不曾提起，有兩倍的英人為德人所俘擄。

這一次戰爭的可怖情形，洩露出來很慢，至少英國的檢查員總算很能幹的，那些將軍們在別方面，雖然不行，但說謊的本領都很好。英國與歐洲大陸相隔有一海峽，他們因此更容易將事變對英國公衆說謊。這對於英國的軍隊也有一種特殊的影響，他們感覺是在與「家鄉」不同的另一世界，就是戰爭的世界，在戰爭裏面的殘忍和荒謬，是自然的事情。這樣可怕的屠殺，竟計畫出來了，並且執行很久，不僅沒有遇到暴動的反抗，而且無論那些犧牲者的父母親友或殘存的同志，都沒有提出任何的抗議。不能不算是怪事。

在奧地利，阿門尼亞（Armenia）和別處的俄國軍隊，也正式宣布獲得了同樣代價的英勇的勝利，德奧方面則竭力指出牠的不確。德奧方面也是損失得可怕的多，雖然比他們的敵人也許要少些。次年（一九一七年）的英國人，又是勇敢而馴服，策略改進的地方也很少，重新開始再來一次大進攻。

但那時，法國軍隊開始表現他們的活潑和聰明。他們對於環境熟悉些，離家庭又近，比起英國人來，不容易與叛亂的思想隔離，有一個尼維爾（Nivelle）將軍，那時担任法國的總司令，做了邱吉爾所稱的一個「試驗」，結果是喪失了近二十萬人。這就是集合無數步兵向砲火密集的地方前進。怡彰洛萊（Yharnegaray）中尉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在法國衆議院辯論中說在一小時內，他們變成一像瘋人一樣的亂跑一的一羣，一切隊伍次序和分別都消滅了；人們估計受傷的近一萬五千人，實際比這個數目還要多七倍；傷亡的人，許多有三天都沒有得到必不可少的照料；其結果是成千成萬的人身上生疽，四肢切斷，不幸死亡。後來，第一次發生反抗，表示人類的服從是有限度的，法國的一師團在被調加入前線繼續這種無益的屠殺時，忽然拒絕開往。

邱吉爾說，當局對這件事深爲「焦急」，無疑地牠使每個視戰爭爲游戲的聰明人着忙。邱吉爾又說，這一師團參戰的成績，「並無不合」，牠的反抗精神是傳開了。

在這個世界的痛楚中清醒的第二次反抗，是俄國的專制惡魔之傾覆。沙皇制度之心理的和道德的衰微，我們在一般的帝制之墮落中已說過。這個腐敗到極點的政府，突然崩塌到不可收拾，牠的廣大的領土內秩序大亂。幾個月來俄國首都的志士在那里對西方的革命家作虛幻的模倣。他們受了第一次法國革命的回憶的感動，或由於對英國國會的崇拜所致；在這個形勢中有一確定的事實，就是俄國人民漸漸不願繼續戰爭了。可是第一個共和政府的領導，是一個會說話而不會幹事的律師政客，克倫斯基（Alexandre Kerensky），既不能繼續戰爭，又不能完結戰爭，「用協商來實現和平」之呼聲雖被抑制住了，但是仍在一切交戰國傳播政府的積極壓迫，雖然有報紙嚴密的隱瞞，也無效果。急進派想在斯都霍姆（Stockhoem）召集一種和平會議。後來俄國的第二次革命，擁護一些人數少而堅決的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他們之能取得政權，單是因爲沒有別的較好的出路的緣故。而且因爲他們明白和確定地允許和平，雖付任何

代價也所不惜。俄國的軍隊在牠發出的消息下就解體了，人們都陸續回家。德國在東方的軍事當局看見他們前面的戰壕都空了，很客氣地好像兵士對兵士一樣的歡迎俄國舊制度的長官，這是躲避他們手下兵士的反抗的憤怒而逃過來的長官。

一九一七年，人類似乎已從戰爭的夢魔中驚醒了。法國有十六個軍團都發生了兵變，被牽連的有一百十五營，各師的士兵選出委員會來，整齊地向巴黎出發，要求合理的結束戰爭。拉發爾(Pierre Laval)說，失望的兵士之一個最後希望是斯都霍姆 Stockholm)。那一種失望使生活不可忍受。但是在美國加入了戰爭之後，風潮平靜了些，統制西方世界的諸強還支持了一年之久，追逐他們可怖的夢想。

戰事畫片一書，有一卷（二十一卷）完全講一團俄國步兵在法國的悲劇。俄國於一九一六年遣送了有一萬五千人到法國，在那里武裝起來，準備加入前線同法軍作戰。可憐這些孩子，許多還不知道法國人和德國人間的分別，而戰爭的表面目的，也不是他們所能理解。他們聽到自巳國內起了革命，他們就決定討論他們對革命的態度。他們選出了代表，並且表決他們是否

應繼續戰爭，就是說應否參加尼維爾那時爲他們所準備的一個「試驗」。他們選擇了在他們看來是容易作戰的地帶加入了戰爭。法國的指揮待他們極暴虐，傷亡近六千人。其餘的人脫離了前線，並且反叛了。他們不願再作戰。可憐，這些無力自衛的人，爲可靠的法國軍隊所包圍，機關槍集中起來向他們突然開火，他們都被犧牲了。這事件的詳情之可怖的攝影，最初是對官廳隱藏起的，後來才發表出來。

法國人對於他們自己軍隊的士氣失去信仰近一年，不敢作什麼大的進攻。但他的聯盟者在帕奧兌爾（Paschendaele）的戰爭中供給了四十萬人，與三十萬德人對敵。在春季，德國人從西方調動了很多人，做了一次大進攻，這一次進攻最初是成功，以後就失敗了。從美國開來的生力軍，增援了他們的敵人，在血泊中反攻，得到了可怕的最後勝利。戰爭最後的九個月，比以前任何一年的屠殺還要多。從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到同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國傷亡八十三萬人，法國人和比利時人傷亡九十六萬四千；德國傷亡一百四十七萬。大戰終了以前，有二百萬美國軍隊運到了歐洲，其中一半以上都加入過戰爭。他們的傷亡一定不少於三十五萬人，葡萄

牙人和從想不到的地方開來的其他暫編軍隊，也是死傷狼藉，但這些小實力的損失，我們現時已說不出精確的數目。

這是戰爭的概算。但是戰爭畫片一書中，有三卷或者是最可怕的幾卷，專講大戰中大羣的人所受的痛苦和滅亡的詳細情形。這三卷書像解剖學書中的顯微鏡下攝成的圖一樣，舉一例可以概其全部。小的人物，是在他們寫作，或談話或攜有照像機時偶然選擇的，被放大來代表沒有留下紀載的幾百萬無名的人。我們所有的敍述，是那些被棄在防線之間許多天，爲飢渴所困，被他們自己的腐潰的臭氣窒息，而又活轉過來的人說的。我們有的故事是那些落入腐爛的死屍堆中，躺在那里幾乎不能呼吸的人，和中毒氣的人的故事。毒氣的害處很多，而且是各種各樣的，用許多混合物，在人的身體上留下了供他終身痛楚的毒害。我們有當時變幹的手術描寫，和關於心理錯亂的統計。還有些許多殘廢的人，沒有面孔，肢體折斷變成怪形狀的可怕的圖畫。成千成萬的不快樂的和受傷的人類，被藏在特殊的機關以內，直到他們死亡的時候，他們是可怕可憐而又無希望，就在他們活着的時候，世界已將他們忘記了。

靈魂所受的損傷，也許比身體所受的還更可怕。在搜集起來的許多可怕的實事中，有最可悲的一項、就是一篇關於使用刺刀的講演；是一個英國參謀官對正受訓練的一班軍官學生們講的。這篇講演印了出來，以後又爲反戰的宣傳家們所重印。他是那樣的兇狠，我們今日看起來，幾乎不能相信的。我們以爲他是喝醉了酒，或者是在發瘋。但他演說時，聽衆喜笑讚美，上級長官對他熱誠感謝；他演說完後，大家拍掌三呼。從這些事情看來，我們可以理解他所表現的僅僅是軍隊中的共同精神。

「假使你看見一個受傷的德國人，」他說，「不客氣地可以將他殺却。」

他完全反對收容俘虜，主張在他們投降後就將他們殺掉。當他講到他下面的一個伍長如何屠殺一羣的德國孩子時，他是同情而且稱許的。「先生，我可以把這些傻瓜們幹掉嗎？」伍長指着一羣被解除了武裝的敵人問。

「可以的，你幹去就是，」軍曹說。

這一誠實的伍長，是從達特莫爾（Dartmoor）監獄釋出的一個罪犯，幹掉了他們以後，回

到軍曹那里，被軍曹訪問；談得得意的時候，還討論將刺刀抽出得很快，接着幹「下一個人」的技術的困難。

這是過去和現在戰爭所賦予一個人的精神。像這樣勇敢的軍曹，每一次交戰的軍隊中多得很哩。我們能引證一個英國的文件，因爲這是自由發表的，但別的許多國的參戰者發表東西却不是這樣自由。整個說來，英國的兵士是和別國的兵士一樣的和平，但是恐懼和殘殺，將社會上逐漸培養起來的各種約束和容忍，很快地和完全地從人心中失掉了。歷史是不應當寫成淡紅和金黃色的。對於俘虜和受傷的人，不僅是忽視，虐待，和「殺掉」而且許多是被酷刑拷打以至於死亡。這或者是由於報復作用，或者是藉殘忍以行樂。我們在一串的攝影中看見被殘忍切斷四肢的身體；這些肢體的被切斷，或者是在他們快要死的時候，或者是在剛死以後不久，割下以後，還要陳列出來。那幾千萬人一走進戰區，簡直是走出了文明的疆界，走出了我們今日所知的任何種人的生活，墮落得比野獸還要兇惡。

一九一八年夏季以後，德國確實知道牠終於要戰敗了。戰鬥的精力也消失了。由於封鎖的

殿屬，到處都是窮困和饑餓。全國的紀律也懈弛了，在前線後面的鄉村內，很多流亡的人出現。德國的高級指揮部，當時和他的敵對者處於同樣的境遇，不信賴自己的人能夠進攻，也不能信賴他們對於敵人的進攻會抵抗。他們急願投降，運氣壞的就在路上遇着從達特莫爾來的試驗的伍長們。

然而無論什麼地方，如果還有人效忠和服從，他們仍是無情地爲高級指揮部所犧牲。戰爭畫片（卷二十七）上面畫着有德國的機關槍手在他們的深坑中防禦，以抵禦英美軍隊之前進。這些人讓自己爲毒氣所襲，繫在武器上面，不能脫身，只有繼續放槍，殺戮，直到進攻的敵人到達他們的面前。那時處理他們就不留情，敵人或者用刺刀將他們戳死，或者把他們的腦漿擊出。他們喫了他們主人的發明的虧，他們的主人發明了毒氣，於是每次進攻的軍隊痛恨已極，就殺死他們來泄恨。這樣無意識的盡忠，一點也抵抗不了，挽救外部對德國的巨大壓迫，德國正在這種壓迫下衰竭了。在十一月，黷武的德皇出亡了，屈辱的休戰條約也簽訂了，德國的軍隊秩序大亂地退回來，他們是革命的可是觀念不很淸楚。

說到「革命的但是觀念不很清楚一我們對於主要的戰爭之敍述很可以結束了，我們只須一提意大利的軍隊在卡波勒托（Caporetto）一戰的失敗和戰後的瓦解，有八十萬人或死，或傷，或被俘，聰明的人就「逃回家去」。我們也不去敍述海軍戰爭，主要的和最後的一戰是在巨特蘭（Jutland），牠是最後的一戰，因爲德國海軍提督們如果想再來一戰時，就會遇有兵變的危險。至於牠是否爲英國的勝利，則從未有過精確決定。這種爭論在波蘭戰爭中就消滅了。

戰爭畫片的各卷中，關於這些海上的爭鬬，給了許多照像和敍述比如我們有關於巨特蘭一戰，英國巡洋艦國防號（Defence）的連續的全部快鏡攝影，牠以極快的速率駛去進攻一個已被擊壞和正在下沉的德國戰艦威斯巴登（Wiesbaden）號，並且結果了牠。那一次勇猛的機械之前衝是可怕的；這一衝似乎是無敵的和不可抵抗的，並且是不可否認的光輝。以後突然有一陣使人目盲的閃光，指出那救援威斯巴登號的另一德國戰艦到了，牠的砲火擊中了國防號立刻國防號也炸壞和完結，只剩下一股直上的黑煙和飛散的碎片說來也可憐，有八百個人的炸開的和焦爛的身體。以後就是滾滾的波濤，只是染有了的顏色。

這類圖書之多是沒有完結的。

但我們且回頭來說「革命的但是觀念不清楚」的一句話。這是了解那時人類的形勢的關鍵。全世界的人都是極不願意戰爭，假使不是在開始的階段，至少在第二年還未完結時就是如此。戰爭使人們煩死了，戰爭使人們憎厭了。戰爭中並沒有那種吸引人的想像和使人驚心動魄的巨變，甚至巨特蘭的大海戰，從熱鬧好玩的觀點上看，也是一完全的失敗。然而比較很少的堅決主戰的人，却能使大規模的破壞和貧窮繼續下去。這有一個極簡單的理由：一方面，戰爭和當時的統治的觀念相符合，另一方面，那數萬萬的人羣，雖看見恐怖陸續的展開，不勝驚恐與失望，但他們對於生活之另一前途，沒有任何明瞭的概念，可以走向牠去，以逃避戰爭的無情的後果。

「使戰爭完結」這句空口號，完結不了任何東西，因為牠沒有指出在人類事務的管理中，用什麼去代替好戰的政府。羣衆渴求的和平還是一沒有形式的否定。但是和平必須是一積極的事情，必須有人把牠設計出來和維持得住，因為戰爭比和平是更為自然。我們最後獲得了人

類的和平的人，知道和平的維持者應該是如何強有力和堅決，如何需要有強有力的武器之設置和十分的謹慎。

八　福特和平船事件

在戰爭那些年的紀載，眞可怕極了。有一個奇特的航行故事閃耀在篇幅之中，這個航行故事雖是古怪而兒戲，却預示着大事件要到來。這是一個載客的輪船，由紐約到挪威的航行。人們對於巨特蘭的黄昏的大戰和戰艦的隆隆砲聲都漸漸忘記了，戰艦的名字也不復爲人們所記憶，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就是他們從火燄中迸出衝過煙霧，完結了牠們的命運。現在只有專家才能告訴我們這些戰艦的名字，是「羅錣曹」(Lützow)或是「偉大的費立特克」(Friedrich der Grosse)；是「獅」(Lion)或是「鐵公爵」(Iron Duke)是「先鋒」(Vanguard)或是「巨像」(Colossus)；連人帶船都沉沒或是蹣跚地逃掉。現在談起這些事來是怪不合時宜，牠們比起爆竹的箱子來還不見得更重要些；要是不說出牠的大小和在牠們裏面擊沉的成百

成千的人數。但是在巨特蘭一戰的前數日，在斯卞第那維亞到美國的航線上，有一隻載客的輪船，阿斯卡第二號 (Oscar II) 橫渡大西洋而來。牠的航行直到今日還是重要的和有趣的，因為牠將那些開始誕生的生活的新概念與當時流行的弱點簡單而老實地混合起來。阿斯卡第二號在歷史上又稱享利福特 (Henry Ford) 的和平船。牠是普遍的殘殺中的一線悲喜劇的微光。

福特是一個心理極自然的機械的天才，沒有受很多的教育，而且也沒有社會中的狡猾脾氣。他是愛迪生的好朋友，有和愛迪生同樣的精神。關於愛迪生的事業，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發明的發展和利用的一章已敘述過了。福特生於經濟擴張的時期，並且在這時代長大，他將經濟擴張看成事物的內在的必然，也許在他未到七十歲以前，他從不懷疑人類的進步是不斷的罷。他真是好運氣，這時代給他一種信仰，使他去設計一種汽車，能做到當時所沒有的那樣的健全，良好和價廉，加以他的異常的精力和能幹，組織大規模的生產。他的心中却從沒有想過，能買他的汽車的人們是有限的。他大宗出賣他的 "flivver" 或 "tin lizzie" (即當時人們

對他的汽車之親暱的稱呼）結果是他將美國的道路運輸和城市計劃都革命化了。他改變了每個正在發達的城市的外形；他使小有產者能住在距工作地和商業中心稍遠的地帶而不愁往返不便；他不但將馬從馬路上趕走，而且也從田野中趕走，因爲他製造農業的曳引機：他在這種事情中所做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多。他在第耳本（Dearborn）創造了工廠如今看來規模也還算是大的。他成了富翁了，而且成了世界上尤其是美國的著名人物。他的人生觀還是可驚異地簡單和質直。

他最初聽到大戰消息的時候，和大多數說英語的民族一樣，是驚異地不相信。他從前知道世界上有軍隊和國家，但他似乎從未想到他們會戰爭的。他覺得戰爭是一種錯誤的行爲。他和那些與他同感的美國人交換過意見。一九一五年之初，他們已從交戰國搜集得充足的見證，使他們相信這些國內的多數人民也是和中立的旁觀者一樣的驚訝，和他們一樣的渴望日益蔓延的流血和野蠻早日完結。曾經有一個代表團去見過威爾遜總統，因爲威爾遜那時和他的國家和衷共濟，都是極端和平主義的。美國人中有一種很普遍的野心，主張美國應單獨召集一種

永久的仲裁會議，或者與其他中立的列强相聯合，站在戰場的邊沿，對於交戰各國的政府繼續貢獻其調停的任務，直到他們接受時爲止。那時有人主張派一個代表團到歐洲去宣傳這個觀念，於是就發生了這個代表團如何渡大西洋的問題。福特馬上答應撥一隻船來裝載代表團。

後來，他將他的提議經過特殊的想像，他想將這一隻船做成一熱鬧好看的船，替牠取個名字，叫做「和平船」。牠應帶一批中選的代表到歐洲去，他們都很有聲名，等他們一到時，大家一定會停止戰爭來看牠。這隻船一出現，就會使發狂的歐洲清醒過來。「我要使那些孩子們跑出戰壕來，」福特說，「他們不願戰爭，他們能互相握手，這是他們最高興的。」他這些話的後面，似乎有一種在前線召集一次總罷戰的思想。「聖誕節時退出戰壕，永不再回去，」這是他於十一月在華盛頓的一個公共會議中的簡單的演說。各種各樣的有名望和有力量的人，都請來了，參加這個代表團。他想找總統出來公開贊許罷，但是總統是一個很有涵養的政治家，不致在福特的這個「姿勢」上浪費他的演說。他正在考慮，後來他應怎樣單獨來一個姿勢。

那時候的美國生活，有他的著名的和人民信仰的人物，代表美國的偉大的和仁慈的理想。

其中的許多人因種種理由，到如今仍爲歷史家所記憶，如亞當士（Jane Addams）和愛迪生布里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白爾班克（Luther Burbank）。這些名字在現在，也許低級學校的百科全書中就可以找到的。福特企圖將他們一齊都容納在一個流星似的船中；美國聯邦的各邦省長，著名大學的著名學生及其他重要的人物都被他邀請。阿特卡馬（Attecama）的歷史博物館已經搜集了一些福特的殘存的幾份請柬以及那些出名的個人對他的提議的躊躇或規避的回答。有些人是在將動身之前，突然疾病大作，不能參加。也有些新聞記者，電影拍照員攝影家，速記生，打字生，譯講，管行李的人，傳達員，都不辭麻煩而來。有一個匈加利太太 Rosika Schwimme 之出現於歷史舞台上，就因爲她是這班人中間的一組織者，以後又是隨着牠而不見了。極多的冒險家和瘋人們都在福特計畫公開宣布時，踴躍自薦地來效勞，還有許多人，是費了很大的困難才阻止住，沒有使他們上阿斯卡第二號的船。

那次和平船航行，還有許多詳細情形，可供寫作者做材料，但我們所關心的既不是整個的航行，也不是關於福特，或其他與此航行有關的名人之所以爲名人，而是關於這次向人類的理

智申訴以反對戰爭的思想之消長，和關於這個思想的變遷。

可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這次航行激起了回響，而且是一廣遠的回響。無論在美國和歐洲的有名的人，爲了顧及他們的名聲，認爲應該對牠表同情，雖然是愛莫能助的同情。比如威爾遜總統他是同情的，但仍然是愛莫能助。一切西方世界的有野心的善辯者，都出來擁護這隻和平船。我們從各方面可看出這幾年對於世界和平有過廣大的宣傳。可是立刻這些善辯者又開始動搖和轉變得離開了。

爲什麼他們動搖呢？這計畫一開始，就有些人對牠有一種隱忍和惡意的仇視。這種仇視越來越利害了，美國的輿論以及歐洲的輿論，都開始將和平船中每一個弱點，每一個很小的笑話誇張和誤解，並且更捏造了一些弱點和笑話。一種嘲笑的宣傳於是開始這樣的巧妙和堅持直到有名的人紅着臉，一個一個的脫離這個集合，他們的無聊的道歉，將這個計畫的主要清醒點湮沒了。當福特和他的殘餘的代表們，在他們的輪船上討論和演說時，和他們在一起的新聞記者，更捏造他們的主人一些誑話和無聊的故事，好像他們是受人指使而這樣做的。

到了現在，我們的確知道他們是受了指使的。在歷史文件集中關於這點記得十分明瞭。

我們的學生們，將那一長段被隱藏的歷史之紐結，一根一根的解開時，我們愈明瞭當時令人痛苦的不誠實，和昏亂的意見不一致，美國的出口貿易，在戰爭的狀況之下，是從來未有的繁盛，各種的軍火，用很高的價錢賣給交戰國。如摩根（Morgan）公司那樣大的銀行，正由供給這些物品成了債權人，使英法在財政上隸屬於美國。不錯，美國的金融業和美國的大商人是沒預先見到這些事的，他們沒有異常的先見之明，後來突然感覺他們是處於極有利益的地位了，由他們的傳統觀念，他們一定是要利用那些利益的。而羅斯福却太天真了，他們說，「這些事情，都不是他應該管的，他為什麼插進來，使造成一些有利的形勢呢？」

在把這件事說成一件危險的事的時候，他們只有巧辯。人們是不能不睬羅斯福的；他的很大的名譽，他並不是一個可輕視的人物，他一定要被人們弄成可輕視的樣子，才好打倒他。美國的輿論的熱心，本可用在一個更高的目的上面，現在却用來反對羅斯福，美國輿論的奇怪的傳統之一，就是新聞記者不應有什麼顧忌，有一些新聞記者是反對道德的人，甘心墮落，只要能夠

挫折福特，使福特失望，沒有卑鄙的手段，沒有誑話，沒有詭計，是不能辦到的。

他們確實使福特失敗和失望了。他們用種種方法，使他自己也懷疑起來。這一個半生不熟的天才的人，既為他的朋友們所鄙棄，於是對於他的計畫也失去了信仰。他漸漸懷疑他的同伴，並且相信起他的敵人來了。

我們只有接受為我們而保存的證據，就是那些證據在我們面前，那些報紙的反福特宣傳中，有些詳細點也似乎是不可信的。在柯特卡瑪有一百本大本的剪報冊，其中最可怪的已在歷史文件集中轉載了。在國外做福特座客的新聞記者和作家，揑造了關於代表團內團員的鬪毆，領袖之間的爭論，福特為他的書記用鎖鍊繫在他的牀上，叛變和許多離奇的事，一律用無線電傳送回國。這些消息有人會對福特說過的，他是能有權力阻止這些消息發出的，因為他們也住在他的船上。可是他崇信言論自由的觀念束縛了他，雖然在實際上，那些自由言論都是自由撒謊。他還是很勇敢地說，「讓他們高興怎樣說就怎樣說。」「我們的工作自然會自己證明的。」

不久，他患感冒了，這種病，現在是消滅很久了，但在那時卻很猖獗，在那些呆笨的醫藥照料

之下，他到歐洲時是消瘦而且疲倦，無論精神上和身體上都是這樣。那時他有些相信，整個事情是有點愚蠢。他被包圍在嘲笑中，無力抵抗，只好退讓。他眞的退讓了。

他在克里斯丁那（Christiana）臥病，他說，「我想最好還是回家到媽媽那里去罷，」他足不出戶，雖然各挪威都急於想見他，並且要恭維他。

但他的運動還自然而然地在擴大。挪威人熱誠地歡迎這代表團他以後在那些力求不捲入衝突漩渦到底的歐洲小國，如瑞典，瑞士，丹麥，荷蘭等國中也受同樣的歡迎。在那些國家內的人民都很相信，這個新奇的干涉辦法，也許能幫助戰爭之完結。也許福特是失望了，但他的同伴們還有些是很好的人物。他們在瑞典，瑞士，荷蘭舉行盛大的公衆集會，他們的活動確實對於德國和英國的和平運動有鼓勵的影響。他們努力去和一些政治家，政客們會晤談話，他們喚起了德國和英國的軍事當局之警戒的仇視，因爲兩方面的軍事領袖都以爲這個代表團足以動搖軍心。爲繼續調解的中立會議在斯篤霍姆成立了，雖然牠的存在也是動搖的。據他們說，這個會議阻過了德國方面引誘瑞典加入戰爭的運動。

以後福特的擁護和平的組織，逐漸失去了重要。那時候有一更大的運動趨向於由協商得到和平，將這組織維護住，尤其是威爾遜總統的空泛而不確定的姿勢。威爾遜之重新當選爲總統是因爲他是「使美國超然於戰爭之外的人」，但他領導了他的人民從虛僞的和平主義和有力的軍備的階段，在一九一七年捲進了戰爭。在達到那一頂點以前，和平船的氣泡就完全炸開了。船上的打字生，攝影師，和書記都被辭退了。福特自己竭了人力所能做的，使人忘記那隻和平船；但留下的紀載是他所毀滅不了的。

他引導（雖是在名義上）他的航行到歐洲來還不到五星期，便一直住在挪威旅館中，避免比他更熱心的同伴，厲行減縮他的財政負擔，最後突然脫離自己的同事而回家；他逃走了。他在早晨五點鐘偷偷地離開他的克里斯丁那的旅館，他不顧他的同志在最後一分鐘，有人知道這個消息，急從牀上翻下來，向他勸告和抗議，他都不顧地走了。在最後一年還未完時，他甚至停止了財政的幫助，而那些拋棄了他們的事業和位置而完全相信他的誠實而挨人嘲笑和憎厭的男男女女，都只得找路回到他們的舊巢或者去找新的出路。

但是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使他的偉大的思想，半途而變呢？在這個擁護和平的十字軍首領之腦中和心中，又有什麼奇怪的轉變，以致使他與以前完全相反呢？這是好奇的歷史家只有懸揣的，因為福特已經忘記了現在已無從對他的頭腦和心腸作審切的研究了。

我們應該先知道，正當和平鴿在太平洋時，在歐洲正發生一件極重要的事情，美國的軍事工業，正在迅速的生長，認為除供應海外作戰諸國的廣大需要之外，應有一國內吸收他們的生產品的市場，一個有消費力量的國內市場。依照一部份人的意見，美國可以超然於戰爭之外，這是好的，但是美國必須「準備着」，美國必須武裝起來。總統之考慮這種提議，已適當顧及他在下次選舉中所能得到的票數和輿論的贊助。他很小心的，正是一個政治家的本分，權衡了這個提議，在某些躊躇以後他同意美國應當「準備着」。軍火應當集合起來，軍隊應當操練，國旗開始飄揚。而美國國歌是一種令人心醉的旗幟——銅鼓與號筒齊鳴，軍事的緊張激動了那廣大而和平的美國人們。

福特有龐大的工業企業，一直到現在是從事於生產汽車和農業機器的，但也能很快的改

作軍事材料的生產。這個產業是他的創造，也就是他的化身。他的產業正是使他與尋常的人有不同的地方。他的朋友和他的家庭看他那樣拋棄自己的業務來管世界的閑事，深爲担憂。多半他們比他明白在先，假使他立足於「準備着」的運動之外，如他担心着去做的，別人的產業一定會在他自己的產業之旁，興盛起來，首先製造戰事材料，但戰爭過了以後，也能反轉來變成大工廠，大宗地生產汽車和其他。在法國，這個從軍火移轉到汽車的製造，實爲雪鐵龍（Citröen）組織所預見到而且實行過的。福特如何看不出這個傾向呢？

但他從前曾於匆忙時宣布自己是反對「準備着」的。他已威脅地在他的工廠上掛起一「國際旗」來代替美國的國旗。

很明顯的，在每一經濟的頭腦中，那時的一切主要的力量都在起作用。他曾生動地和慷慨地響應過以世界和平爲目標的新的宣傳運動。洛赫納（Lochner）在他的美國的吉訶德（America's Don Quixote）（一九二四年）一書中報告他離開紐約出發時的談話：

「你有什麽最後的話要說嗎？」一個新聞記者問。

「有的，」他回答說，「告訴國民們，呼籲和平和反對『準備』」

「假使這一次和平船的使命失敗了呢？」另一人問。

「假使失敗了，我再發動另一個；」他毫不躊躇地回答。

「人們說你不是誠實的，」第三人批評說，

「我們現已使和平的宣傳在進行，我將推動到底。」

以後就有那些第二次的思想了。當一九一七年，美國加入戰爭時，和平船是一陳腐的老笑話，福特的大工廠為軍火的生產，已準備好了。

福特是他的時代的縮寫，所以我們要在我們的歷史中給他以重要地位。二十世紀的普通人既非和平主義者，也並非戰爭製造者，他兩種都可算得。福特是一個普通人，他的出名只是由於偶然的環境和非常的精力。

二十世紀的歷史主要特點就是猶疑不決，福特在他的和平船上把這種不決斷表現得極明白。假使我們將為人類統一的偉大鬥爭，比作人類動機的複雜的奏樂，則和平船的航行，不過

是前奏曲前的淬鐵哨子的吹聲，至於正樂，就是人類的總一，那還在後面呢。

九　軍火工業對於延長戰爭危機的直接作用

我們現在應該說到膨脹的「軍火工業」的直接的活動，怎樣促成大戰和維持大戰的屠殺。假使我們要了解二十世紀中葉的緊張和殉難，我們對於那個勢力的正確了解是最主要的。

這些「軍火工業」，是鋼鐵工業的結果。鋼鐵工業在一七〇〇——一八五〇年之間百餘年中，由手工人的不足道的活動，生長到鉅大生產的狀況。鋼鐵工業在世界上鋪上了鐵路的網，創造了鐵船，後來又創造了鋼的輪船，將木的帆船從海面驅逐走了。在另一階段——一切這些，在 Luke Zimmern 的 Entwickelung und Geschichte von Kruppismus, 1913; 歷史文件 394 112) 鋼鐵工業的注意力又轉移到世界上的武器。

大砲的口徑和射程之不斷的進步，戰艦之鉅大擴張，及時常擴鼓更建立巨大和更精緻的型式，這些都是軍火工業最重要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利潤泉源。世界各國的政府事先並不

警察，而軍事工業能在短時內，靠他們的健全和習慣的售賣方法，把牠的新奇物迫得這些政府承受。這些政府之間的敵視本是傳統的和不可調和的，大家很快的認識忠君愛國之觀念的衰微，同這些大工業的利潤不相容。這些工業的販賣部，或在接收買當時的大多數新聞紙或想法去管理牠們，而且在學校中也嚴密注視軍事教育，培養好戰的風氣。這些大公司的經理們依照販賣的工業主義的既定規則和習慣，除利潤外，絕不想到其他結果，只知道創造新的戰具，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中，作第一次的試驗，在一九四〇年的波蘭戰爭和以後的十年中，表現他的最後的拚命和可怕的震動。

就是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初期，人類使用這一種新戰備是異常的不愉快，牠還滿足不了人的經常的戰鬪本能。一個動怒的人所要做的是去毆擊另一個人並且使他羞愧；如果一個人在距離十哩之遙，被子彈打倒，或在洞穴中中了毒氣，這有什麼意思呢？人們不是和他們的同儕在共營戰爭之樂，而是共營地震的恐怖。我們已指出過，在同時出現的戰事書籍，對於可怕的新的策略，對於非運動用的品質，對於污穢狼藉和不文明，對於不顧人的尊嚴的機械，

充滿了無效的抗議。這種抗議，自身必然是無效的，因爲牠對於那製造和維持戰爭的勢力，沒有明瞭的判罪。正如兒童在怒號與啼哭時一樣，他們也許不想去看，那些使牠痛苦的是什麼東西。

在我們今日看來，允許營利的個人和公司，製造殺人利器和出售於任何人，似乎是瘋狂的行爲，但是在十九世紀之末和二十世紀之初的人看來，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由於新工業品繼續的擴大的應用於戰爭中，由於和平時代商業的經常的出售方法，不受任何限制，天然就發生自由製造和買賣殺人利器的行爲。一直到世界大戰的浩刼以後，戰爭之無用可算完全的證明，人們仍讓自己像羊羣一樣地被趕進營房中，讓軍火商人積極生產和出售新的殺人武器，他們被壓迫地去消費這些貨物，並且自己也爲這些貨物所消費了。一堆更多的和更危險的戰爭原料，繼續着集累起來。

本加里（Bengali）的一位諷刺家孫教授（Protosor Chondra Sen）（一八九七——一九四二）在印度（幾篇童印的文字）一書中，有一篇古怪的，似乎是科學的論文，稱爲對於幾種聰明的動物的愚蠢的比較研究，這幾種動物也包括人在內。他感覺得人類在這時期看着

製造的物品是爲摧毀自己用的而漠不關心。他研究那時正在世界上絕滅的幾種海禽如企鵝等 (Penguins) ——二十世紀這一時期毀滅了幾百種動物——因而推測出人類也將遭相同的命運。他開始說企鵝的被屠殺，他印出大堆的這些非常的動物之攝影，牠們集合在南洋諸島的沙灘上，注視着殺牠們的人的前進。牠們散處在一個長而傾斜的岸上，當屠殺在進行時，牠們靜立着，或者搖擺地走來走去，或者輕拍牠們的矮粗的羽翼。牠們似乎不大關心牠們的同胞之被殺，也不被激動得逃走或抵抗。（我們可以說，關於企鵝的心理沒有過充足的科學觀察。試驗心理學之復活是來得太遲，來不及做這些工作，我們現在只能猜測，當殺戮在進行時，牠們的奇怪的頭腦是怎樣的思想。有一種見證指出這些動物有好奇心，很和氣的；有同情心而且也是幽默的。牠們是可造之才，在鳥的智慧測驗中，他們的地位很高。然而他們允許牠們自己絕滅。）孫教授很相信，一半是認眞，一半是嘲笑地；牠們並不是沒有心理，只是心理有缺陷和錯誤。牠們能有許多的思想體系，但沒有社會保存的思想。他指出海象也是這樣，海象也是很快被毀滅了的。（這些海象中之最後的幾隻，後來被一個日本獵人殺掉了，一九八五年「海盜的暴動」中，

當保護的巡衛撤退時，這個瘋人因急於想造一「不朽的聲名，」就殺海象來「創造紀錄。」但孫教授在考慮過各種可能的例以後，他們將社會愚蠢的獎章歸之於人類。

他很漂亮地模倣當時的社會研究的方法，對於他所稱爲二十世紀初的「人類企鵝」做了各種攝影，成千成萬的搖搖擺擺地去看戰艦下水，看着閱軍和大操歡呼，注視他們的軍用飛機在天上奏技。並且他在人類攝影的旁邊也刊出了企鵝的各種攝影，無論是由微倖的偶然，或是由於人工的安排，他們與人們的情形相同得奇怪。他附出軍火公司的股東的一張單子，內有自由教會的現任主席，英吉利國教的主教，很多的教士，藝術家，法官和各種敦厚的人。他引了許多英國國會戰前辯論的紀錄，（在一個一九一四年初關於海軍預算的辯論中，史諾登(Philip Snowden)，即當時是急進的社會黨員，後來成爲史諾登子爵的，）史諾登表示得特殊地明顯。從這些辯論看來，人們對於危機的性質看得很明顯，而且也公開地說出了，只不是怎樣地感覺到罷了；他們能覺察到事實，只不是深刻的覺察，能引起有效的行動；這個小小的差異，是我們的注意應集中的地方。

人類何以呆望着槍砲而不表示什麼呢？而且人們已看見大戰的時候有兩千萬以上的人們痛苦地和不合時宜地犧牲掉了，何以不繼續行動，不做一點與那時機相合的事呢？何況軍事準備正繼長增高，戰爭的可怕的可能，在人的眼前增加。後來有人發現美國的皮刺萊姆（Bethlehem）大鋼鐵公司在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會議中是積極反對海軍軍縮的。無論如何，這公司同希爾（Shearer）君所控告的三個造船公司有關係。希爾說他承受了反對海軍軍縮的任務之委託，但他們答應他的款子並沒有給他。他被公司僱用過似乎是無庸爭論的，問題是在他服務的程度及他的薪金之多少。企鵝們對於有關的公司或對於希爾都沒有做什麼。有幾個人表示憤怒，這樣就算了。正如有時候一個鳥看見了取魚油的人畏縮得叫起來一樣。（詳細敍述，請參看 C. A. Beard 的 The Navy; Defence or Portent，一九三〇年；歷史文件重印，4,270,112）。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世界上沒有一點哲學的教育；對於原則和一般的觀察，沒有聰明的批評。那時完全沒有社會科學，人們所受的教育，都是不叫他們認識事物之間的關係，多數的人們

都不覺得事物之間會有任何種關係。他們想像生活的這一面儘可變動，而那一面則不受影響。工業家和金融家建造了偉大的軍備，強迫當時的政府購用，不顧後來的結果，這在現在看來是絕對胡塗的行為。這些軍備的宣傳家大多數在他們的私生活中也是很可敬佩的：有的是溫柔的愛人，有的是最好的丈夫，有的喜歡小孩和動物，有的是好人，對於下人也很有禮貌。柴哈洛夫(Basil Zaharoff) 是軍火業的最大的經紀人，有人最近在巴黎發現了他的一張畫像（據說現歸奧蓓 (Orpen)），他頭戴三角帽，乾淨的小八字鬚，他的頸項掛有俠義的勳章，看來是一個十分漂亮的小紳士，雖然有點容易發笑。那些做主教和牧師的股東們，除了有些為我們所知道的相反的例子以外，都有可愛的基督徒人格。但他們要他們的紅利，為了要付那些紅利，公衆的心中必須常燃着戰爭之恐懼與戰爭之必要。

最方便的做法是收買輿論。那些日子你可以出五百萬或一千萬元，整個的收買一種大報紙，單是從一個戰艦所得的利潤，即足以償還這個數目而有餘。報紙依照最好的生意經的傳統，天然是受僱或出賣於戰爭經紀人的。這又有什麼錯誤呢？在那些日子，新聞紙是一件生意，不是

一種公共的義務。一個忠實地報告戰爭的危險的日報，牠的銷路自然會爲人破壞，牠和那些資力雄厚的報紙是競爭不過的，這些競爭者因爲有錢能收買一切最有吸引力的特點，對於普通讀者在各方面都可以勝過牠。

並不是報館主人和軍火商有意傷害某人。他們只願出賣機器並且願那些機器趕快賣掉。報紙也不是願意人類的大批被屠殺的，他們需要出售並且需要廣告。屠殺是一個附帶的問題，是合法的生意中之不幸的附帶問題。近視並非惡魔，雖然牠產生兇惡的結果。

至於那些兵士呢？弗洛得海姆（Freudheim）在他分析兵士心理時舉出一位亨利・威爾遜爵士（Sir Henry Wilson）穿着襯衫，挽起袖子，在退休的時候，裝出儉樸的樣子，在他的別墅的花園中鋤地。而這同一的個人，做軍事行動的指揮者時，打扮得極威風，佩有鈕扣，帶子和「勳章」從一個郊外不足道的退職書記一躍而至上帝般的重要，這變化是可驚的。在和平的時候，這個亨利・威爾遜依他自己的日記上說的，是一個固執而爲人討厭的人；在戰爭的時候；他卻變成不可批評的人，好像一個上帝。我們立刻可以明白名職和升遷，對於個人是十分重要。

但就我們所能說的，他不是嗜殺人而殺人。假使有人給他血欲，他一定是要討厭的，然而他是生活在血液的池內的。

這些職業的兵士，想到屠殺的時候，是很少的說他們願意這樣做的，未免不近人情，更不要說他們是覺得快樂了。假使他們能多想到屠殺可怕的話，人類也馬上可以變好些了。人類對於他們的國家是從小感情地矢忠，在他們的服役中自視頗高，並且瘋狂地好戰，他們不看見也不願看見他們的職業之外的事情。他們的宗教的教師，隨時可以告訴他們，凡他們所作所爲都是對的。

那個時期中，年代久遠的基督教教會，在戰爭中實有很直接的利益。忽視和嘲笑宗教儀式之趨向日漸顯着，但人們因爲受了損失和死亡太多的壓迫，又轉而求上帝的保佑。這在當時的小說中是容易看出的，一時被人輕視的候補牧師們又成了感情的戰爭小說中，從軍的，英勇的牧師了。

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有少數人覺悟到我們人類危險的前途。這樣的少數

人是在日漸增加。在他們之前的問題是這樣：如何使人脫離散漫的心思，集中注意於他們前面的醜惡的現實，以後又如何去組織偉大的努力，以擺脫那不斷發生的，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危險的戰爭狂熱，並擺脫那威脅着要使全世界社會瓦解的永久的貧困。

這些着急的人找不着中心的敵人，找不着一個統治的魔鬼去與之爭鬪。假使找得到時，爭鬪就可以成一直接的並且可以了解的運動了。但是報紙表面上是虔誠地希望他們勝利，實際上是反對他們的。舊的社會和政治的傳統，無論裝成什麼樣子，也都是暗中反對他們的。歷史是反對他們的，因為自有文字以來，牠對於戰爭這事可謂司空見慣了。不僅希爾福爾的現任主教，自由教會評議會的現任主席，因為害怕分不着紅利，而且天主教的以及一切基督教教會，口頭上擁護和平，暗中是敵視和反對唯一能使世界和平穩固的世界監督的。新的精神的努力如欲收效，必須以先承認這些基督教會的信條不能夠取悅或指導世界為前提。

戰爭是自然的和不可免的，這種觀念不僅在世界各處的人們的腦中，而且也侵入他們的血液中和習慣中。在少數有眼光的人的周圍的，正是這些人。這些少數的人所要進攻的不單是

一個砲台，而是各種不同的混合的動機，錯綜的利益，在他們的心內，也在他們的身外。

一〇 災禍根源的凡爾賽

反對中歐同盟國的戰爭，卽「世界戰爭」，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表面上完結了。中歐諸國失敗和屈服了。和平會議在凡爾賽舉行，這正是勝利的德國人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後，對法國提出和平條約的宮殿。現在是法國和他的聯盟者提條件，天然是浪漫的復仇的觀念，和嚴厲正直的裁判的觀念支配着形勢，到會的列强大　坐下來糾正他們的若祖若父的錯誤。可是時間已經遲了，在閱讀他們的議事錄時，我們確實看得明顯，這是歷史的傳統和人類世界的統一之銳敏的感覺二者之間衝突的發展。假使「世界國家」的觀念在會場中找不到，至少牠的聲音可在會外聽到的。

這時候，（一九一九年，）世界上確有很多聰明人日漸認識了「世界國家」的必要，很多的人們，如我們已描寫過的福特一樣，本能和感情兩方面都了解這觀念，但是還沒有一個人智

慾上有勇氣，認眞來解決用一個世界的制度，來代替現存的諸政府的問題。人們不免有點怕負這重大的責任。然而我們現在知道得很清楚，這是他們唯一能做的事。這是唯一的前途，假使我們要避免日陷日深的連續的災難。但這種計畫的新穎與廣大使他們畏縮不前。不合理的習慣留住他們在歷史的故轍中。

在我們看來，他們似乎如淹在水裏快死的人一樣，願意藉游泳，浮起，抓着稻草和抓着泡沫等嘗試，來救自己，但是堅定地拒絕從水中好好地爬出來，雖然近傍有個梯子。

在他們的世界制度的理想中，他們中間沒有人走出了純爲避免戰爭的政治協定之外。人類還需要再嘗五十年的艱苦，才會有廣大的認識：好戰只是人類的分裂的徵兆之一；但不是最嚴重的徵兆。

在赴和平會議的一切代表中，威爾遜總統是感受將來的暗示的。他對於那次解決的貢獻，固然有缺點和短處，使我們可以略知那些日子的政治想像。他將創造了美國共和國的個人自由主義所留下來的，帶去解決世界問題。在這些可驚的討論中，許多到會者，如法國的克里孟梭

英國的路易喬治，意大利的松寧諾（Sonnino），日本的西園寺，比利時的希曼士（Hymans），波蘭的怕德列夫斯基（Paderewski），羅馬尼亞的布拉庭拿（Bratianu），捷克斯拉夫的本尼士（Benes），希臘的維尼齊洛士（Venezelos）赫查茲的費沙爾（Feisal），還有不少的現在已凋萎的人們。在這一切人中，沒有人覺得除了任何民族利益的考慮以外，整個的人類在這次解決中也有利害關係的。他們是不可調和的「代表」國家利益的律師。威爾遜只在一個很短的時候，孤獨地代表了人類，或者至少他外表上是代表人類，而在那一短時期內全地球的各處都對他有非常的和重要的響應聲浪。這個形勢是十分令人着急，全世界的人類都跳起來擁護和崇拜威爾遜，甚至在他說一句話和做一個姿勢時，人類也把他攫來當作和平的象徵。威爾遜在人們的眼中神化了。他不是一普通的政治家，而成了一彌賽亞（Messiah），成千成萬的人相信他是帶來了說不出的幸福的人；成千成萬的人願意為他犧牲。那一響應是二十世紀初的最有光輝的事件之一。顯然「世界國家」的觀念那時已形成，牠已經在母親的子宮中震動，牠是活着的。

以後有焦急的幾十年，牠又停止了跳動。

威爾遜的故事，是在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衣裳中，重複福特的故事，他們都是被太偉大而爲他們不能實行的理想所舉起，在短時間內大出風頭。以後就降落下來，正如一片敗葉被一陣狂風所吹起，以後又落下來一樣。世界上不久就知道了，實質上的威爾遜，是愛好虛榮和喜歡排場，沒有深刻的思想和廣闊的慷慨。他完全不是站在代表人類的立場上，而是代表美國的民主黨和他自己。他爲了黨的考慮，犧牲了美國人民的一般的擁護；他爲了求得社會的鼓掌，犧牲了他在歐洲的聲望。有一個短短的季節他是活着的最偉大的一人。以後還有一短短的時候，他仍是最出色的。他去拜會過歐洲一切殘餘的朝廷，在每一個歐洲的首都，受着歡宴並且犧牲主張。他這種帶着無結果的得意的游行，我們在此用不着多研究了。我們所關心的是他的思想。

他顯然要求某種的世界和平。但他是否有時候能夠理解世界和平就是世界監督人類一切重要共同利益的意義，這是很可懷疑的。他似乎對於很有把握去做的事情，沒有澈底去想一下子。他並不想，或者假使他想時，他也不敢要求，如在我們今日存在的集中的世界的統制。這樣的世界統制或者是出乎他讀的書和他的理解之外的。他的計畫從頭到尾純是一個政客的計

畫。

他的理想的型式，是想將歐洲和美國的議會政府簡單改變一下，適用於更廣大的聯合。他的國際聯盟如在凡爾賽和議中出現的，是一個標本的十九世紀的政府，擴大到地球的範圍，在過程中就萎謝了。這聯盟有一個上議院，即理事會，和一下議院，即國聯大會，但爲了免得各主權國家的疑心起見，牠沒有執行權，沒有確定的收入，沒有軍隊警察，沒有實際權力做任何事情。就政治機關說，牠是廣闊而且無效能的。牠完全不是世界上各國人民的代表，只是各國政府的代表。實際上沒有做一點事情使世界上的普通人民感覺國際聯盟是他們的國際聯盟。國際聯盟的代表是各國政府的外交部所派遣的，而國際聯盟的作用，使一般人的想像，就在代替各國政府。他們是國家主義的政客，他們却被派到日內瓦去消滅國家主義的政策。國際聯盟終於成爲一個被人嘲笑的機關，是爲敵視人類最初表露過的統一要求，使他們慢慢忘記這種要求的。

可是那時候能做什麼旁的事情呢？假使威爾遜是代表人類不成形的願望，他在他所接近的和應付的政客中所引起的印象，是把他看成一個不誠實的夢想家。他們是把他當成那樣的

夢想家來應付他和攻擊他。如果我們要得到比這無用的聯盟更實際些的東西，唯一的道路，就是作一篇革命的檄文，告訴世界上厭戰的人民，起來反對他們的政府；對全世界說，如在一九一八年所能說的「世界國家」的日子的到來。這一定會喚起地球上遠近各地的同聲。

威爾遜是不能這樣做的人。他沒有想像能力，他沒有對待政府那樣的勇氣。他和普通政客一樣，以很大的主張爲達到小目的的手段。假使他能夠勇敢些和偉大些，他也許會失敗的，他也許會完結的，在這樣的世界情狀下，他總是要失敗和完結的呀；而那一種勇敢的號召世界統一，或在人類之前永久提出了眞問題，也許可以縮短世界的失敗時代好幾十年。

他所做的事，爲了獲得人民的歡呼的眼前虛榮，對於人類的希望擺出一副嚴肅的自許的面孔，從游行的馬車中和裝飾的洋台上對於羣衆鞠躬，莊嚴地退到同舊時代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舉行的秘密會議中。這樣最後出現了國際聯盟，牠既未創造什麼，也未解決什麼，過了一二十年，就在歷史上消滅了。

這個聯盟不是消滅各主權國，而是保全各國的主權。聯盟的約章既爲和約之一部份，將和

約劃分得異常之壞的疆界，聯盟的作用竟在保障牠得更長久。在許多其他的規定中，也包含有懲罰德國及德國的同盟者的條文，正如迦太基（Carthage）在查米亞（Zama）的大敗以後被羅馬懲罰一樣，而且懲罰得如此嚴厲，於是條約義務之不能履行是必然的，但這又是一個永久的藉口，以便繼續使德國屈辱。這不是一個解決的方法，而是一種永久的懲罰。德國人變成了勝利者的奴隸，一代的人，幾代的人都是在債務中過活，由初生以至老死。爲了保障這種辦法的安全，德國被解除了武裝，而且不能再繼續武裝的了。

「德國必須毀滅」（Delenda est Germania）是法國人的唯一思想（見莫理斯・亨貝恩著"Study of Pertinax"，1939），協約國的其他代表集合在巴黎的周圍，在凡爾賽的復仇的記憶中辦公。他們是十分樂意把他們的任務了解爲懲罰的意思的，使大家都了解懲罰德國是重要的事，反而將一百個困難的問題放在次要的地位。對於那些沒有高尙的想像的人，把事情弄得開倒車，比起把事情弄得前進，總是要容易些。假使法國人害怕德國軍隊的復活，英國人則害怕德國的海軍和工業競爭的復活，日本和意大利，在別處爲他們自己的損失找補償，看見

構成大陸脊梁的德語民族分裂和降落到奴隸地位，他們也是很滿意的。

威爾遜的觀念之陳舊的形式，在那已患壅塞的歐洲地面上，生產了更惡作劇的後果，就是增加了一些新國家。威爾遜以為國聯即是代表統一，他被這種模糊的認識所欺；很現成地贊助歐洲地圖在嚴格的民族的單位上重造。波蘭這個國家是恢復了。我們的歷史已研究過這個國家在十八世紀被瓜分幾次，牠是中央平原的一個廣大地域，當歐洲的商業發達起來時，牠的獨立的存在是日益不方便的。地理即反對這樣的存在。牠過去是個人主義的騎士貴族統治農民的鬆懈的聯合，但俄國，普魯士和奧國的瓜分牠是用最高度的野蠻來達到目的的。在拿破崙戰爭以後，關於這個已經喪失的波蘭王國有一種浪漫的神話，打動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感情。為鄰邦野蠻吞滅了的粗野的貴族與他們的農奴被理想化為文雅的，勇敢的，和完全奇異的民族，却在異族的壓迫和踐踏之下，恢復波蘭，——過分地恢復波蘭，是威爾遜總統的最光明的野心之一。

波蘭恢復了。但這個從一百二十年的奴役中脫離出來的波蘭並不是有高貴精神和大度

的人民，是剛全世界自由主義者的同情和希望。恰恰與之相反，一個狹隘的愛國政府出現了立即發展成爲一使聯的復仇的和無情的獨裁，立即開始熱烈迫害牠的太廣闊的國境內的落在牠的網內的弱小民族（約占全人口的三分之一）。過去的眞實的波蘭是掠奪和侵略的國家，牠的鐵騎踐踏和搶刼一直到過莫斯科的城下。牠沒有改變牠的本性。立陶宛（Lithuania）的一城市維爾納（Vilna）現在被牠突然進攻强佔了，牠東面的疆界一直伸張到加里西亞（Galicia）。波蘭在對付被壓迫的烏克蘭（Ukrainia）和路登尼（Ruthenia）人時，牠的殘暴不亞於其從前所身受而爲牠的歌曲所詠嘆的。一九三二年，這一個雄糾糾的新國的預算，有三分之一是做軍火的用途。

不僅波蘭是這樣放回在地圖上了，由於對歷史的感情傳統，方言和地理感覺之周到的研究的結果，一整簇的新主權國：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南斯拉夫（Jugoslavia）芬蘭（Finland）愛沙尼亞，（Ethonia）拉脫維亞，（Latvia）立陶宛，衰弱的匈牙利，擴大的羅馬尼亞，都被喚出來以牠們的主權國的自由野心，敵視，聯盟，誤解，暗公開的和祕密的條約，稅則，貿

易戰爭和其他，把人類的事情弄得越發糾紛和糊塗。俄國被排斥於第一次嘗試的世界的議會之外，因爲牠否認了牠的鉅額戰債，這是西方的債權人所嚴重關心的。更奇怪的是以國際的仲裁者和國家的恢復者自居的美國，也立在國際聯盟之外，因爲威爾遜總統的偏强的決心，想自己和他的民主黨獨占那拯救世界的不朽的光榮，所以他失去他的多數參議員的同情。

參議院在做了一些妥協的企圖以後，完全否決了聯盟的約章，洗手不問世界事情。威爾遜總統不能再做永久的和平之王了，並且這奇怪的時代，很快地使他退回到凡人的本色。他死的時候是十分傷心和失望。美國同福特一樣，同到經常的做生意和造損益決算書的舊旋渦中，而歐洲人則將威爾遜的名字寫在他們的城市上，街上，馬路上，草場上，火車站上，公園空地上，盡力在他們的事情中利用他所遺下的這一個去了勢的國際聯盟。

假使俄國和德國是因爲他們是壞民族而被排斥，不能參加國聯，這些遼遠的人民如中國人和日本人却被容納在國際內，認爲是一件自然的事情，縱然是因爲牠們是世界都成爲「威斯特發里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型式」的趨向的「好朋友」，歐洲的人實際一點

也不知道那些遼遠而古代的社會的心理，在這些集合的政治家當中，似乎誰也不會想到政治的行程完全以心理的事實爲基礎。國聯在很多的困難之後在延緩了幾年以後，雖然成立過一種智識合作委員會，但就我們現在能踪跡的他的活動來說，這只是關於非實用的知識，沒有事情指出這個委員會對於聯盟之爲一理想有什麼興趣。

我們如果參證了後來的事件來說，國際聯盟如果直接在美國參議院否決參加之後，實行切腹自殺，豈不很好。那時歐洲列强理解牠們馬上安定全球的失敗，或將立即着手組織歐洲範圍的調解和合作聯盟。國聯之完全不能監督甚至改變日本的外交政策，（這是依十九世紀的歐洲型式所鑄成的）是使牠墮落成爲評論時事的機關的決定因素。

牠的權威減少了，牠的報告的勇氣和辛辣氣味則增加了。後來的幾個報告書是十分有意思的歷史文件。國聯的會員國逐漸停止了津貼，書記處也墮落得同沒有一樣。國聯像海牙法庭一般，在飢餓的三十年代中間，或在以前的時候就漸漸不存在了。牠在第一次波蘭戰爭以後已在歷史中沒有地位，但牠的辦公室的大廈在一九六五年仍然不動。在一九六八年，和以後幾年，

爲全世界運輸聯合會的西方分部用爲附屬的辦公處。

對德國課以鉅額的金錢賠償是凡爾賽條約中唯一研究我們人類的財政和經濟生活的部分。這在我們今日看來，似乎很奇怪，對於凡爾賽的政客們却是最自然的事情政治生活仍是深植在舊日純粹戰爭的傳統中，仍集中在疆界和軍事的利益上；牠是異常的不理解經濟的現實的。我們已指出過，鉅大的勢力要求經濟的統一，是大戰的眞實原因，然凡爾賽是完全忽視這點的，好像這些原因都是不成立的一樣。

那時聽得見的，只有一個特出的聲音，即是英國經濟學家坎斯（J. M. Keynes）的大著歐洲戰爭之經濟（一九一九年）他抗議和警告賠償支付將使信用和貿易解體。協約國們相互間（！）欠了一大堆債務，一點沒有取消這些債務的辦法，而且在政治的國際聯盟之旁，沒有經濟的國際聯盟。沒有人提出過經濟戰的節制來。美國人，迪威斯也在內，還是在財政的個人主義的階段；他們以爲賺錢是個人在法律範圍內聰明不聰明的事情，而美國人所理解的法律，對於開明的自私自利，只是些有趣的障礙，而並非有効的牆壁。當時美國娛樂的方式是撲克

牌戲，所以那一個偉大的民族在大戰後坐下來玩撲克牌，以法國和英國爲其主要的對手，互相欺騙，看誰贏的世界的信用與黃金最多。

只是在大戰以後十年內人類的智慧才慢慢覺到凡爾賽和約完全沒有結束戰爭。牠只是流血的暫時休息，牠所以這樣做只是爲了在各主權國間保持紛爭，中間一個更巧妙的而且終於是更破壞的階段。諸獨立主權國之存在無論其爲紅色或白色，都是戰爭，只是一種縝密的錯誤教育使世界上的人對於這種淺顯的事實看不見。戰敗諸國的民族覺得這個條約是太不公道，雖然確定指出那幾部分來不大容易。他們覺得這一種條約只是向他們提出，叫他們簽字在上面的，把他們的簽字看成犯人之帶來受處罰一樣。他們自然決心要盡可能地修改這條約，或者暗中違犯，或不顧牠的條文。另一方面，勝利的列強也覺得他們不僅侮辱了他們的被擊敗了的敵人，並且使他們處於最不利的地位。所以勝利者時刻防備報仇，於是他們不解除武裝，如德國人被迫而做的一樣，他們破壞凡爾賽條約的約束，保存和增加他們的軍隊。

軍火公司和他們的報紙，自然盡力使武裝的「安全」的堅持更爲強化。比如法國公衆如

果想將武器投在一傍時，就立刻有了關於德國有祕密的兵工廠和偷着操練的故事宣布出來阻止。而支配法國的那些狹義的愛國勢力不憚使自己過火的武裝反對牠的已傾覆了的敵人，而且進行一種暗中的和無情的金融戰爭，和美國的把戲玩在一起，使德國經濟上和社會上企圖恢復的每一努力都歸於失敗。

而且，勝利的列强，一等到他們看見他們過去的敵人被打得不能再起以後，在分贓時很坦白地就想互相佔便宜了。這是與主權國的傳統完全相合的。他們的「聯盟」沒有產生共同的感情。在凡爾賽和約簽字以後一年，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已在小亞西亞大打起來。希臘人得到英國的鼓勵，土耳其人接受法國人和意大利人的幫助。這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工具間的戰爭。這次戰爭的結果是希臘大敗，斯麥那（Smyrna）城市被焚燒，在這城市中我們看見了一次可怕的屠殺；無數的婦女兒童受了暴行，男子及青年的眼睛被挖，有的去勢，有的虐殺；除土耳其區外，一切地方都受劫掠和焚燒。在起火的城市前面的碼頭上，恐怖的人羣密集着，無希望地在盼望，盼望他們能從被搶劫，被屠殺，或被投入水中以前，能夠找着船隻走掉。

在以前不久，土耳其人已經從古時的西里西亞行省將法國人逐出，已經將那一古代的人民，希太人（Hittites）或阿門尼亞人（Armenians）完全殲滅。在阿門尼亞人看來，戰時和戰後是一樣的，因為刀火仍在追逐他們。死的人在兩百萬以上，而且多半是暴死的。

在偉大的和平以後，在俄國的北部和南部，在東西伯利亞，戰爭仍繼續；中國也成為強盜的軍隊的犧牲品。波蘭奪取了維爾納，侵入了東加里西亞，與俄國人在烏克蘭戰爭，一隊愛國的意大利人侵入了阜姆（Fiume），將一個協約國的混合衛隊驅逐。

在俄國的東南部，馬上發生了可怕的災荒，無論美國或歐洲，都無法援助。在大戰以前，世界任何處的災荒都在盎格魯薩克遜人的社會中激起了慈善份子的活動。但慈善事業已失去了心肝。在美國，舊習慣還有一點微弱的雖然無力的顫動，但在英國連這樣的顫動都沒有。

這就是凡爾賽會議所完成了的世界的和平與聯合的結果。

於是他們須做一些不滿意的附加和補綴，以糾正和約中的最明顯的缺點和省略。君士坦丁從前是從土耳其人那里取去為協約國的混合軍隊所防守的，在斯麥那的屠殺以後，和在他

們與英國人之間某種戰爭的姿勢以後當一九二三年又交還他們了。

在歐洲的殘破局面中，新的和重造的國家的疆界之劃分是很不顧及經濟的常識。農民們由於需要多年才發展出來的城市市場，或是冬季夏季的牧場，現在都將牠們切斷了。大的冶鐵爐和化學及五金工廠都從牠們所依賴的鐵砂和礦源分離。維也納從前是中歐與南部的金融和商業中心，只成了一個光頭，沒有了身子。然而凡爾賽的一切愚蠢中最荒謬的和後來證明是貽害無窮的，是但澤（Danzig）自由市及所謂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之創造。

我們且略說上述的最後糾紛，以表明和會在最壞時所具的心理。一種簡單的浪漫的觀念，彷彿說德國人是壞的，凡反對德國人的，無論誰都是好的。這種心理支配着一切形勢，在波蘭走廊問題上比在任何別的地方爲尤甚。波蘭人是好的，他們是協約國之驕子，是從美國來的感情的歷史家的寵兒。他來是爲人將從強者的位置踢翻，並且扶植弱小和柔順的人的。對於飢餓和有欲求的人，他準備裝滿了好東西給他們；而那些有錢的，從前有錢的人，是要打發得空手走出。德國，像地獄中的魔鬼一樣，抬起[illegible]望的眼，看見波蘭像天神一樣在威爾遜的懷抱中。好的波蘭

人不僅是許可統治路脊居人，烏克蘭人，猶太人（是他們特別討厭的人）立陶宛人，白俄羅斯人和德國人而且他們也得到經濟上極關重要的東西——「出入海口」。

威爾遜總統在這點上極其堅持。瑞士在大戰前的歐洲沒有「出入海口」也過得很好，但這是另一回事。困難就在於在種族的有色地圖上，找不出一塊地方能指出波蘭界海，在維斯吐拉（Vistula）河口的兩岸有地帶為坡馬蘭里亞人（Pomeranian）和德國人所居，如果波蘭需要出海的貿易路時，（其實波蘭的貿易大部份是和牠的鄰居進行的）唯一的合理的可能，就在經過與那一地帶的人民成立諒解。這是易於成功的，在維斯吐拉河口，有完全德國的城市但澤。牠主要是依賴做波蘭貿易的出路而生，牠是沒有別的法子能夠繁榮的，我們沒有理由相信牠會對於波蘭的進出口安置任何困難。牠是一古代的，誠實的，乾淨的，和繁華的德國城市。牠的居民之百分之九十六是德國人。

凡爾賽和會在那一誘人的術語「出入海口」的靈感下，注意到這問題時，以上所述卽是當時的形勢。縱然征服者深信沒有一個德國人不是壞人，也不能作為他們將但澤交給波蘭統

治的理由。但他們將牠從德國分離開，將牠變成一個自由市，在牠的西邊，他們連波馬爾里亞的寬帶形的領土劃給了波蘭，如了威爾遜的「出入海口」的心願。（這是爭論中的眞實的「走廊」）走廊以內沒有可比得上但澤的商埠，但波蘭人自己開始在格丁尼亞（Gdynia）創造了一對抗的城市，應當純是波蘭的，牠的目的就在使但澤的做生意的德國人挨餓。

和平條約的訂立者，為使維斯吐拉河對於波蘭盡量的清潔而甜蜜計，有將波蘭與東普魯士的疆界不同尋常一樣，定在沿河流的中間而是定在朝東普魯士一面的地方。（Jacques Kayser, La Faix en P[illegible] 歷史文件 711711）所以東德的人民如農夫，從前的漁人，帶着羊羣欲飲水的牧者，都是在從看見河流的地方就被一條邊界線和波蘭衛兵的槍阻止住不能前進。而且東向的鄉村是平坦而低窪，從前是被一道長堤所保護，以免水災和免陷於沼澤的。國界將該堤切了五段，因為波蘭人一點也不注意這些堤防，不久堤防多失修了。甚至茄細國（Garnsee）國界線將皮俎夫司惠特（B[illegible]ofswerder）大城市從他們的火車站切開了。

但我們不願將這一個使人憤激的解決說得太長。最使人生氣的事，就是那走廊本身交通

線自來就是東西向了，鐵路是朝這方向建設的；南北向的交通之到但澤，是沿着大河。現在波蘭人開始去破壞這兩個路向的交通，將一切交通沿南北向的盤查線去以避免但澤。每個往東去或往西去的德國人要受多次的邊境盤查，繳納關稅，相當的耽擱要受那些小而可紀念的麻煩，如特別快車經過走廊時，窗戶都要關閉，眞是麻煩極了。而但澤城自與德國貿易切斷後，他們的波蘭的生意，逐漸地爲格丁尼亞所奪了。法國的資本傾入了格丁尼亞，傾入於其南向的新鐵路中，由此，法國金融業馬上捲入了旋渦中。

但澤的受辱與危險，在德國人的想像中，燃燒了起來。那一走廊激怒了他們，和平條約中任何別的東西，都沒有激怒他們那樣利害的，牠成了一重要的政治爭論。在上西利西亞也有一與此相同的困難問題。在薩爾（Saar）流域有一傷痕，被迫從與國分開的地方也有一受傷的痕迹。其牠還有許多痛苦的回憶與委屈這些地方對於柏林十分親近牠使德國一切生活都煩慮不安。

在凡爾賽和約簽字後十二年內，波蘭走廊明白地是歐洲形勢中之最危險的因素。牠破壞

每一次軍縮計劃牠指着歐洲的被催眠的和無力的治國方法直接再走向戰爭的道路。對於戰爭抱一種宿命論的態度，視牠爲實在可怕的一件事，而又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在一九一四年之前，歐洲的政治家中已變得明顯的，重新出現而且擴大了。

歷史真有重複自己的神氣關於這些公開的創作，沒有一個能提出何種確定的辦法但這時期幾乎沒有一個政治家不在有機會的時候，大彈其反對戰爭的高調；自然是巧妙地避說那種具體的，可引起爭論的，不愛國的，或易於傷那些有關的列強的感情的話。

二 國際聯盟之不能實現世界和平

在我們完全忘掉那個淒寂的和徒勞的理想主義者威爾遜之前，我們應該喚起讀者對於他失敗的許多主要原因的注意。我們不要因爲他的個人的缺點，遂斷定他的理想的野心也同樣不可能。他的狹隘的自大，對於由歐諸國之懲罰及許多旁的事情，只是說明當時組織國際聯盟的不利，後來變成牠的致命打擊在那時要實行一個世界制度，心理方面的準備還不很充足。

沒有一種思想體系能夠出來維持牠。「世界國家，」「現代國家」一種種觀念，人們對牠認識還很模糊，沒有將牠加以充分的發揮，而國際聯盟是最倉促成功的急就章。

這需要德・文特（D. Win t）及他的同志的終身擘畫，我們很快就談到了。這需要社會心理學科學之很大的發展和應用，於是主權國家和混亂狀態之為中央的統制所代替；才有遙遠的成功的可能。威爾遜以為他能集合幾個同情的份子，為人類的統一寫下一個藥方。他一點也沒有想到在他前面的任務的偉大，複雜，親切和深奧。他企圖將那時代的破舊系統加以補綴，就將牠充做新的。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貨幣的改造，全世界實行純社會主義之需要，和教育的完全革命；這樣人類的和平與安全才能建立。然而他雖是狹隘與盲目，他好像總是站在他的時代的思想的前面。

這個早熟的和無效的聯盟，對於世界和平之實現，實在是一種阻礙而並非幫助。牠阻止了人們自由思想關於這個問題的主要點。有些有好心思的人們曾組織過（比如在英國 國際聯盟協會，表面看來好像是贊助牠，其實也是反抗而並非幫助，對於牠的會章與工作，做有效的批

評。他們會說，有牠總比沒有牠好些，實則這樣組織開始就錯誤，比沒有還壞。在戰後的十年，一般人心中，關於世界政治的活潑和建設之思想的分量是異常的小。只是國聯的無能已無可爭辯了。人們不得不重新開始那已經放棄的對於世界統一的研究。

十二年以後，「現代國家」運動，還只是在找一些概括的公式，爲自由與進步的努力之用。和平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以及部份地而且混亂地表示出不滿的各種主義者，還得拉攏來諒解和合作。他們的精力，大部分已消耗在暗中的爭論，相互的懷疑，和小而局部的嘗試中。二十世紀的中葉已過完了，世界上關於「現代國家」的宣傳和教育，還沒有很多的人擔任起來呢。

一二　凡爾賽以後的金融和社會紀律之崩壞

我們已經指出，世界戰爭之空前的範圍和破壞，多由於世界鋼鐵工業的發展，與人類的政治和社會的概念相比較，是一種膨脹的狀態。但在戰後的最初十年，在團結很鬆的人類社會中，

有旁的不相稱的發展，在許多其他的弱點中開始表演出來。從經濟的觀點看來，戰爭這一事，是人類沒有其他方法來分配和消費那些過剩生產的消費方法。但戰爭的必然結果，尤其是牠對於國際貿易的干涉，使牠在從前許多只產原料的未開發區域，也成立了工廠，出產製造品，在全世界增加了生產的工廠的總量。等到公開的戰爭停止了，剩餘生產品的消費，或停止維持那數百萬數千萬脫離勞動工場的工人時這個事實變得日漸迫切的明顯。在戰爭以後，不管關於軍縮有無數次的會議，而戰爭準備仍舊繼續增加，但牠所毀滅的人和破壞的物質都不十分多，所以不能解除困難的形勢。

再者，生產能力擴張的時候，我們看見消費能力正在積極地縮減。出產的效率愈增進，工銀勞動者愈減少。貨物愈多，消費者愈少。消費者愈少，商業利潤愈小，股東和個人企業家的總消費力也減少了。所以購買的行程的兩端都減少，普通的投資者和工銀收入者的境遇更困難了。這是「生產過剩的難題，」很可以使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的作家與新聞記者們焦急的。

今日的青年學生也許要問：「為什麼他們不整頓呢？」問是容易的、可是試問叫誰來整頓。

我們應用經濟學之現代的上層結構，例如大衞・盧賓（David Lubin）局和經理總部，及牠的廣大的統計組織，數十萬的分站和觀察者之指揮，整理和分配。這些組織在那時還不存在，只有盲目的估計得不好的力量在那里調整。人類的普通利益在於繁榮，但沒有專門的人使繁榮繼續維持下去。顯然地，將企業的自由加以很大的修正是必要的，但那些管理政治的人們，就是最不情願担任這種修正的人。

自生產活動膨脹以後，銀行與金融組織也都膨脹了。這是一種畸形的膨脹，可以說是物質生產已擴張的結果，並不是相互補償和有統制的發展。

我們現在看得很明瞭，世界物產的分配於企業或消費方面，是屬於社會正義與社會政策一部份的工作，應該在公共批評之下進行，考慮各種要求與需要的理由，所以我們很難了解二十世紀的人對這些事情的態度。我們不會夢想將這些事情交給營利的私人去作有效的管理，等於我們不會將我們的法庭和我們的學校，出盤給任何私人一樣。但在一九三五年時，人們還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還待學習這個教訓呢！

二十世紀初年、銀行和貨幣的故事，有許多好像是不可信的，於是變成最吸引歷史心理學研究者，和研究容易得着結果的領域。銀行和貨幣的體系是由實用的複雜錯綜中生長的，牠是演化出來的，而並非有計劃的組成。從來沒有人，想衡量任何實行之是否合乎正義及後來的結果，大家都以為只要牠當時還行得通就罷了。人們將這樣試試，又將那樣試試，將這樣做做，又將那樣做做將他們對於做的結果的意見都隱藏起來。隱藏在這個系統中是主要的，關係於大衆利益的事應當公開發表，可是這個需要不為人所了解，於是影響普通人的購買力和工業企業的信用之根本決定都是在祕密中做的，對於貿易和工作之限制與刺激，是在最深的幽暗中進行。無論在學校或大學的普通教程中，對於這些主要的事實都沒有任何的教育。私人企業的祕密權利，為教會，法庭和習俗所尊重。人們找到工作或失業，他們的貯蓄受了人的騙，或景況好起來，他們自己莫明其妙。他們既沒有如我們今日所有的關於經濟壓力和運動的明瞭知識，他們只看見一些令人生氣的規避之詞，或許多錯誤的聲明，以及人為的價格及難免的變遷等事。這些事構成一種朦朧的霧，這霧的裏面可以隱約看見好多神祕的人物。

任這些神祕人物中間，有一個很有名的人，叫做諾爾曼(Montaga Norman)，他是英國銀行的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五年的行長。他是全部歷史的最不可相信的人物之一，在他的週圍，積起了一大堆的神話。他是很神祕的，因爲他根本是一個神祕的人。他的照像是一個瘦削和有鬍鬚的人，穿得活像一個藝術家或音樂家，並不像當時的銀行家。他的羞怯很出名，也許因爲這個緣故，大家都說他是「漂亮」。他常化名遊歷，和突然出現於沒有人料到的地方的習慣而刺激人民的想像。他爲什麽要這樣做呢？現在誰也不知道，也許他是爲着好玩而這樣做。他對於一九三〇年的調查金融的麥美倫委員會(Macmillan Committee)供給好些證據，由那次的證據和出於保存着的他的一二次公開演說，使我們明白他所從事的暗中活動的教育，照我們現在看來是很不完全。他對於人的生活習慣和對於環境關係的學問，沒有一點常識，關於他的社會和經濟兩方面的思想，也不是我們今日認爲一個普通公民所必備的普通思想。他之所以適合這個黑暗的負責職守的主要資格，是由於他在爲英國銀行服務以前，他同一些私人的銀行往來，得着許多實際的經驗。這種經驗之積得，是屬於我們今日所知道的人類財富的偶然和

短時擴張的時期。明白些說，他對於他的職守並不虛心，因為非常態狀況下的銀行活動也能獲利，他的心中卽有了許多成見然而在那個時期，他被認為是有魔術的能力的「專家」，在戰後時期的困難中，他竟有偌大力量，能破壞或促成那些使歐洲每一國幾百萬人貧窮或致富的安排。

在戰爭和戰後時期中，另外的暗中活動的大金融勢力，是一大羣的私人銀行。摩根銀行可算中心，為最典型的一個銀行。這個銀行所進行的業務之規模，完全大於許多小國政府。他對某國簽訂或是拒絕某一種借款，就有維持或推翻該國政府的力量。該銀行的創辦人摩根（J. P. Morgan）是美國「紳士」和德國貴族的奇異綜合，他的內在的貪慾也流露在搜集名畫和一般的「美術」品上面。他在大戰爆發前就死去了，但是他在與第一個羅斯福總統爭論中所用的一句話，以後被大家用做反對全部私人銀行的非常厲害的批評武器。羅斯福，他抗議說，「要我們大家都有玻璃的荷包」。

第二個羅斯福總統立刻復活了那一種要求。

沒有一句話，能比這句透露着貪得的弄權詐的習慣的話更明白的。摩根並不是不誠實，只是常常奸詐，這是他的生意上的規矩。他堅持不公開的荷包，隱藏的動機，而且一件生意應該準時完成。他的傳統，在他死了以後還活着，他的銀行變成信用的堡壘。他所做的錯綜的交易，在歐洲生活的周圍，懸掛着像暗的蛛絲網一般。這個事業自然地做了許多害人的工作，正像蜘蛛的織網一樣，是殺人而不見血的。當時的人沒有能懂得牠的任何特殊事件的特殊情形，只能在有條理的研究者，在很多月的研究以後，才模糊的弄得清頭緒。

這些神祕的銀行世界的系統，又和那些統制着廣大的工業活動的黑暗人物和集團，結合起來，使消費力陷於困頓和不規則。比如有一個神祕人們中的神祕人查哈洛夫 (Sir Basil Zaharoff)軍火經紀人，仍舊是我們學校兒童喜歡的人物；還有克魯格 (Ivar Kreuger)，獨佔着世界的安全火柴市場，借了許多款給各國政府，最後爲人們發覺僞造大宗證劵，他爲了逃避詐欺罪的懲罰而自殺於巴黎，（我們須記得今日我們在博物院中所看見的安全火柴，那些日子消費以十萬萬計。那時沒有別的便利的火源，牠們的製造和分配是一大工業的規模）。克魯

格不像摩根，不是貪婪一類的人，他既不窖藏也不搜集。他不顧惜甚麼甚至也不管法律；但他建築了許多豪華的房屋，捐錢去做科學的研究。（比如北京人之發現，在考古學上是一可紀念的事件，是由於他的捐款而辦到的。）摩根是居奇和集聚，克魯格是掠奪而且賭博。摩根花費他的錢，收買名畫的眞蹟，原稿，和同樣純正而有價值的舊貨。當克魯格用他所保管的金錢時，他在裝飾的藝術中，在電氣事業中，和在離奇的建築中，做了許多非常的試驗。但兩人的行動都是不受干涉的。那時的金融機構是這樣黑暗，於是克魯格能在幾個月內將一捲的僞造的約値五十萬金圓的意大利證劵在市上銷售得如同眞的一般從有名的放款人那里以牠們爲抵押而得到借款。在今日，這類的把戲，如果是可能的話，只要一天就可在交易所中查出來了；可是如今也沒有人企圖做這類的事情。這些神祕人和各種操縱或顛覆各國貨幣的投機的集團，以及很多他種營利的集團和個人的生活，都可以從傳記字典（Dictionary of Biography）的惡作劇人的生活（Lives of Mischief）（金融諸卷）中查得淸楚。他們中間最好的也是幹些搶劫或雲霧中冒險的勾當。他們的大多數同鑽堤的鼴鼠一樣的活動，不管後來的結果。

在這個時期的金融文件的皮鏡中，當黃金的運動對於商品的價格和對於世界上每人的信用有極重要關係的時候，我們看見新聞紙上有這樣的題目：「無名的購買者取去現金兩百萬」，或說得不大精確些，「黃金爲無名的購買者所買」——以後一切小的貨幣投機者就要開始去窺測，偵探，猜度，而且人工地升漲他們的生意，以便遷就這個暗中所暗示的平衡的金融的移動。

其他神祕的人，還有各國的財政總長，其中英國的財政大臣或者是一個很好的典型。每年關於另一年的國家的預算和稅收之整理，總有多量的耳語，暗示，窺測，計算和預測的發表。他們須要做一種稱爲「平衡預算」的算術的神祕。當預算快宣佈時，生意好像停止了投機的行動，保險的行動，統統活動起來。要人的妻，家庭，親友和祕書在世界上走動時都成爲人們猜謎的中心，被人看得好像有魔法一樣，而且自己也以爲重要得了不得。最後偉大的日子到了，立法機關集會時人數非常的多，也着急，也好奇。魔法的醫生帶着他的魔法的皮包，在下議院中佔據他的席次，有威儀地站起來，開始「預算的演說」。

關於預算的演說沒有不引起人的—驚奇—的，有什麼東西對於二十世紀的混亂的不測，能比牠作更生動的見證呢？任何東西都有被摧毀的可能；任何東西都可能破碎；任何人都可以墜閃在那時的經濟的黑暗中。這似乎並不要緊，可驚奇的就是這個系統在世界上，雖然搖搖欲墜，竟能支持得這麼長久。

這種種狀況，是何等可驚，何等離奇，這好像是一隻橫斷大西洋的大郵船在洋面航行；官艙，和房艙中燈光輝耀，客廳與餐室都在熱鬧中，而船的下層，主要的機器，顯然是有些毛病，沒有一點關於發光的配置。那些照護的人（有些戴着假面具）工作時沒有工頭，沒有指導，靠一根偶然的洋火的光亮，或者寶貴的，可是很破舊的電燈光，也許完全是在黑暗中來轉動他們周圍的機器。

從一九一八年停戰時起，以及後來若干年，很明顯的，這一個機器已經嚴重的損壞了。這時候的經濟史，是很可驚的震顫和動搖的歷史，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悲慘更令人沮喪。在大戰之前的十年，雖然各種通貨的眞實價值有些變動，可是都在極微的限度內變動，上升或下降，也經

過較長的時間以內進行，但在戰爭以後，在匯兌和價格中開始了一串的運動，是在整個的繁榮時期中所沒有的。通貨上升和下降，像大西洋的浪一般地不安定。人們覺得他們銀行中的金錢，在幾個月內，可變成無用的廢紙，因爲支付的時日漸不可靠。內外貿易的進行也日漸困難，因爲製造工業很多是從國外獲得原料的，國外貿易的糾紛，常使國內的生產停頓。貿易和工業在這樣可悲的不確定的局勢中，一天一天的得病和傷心，牠好像是在地震的狀態中一樣，人們無論站住或跑開都是同樣的不安全；而失業的人羣繼續的增加了。經濟上佔上風的國家，在關稅之後防築起壁壘，互相用債務，否認債務，突然的膨脹和減縮等把戲來鈎心鬪角。世界上似乎沒有力量能使他們聯合行動起來，以阻止和挽救他們的共同的毀滅。

二十世紀的第二個三分之一的年代，人類是在最奇怪的悲慘狀況中。地球上的人類，能從前是要健康些和富足些，在既有的資源中，供給全人口以完全和娛樂的生活，是什麼也不感缺乏。那是物質的實際狀況。但世界上沒有其他原因，只是由於各種昏頭昏腦，我們人類似乎不能伸出他的手，取得在伸手所及的範圍內的豐足的東西。當我們翻開那時的期刊和書籍時，我們

看見驚恐與困惑還在增加和深刻化。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大戰爭的時期充滿了受苦，但也充滿了興奮；經過恐怖戰場上的人也相信一個補救的和平和快樂是距離不遠了。從死中逃生的人也有人答應給他們以一適合於英雄住的家庭。但是一九三〇年以後的危機的特色，是缺乏彈性的；牠是無條件的失望時期；任何抗議都無效果。一個同時代的作家曾說過：一個人是在一個「迷惑的世界」上生存。

這一個貨幣的紊亂之經濟的後果，立刻跟隨而來，但較深刻的社會道德的破壞，及其影響，不是立刻就顯著的。全世界的制度一直是為普通人的一般的好行為所維持，如書記，各種的工人，商人，自由職業者，誠實而且守時刻。一般的安全都依賴在街上和在鄉村的成了習慣的有禮貌的行為。但普通人的行為良好，是因為他信仰他的收入是安全的，雖然有時感覺缺乏；大體從保障他生活中某種的舒服和尊嚴，他想像這是他自己與社會之間的不成文的條約，即是他應該有工做，應該安全，以換得他的服從法律，而且社會對於他的貯蓄也應當守信用。他相信政府是會維持他們所發行的貨幣的，而且會顧及貨幣給他應得的那些滿足。他不是白做好孩子的。

但現在全世界幾百萬幾千萬的男男女女，都用各種各樣的話問自己：勤奮，有技能，和服從法律是否「值得」。自一九一八年以來在社會纖維中的黏性物，逐漸地，明白地衰落而變成了塵埃。在整個的繁榮的時期內，下降的犯罪的百分數，又上升起來了。

一三 一九三三年的大停頓

我們將人類的歷史敍述直到社會擴張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個三分之一完結時，即大停頓的時候。一九三三年完結時，是在失望的驚恐時期。牠是像一個寒冷的寂靜，無言的不安的時期，正如大颶風暴發生之前的時期一樣。經濟生活的車輪只是忍耐地和不定地在旋轉；幾百萬的失業者增加起來了，一天天地變成威脅和危險。全世界的羣衆是由困難和缺乏，墮落到真實的飢荒。他們集團地沒有做一點有効的事情，足以表示抗議或鬪爭。暴動的社會主義在每個大集團中潛藏着或者喃喃自語。但單是暴動，沒有建設的思想，是什麼也不能救濟的。但在已發現的任何的建設的觀念之後，還沒有能力和精神做後盾。單是壓制的力量無論他們對着犯罪是如何

的無效，總算完全能壓制民衆的暴動。他們能使貧窮變麻木和不起作用。

各地方的各種事情都缺少生氣。公共衛生的降低也總顯出了。對於傳染病的抵抗力減少，和嬰兒死亡率的上升，在一九三三年後的生育，死亡，婚姻統計中，已明顯地看得出來。

戰爭明顯地逼近了，在東亞和在東歐；牠徘徊，前進，停止；沒有人表現一些需要的活氣，或者表現一點能力，以阻止牠的斷續的不慌不忙的走近我們。

然而舊制度的無限惰性，使事情照舊混下去。在一個昏黑的天下面，大多數的人民，依照着舊日的習慣，進行他們的事業。不賺錢的工業，仍舊於減少職員後辦下去。到舖子來的顧客，也日漸減少了。失業的人在職業介紹所前排成長的隊伍，成了習慣；至少只有幾個人能得到職業。地產的經紀人不再收租了，只是來索還他的積欠之某一期。沒有營養或營養不足的兒童打着噴嚏，到寒冷的學校去；教書先生因爲薪水減少，也垂頭喪氣了。破產的鐵路和輪船航線開班的次數減少，但還是守着時刻。旅館的開門不是爲了賺錢而是爲了減少損失。公路交通失去了新穎和迅速，但牠還仍舊進行。街上的羣衆行動並不及以前活潑，但如果出了事情，這些懶惰的人羣

是更衆多些；警察也不及以前的銳敏和戒備森嚴然而還是維持着秩序；

在凡爾賽和約之後，有許多的雖然不充足的建築事業非常活躍；可是一九三〇年以後，造新房子的愈來愈少了；也許有某些建築者找着了工作，只是爲了必要的修理，或者房子燒了，須重新造過。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七年，世界上將有非常厲害的感冒瘟疫。統計家已觀察到抵抗力的減低，人數已退回到中世紀的狀況了。但是醫生和看護婦勇敢地盡他們的職守。那些把營業早已擴大了的藥房老板，則大賺其錢。

在這個失去活力的階級中，那些陰暗中生活的畫片，還不十分完全，牠們也傳達不出一整代的人所處的貧苦的環境，以及這一代人在這環境中由生長以至於死亡。我們看見成排的失修的房子，可憐的內部，和在周圍的穿得破爛的男女們。在這些圖畫中，他們似乎永久是站着的樣子。記人事的新聞文字，使學生們更接近現實了，然於沒有地位，沒有顏色，沒有運動，沒有希望或機會的現實。有許多人做了一些「調查」，特別是英國的，美國的和法國的報紙，他們所說的故事總是說輪子走得緩慢和快停下來了。工廠的門也關了，煙囪也沒有了煙，鐵軌也上銹了。

以下是那時代的人的一篇生動的描寫，表示在人類經驗中的一個奇異的階段幾百萬的人們是怎樣的情形。這是一個英國的最好的記事作家湯林生 (H. M. Tomlinson, 1873–1969)，所寫的。

「在上星期，我偶然來到了在卡狄夫(Cardiff)上面的一小城市。那不過是偶然的事情，我從前從不曾到過這地方。這是一個典型的谿谷，可以不管牠是什麼地名，牠也許有很多的地名。牠的人口，現在或以前不過是六千人。牠的人民從前有過苦難，不到二十年以前有三百以上的人，在一個礦山爆炸中被炸死了。我們不能說，城中的人們已忘記了那件事，因爲我同他們那些人談過話，一提起這件災難，他們心中還有餘悸。這是他們對自然戰爭的一個可怕的失敗；但是殘存的人回到戰爭中去也不再提及牠了。

「當我從遠一點的距離來看這城市時，牠周圍是荒涼的高地，我就想起那些很熟的，在法國離戰線很近的城市。正午的時候，太陽明朗地照在天空，但這個煤礦區是寂靜無聲，這樣的寂靜無聲，好像是着了魔一樣。

「事實是牠已經着了魔，就某一方面說，這小城市是死的了。但是牠的人民仍依附着這城市的空殼。他們能到什麼地方去呢？

「初次看來，這好像是不會有人住的地方。前面的建築是成了廢地了，憔悴的礦山外的機件顯然是有一代沒有轉動的樣子。馬達間的黑漆上的罅隙，指出這是蝙蝠和貓頭鷹的家。

「我達到牠的大街的盡頭，才遇見了第一個人。我看見街上的舖子不僅關閉了，而且無人看管。空屋，這人是站在邊石上面，中等年紀，靈敏，而且憔悴，他的衣服是洗刷得很破舊了。

『這個城市是怎麼一回事？』我問。

『在領救濟費。』

『你也失業了麼？』

『自然我也失業了。』

『失業多久了？』

『他不做聲，伸出五個指頭。』

『五個月？』

『五年。』

『這裏的人，大家都是一樣嗎？』

『大多數。我們是不會找 工作的。』

『他引我登上一個垃圾堆，一隻羊正在那里把紙來做食料。我們在近處看了一下子煤坑。

『這就是我們不會再下去的理由，』他說，『你怎麼能工作牠呢？』

『不知是由於什麼計劃，或是由於生了銹，一座鋼的小橋倒在到礦坑去的鐵路的軌上。一個彎曲的水溝在金屬中間流，長滿了草和停滯的沼澤材料。外面的建築已荒圯得不堪了，裏面像有鬼似的。『我知道，有些人，』我的嚮導低聲的說，『還在那底下呀，他們就停止在那里。他們現在已在那裏面十九年了。你會說他們是儌倖嗎？』

『五年以前，有一千五百人從主要的煤坑中跑出來。這里沒有人了，店鋪是關了，長排的店鋪的白粉刷過的窗子，和門口，是充滿了塵埃和稻草。許多房子的木料已竟取去當柴燒了，連合

作社以及當舖門都關了，節省與奢侈在這城市中是同樣的事。我看見那些教堂的窗子也破了，讓鳥和鼠在裏面做窠。

「比這些淒慘的店舖和破舊的建築還壞的，是許多穿得破舊的人們，乾淨而且整齊，站在街道的角上，不做聲地等着。等什麼？甚麼也沒有，沒有什麼東西來呀。……

「他們是完了，這些父母們，看着一代人骨瘦如柴地長起來；在這代人的心中有一個暗影，他們的孩子們，當他們應當在玩的時候，知道在他們周圍的緩慢的死的徵兆；這是沒有兒童幸福時代的可憐的兒童們。

「他們的家庭，是在人類的希望的墳墓中。……」

那個時期的報紙與書籍，令人讀着希奇。牠有時是黯淡的不誠實的樂觀，有時是無望的拚命。一種無尊嚴的邪僻和一種嘲弄的幽默，侵入民衆的藝術和文學；風格和氣味很強，但對於同時代的生活的現實却沒有把握。關於安心的和故意「很快樂的」書籍，生產和出售也很多，有一種傾向於宗教的神祕和別一世界的運動，如有一種顯著的趨向於抑制的淸教徒主義淫慾

放縱的過度，就激起檢查的和迷信的壓制，這兩種事情都是人類鎮壓降低時相關的兩面。人類面對着牠的金融和政治的複雜問題，變成神經衰弱。

一切的神經衰弱，顯然有其不可解釋的成份。在我們今日看來，脫離這些苦難的出路是擺在那里，但沒有人明白地看見和勇敢地實行，這似乎是不可信的事情。在社會心理學家的心中，還是那種盲目和不努力的惡習慣，出路是很明顯而且也看得見，早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已爲數百聰明的和公正的觀察者所指出了。白朗在他研究「現代國家」的觀念時，有兩附卷專引這些人的話。比如，這樣的話：「世界主義，貨幣膨脹和公共工程！」（是從一九三三年英國的報紙所引出）確實說出，至少是一般的說出，人類逃脫的道路。這些是不成熟的，沒有下好定義的話，但顯然在裏面已包含有終結的改造的形像。「世界主義」預指我們的合理的世界管理，「膨脹」是明白的指出我們現在對於債務的加重和價格水準的動搖之完全的限制；「公共工程」是我們的祖先之社會主義的概念。

但在沒有達到和平與自由以前，這樣的散漫的理解的閃光需要集合起來，燃燒一個更強

的光亮革命的改造世界的概念需要從少數人傳播到多數人。傳播給他們時，不僅使他們看成一個思想和暗示，而且要有那樣的力量使他們的心理飽和，和決定他們的生活。那時候只有在那時候，人類才能指揮必要的意志力，和引導得對於地球上事情作有效的改組。

在人類的頭腦中，應該發生一種提倡清醒的鬬爭，將一使錯誤的觀念，因襲的曲解，一盡求批評過的格言和不可能的「權利」都拋棄；將關於道德的，物質的和生物學的各種關係的觀念都加以肅清；我們會看見，這個鬬爭成功時，已過了三代的人們我們的歷史的下頁，將去分析這個鬬爭中的許多因素和決定的力量。

約有八十萬萬至一百萬萬的人在失敗時代活過。比起今日的平均生命來，他們是短促的，也是不健康的。他們都有長期的生病和衰弱的時候，這在現在好像是出乎人的經驗之外了。他們的大多數是勤勞地在污穢的喧鬧的環境中，在草屋，小村，地窖中度過不衛生與慘淡的情形，幾乎如祖先的穴居一樣。一個能指揮「家僕」的少數人，比較過得舒服些，甚至有相當程度的自由與奢侈，這是靠了犧牲大多數其餘的人。這一代繁榮的少數在一九三一年以後也減少了，

正如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以後就消滅了的一樣。

在以後的若干年代，世界上個人的安全的感覺日益減少，關於明天的事情想起就神經衰弱，易於害怕和沒有把握。那時候人與人間多不相信賴，猜忌，容易動怒和爭吵，在某個墮落的階段，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們生活是和平的和文雅的如舊時一樣。疾病和餓死又成了共同的目的。已寫過的第一次世界史是稱爲人的殉難時代（The Martyrdom o Man）(Winwood Reade, 1871）。在失敗時代的許多人看來，殉難者是日漸增多，快到最後的無希望和絕滅了。

然而在這個混亂中有笑聲，有同情，有相互的扶助與勇氣。那些受折磨的和辛苦的生活，和偉大的光明的光線交織在一起。人類既受盡了各種苦難，人們的頭腦由於在他們周圍的黑暗與痛苦的積累，變成懶惰和隨便，但從這些頭腦中最初出現了希望，以後是廣大的計畫與努力，最後出現了富於收成的制度，集合起美麗與快樂的安心，這即是我們今日所住的世界。

卷二：明天以後

一　倫敦會議

舊式政府的大失敗；獨裁制和法西斯主義之蔓延。

我們在以前諸章，已經說明，十九世紀的舊制度，卽所謂資本主義制度，怎樣在二十世紀的二十和三十年代遭遇災難，因爲牠的工業生產發展失去均衡，貨幣制度的不健全時時有破壞可能；在政治方面又不着適應，牠的內部已沒有能使牠恢復的力量了，而那時人們對於新制度還沒有明瞭的觀念卽有此觀念也不能充分的發揮，不能代替舊制度，因此災難只有繼續下去。

那時候能採取集體行動的唯一機關是各國政府，牠們都是反覆無常，並且各不相謀。大多數的國家在大戰將作時都是君主立憲或議會的民主共和政體，議會是由全體人民 大部分基於無道理的選舉制度選舉出來的。這個時期是民主主義時期。民主主義那時候的意義不

像現在這樣，各人都有相等的機會，依照他的才能對所屬的機關服務，並能參加決定公共的事務。牠又不是在一個小社會內博愛、等的意思。牠表現的是一個非常的政治虛假：即是把那時代的國家每一公民認爲有相等的才能、應該做任何集體的決議事件。

遠古時代的共和國如迦太基雅典與羅馬，主要都是貴族的共和國。民主的共和國，就是說，假定個個人平等參政的共和國，在十八世紀以前如果說是已竟有過，那也只是在如烏利（Uri），溫特發爾登（Unterwalden），或安多拉（Andorra）等地小民窮，僻處在人跡罕到的地方。一般的世界是不知有這些地方的。他們的事務很少，而且也很簡單，每個普通公民都能理解和處決他們的公共事件。

歐洲稱霸時期的開始，移入類歷史的一大關鍵，這是在十五世紀，那時候，會語出現了，講學也興盛了，這是一個大的興奮和混亂的時期，人們對於忠君信仰等觀念，肆意作破壞的批評。新的經濟力自由活動後，舊的封建制度即緊張欲裂。探險與經商，新的金融狀況，工業的發展，這些都創造了新型式的人，並不能確切知道他們的能力，只躍躍欲試，要求自由地表現。他們對他們

所要求的是什麼和他們如何與舊時代的人不同，知都覺得不清楚；他們對於人類關係之改善上的改良也沒有任何的概念。然柏拉圖（Plato）在他們之前約二千年就已描寫過這種改良了。他們不知道柏拉圖曾計劃過創造一中心誠實而且有學問的治者階級，也不知道摩爾（More）曾企圖復活過這種計劃。他們只是簡單地反應他們周圍的事實他們呻吟於世襲的貴族的虐政之下。他們不信賴一個專制的國王，

十九世紀的民主主義術語，主要是從反抗「門第」和「特權」反抗狹隘的和世襲的階級之獨占統治和利益的運動中誕生的。這些少數階級的獨占，乃是根據相沿的武斷教條。因為這個反抗是流品極雜的人的反抗，他們都具有能力和義憤填膺，但無論就心理上和社會上說，都沒有確定組織好，於是這個新運動在很早的階段所採取的形式，就成為伸張一切人類的平等權利。

這並不是說，這些十六和十七世紀的急進分子，都擁護政治由普通人羣來管理；這只是說，他們仇視既有的諸階級和統治者，他們形成一猛勇的和造反的少數，盡可能的喚醒慣於服從

的消極的多數人類，將這些人拖在他們後面走，歐洲稱霸時代的這些民主運動的性質，也是如此。表面上是羣衆提出要求和決定一切但無論什麼時候，羣衆是被推動着前進和被領導着的，那幾個世紀的民衆「領袖」的個性，比那同一時期的國王們和教會首領們的吸引力要强得多。這種世紀的君主只有一兩個如鄂闌吉（Orange）的威廉親王（William）或普魯士的弗列得力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名聲是和克羅威爾（Cromwell），福祿特爾（Voltaire），米拉波（Mirabeau），華盛頓（Washington）格蘭斯頓（Gladstone）羅伯士庇爾（Robespierre），拿破崙或馬克思（這只是雜引的一些新典型）同樣照耀於史册。

後來在英國，美國，斯坎突那維亞德國，芬蘭同樣也有少數不滿的和激烈的婦女，力爭對於事務之參預，其結果是多數被冷淡的婦女得到了選舉權。但她們的成功也不過到此爲止。那時的婦人除了想伸張女性的勢力外，對於世界問題的解決，貢獻甚少，實際也可以說沒有貢獻。

研究社會心理學的人剛剛開始在探討：對「民主主義」之信仰有一大半世紀成爲幾幾乎全美洲和大部份歐洲的流行的虛僞口頭禪。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甚至那時期有名的「思想

家，一他們的內心也是很不明白。他們在心中是害怕明白的現實；他們在本能上努力將他們的異端去遷就他們所認爲不可克服的既定成見他們的想像的民主主義，不外是一種遠處的簡單的小共和國，裏面的人都强壯而且正直，在財富與才能上都平等，一邑的事務由這樣的人所組織的人民會議來處理會議中的演說與鼓掌，都是坦白無私。一切古代的民主主義，連羅馬共和國在內，都爲這類的全民會議所統治，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大家以爲只要人民是在注視，傾聽和發表意見，聰明的決定，即可隨之而生了。

繼封建制度而起的是新時代的大都市。我們如果將民主主義的理想擴張到這樣大的社會中應用，就有許多明顯的困難。我們如一要假定社會的主權是屬於人民，那麼只有藉助於神祕主義。但是那時有一種强有力而普遍的恐懼，就是假如人們不維持這一假定，則特權，束縛，專橫等中古時代的東西都會回來；所以他們勇敢地採納了神祕的解釋。黎明期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新起的人說，無論付什麼代價都可以；只要那些舊的不平等不要再見，他們脫離了原來的一種壓制，趕快跑到另外一種壓制下面去。

他們發覺盧梭所宣傳的「人性本善」的主張，對他們異常有幫助和有效力。普通的人如果不是受了教師或國王的錯誤引導，他們一定是永久良善的。平民由此成了一個神祕的東西，簡直是一個上帝；他的祭壇是選舉會，他的神諭是投票匭。這個在歐洲稱霸時期的上帝，是遲慢而且龐大，但是人們聽說他的賞罰雖然遲延些，可是不爽和大公的而在賞罰未至以前，事情能照舊進行。林肯曾說過，你能哄騙一部份人民哄騙得長久，你若哄騙全體人民只能哄騙一時，你不能長久地哄騙全體人民的。然而為促成一個戰爭或利用一種經濟形勢，為了重大的目的而來的哄騙，這樣作孽的勾當是很利害的。

從這個形勢中，天然發生了有最高等的哄騙能力的輿論機關。

這個遲到的，不可避免的上帝（按即平民），現在證明對於解決緊急的和生死攸關的經濟的和政治的謎，是完全遲鈍和無用。然而這些謎當二十世紀展開時正緊逼着我們的人類要解決。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年軍縮會議和經濟會議失敗的經驗，各國立法機關的外交政策是狹隘的自私，以及整個的世界，在迅速的經濟崩潰的面前不能成立任何全體一致的行動：這些

都暴露了議會的民主主義的最後破產。

世界的名義上的統治者，有一種終身的習慣，是對有成見和驕傲而莫明其妙的投票羣衆演說，而又不願明瞭的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之不能擺脫這樣的習慣正使認清現實和解決現實問題的努力爲之破壞。他們對於任何有效的或新穎的行動的動議，常不免於畏縮。理由是：他們的職務純粹是代表的。讀者感覺在他們背後的，是隨意伸展，不安而且可憐的不負責任的選舉羣衆，這就是代表們所供奉的上帝。這些羣衆的選舉人容易煽動得驚恐起來，去瘋狂地反對新的，勇敢的和急進的手段，他們極易中愛國主義的宣傳，極易受嚇和瘋狂地加入戰爭，同樣容易延緩枝節問題，和外面對他們能信仰的重要人物的攻擊，變得懷疑和無力，一個完全不負責的輿論，無論是傀儡的或黨派的，只願挑動他們的卑賤的感情，（這些感情是很容易挑動的，）而不去訴之於他們的智慧或良心。

選舉人或羣衆沒有受過教育，也沒有良好的領導，這是那些上層會議之無力的基本解釋。

倫敦的世界經濟會議，是上面所說的兩個失敗的會議中更爲重要的會議。軍備和軍縮，是象徵

的和表面的，經濟生活則是根本的。對於這個倫敦的集議，我們的社會心理學家曾做過一千種的研究。其中的許多矛盾，我們到如今仍不瞭解。參加會議的人和我們今日任何人一頭腦都是一樣。坎比 (Moreton Canby) 對於會議中提出的種種條陳做詳盡的分析，他證明他們對於世界形勢的需要很能理解，然而他們一想起後面的群衆和輿論的囂張，一想起這些 的衝動和憤怒是不可計數，他們大家就害怕行動了；只是在那里發疑，其害 還比凡爾賽和會堂皇地做錯事還大。

首先，倫敦會議是修改凡爾賽和議的許多缺點的一種遲緩的努力；牠想對於貨幣的和經濟的紊亂作些調劑，來補充威爾遜所補綴的（他的意思是很好的）歐洲政局。這樣 貨幣和經濟的紊亂使牠的眼光太狹，沒有預見，或者是過於 弱，沒法避免。有一些模糊觀念；如在貝爾 (Bale) 的貨幣的國際聯盟，以及為關稅而設立的理事會及全體大會，幽 似地在會議開幕的煙霧中徘徊而歷史很有意作一次不精確的重複，使這個第二次的世界大會的主要角色，也是美國的總統，也屬於民主黨。依該黨的習慣，言必稱哲斐孫 (Jefferson)，正如共產黨員之言必

稱馬克思和回教徒之對摩罕默德的崇拜一樣。這次的主要角色卻是羅斯福第二，他沒有他的前輩威爾遜那樣煊赫，在人心中的印象也沒有那樣深刻，因爲他沒有在歐洲舞台上站得那樣長久。但當他選爲美國總統和倫敦會議開會的前後數月，世界上又有一種低聲的希望，認爲一個眞正的「人」已經起來，他會看得明瞭和簡單，他會對各人簡明白地說自己的意見，和將世界從可憐的煩慮及愚蠢中解放出來，世界在這些愚蠢與煩慮之下已經受夠了痛苦，而且似乎是幻術地做牠的奴隸。但是他沒有做到的一件事，正是他沒有明白說過自己的意見。

他從威爾遜的失敗學到聰明，不到倫敦有使他自己和他的談話給人作太細密的研究。他比較願意在南塔刻特海口（Nantucket Harbour），他的游艇安伯傑克第二（Amberjack II）中經過斷續的音信和多少有權的中間人，應付倫敦的搖動的危機；安伯傑克第二這隻船在人類歷史中幾乎和福特的和平船一樣。無論就牠的志願和失敗說，二者都是相等的。

當經濟會議逼近時，各處的人都在探詢關於這個　能的新領袖的一切。「這是我們最後找到的彌賽亞（Messiah——救主）嗎？還是我們須得另外找「一個」？」歐洲的每一個書店都陳

列出他新出版的向前看（Looking Forward）一書，以便使人們略知他們要應付的人是怎樣一種心理。這一本書在那些極關切的人讀起來是很失望的。這個人，明白地是堅定，誠實，和藹可親，如書前面的一張照片所表示，有明瞭坦白的眼睛，和堅決的面孔。但這本書的內容是政治家的內容；充滿了好意，混合一些模糊的現代精神；可是缺乏智慧的理解。「他是好的，」他們說，「但這樣就算夠好了嗎？」

然而人心的希望仍沒有斷絕，因為他總較勝一籌；至於別人對於這個用符咒驅走纏在人類經濟生活上的惡魔的工作，連答應也不肯的。這個世界經濟會議或者是羅斯福的會議，也許是沒有結果。雖然那一本書也令人失望但還有可供希望的另一些重要理由。人們說總統有一「頭腦托拉斯」——他的同事的能幹是無可懷疑的，如特格威爾（Tugwell），摩萊（Moley）和狄更生（Dickinson）等教授，都有現代的頭腦。正是這些人後來的著作在法律和政治的方法之改造中起了重要作用，為美國對於現代國家的思想的特殊貢獻。可靠的消息，這個一人類的最後希望；——和這些人很親暱，羅斯福他們都是稱呼名字，而他們則稱他為 "Guv'nor"（州長，按羅

斯福曾任紐約州長故云——譯者。）人們說他的謙恭和偉大就在於他能尊重他們有研究的和成熟的意見。有些觀察者更樂觀，以爲他如果傾聽這些顧問的意見，事情最後就不會弄得這樣糟。他總比只聽大銀行家和大商人的話的那些歐洲政治家和要人們好得多。

但他的確聽從他們的意見嗎？他把握住了他要解決的問題的二重性質嗎？他似乎了解爲減輕債務及過度資本化的負担，有紙幣膨脹的必要；他顯然感覺有不斷擴張公共工程以減少失業的必要：這些他都是正確的，除非他在「公共的」和「公共扶助的」（這完全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間動搖，這點我們還不甚明瞭。但他也感覺這些手段應當有世界範圍嗎？他在這些方面的態度有些改變，沒有爲人預料到的。這些改變是暫時的性質，還是掩飾他的一貫的和堅決的目的之策略上的權宜？當全世界正需要羅斯福明白的說自己的意見，正需要他簡單的指導思想時，羅斯福却在那里用策略了，這是聰明的行爲嗎？他的治療，是很雜亂的：他似乎聽他的顧問的話；但他也不是聽每個人的意見的，他也不反對採用複本位制，他好像把各種各樣的藥都想試一下。

經濟會議在開幕時，就極堅決地想使自己成爲有光彩的和重要的會議。各旅館內客都住滿了，街上都懸旗慶祝，招待的隆重是可以贊嘆的，甚至英國的天氣也十分晴朗了。英皇和他的首相麥唐納的開幕演說，今日讀起來也令人驚異的，這宣言表示對於人類事情狀況之嚴重，有深刻的體驗，他們說了許多話，意思是會議如果失敗，世界的災難將加速到來。他們堅持世界合作，貨幣簡單和恢復工人工作的必要。我們承認這些都是實話，但怎樣才能達到這些有益的目的呢？他們就連最微弱的暗示也沒有。他們所做的姿勢是我們不懂的，除非他們關於形勢中的重要元素有稀微的了解。但立刻他們又談到別的問題上去了。有應付的決心而無應付的能力的情形，是我們今日所最不懂的。假使他們看見了形勢中的主要點，則他們確實沒有將牠們貫串起來。他們沒有看見在他們之前有任何世界行動的路線。

美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赫爾（Co dell Hull）是個又漂亮又含糊的奇人。他在歷史的卷帙上寫了以下的嚴肅而動聽的話：「我們應該將自私心加以驅逐。假使——上帝禁止！——有國家要破壞這個會議，以爲牠的局部事業可以因此獲利，則那個國家是值得人類咒詛的。」

法國的國務總理達拉第（Daladier）的演說，一開始就有範圍廣大和清醒的意見，他堅持兩篇英文演說所忽視的地方，即是全世界須陸續進行大的公共工程以吸收失業者和恢復消費力，他認為這是迫切的需要。美國的代表在第二星期中很氣同意這個意見了。但會議中發揮的高明意見至此為止，此後就鬧小問題，這會議顯然維持不住很高的現實水平。每個代表的背後都有羣衆和輿論的壓力，這些壓力開始在他們身上發生影響。各國代表開始堅持國家的利益不應當為大家的好處而犧牲，漸漸又懷疑世上是否有大家的好處的這類事情。世界經濟會議不知不覺地變成世界經濟的衝突，正如國際聯盟變成外交的論價的市場。頭幾次會議的一切美麗的前奏曲都凋落到沒有結果，因為正在人的意識中誕生的三條件，還需要有無限的道德和教育的努力，而且因為人心尚不願接受如這些條件所指示的將一切政治利益都合在一起的主張。這樣所需要的巨大的自我犧牲不是那些代表們所能承認，因為他們有不可克服的心理障礙。這就是要他們犧牲那些造成他們代表資格的情形。我們試想被任命為國家的代表的人如何能贊成將各種國家利益合在一起？他們實在是完全準備着將世界的情形革

命化，將正在增加的貧窮變成希望，富足和安寧，但必須依一種不可能的條件，就是他們不改變他們自己，和他們所視爲重要的東西也不要變更。經濟會議中的領導思想固然正確，可是也有些混沌，個人的，政黨的和國家的自私主義，力量太强，他們沒有法子克服。

蘇俄的代表對於世界之謎也沒有做什麽抉幽發覆的工作，這是一件很可奇怪的事情。許多作家還在說「布爾雪維克」的政制是我們今日的「現代世界國家」的先驅。但這里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我們知道，「現代國家」的概念和馬克思主義及列寧主義都是從同一的社會律令和建設衝動產生出來的，但「現代國家」却是一種獨立的，更成熟的，和更健全的革命概念。蘇維埃制度就其主張國際主義和牠的真實的社會主義說，特別就是一個專一的指揮的組織——共產黨說都預料到了我們現時制度的許多缺點，尤其是共產黨的組織是我們的「現代國家同志會」的先驅。但是理論與實行在俄國永久有很大的縣隔，而代表那第一次試驗的偉大計畫，發言人李維諾夫(Litvinoff)大半注意於他的國家和西歐各國之間，特殊爭論點了。例如貿易的禁止和貸款的困難，而沒有利用機會如他應該利用的那樣向全世界呼籲。他一點也

不應用共產主義的領導原則於世界形勢中。全世界最感計畫的需要，但是他關於全世界的五年或十年計畫一點也不提起。在這里是明白需要集體的勞動的形勢，他甚至不去堅持世界社會主義的必然。他顯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一樣，完全忘記了把世界當作一整體看待。他想着用俄國來與世界上別的國家對抗，好像他是一個普通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愛國主義者。

其他國家的代表團的要求，是更近視而且更庸碌了。因爲他們演說的時間有限，他們將關於人道主義的話縮成一兩句，說完以後，就談生意經了。只有從愛爾蘭自由邦來的參議員康諾禮(Connolly)抗議那些演說的人，好像同馬一樣的眼睛被遮得不能旁視了。他主張考慮「各種可能的理論；就是非正統的理論，也得考慮。但是他自己的演說也沒有說出重要的建設的觀念。他的心對英國之禁止愛爾蘭貨物輸入太關切，後來還是說到那問題就算了。……

坎比堅持說，現代的世界國家之概念，在到會的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和俄國人所發表的思想系統中，都可以尋到，雖然這觀念在他們口中是說得不自然和沒有生氣。在美國的聲明書中，牠是包藏在個人主義的詞句及警告中；在英國的聲明書中，牠有帝國主義的前提；在俄國的

聲明書中，牠被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心理和無情的妄語所調製得味道很惡劣，第一例是做生意的●不顧政治和不顧攜手；第二例是帝國主義的官吏；第三例是武斷的黨人。每一關於普通原則的聲明，都有愛國主義，派閥，金和個人關係的糊塗感情攪在中間。但無論怎樣，有一不可爭的事實，就是在一九三三年倫敦會議中「現代世界國家」已有了微弱的輪廓出現。雖然牠的出現還在將來，但牠如幽靈一樣的徘徊，幾為個個人所感覺到。牠在成為人類政治生活中活的現實以前，失敗時期還須經過最壞的階段，還有幾代人要受痛苦的磨折，「現代世界國家」總可以姍姍地到來。

故此說，這幽靈當時沒有具體化，因為缺乏物質的材料。世界上每一大國正在摸索自己的道路，以實現永久進步的「世界國家」的主要原則，但沒有一國達到了牠的部份的或一地的實現。故此認羅斯福第二及其最後改造美國的努力，是特別有興趣。總統明白感覺，用膨脹來減輕債務的需要，但他殊不能阻遏已覺解放了的精力之在投機中浪費。他忙於應付的那些人，都受過玩撲克牌的訓練，充滿欺騙精神，狡猾已成了他們的第二天性。但他還請（有時用兇猛的

威嚇）他們表示公開的贊助。他沒有現成的適當的行政官吏來監督大的公共工程，他立刻想將美國的技術人材從自私的金融活動者改變爲坦白誠實的公務員，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企圖勸牟利者放棄利潤，勸他們把他們的工業組織在和他的基礎之上，不然他就用社會化來威嚇他們。然而他又沒有善於經理的一階級去執行。他和他以前的威爾遜同樣不明瞭英國人或歐洲人的心理，同樣不能與之成立諒解，只能相互誤解，但他的樣子却是挑戰的而且自以爲是的。在會議未完以前，他已竟開始咒罵了。在一九三五年時個個人都指出美國與俄國之間有一種對比的相似：兩方都同爲使國家組織得更科學而奮鬪，兩方都感覺將生產的效率與政治的監督相關和一同樣困難。技術家和政治家相互間還須同化。兩國的獨裁都是在和投機者與牟利者戰爭。兩方對世界合作都只有微弱的希望，實際上他們都在集中力量於實現自己國內的繁榮。但他們的生產效率和社會見解恰是相反的，他們從相反的兩極出發走向那一共同的目標。羅斯福從民主的個人主義的觀點出發，而史太林則從馬克思共產主義的觀點出發。至於英國的體系和世界上的其他中間國家在金融崩潰的混亂中還在力求保守。總之，這時候還沒

有人想出好辦法來，將世界上的好意加以綜合，成為一種偉大的力量。

倫敦會議並沒有達到像凡爾賽和約簽字的那樣熱鬧的高峯。牠沒有產生結果。牠的開始是最高峯，以後就不斷地降落了。假使凡爾賽所產生的是一個怪物，倫敦會議是什麼也沒有產生。倫敦會議完全是虎頭蛇尾的。

當時輿論有許多嘈聲，——見哈布萊特（Hawright）的 The Sens of Catastrophe in The nin teen thirties，這是歷史文化叢書的173,193種，藏有無數的引語——認那時代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紀綱都已經衰落了，假如隨意挑選一般人出來應付在我們人類之前的將至的大破局，則比起舊世界政治人物的這個集會，至少是一樣的適宜。因為無論怎樣這些人是都嘗試過和證明過，他們的不中用是很明顯了。然英國的首相麥唐納，即職業政治之精華，在會場上仍滔滔不絕，並且瞪眼四顧，似乎還希望從空虛中出來一件順逐的事來解圍，救他和他的同類，免為歷史所譏笑。在會議開幕的盛況中，有一時期，攝影者忙於攝下他，每一個有研究的姿勢；收音的人用收音機收下他的好聽的聲調，和他的豐富的重音；忙碌的書記們都在勤於伺候他；

代表們也一定用莊嚴的樣子，（特別是美國人最會在公共會場上裝這種的樣子）捧他的場；於是這個最後的和有威嚴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一定相信自己指揮的本領是魔法無邊，他一定是那樣的感覺，否則他是不會留在那裏滔滔不絕了。他之由極寒微爬到世界知名的高位，單靠聲音和姿勢，假使他不相信魔法，則他再沒有什麼可以相信了。他一定也對人類應該相信魔法的。但假如這是他那時的心情，他實在難經得起以後幾個月的批評。那時他一定會有幾晚睡不着，在那幾晚甚至他的私人的魔法也失敗了。

世界經濟會議開會約一星期，即失去了他的光輝。倫敦的西提區最初充滿了希望，證劵價格都上騰，但不久又重新降落了。不等經濟會議散會，世界的衰敗又顯明了。在一開始時倫敦爲光明的希望所脹起，好像小孩玩的氣毬一樣，一等到吹氣停止的時候，牠就收縮和烏烏的叫響，是一陣失望的哀聲。

如哈布萊特所說的，一九三三年的七月，到處聰明的男女們都談着兩件事情，關於集合的代表們和統治者。他們說，「這些人不能爲我們做什麼，他們做，比不做還壞得多。他們使災難更

嚴重。」第二，他們很驚訝地問：「爲什麼歷史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現在甚麼也不告訴我們？在民主的狀況之下，政治家的失敗實有可原諒的。但我們的大學做什麼去了？關於這些事情未必沒有科學來解決的吧？未必沒有知識可研究吧？未必歷史上沒有過教訓？未必他們對於毀滅我們的行程沒有過分析吧？」

那時的教授們正忙於在歷史，社會科學和政治科學中做博士論文，人們聽不到他們的回答。

在三十年代終了以前，全世界都明白有一世界範圍的社會浩劫，現在正無可避免地要降臨了。聰明人所能做的聰明事情莫過於坐在一種諾亞的大船（Noah's Ask）上，去拯救那還可拯救的一部分的文明，等洪水式的災難過了以後，猶好重新開始。有幾個預言家像這樣說了好幾年，但現在這個拯救的觀念正如疫症一樣的傳播。牠準備好了一「現代國家」的運動，也就是我們現在制度所寄托的運動。然而當時的悲觀並不因對於恢復抱有希望而減輕。據哈布萊特所引有一個作家將人比成一個養在家裏的猴子，牠在冷的時候有聰明和能力將牠的草

牠拖到火旁邊，但牠沒有智慧又沒有預見，逃脫大火的後果。哈布萊特簡略的敍述人們當感到災禍快來時所幹的經濟活動，極完全地證明那個慘淡的圖畫的不錯。

在那十年之內，各處的人都相信議會的民主主義已竟到了完結的時候。由凡爾賽和議後國際事件的動搖一直到四十年代發生戰爭，在這時期中間，人們都在討論計畫和求實現一種至少應該有決斷的政府。現在他們的努力又迫切起來，全世界都充滿改變政府和更換官吏的狂熱！

在開始的時候這個渴望已決定產生一些異常不成熟的結果。一陣巧辯的「獨裁」在戰後不久從波蘭到西班牙席捲全歐。這些冒險者都是模倣南美的一些小共和國的叛黨領袖一般。現在讀普通史的學生，也用不着去細究這些不重要的小事，但從此以後全世界發生了指導的或類乎指導的團體，爲我們的現在制度所寄托的現代國家同志會的先驅。

意大利墨索里尼（Mussolini）的法西斯獨裁，比起別的代替議會方法的東西，是爲結實。牠之興起不是個人的僭竊，而是一種有目的的和有學說的組織。法西斯主義的智慧是有限的，

是國家主義的和浪漫的。牠的方法，特別在開始的階段，是用暴力的和可怕的行爲，但至少牠堅持牠的黨員應守紀律和應爲公共服務。法西斯運動的出現，是對於混亂的勞動共產主義的一種對抗，牠雖擁護殘餘的專制和教會，但對於爲公衆利益而辦教育和運用私有財產則進行得異常勇敢。平心而論，法西斯主義並非完全的壞主義而是一堆的好東西！墨索里尼已在歷史上留下了他的威名。

在俄國，自從一九一七年以來，一種更徹底和更廣泛的共產黨起來當權。牠是列寧的發明；列寧繼續改變黨的組織和學說以求適應環境，直到他一九二四年不幸逝世爲止。當他活着的時候，俄國的試驗眞像要領導世界從無用的麻木不仁的議會政治跑向一個新社會似的。很有趣的，我們如注意早年的布爾雪維克政府，牠有許多方面是帶現代性的。

在環境需要之壓迫下；加上列寧的領導布爾雪維克政府達到了那個現代性，雖然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爲牠創造了許多嚴重的困難。馬克思是二十一世紀中葉的心理學家所稱爲「受環境限制的天才」，他總脫離不掉他生存的那個時期的民主主義的感情。當現代民主主義初

誕生時，已有一種傾向，想將特權階級屏除在平民的眞實民主主義之外，而馬克思和他的門徒們旣將民主主義當神一樣的供奉又有其特別的解釋，卽只限於無產階級；於是把這個傾向弄得更强化和僵化，無產階級就是純粹的羣衆，神祕得不可形容。

但眞正的俄國革命，在一開始卽受了實際的和中等階級的列寧指導，他留心保障他理想的社會改造免於兩種危險：一方面不致因受羣衆的惰性的影響而行動不靈，另一方面不致因羣衆的驚謊而被推翻。他的自稱「民主主義的」蘇維埃政府，卽 維埃的金字塔，是一種層級的制度，到上面來和政府人員見面的，只是那些經過步步高昇的機關濾過的代表，所以他們都是純潔的。而且列寧對於教育和輿論，統制得極完全，使那名義上是國家主人的羣衆的思想趨於正軌。而他所發明的共產黨的作用則爲激勵和管理全部機器之用。

這個共產黨，與意大利的法西斯蒂相似，他們的一般概念是從柏拉圖的共和國的衛士(Guardians)階級脫化出來。「現代國家」的觀念亦於此書具其萌芽。假使有人可稱爲現代國家之父，那就是柏拉圖。共產黨員極像那些衛士。早在一九〇〇年時，民主制度的批評者正

討論創造一種宗教式的團體，主要是致力於政治的和社會的服務，實行自己訓練，自己任命和有自我的紀律。（英語國家以內的社會主義運動在一九〇九——一〇年（見關於那些年的歷史文件中的 Fabian News）已在辯論此類計畫，但必須有戰後歐洲形勢的危險和緊張才產生出那麼多的十分超然的，持論的工會和青年聯合為一個永久的革命組織。

共產黨在開始沒有分成「各部」，其精神上是政治的而非技術的，這是和我們現在的現代國家同志會不同的地方。但二者相似之點，就在他們都堅持一生都要繼續學習和訓練，在黨以內實行自由的批評，凡願在牠裏面服務的人（在相當的限制之下）都可加入，那些比較不負責任的人也有辭去牠的特權與嚴厲的規律約束的權利。但是創造了俄國共產黨的那些條件使牠必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本是十九世紀中葉急進主義的最後產物在純熟的列寧以後仍保存許多感情的老調。列寧死後，在史大林統治之下，牠更日漸回復到這些老調，因為史太林雖是忠實但他是一個沒有創見，疑忌而傲慢的人。

在俄國制度的上面，有很重的民主的，平等的口頭禪束縛着，正為在意大利法西斯制度的

上面有愛國主義和宗教的口頭禪束縛一樣。甚至美國的憲法比起新的俄國制度來也不及牠那樣偏强的提倡民主的平等，和堅持下級的人羣之智慧。雖然俄國的統治者中很難說有一個是農民的和工人的出身，（在西歐和美國的公共生活中從該社會層出身的政客反要多些）他們却裝成普通人，他們吐痰，不修面，不打領結；他們對資產階級的舒服裝作冷淡的樣子；他們所受的訓練就是聽見「階級戰爭」的名詞，個個人都屈膝。共產黨的領袖們相互爭吵時，都是攻擊對方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這是最利害的罵人話；雖然兩方罵得都對。任何向現代國家制度前進的運動要完全免去這虛偽的遺產，還須要經過好多年。

俄國進行的是一種新試驗，其不幸的地方，就在牠不能吸收能幹的技術家，組織者和教育家參加牠的領導。這是因為牠裏面參雜有對於舊制度的社會的妒忌和憤恨。牠在現代化的企圖中所拒絕的正是社會中最現代的一類的人的援助。因為這些人受過特殊的教育和知道一般人所不知的事情，就很難和無產者的地位一律。所以俄國同法國一樣，政客只會說漂亮話，態度向來不坦白，雖不是在那裏真正破壞，却是在干涉和阻礙一種新社會和新經濟制度之科學

的發展。

史太林自從在五年計畫中經歷困難，他就知道將技術的人才隸屬於政治人才的壞處，他在一九三一年六月論新舊技術人才的演說（歷史文件叢書 Stalinism, XM. 327,705）中很坦白的承認在現代社會中「無黨的」一科學家和有特殊知識的人的重要。不幸，俄國的黨政客的手得到 G. P. U.（卽俄國的特務機關）的活動之援助，後者成了馬克思主義權威的奇怪的保護者。所以自一九二八年第一五年計畫開始以來，俄國雖爲極大的熱誠所推動和妄自尊大但還是走得很笨和很喫力。一個政治家的獨裁只會宣傳而不會實行，頗使國外愛護牠的人失望。當牠的計畫由於缺乏精確的物質的預見而錯誤時，牠却去控告，囚禁或槍殺那些工程師和有用的技術工人。

蘇維埃制度的不可抹殺的民主主義顏色更有一壞結果；就是使俄國的進程和西方的創造的活動日益隔閡。他們沒有做成聯盟者却變成了反對者了。社會瓦解的憂患，在大西洋諸國方日益緊迫，將重造的文明從災難的漩渦中救出的希望，正有賴於每個國家，種族，階級中聰明

才智之士的協同努力。那時需要一種革命，但不是照街市戰鬪的，階級戰爭的陳舊公式。那時需要在革命的性質中有一種新的革命。暴動的革命，再也用不着了，因爲現在這個制度自己已毀滅了。頂要建設的革命階段已到來，在凡做建設的努力的地方，主張階級戰爭的瘋人之出現便人們相互敵視，引起妨礙和分裂的破壞作用。辛克萊（Upton Sinclair）在一九三三年的出路（The Way Out）中，曾論過這個衝突，此文被收在用他的名字重出版的論文集中見歷史文件叢書的意志史（History of Opinion）。

創造的精力之浪費是很多的，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全世界。每個文明社會中無數的青年男女，代表人類的活的希望，他們却將他們的青年寶貴光陰和精力浪費在關於純教條問題的激烈爭論上。國家主義的流毒在國外正使他們的反應更加複雜。許多人竟完全反對進步，想將世界推回到想像中的過去的樸質時代，所以他們變成三K黨，國家主義者，國家社會黨。青年的天然衝動是傾向於做大事，作有效的和嚴厲的行動；青年們的意思原本很好，他們的精神都一樣，可惜的是語言的混亂，釀成各種不同的結果。「現代國家」的觀念，他們在想像中有很長的時

間弄不明瞭，大半因爲俄國的自己矛盾太顯著，成爲障礙。

俄國似乎在領導，牠想在行爲中領導但牠擔負了大家的希望。在這個期間，議會民主主義的舊方法和舊的國家主義外交仍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活動，牠無力阻止的社會崩潰在繼續，這都是因爲創造力量分散的緣故。

二　舊教育傳統之蛻化

費伯爾（Faber）在他的有興趣的和有意思的歷史的分析（Historical Analyses 2103）書中討論在二〇一四年以前一百年戰爭，經濟衰敗，瘟疫，災荒，和真正的飢餓等階段和時期何以是必要的，因爲就那時已有的能力，人類本來是可以避免這些不幸了。他認爲傳統的壓力太大，所以我們人類的這個痛苦是不可免的。他的道理是沒有這些不幸者的代人受苦受難，人類心中的那些憂患，妒忌，恐懼，和迷信一定不會肅淸。人的意志也不會振作得爲建立「現代國家」去努力，犧牲和服從紀律。

費伯爾更具體地應用他的批評於一九三〇年以後的所謂教育的衰微的一例。從來人們都把學校和上學的人的減少，當做是眞正的退化，將牠與一般生活水準之降低和公共衛生之退化並列。但他提出了某些最好的理由來解釋舊世界的教育機關之荒廢和消滅完全不是一件壞事，而是社會恢復的必要前提。

他認爲，普通的學校需要再生，需要根本改造。在未這樣辦以前，將牠破壞也沒有什麼不可。他輕視和排斥以十九世紀爲一教育世紀的那種見解。他說，我們若因過去的學校和大學及現代的學校和畢業以後的教育之間有點形似，遂以爲是一樣，那就錯了。二者雖同佔據青年人的時間，但是牠們對青年所施的教育內容完全不同。我們的教育是生活之繼續的革命的前進的預備階段；但二十一世紀以前的教育純是保守的，牠是完全和嚴格地傳統的，於是牠的普遍的崩壞是新世界的建立之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教育二字現在幾乎包括人生的一切智慧的活動，除了研究和藝術的創造之外。這不是牠原來的意義，牠原來的意義是爲生活而準備青年。那時候，甚至在非常的例子中，三四歲以下和

二十歲以上卻無所謂教育，普通到十四歲就已竟完畢！但我們不像我們的祖先一樣，在任何年齡上書界限，祇為學習停止的日子。公眾的輿論，公眾的商議和集體的決定都屬於我們的教育的範圍。二十世紀之初所認為教育的是把這些放在牠以外的。

那些日子，人們所知道的都是知道得很偶然。那時期的新聞紙都是私人所有，牠所告訴公衆的都是牠的編輯者或牠的老闆所要的；早年的電影之傳播事實和觀念，無線電廣播及其他，在美國都完全商業化了，做商品廣告之用；在英國則為有勢力的政治家所管理和指揮。書籍的出版，甚至科學著作之出版，主要是投機的和競爭的，世界上已沒有知識的中心。

我們看人類沒有何種知識的組織也能過得長久，這是可驚奇的。十七世紀以前，沒有百科全書，甚至書店裏的百科全書也不存在；因為所謂中國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是一些文章的薈萃，甚至在十七世紀以後有開始的商營的百科全書，也沒有關於紀載的永久組織。那時人們對於知識的永久體系也不感何種需要，這個系統知識常被修正，一直到二十世紀快完的時候。在失敗時代的人們看來，我們的連鎖的研究分類，討論，實證，和輿論的組織，我們的根本

知識的體系，就是說，以巴塞羅納（Barcelona）為中央撐，各處都有分站，各省都有分局，有一千上百萬的積極工作者，在百萬的通信員和參加研究者的聯系，在失敗時期的人看來，是龐大得不可信的；雖然他們在那些大家都窮的日子所維持的完全不生產的軍隊和軍事機關實際也和這相等的龐大。

我們現時還在擴大這根本知識的體系，亦可稱之為人類的頭腦，我們仍在增加牠的細胞，擴大牠的組織和使牠內部的交互影響日益迅速而有效。此外還有廣大的獨立的出版事業，繁榮於其旁。我們如將在失敗時代的人類與今日的人類相比，則前者整個說來是沒有頭腦；集體地說，牠是沒有存儲，只有幾個分散而又聯絡得不好的中心；牠是昏睡地無知，牠還須從未製成的原料般的知識中發展出有條理的知識來。

但不僅昔日的知識是粗野的，偶然的，錯誤的，很壞的；賚伯爾之反對舊教育，是認牠比這些還要壞。照白些說，知識完全在那時的教育之外，在形式的學校之外。教育需要給人以健全的共同的信念，但是現代國家的觀念。但賚伯爾指出舊的所謂「初級」的學校，並不像供給知識的

樣子。就指導的觀念說，她們更無意思供給。費伯爾引康恩茲（G. S. Counts）博士的美國的收穫路（The American Road to Culture, 1930）在美國所作的一極可注意的調查，在這裏，美國共和國普通學校的思想之完全貧乏，已被證明得它無疑問。這個思想貧乏的教育是有意如此的，費伯爾說，若就供給關於人生的概括的知識說這個時期的教育簡直絕沒有毀滅甚麼有價值的東西因為有價值的東西根本就沒有放在學校課程中這些普通學校中所教的歷史是有毒的愛國主義的囈語。生物學或者是不存在，或者是以正經和靦腆，比如他們所釋的兩性的事實，是用花的解剖來教授。關於經濟的教科，是一點也沒有。十九世紀的「教育」不是啟發文明而是反對啟發文明學生的父母政府和宗教的團體都極注意教育應當是這樣不能是別樣。他引學校的課程表和公共的討論為證，並給了所用的教科書的幾種樣本。

費伯爾認為那些說在經濟活動收縮的時期，科學研究也在受苦的人們是太誇大了。雖然由於私人捐助之消滅和由於節約研究者的人以大大減少，雖然思想之國際的交換受干涉，和思想生長的速度也緩慢下來，但是有條理的科學之進步，卽在社會崩壞的最壞階段，也沒有絕

對的中斷研究事業表現一種極善的適應性和不可滅性。牠初爲財主所獎勵，後來爲軍閥提倡，牠在俄國，西班牙和南美都避過難；牠還逃到飛機的棚子中間，經過了相當時間以後又重新興起到牠現在世界上稱雄的地位。牠從未受過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之嬌生慣養。在繁榮的第一時期，純粹研究的事業所過的是僅足糊口的生活。當牠有錢可賺時，如劉易士（Sinclair Lewis）在馬丁·安羅斯密士（Martin Arrowsmith）所說的，牠就商業化和墮落了。當衰敗的時間到來時，科學的寄生蟲都跑開了，但純正的科學研究者，是在很少的物質供給中過慣了的，與肚子捆緊些，在各種僻靜的地方和他的職務相依爲命。

一九三〇至一九五〇年之間的時期，所眞正破壞了的東西，是在十九世紀一步步發展出來的國民義務教育。這些教育除教人識字，說話和算術以外，其餘恰恰只是背誦傳統的老話。過去曾有過一些改良，特別是在方法上。關於嬰孩的教育也有過一些進步（雖然在經濟恐慌的時期早被犧牲），還有幾個例外的學校曾出現過，但以上所說的是那時模範的學校的性質，這類的學校一直到大戰爆發時爲止，幾乎世界上每一國都不斷增加，識字的人即至少能讀書的

人的比例也漸漸增加了。大戰以後，進步的速率一步一步的降低到零點，只除掉俄國，那里的義務教育只是在一九一七年以後才開始。但眞正衰退的，完全不是知識或教育，而是舊社會約束人的傳統的訓練之衰退。

一般人知道「宗教和科學的衝突」的歷史主要是十九世紀的歷史，我們在這里不再說基督教的信仰和紀律的結構，當初頗爲安定，在十九世紀由於地質學和生物學中的啓示之結果，牠的價值就動搖了，這一結構也削弱了。在一八五〇年以前，歐洲和美國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口對於宇宙是在西元前四〇〇四年那年創造的，都深信不疑，他們的智慧的生活都縮在那一時間小細胞的圈子以內。他們害怕逃出來，他們有害怕陌生地方的心理。讀者已知道亞當犯罪和耶穌爲人贖罪，從前是被基督教的牧師當歷史事實來教的，在心理的解放和擴張的那些年頭，他們將這些說成是「象徵」的意義所經驗到的困難。基督教亦由於這個不可免的含糊而失去了信仰和權威。爭論開始的時候，如雷鳴一般，但後來變成很小的聲音並且帶着譏諷了。這些爭論的結果在後來的幾代人看來是更爲明顯，他們確定了神道的虛無，新的和舊的

相抵相消。

爲人所公認的基督教世界觀，無論是天主教會規定的或新教的各種教派所規定的，都帶有一種粗野的但頗爲有效的道德律令。地獄的恐懼逼人行善，教會雖然在道理上辯不過，但牠有錢，教育組織也在牠手中。他們對於新見解之實際的抵抗，比他們辯論的能力有效得多。人們之屬於教會和將小孩托給牠教育，成了一種社會習慣那時也沒有別的現成的教師，也沒有別的學校。所以傳統的正統宗教能阻礙人發展出一種現代合理，使牠和他對自己在時間空間的位置的新認識相調和。但是這些宗教內失掉很多他們舊日的不可懷疑的權威了。

稚普遍的繁榮的第一時期內，他們所得的捐助的相對價值也逐漸減少了；他們又喪失了智慧的和道德的尊嚴。但只是在戰後時期經濟的崩潰以後，他們的物質基礎才完全坍倒有一時期這些大組織同普通人一樣的受苦，最後，當生產恢復時，他們並沒有恢復他們的比例的重要。他們舊日的投資已不見了。當社會收復了地產的所有權時，他們同別的地主一樣的遭難。一九六五年時，一個普通青年再不能依賴當教會的牧師來謀生了，因爲聖職所代表的是舊世界

觀，一個野心的教師也很討厭牠。牧師們看見了他們所得的捐助不斷的減少，他們很容易的換掉他們特有的服飾，鑽進人羣中而消失了。有組織的基督教會最後從歷史中不見了，幾乎同波斯征服巴耳（Baal）以後，拜偶象教的祭司之不見是一樣的快。依羅伯爾看來他們只能這樣的消滅了。

社會道德之普遍的淪喪，也是這個時期的特色。一般人認爲這是由於一方面基督教倫理的衰殘，另方面現代行爲的道德的智識標準還未確立。羅伯爾勇敢地反駁這個意見，他承認西方文明的道德大都爲基督教機關所建立，但他否認維持道德的即是這些機關。他將西方文明的道德的消失幾乎完全歸之於社會信任之破壞，我們已說過這是那時候經濟的安全和貨幣的價値二者狂野的動蕩的天然結果。人們對社會不再尊重，因爲他們感覺他們受了社會的欺騙和被社會所賣掉了。

三　社會沉澱物之分解和結晶

在這整個時期內人羣的解體與重新集合之進行，是很能吸引社會哲學家的注意。普通的人對於尊敬上帝，對於社會正義，對於他的教育和社會的服務，都失去了信仰。他失去了職業，他的慾望，也得不到滿足，中心煩躁，勞動和家庭享樂，舒服的生活，對於數目日漸增加的多數人民，是變成不可能的了。

我們現在所稱的社會的安居，那時候是沒有的。家庭組織和社會秩序都紊亂了，他們變得煩燥不安。整個十九世紀所盛行的社會信仰和紀律，很快地退化了。社會的安全也迅速的崩壞。

人類歷史中已發生過無數次的瘟疫，還有不安，混亂，人口的凝聚與遷徙等階級。自古以來，人類安寧和滿足的時期，都是例外的。但在過去，一般總是糧食供給的耗竭，瘟疫，或蠻族的侵入，破壞社會的結構，使人類幹起非法活動來。至於這個新的社會的分崩離析，性質是截然不同。第一，這是社會的機體內，物質與能力之增加，而並非物質能力減少的結果；第二，這是由於傳統的

法律和政府的不中用，而使膨脹的行程走錯了路。

使社會離析的諸力量，我們在十八世紀已看得清楚了。牠們在法國革命中以及以後的社會和政治的紛擾中已竟顯著；但牠們只在世界或戰後才生長到支配其他統制的勢力的地位。

十七世紀時，人口稀少安土重遷，那時鄉村維持秩序，只要一個里正就夠了。地方的縣令和法庭，審問一個罪犯時，是容易熟識這個罪犯，且了解他的地位和犯罪動機的。但十八世紀的經濟發達，增加了城市的面積並且增加了城市之間新修的公路上的交通，而維持秩序的勢力則不能比例地增加，所以城市中的暴民和强盜，以及綁票和土匪都應運而生，本方的里正的力量不足對付這些新要求；地方縣令也同樣不夠了，於是罪案有增無減。

在用野蠻的刑罰對付這些犯罪失敗以後，在第一次法國革命的種種過火行動以後，每一歐洲首都，都有過暴民的騷，此外並有無窮的超出社會制裁的他種表現，於是政府的機構只有努力於整頓自已以應付新環境。現代化了的警察實力，在全世界都出現了，秩序與安全的新

階段開始，這個階段在大戰以前的幾年到了最高點。那時的世界上，（或至少其極大部份）幾乎如今日一樣的安全。一個沒有武裝的人能在大部分的歐洲，印度，中國，美國，等處旅行，不致有什麼危險。沒有人想對他以暴力或企圖公開的劫掠。在英語國家和西歐社會的巡警服務時，甚至武器也不需，只帶一根警棍。

十九世紀的進步年代對於使用暴力和流血所成立的許多的限制，都爲世界大戰打破了。不安的聰明的失業者數目正在加多；摩托車，電話，玻璃櫥窗，鄉間無鐵欄的別墅，和誠實的社會習慣都在引誘他們犯罪，犯罪的機會也比合法行爲的機會要多些。現在正是世界衰敗的時候，公正節約已成了一種流行病於是已有之教育的法律的和警察的組織都談不到迅速的擴張和現代化。法庭及警署的規模和威望都漸漸減少了，而在這個緊張的和厭煩的時期內，社會上不規則的行動正在廣大的發展，需要牠們解決的問題正在增加。

非法活動的舞台，是這樣佈置好了，犯人只在與他作對的敵人（即警察）對抗以前，考量就有了準備，他脫離了地域的限制，不知有任何的束縛，他經驗到了精神的振作和活動範圍的

廣闊。犯人的勢力在生長，法律却被拘束在牠的傳統的羅網之內，不能與牠同時生長。

這個混亂期間的犯罪紀載，今日讀起來是令人奇異。那時很可怕的一些罪悖，我們今日看起來，只是一些怪異的和情節曲折的胡鬧。我們讀牠們時，如讀關於中世紀的體刑或食人肉的宴會，或戰爭的殘殺，或人類的犧牲的故事一樣，抱一種驚異的不相信的態度。我們現在看起來，這都是不可能的。我們中間很少的人能眞實了解這些祇是一百五十年以前活着的男女所受的切膚的痛苦。

在世界大戰以前的普遍繁榮的第一時期，歐洲的比較富強的國家的犯人本是很少的，而且是一些非常的現象，像社會今日須應付的很少的幾件不可忍耐的行爲一樣。犯罪的大都是多數心理有欠缺或者是劣等智力的一類。他們多數的犯罪都是屬於感情的和野蠻的行爲。那時有些竊盜和商業詐欺的事，並不是嚴重的擾亂社會的秩序。但是當舊制度的道德解體了的時候，情形就不是這樣了。聰明和勇敢使自己覺得與社會是處在衝突地位的人，日在增加，他們也有自己的道理，他們說這是因爲社會對不起他們。他們感覺愛國主義也欺騙了他們，除了貧

之和戰爭之外，沒有給他們別的甚麼。他們從不曾有過公平的機會。他們這時候覺悟了，要自己顧自己，讓社會也去顧社會好了。他們就找着他們的近鄰的老實的伙伴來欺負。

至少你的同伴是離得很近，假使他在你急難的時候沒有幫助你時，你儘可去進攻他。所以在人羣中，如果未被社會安插的分子密聚在一起，而且蒙受羞辱，或者聰明人在失業和貧苦的生活中過不下去的時候，在這些地方，犯罪的小團體就繼續生長。

一九〇〇年，歐洲的社會還以家庭爲細胞單位，人各有自己的家庭，安居樂業。在一九五〇年，歐洲社會的個人集合在犯罪集團，或密祕會黨中，或溶解在游民羣中，任何公認的好品行的標準，對他們都失去作用。

我們如縷舉社會的罪行，當以搶刼爲第一大事業。過去每個有效能的政府，都是只許自己有沒收別人財產的權利，每個聰明的政府之行使這種權利，也是異常的謹慎。在過去私有財產未受調節的時候，偷取可以攜帶之物，和侵佔無人保護的財產的事情，是永久存在的。英國的社會秩序最佳的時候，是在普遍繁榮的第一時期，竊盜（我們可以將種種貪汚和詐欺行爲都包

括在內）是犯罪的單子上的主要項目，好像其他罪名都沒有那樣多。但是普遍的繁榮中，如果有了停滯的時候，就有更積極的搶刧方法出現，以補充普通的偷竊。路上有人公開地搶奪錢袋和金錢了。夜入人宅的盜賊的活動也增加了。以後就是帶威嚇性的攔路行刧，或是明火執仗的搶刧。在一個普遍的信任的世界，無武裝的，無跟隨的人在各處走都可以戴有價值的珍珠寶石，或攜帶大宗的現金；但那個信任的雰圍很快地冷下去了，甚至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英國，還有單人的或成雙的人搶刧的事，例如六十年代的"Garrottes" 突然從後面襲來，攫去錶和錢袋，他們會在被刧者的嘴上貼一張膏藥。有些時候，雖是很短的期間，甚至在倫敦和巴黎的郊外也變成不安全了，而且在美國除了某些近大城市的中央區城以外，其餘地方沒有時候是安全的。這類事情在世界大戰以後到處都顯著地增加。

但這種單人的搶刧的事情有其顯然的短處，使牠自己會趨於消滅的大路。這類的打刧之能興盛，必須一般人先有一種實際安全的感覺，換句話說，必須要有可供打刧的人。這樣的打刧使社會一時感尖銳的痛苦，但不是長久的病疾。路刧很盛行時人們就不攜帶貴重物品走路了，

他們避免走孤僻或黑暗的街道，他們走路時多人結伴，並且攜帶武器。路刼的流行病過了最高點就衰落了。

有犯罪習慣的人，馬上學習到結團體以開闢努力的新方向的重要。如果有被訓資格的人很小心和保衛得周密的時候，偶然的犯罪發展，成爲有計劃的犯罪。在每個國家犯罪的團體增加了，牠們開始定出自己內部的紀律來，這紀律爲結團體以對抗法律的人所必需遵守。在歐洲的強烈的關稅戰爭的情形上，私運商的活動是很賺錢的，人們在做私運事情的時候，容易發展出一種秘密的忠誠，秘密世界的規則，牠如果很因的應用起來，也很便利。在美國，禁酒法反而爲類似的病態的秘密組織系統的發達，創造了必要的前提。牠們馬上和那些較老的政治腐敗的組織和恐怖主義的組織匯合在一起。當世界經濟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和四十年代繼續崩壞的時候，一般的社會安全，在美國比歐洲退步得還要快些。但各處的崩壞是平行的過程，一時是這個國家，一時是那個國家，罪犯勢力蔓延着，對於沒落的制度下服從法律的公民作新的攻擊。

大規模的攔路行刼的事愈來愈加大愈衆多了。歷史往往重複自己只是稍微有些不同，十

七和十八世紀路上的大盜不見了，乘汽車的土匪和劫火車的強盜出來了。武裝的土匪劫華昌的列車，這樣的事，首先發生在東歐和美國；以後更爲普遍。這樣的事常要十幾個人聯合起來才能進行，他們須先找好逃脫的路，和贓物銷售的市場；有時鄉間別墅和鄉間俱樂部在充滿了貴客的時候突然爲人所襲擊，電話線被切斷了，大盜們在這些地方飽掠而去；餐館，賭場，和有錢的人常到的其他地方也常被搶劫，方法日益高明。本地的銀行和銀行的支行都變得不安全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前，一個城市銀行的辦事處是又大又寬敞，又講究，有旋轉的門，櫃台，低而有玻璃的隔斷；十年以後，銀行的面容改變了，寫字生爲鋼欄所保護，他們携有手槍；他們和顧客經過小的鴿籠窗子交易，這窗子可以立即關起來。

兇惡的犯罪之範圍和性質的改變，也影響於公共的時尚和外表。戴珠寶，佩練錢，貴重的鈕扣，和他種炫富的東西的人逐漸減少了；衣服是扣得緊緊的，後彈藏武器的習慣從美國傳到了歐洲；婦人的衣飾漸漸變得在藝術上美觀，而在實質上不值錢了；各處的社會都不像從前那樣的炫耀。外面窗子狹窄，裝好鋼門，鐵鎖和鐵欄杆的房屋慢慢代替了那種坦白暴露於陽光下供

外面的人欣賞的式樣了，城市商店的櫥窗陳列也更加小心的防備着。

要保護和害怕惹人注目的需要，影響到汽車的設計。二十世紀中葉的普通汽車的面孔像一個惡很很的吵架野獸一般。坐車的人同牠比起來也很諧和，在世界大戰以前，任何車子如果看見道旁有一個車子壞了，或有他種困難，一定立刻停下來，設法幫助。時勢變了人們害怕這是埋伏；他們在天黑以後就不肯停車，甚至在白天，他們雖然有時看見受傷的人或外表受傷的人躺在路旁，也是不停地向前開行。

在這些狀況下，旅行的人們，也很快地減少了。要找這種統計有某種困難，但在一九二八和一九三八年之間，在歐洲的公路和鐵路上游歷和尋樂的人，減少約百分之八十以上。這些減少除了交通之一般的不安全外，自然還有別的原因；一般的貧困也使人們留在家中不能出門。但重要的因素是不安全。

公路不安全時，行走的人們就日漸減少了，許多公路都失修。現在我們學校博物院的收藏家所寶貴的舊的道路記號，和汽油唧筒都從地面上看不見了。

搶劫的進步，只是犯罪的進步中的一種，比牠更可悲嘆的，是嚇詐之組織，首先是反對個人，後來更反對社會中整個的階級。當人們不願爲了出去旅行而被劫時，強盜就追到他們的家裏來。這方法又是美國人的發明，他們的進取精神眞的領導了全世界。普通的富人，慢慢發覺了他的生活如墜落在担驚受嚇的網中一樣。甚至在繁榮的時期中，美國有錢人的生活也不免於危懼的元素之侵襲。他們的担保品從沒有十分安全過，他們的地位也不能全完的穩固。但他們現在除了財產和收入的日益不安全外，還要出錢買掉日益增加的騷擾。嚇詐匪，綁票匪和恐怖黨徒，利用當時巡警保護的不周，不做聲地，板起臉孔逐漸公開地現出來。

他們對於無保護的私人，有一種特殊殘忍的進攻形式，即是威嚇着而且實行綁架青年兒童；比這一個方法和平而且好些的是偷竊和勒贖人家暱愛的動物。美國極有名的長距離飛行家林白大佐的小孩曾被人綁去而殺害，在這案子以前不知有幾千的小孩曾被偷去藏匿起來，於得到酬金後又交回。直到林白事件發生，才喚起一般人對這日漸增加的討厭事情的注意。然而人們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的手段來制裁這類事情，而在一九三〇年後不景氣的那幾年，綁

票和嚇詐的事增加許多，傳遍了舊世界。牠是有組織的，他們很快而秘密地將男的或女的偷走，以刑罰來威嚇並且監禁着。假使追捕得太喫緊，他們就不見了，再也聽不到他們的消息了。暗殺的案子也增加了，有些人公然地在「公民保護會」或「秩序維持會」的名義下來組織團體。要過安靜生活不願受騷擾的人，他和他的家屬，爲這些秘密團體強迫得對他們進貢，否則他們就不讓你安居。甚至如果他的某些「保護人」讓他安居時，或者還有別的秘密團體正是那些「保護人」所不能負責的，也出來恐嚇他只得與他們成立單獨的協定。

這樣被騷亂和出款的不僅是有錢的人，一些小工人和商人也得要出他們的收入的或賺的錢的一部分以避免不斷的迫害。這樣的人的數目在增加。「麻煩」(Trou le)是一美國的形容字。「你是不願有麻煩的，」嚇詐匪和平地，可是堅持地對他的主顧說。

新時代的人在這個祕密的妥協和私自的屈服的世界中生長起來。普通的人在這種麻煩都可能的世界中，很謹慎地選擇自己的路。一個人如果不是某一會社中的一員（或僕役）他就不敢生活。這是回到極古的狀況，這辦法，在中國盛行了幾千年，這也是在西西利和在南意

大利的狀況。但他是從十九世紀末自由和信任的日子退化下來了，這是反映人的日常快樂之收縮。

綁票不限於爲取贖而這樣做。世上永遠有一種撲滅不了的生意，就是爲賣淫而引誘和綜竊青年人的東西，這生意也增加起來。工人們被綁架了，對工廠中恐嚇工人的一類的事，變得更膽大和更不顧法律了。個人爭吵的時候，人們常訴之於暴力，尤其是復仇的罪在增加在一個快樂與信任日漸減少的時代，有精神的人處在被壓迫的情形下，不怕悲劇的了結自己。他們用自己的手來執行法律。他們開始搏鬬和殺人，但不一定都爲法律所追究。

剩餘下來的富人，時常出現的金融投機者，著名的政治領袖祕密世界的一時的「大王」，都僱用衞隊在身邊保護自己。這些衞隊使人回想到中世紀後半期意大利城市僱用的鏢漢，和日本貴族僱用的武士。這些人都重新出現，做有錢的美國人的私人衞士。經濟的危機以始以後，不久，紛若一羣必要的僕役，成爲那些財力上供給得起的人的普遍習慣。他們保護人的身體和家庭。他們補警察之不足。

衛士之從保護的職務過渡到恃強行兇，是不可免的。美國的重要的私運酒販是作俑的犯罪人，但這種榜樣也是傳染來的。侍從的人中間的喧鬧，在美國，德國和愛爾蘭首先出現。這些喧鬧首在街道上的小鬧，或者是在選舉的和其他集會中的衝突，或是屬於政治的集會和遊行問題的附帶爭論。一九三八年後，一個政治家若不是他知道他的人已在他周圍，和已配置在會議中的衝要地點，他是不敢在群衆之前講話的。他一定會穿着一件鐵馬甲或用別種方法保護他的身體之重要部份。這類的馬甲在我們的博物院內陳列着的有好幾百件。

「稍爲重要的」男人女人，或小孩在一九四〇年以後，沒有一個敢單人的沒有保護的出來走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婦女已獲得了很大的個人自由。一九一二年時，一個十幾歲的美麗女孩，可以背一個包，一個人走遍北歐諸國，或美國，完全平安，沒有人惹她。到了不安全時代，這些自由都不見了。婦女們沒有人護送連在城市以內都不敢行走。青年的人，弱者和溫和的人的舊日的普通自由不到二〇一四年恐怕沒有真正的恢復。如當時的小說所啓示的，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中葉，婦女方面對人類生活的一種社會的習慣，即是慣單獨行走的習慣都還殘存着

在一九四五年以後紀載中又有一種新的不安全出現了，人們常講到有些路旁旅館的不安全，那些「出事情的」使人失踪的和生人不宜去的地方（不僅街道而且整個的區域和鄉村）都增加了很多。這些傳染了罪惡的城區，有些過了七八十年才恢復了他們的名譽。危險的大旅館及其祕密的電梯，短巷，埋伏所，和出鬧事的私室，還是我們的有名小說家得意描寫的地方，並不因為事已過去而失去了興味。

二十世紀的警察的心理，這類題目曾被人做過很多的歷史研究。在二十世紀，警察和教員或醫生的服務之間沒有連繫，這在我們今日看來是必然的。這種連繫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初創辦警察的人看來，一定以為這是瘋狂的行為，他們認為警察是一種活動的隊伍，和組織，在看見鬧毆、小偷，或不體面的行為時，能插入而有所行動；此外，我們不應該將其他應做旁的出主意的事情。他將那「交給他」的人帶到看守所。他上面有警官，普通是屬於不同的一階級，還有一羣研究犯罪的專家，在警察機關內服務，他們很能處理大多數違背法律的那些犯罪的，那都是屬於普遍採用迅速交通，動力機器，和大量生產以前一時期的罪惡。這種警察用到二十世紀開始

時，工作得還不錯，除了在貧窮很盛的區域以外，也很是誠實，牠有一種維持自由，財產安全和社會秩序都維持在很高的水平線上，只是在管理道德或干涉政治的事插在他身上時，他才證明是不能勝任。

當「世界國家」這個較大的社會組織，開始遲笨地和辛苦地奮鬬，以求脫離傳統的形式時，我們又看見警察的任務，超過了警察的能力。牠退讓了，有人會問「何以這種警察組織不能與新的需要並進？何以那時統治的人們不能改變牠使之適應於對牠的新要求？」我們已指出回答的主要內容，正當根本改造世界警察，需要很迫切時，首先國際間的仇視變劇烈了，各國的祕密偵探都發達起來了；使任何國際的廣泛的處理這問題為不可能。其次，是生命總盡的犧牲在債權人那里，這又是以佔有為基礎的任何社會制度的必然結論。

以利潤為主的資本主義制度絕對不能約束他所招致的失業和牠所刺激的敵意。牠死守着牠的寶藏而停滯不前；他反對膨脹，牠反對加稅；牠在死亡時還在主張節約；牠將公共安寧所寄的學校都裁掉了；牠一方面限制工人的僱用，另一方面又限制對失業者的救濟；即在關於警

察的這個問題上，牠也想節省。牠說，我們對維持現有的警察實力經費還嫌不夠，怎樣能計畫新的警察呢？

這些警察的組織既然純是十九世紀的式樣，經費不充足，設備不完全，又四分五裂，屬於一國的或一地方的當局管理，規模小而方法陳舊，在許多時候，是腐敗不堪；另一方面牠所反對的那些破壞勢力却是社會發展之不規則的膨脹所宣洩出的魔怪一樣的勢力。警察對這種勢力之作戰是拚命的。何況在那一可悲的時代，除了這一種衝突外，還有其他種種的衝突。

警察的腐敗雖已顯著，有些地方，牠簡直是在犯罪。然大部分警察實力的普通意志似乎仍很健全。我們說的是大部分，並不是全體。警察組織的大部分雖在解體的過程中，還在維持秩序。他們仍繼續反對罪惡的傳統的戰爭，但他們的方法則很墮落了，和那時期的刑罰一樣，二者的墮落是同樣的理由。警察和檢查官都感覺反對他們的勢力比他們占優勢，他們是和地位優越的人在作戰。他們反對罪惡的戰爭變成了爭吵。這種戰爭發展得不像莊嚴的監督，而像一種從屬團體之間的衝突。他們工作的空氣是見證的人容易受恐嚇，地方人的同情很多時候是在反

對法律的人一方面這就使他們在求得和運用見證的時候不暇選擇。有許多例子（見威爾吏生的 Aubrey Wilkinson'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Police Frame-up, 19 1）證明警察有心製造見證，反對他們很有根據認爲是有罪的罪犯，而且是不躊躇的誣陷別人。威爾吏生宣稱在二十世紀之初有幾十萬做錯事的人爲「虛假的見證得着正當的定罪」而他們是不能用別的法子定罪的。

但是威爾吏生替警察辯護，當他說到他們在緊急時候墮落的另一方面時，就不攻自破。我們都曾驚悸地讀過中世紀使用肉刑的事，那些日子甚至有特殊的刑具如引張四肢的刑架，壓搾姆指的螺旋，夾棍等等粗暴刑具。但我們現時無可懷疑的是二十世紀的警察與他們力所不敵的勢力作戰時，確實恢復過很利害的肉刑，以處置他們信爲社會的危險的人。現在來詳說這個故事是困難而且有點醜惡，但有充足的事實顯出來告訴我們在那行爲墮落的時候，對於被捕的人不僅是偶然的打擊和處置的粗野，而是不斷的虐待他壓迫他欺負他，用眞實的刑具逼他，以便得到他的招供和得到陷他自己於罪的聲明。這樣的方法在當時是很流行的。

人類結社的種類很多，並且很雜亂。有些是流氓的組織，有些是爲顯明的犯罪目的而成立的團體，還有爲非法，維持安全和秩序而組織的保護團體，以及在一國之內的廣大組織如現爲捷克斯拉夫領土的德國諸省的國家主義的蘇克爾（Sokols），愛爾蘭的共和團體，美國的三K黨，印度中國和日本的無數的秘密結社，奪取了俄國的共產黨，攫去了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奪去德國的國家社會黨，他們都是在日益勇敢的規模中，力求實現大的，和革命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目的。然而引起這一切組織的過程在性質上沒有真正的不同。一切這些組織，在結構上說都是大的秘密會社的體系。他們有些是爲目前的特殊的嚇詐而結合，有些是尋求較大的滿足；他們的分別就在這裏。甚至當整個的團體關於牠的任務有明瞭的認識時，在某些地方牠容易墮落到單是首領的或脅迫的統治。社會之內這些大大小小的重新團結之所以發生都是由於表面上治理的，經濟上指導的和教育的制度之不善適應和缺乏活氣與合作所致。因爲人們沒有先見去保證制度的生長連續不斷於是有這些未思慮過的和常是病態的生長，表現愁苦和不滿足正在積累，需要一種更親密的，更有力和更有結果的人類團結的形式。

文明的人類社會，在十九世紀後半和二十世紀之初的分裂，是因為人們迫切需要在更積極的團結和統一中生活，這在表面上是難解，但都是實在的。牠為自己的新的凝聚力拉成碎片，不到有一完全的，滿意的和活潑的「世界國家」組織潛滋暗長起來的時候，這個分崩的機械和社會精力已重新集聚，是不可免的。這正如蛹中的幼蟲器官之崩裂是為了形成新蟲之全體一樣。

正在現代國家同志會自身，若就其許多支部說，最初亦屬於這一性質，牠是一切不同的技術家所組成的團體，他們認為，社會混亂如機械擴張時，職業會消滅，他們視為生活中有價值的東西亦會失散。他們用無比的世界範圍的合作力量，組成保護的和進攻的集團。他們的聯合成了一新世界。

世界海上生活之敗壞，不如陸上的騷亂傳播得那樣迅速和完全。這是因為海軍的餘威尚在的緣故。在上次歐洲戰爭快完時，因為海軍連續兵變，往昔海盜的活動又恢復了。即在那時，對

於船隻的警衛還相當周密，一隻反抗的船比起城市的黑暗街道來要容易對付得多。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一二艘船被強盜上船來搶掠，截留在非交通要道的海港中，但沒有一回行刼的人來得及將贓物運走的。一九三三年，中國的海軍已經瓦解，成爲幾船的冒險家，用無線電來對那瓜分了國家的幾個政府表示願效馳驅。但這些散失的軍艦在他們被日本人收買捕獲或擊沉以前所幹的惡作劇是很少的。

一隻坎拿大的郵船大西洋王號，在牠的最後一次休假日航行時，於一九三九年被一武裝團體在海上刼去。他們想將船上乘客扣留勒贖、他們宣稱，如果有人逼得他們太緊時，他們就將乘客殺完。然而由於美國海上和空中的實力——雖然他們的偷欠了好多個月，那時還算有效能——之聯合的進攻，盜賊的心腸軟下來了，他們不禁摒棄屈服了。

海盜沒有刼過九千噸以上的船隻過。海上秩序之能相當的維持，是由於特殊的條件。例如：由於當時發現還算很近的無線電交通。一直到四十年代造船業實際的停止，和世界航業無限地減縮以後，這個秩序還能維持着

新的種類的犯罪之在空中出現，是在第三次歐洲衝突以後，即在那時也不很利害。空中的領域是人們的活動十分簡單和能控制的領域有時候，飛機實是世界旅行中最安全以及最迅速的方法。陸上旅行實際停止以後的幾年，不常見的飛機仍在空中飛騰，飛過危險的城市和無人行走的大道，飛過鄉間別墅的廢址和耕種放棄了的平原，飛行的人那時會回想起舊日的紀律以及想起新秩序的將來。

飛機比以前少些，正如船隻比以前少些一樣，因為一般人對於企業都很消極，式樣的變化很少，然而天上如海上一樣，在本世紀的中葉以前，實際還未被捲入一般的社會崩潰之漩渦。飛機場的飛機的修理和燃料的需要，使這日漸減少的飛行家們團結在一起。空中的暴行即在最壞的階段，還是散漫和偶然的事件，最後是在空中和沿空中航線上，新秩序的使者才重新出現。

四　世界大戰後的戰爭方法之改變

在這個失敗時期之內，戰爭的科學與實際，既無適當的指導和統制的力量，牠的發展就依

照牠自己的荒謬的和可怕的邏輯進行，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時，軍事科學是一種妄自尊大和落後的學問。我們說過，軍政部已讓軍火工業把很大的武器放在他們的手中了，但他們的心理並沒有一種必要的改變，以適應於這個規模。一切陸戰司令（很少例外）還是依照十九世紀戰爭的陳舊傳統上，很笨拙地從事戰爭。他們還是想着前方的進攻，包抄，衝破敵人防線等等呆笨行爲。我們已盡可能地簡單說過，這種戰法的收成，實是可驚怖的。海軍部方面，或者受了技師的預先警告，是更爲謹慎，他們多半將鉅大價值的艦隊藏在有强固防禦的海港中，避免戰爭的慘禍，只讓牠們冒險地出來戰一兩次就罷了。又故意使牠不讓勝負決定，像爭論一樣地延長若干年，直到今日還未決定。潛艇，地雷，飛機，原始的「田克車」，殘暴戰爭意志的有組織的宣傳，瓦斯的試用，以及戰爭進行時許多老的司令之更換，這些多影響了陸上戰爭，但直到最後當一般的「士氣」崩潰引到休戰時止，職業的軍人還固執一種觀念，好像他們的自古以來爲人尊敬的職業的方法，自始至終，沒有發生什麼根本變化似的。

「這一切情形在凡爾賽和議以後就不同了。一種不穩的精神侵入了世界各國的軍政部和外交部。他們意識到一些大變化，並不因此種意識的遲早集累起來而不認爲重要。參戰過的青年軍官們的心中不能不回憶到那些開始的進攻，瓦斯的彌漫，坦克車的行動，尤其不能遺忘那些有實際能力和非軍人心理的暫時官佐之隨意的不客氣的評論。這些青年的軍官們後來自己也老了，他們當權的時候就不變地重複：「我們須與時代並進。」

如果老一代的人是十分保守，則後一代人便異常的趨新了。各國的軍政部都着急地找新奇的發明，秘密的新穎東西，和暗中的系統研究。到處，偵探和情報者的秘密報告爲軍火商所留心供給的，刺激這個發明慾。

大家認識了舊式戰爭實在是失敗於戰壕中的笨重的膨脹狀況。牠實在是一「完結戰爭的戰爭」—就是說舊式戰爭就這樣的完結了。新的戰法須得代替牠而且要很快的代替。外交部要求牠，他們沒有戰爭就不行。有國家就有戰爭。傳統的國家是反對外國人的組織，寄托在最後用武力解決的默認上。他們不能想像那種的情狀，因爲這就是設想他們自己的不存在。這世紀

的三十和四十年代，充滿了暗中的和怪可厭的研究以發現和擴展新式戰爭的方法。因爲不促進戰爭的另一條路，就是放棄國家主權，而人心在那時尚完全沒有作這樣準備。

一九一〇和一九五〇年之間，戰法上的改變，除了十二世紀至十六世紀之間的火藥的發明以外，是人類自從最早的野蠻的成羣交戰以來所發生的最大事情。無數年代以來，人類的主要的衝突都是「戰爭」人們結隊或步行或在馬上實行接觸，步兵是軍隊的傳統的骨幹（除匈奴人和蒙古人是不照規矩以外）騎兵是輔助的；重砲是用在進攻以前的「準備」。拉美斯(Rameses)，亞力山大(Alexander)，凱撒(Caesar)，拿破崙都是這樣地作戰。在戰爭的浪漫的年代中，戰鬥的光榮的勝利大體都是一樣的型式：首先用槍矛，大刀刺刀槌矛和如此等類的武器，集中在一地，實行大搏戰，猛擊，推進，擲射，衝擣，短兵相接，和毆打在一團，還有一陣如雨的矢或彈丸相助作戰這樣的戰爭延長數小時，結局或是一個暫停或是敗退，後來騎兵的追擊和屠殺。固然這個「公開的戰爭」和長期的圍城相間歇，後者比較是不大激烈的階段。搏鬪的主人一面拒絕戰爭，不衞生地蹲伏在挖好的洞穴中和蹲伏在城牆後面，以暗襲衝鋒和衝破圍攻的

企圖，來相互騰擾，一直到飢餓，瘟疫，因厭煩而紀律衰落，或是周圍的人口的激怒解圍。在戰爭中，非參戰者受了很多暫時的和偶然的騷擾之苦；有一些強奸與搶劫，破壞糧食的洗刦，強迫勞動和偵探搜索，這些大都是尋常犯罪的劇烈化。整個的破壞，如蒙古人之破壞美索波達米亞的灌溉，或英國的威廉皇帝之洗刦諾森伯里亞，在發生的時候都是一種政策而非戰爭手段。如果要像拜占庭（Byzantium）和波斯之間的戰爭在小亞細亞所造成的那種毀滅，戰爭必須進行幾十年。伊斯蘭（Islam）的侵入，最初因爲有宗教的宣傳而使人不快，但後來又是差別的徵稅引起人們的反感。羅馬的，匈奴的和蒙古人的遠征又將一時候的屬於一地方的各種傳染病傳播得很廣；但是古時戰爭對於人類命運的全部影響，不免爲從前制度下的民族主義的歷史家誇大得利害一點。戰爭比人口遷徙的重要小多了。農民的生活沒有變化，繼續而勞動，如大多數人類在農業開始以來所過的生活一樣。各種「世界的決定的戰爭」都是迂儒幻想中的高點，所謂偉大的「帝國事業」，是迂儒們當人們從農民的生活狀況長久摸索走向清醒的有秩序的生活方法的時候，用以此迷惑人心的宣傳。

但從拿破崙戰爭起，兵士開始影響和改變人民的經常生活的組織了，如徵兵制，徵付簽前的貨幣經濟賠款和捐稅，這些的破壞經濟行程，是從前未有過的事；反過來說，如我們所指出的，工業勢力的擴張，新聞事業和其他各種宣傳，在人羣中所起的影響，使人（軍事領域和普通的生活，這兒兵士不請而自來的。戰爭在我們祖先的時候像淺耕；後來變成地面以下一層的耕犂，像一個挖得日深的掘鑿器，能將地下的泉水推開和改道並準備廣大的山崩。

世界大戰時候的將軍們都好像是些無經驗的門外漢，管理着非他們的能力所能管理的龐大機器。從前的戰爭是沿着一直線一和平面的，後來突然變得從過作戰的軍隊和在他們的上面進行起來，誰也不能立 戰爭以外。一九一八年時已有人說過，新式戰爭是否擬人口的戰爭。以前的對非交戰人口的寬容都 消滅。人們這樣的說，有幾個甚至企圖詳細理解這話的意思。而此時全世界的軍 紳士們（許多紳佩帶着肩章，皮帶，飾扣，勳章，殘餘的武裝薪片，和屬於此類的昔時的美麗紀念物）正在最可敬地從事於究出新式戰爭的可能和方法。

勇敢，永久是軍事傳統中的好品質，這些人的勇敢是不可反的。他們在這整個時期內努力

使自己跑過發明的前面，駕馭機械工程和工程簡化學和化學家，戰事通信員和報紙編輯，生物學，醫藥，甚至金融，都爲的是努力保存着那個古代的戰爭觀念即爭鬪的主權國觀念，使其生活着。我們已說過，學校是忠誠地擁護牠們的；牠們又有軍事工業之贊助，或者也得到舊宗教的，和舊貴族和忠臣的稱許，不過不是同樣的熱心。牠們的活動是深深的愚蠢，但是牠們的成績的令人驚怖，我們三代人類的憂患和不快樂，都是受牠們的荒唐的性格之所賜。這些都是很近的事。

這一時期的軍事科學的書籍，是卷帙浩繁的，其中最是要言不繁的一本要算福勒—墨其(Fuller-Metsch)的二十世紀中的戰爭理想(The Ideas of the New Warfare in the Mi dle Twentieth C ntury 2001)。在這書中，作者對自己提出三個問題：「他們爲了什麽而戰爭？」「他們是怎樣戰爭？」——「在他們看來，怎樣才是戰爭的確定的結束呢？」

他所給的是一個總回答。似乎沒有一個人能夠全部把握新式戰爭之意義。每一個「專門家」帶着嚴肅的迂闊，假裝的謙虛，研究他自己一部份的學問，但是讓命運去將許多部門配合起來成一整體。但一九三五年，綜合的兵士，能模糊地想到的似乎是以下的意見：他認爲世界已

為一些政府或強國所分割，這些強國是威斯特伐里亞的條約（一六四二）所造出來的。一切的國家都是競爭的，牠們或消極地或積極地相互敵視：積極的敵視時期就是戰爭，恢復和準備的時期就是和平。戰爭是交戰國間休戰的停止，這個停止是由於不可調和的爭論或利益的衝突，那時候每一強國就想使敵人服從自己的意志。在二十世紀以前的時候，這個強人以服從自己意志的事，在政府和軍隊多少是當成自己的職業一樣。首先是一個國家開始進攻越過國境，向敵人的政府所在地前進。在幾次的行動和作戰以後，首都被攻下了，或者侵入者被擊敗，退到自己的國境，那時就多少依着勝利者的意志，來締結和平和簽字條約。國界依那個意志變更，殖民地開始轉讓，賠款也決定好了，勝利的國家擴張勢力，戰敗的國家俯首帖耳，沒有勝利的國家的人民感覺得很羞恥。直到十九世紀之末，這個公式是一直遵守的。

但在世界大戰的時候，情形便不同了，不僅是「前線」的消滅，和不參戰的人之日益捲入旋渦，而且還有別的事情發生。列強都失去了牠們的確定的面目。在此發生了一個細密的問題，即那一種政府才是負責的政府，能強迫戰敗者接受條件或屈服於勝利者所提的條件。比如，俄國

共產黨的新政府，對於專制政府的種種擔任能負責嗎？德國一切德國人都負克蘭伯和凱撒（德皇）的軍國主義時代的責任嗎？是君士坦丁的傀儡教皇，還是安哥拉的基瑪爾應當同意於土耳其瓦解的正當政府呢？再者，美國歡歡喜喜地參加了戰爭，以後對威爾遜總統的解決可表示不負責任，好像他並不是一個全權代表，這是一個大國應有的行動嗎？

關於戰爭的法規更起了些困難。假使前線被廢除了，假使可從空中對無武裝的人民擲炸彈，那麼，職業的兵士之槍殺義勇軍及毀壞他們的家庭的權利又怎樣了呢？這好像是一足球場的場內被看客侵入，將球踢來踢去，趕走裁判員，拒絕保存原來踢球兩方的比數。

軍事當局對於新時代的這些破壞之議，是畏縮不前的。他決定這些問題不是對他提出的。戰爭中永久是兩方面，以後也還是兩方面。爲牠們下定義，這是政治家的事。他相信他的一個強國「強加其意志」於別一強國之上的基本概念，但現在，除用舊的侵入和向首都進攻的方法外，還要用宣傳，封鎖，在前線的背後進攻，和一切最近的化學的和空中的機械等新方法，化學的與空中的機械，是爲了破壞敵方人口之士氣和壓迫對方政府投降的惡手段。最後必須對着戰

敗方面的都城來一個長驅直入，雖是戰爭快結束的時候也要這樣做一下。他拒絕考慮一個必然的問題，卽是敵人政府雖然不屈服，在崩潰，却沒有留下負責的承繼者。那時又將怎樣考慮在那種情形下怎樣辦的問題。這不是他的事情，戰爭多半會無定期的繼續

他也是不過問戰爭的財政方面的。新式戰爭的耗費和勝利者目的達到後所獲得的物質利益，二者之間得失是否相償的問題，他是不去估計的。在這方面他是過於客氣了。大家不應該期待他想每件事情。他的事情是爲他的國家盡可能的最好的和最熟練的準備戰爭，利用最新的發明，不顧耗費的多少。至於籌措軍費，和如何利用準備好了的戰爭，（或只部分地利用牠）還是他的政府的事。戰爭單單是戰爭自身，是他的任務的限度。

研究最近的改進，馬上引起現在是病態的進步的軍人的心，有可驚怖的發現。有些軍人一想到現在戰爭所能予人的禍害，確實是害怕起來。這在他們的演說和書籍中都透露出來的。但他們却繼續混下去。這一部分固由於他們有鐵石心腸的傳統，不願意氣沮喪，但主要原因則和已失去信仰的基督教牧師和主教仍守着教會一樣。因爲這是他們唯一的職業。在凡爾賽大會

以後整整三十年，軍隊中成千成萬的極聰明的人和專門家，航空的兵士，機器師的兵士，化學和醫藥的兵士及其他，他們的人數，比致力於解決當時更爲嚴重而且緊急的金融之謎的職員多得多，和有能力得多，他們爲將來犧牲於他們之手的人所默認，稱許，和不吝惜的捐助，正在耐煩地，技巧地，嫻熟地，定出可憎的新穎玩意使人類驚奇和受刑。

這些專門家中沒有一個似乎是超出平庸的，那是平庸的人——心理的和道德的——的時代。甚至在我們已經說過的認爲人所承認的限度之內，他們中間好像沒有人能把新式戰爭當作一整個的完全的行程定出來。祕密工作中的人們，得不到外面的批評，他們的策畫，自然不僅反對外國人而且也相互反對。居要津的大多數人們光是熱於升官發財，而不是善用心思的專家。結果是他們的許多計畫有一種互相阻撓的性質。

有一羣這類的專家，在英國正異常忙於我們稱爲機械戰爭的準備，英國人在大戰中是首先發明坦克車的，以後又是他們弄出許多壞事情來。他們是一種固執的人民。軍事當局採用牠得很遲，但以後就不肯捨棄牠了。當各方面都深刻感到節約的影響，感覺牠愈來愈刻薄的時候，

他們的軍政部在這部門中的花費是一點也不吝惜的。這是一切事情中最不感拮据的。這些軍事的「發明家」所生產的各種大小不同的好玩的陸上鐵甲車，從鐵甲機關槍車一直到極大的移動砲車，都是與爾得肖特 (Aldershot) 博物院的鉅大的戰爭廢物的廊下所陳列的最古怪的物件。牠們是和費歐海軍提督的同樣的石油無畏艦相媲美的。

在英國人關於下次大戰的夢裏面，似乎鋼鐵製造業勝利地普及於歐洲。由於某種的魔術（這想出來是太麻煩，）這些鐵甲的坦克車能逃脫兇惡的毒瓦斯，地雷和砲火，那時甚至有準備在水下而走的「坦克車」，有些坦克車甚至能浮起來。漢生 (Hansen) 甚至宣稱（見 The Last War Pr parations, XXIV, 1976) 他已找着（拋棄了）能天上飛和地下走的坦克車的計畫。許多這些圖樣是從未製造過的。牠只使人看見這為多數戰爭博物院中所無的陳列有點發笑而已。

英國的和法國的專家，接着是德國的，也辛苦地在研究戰鬭的飛機。英國人和德國人的成功最大，可以從極遠地方的空中放射的炸雷，也好像同時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所完成了。法國

人的心靈，雖有其固有的才智，但他們爲保守傾向所障礙，不願拆毀舊工廠來改建新的。想出最多的化學進攻的可能的是英國，美國和俄國的專家。德國之被解除武裝自然逼迫牠的軍事當局集中於研究，試驗，和準備一種不爲國外所知道的武器。俄國人之作相似的研究，是因爲牠在工業上比較的落後。德國人是在大戰中最初用瓦斯的，他們在很長久的時間都是戰爭瓦斯的先驅。但在大戰以後，美國對這種武器很注意，受了化學工業的影響，生物學的戰爭，即是傳染病症之散佈，也被廣泛地研究過。在德國與中歐洲的人在這事件中居領導地位。

在一九四〇年，中歐戰爭的以前以及在牠以後的諸年，分佈各種病菌已不單是一理論的可能。那時已有做得像自來水筆樣子的小藏蓄器的製造。只須將藏蓄器的蓋子取下，可溶的東西便暴露出來，以後就將牠投入蓄水池或流水中。此外還有玻璃彈可以從飛機，火車的窗戶等處擲出，落在水中就裂開。在奧爾得旭特的博物院裏，面這些東西都有樣本存在。一九三二年以後；醫師們和受訓練的助手之被招募在一起，依地方爲單位組織起來，是爲了對於受驚嚇的人打預防針；這事情在那時候進行得非常有勁。

但關於病菌之使用有一種躊躇：分佈牠是容易，限制牠的作用的領域就難。假使在戰爭時濫捕，俘虜（武裝的和非武裝的，）還佔領城市及土地，則散佈得有效力的瘟疫可以回到那散佈牠的人的身上。微生物戰爭甚至在研究牠的專門家看來，也是一極不可靠的方法，除非在失敗的時候想英勇地復仇的人民才使用牠。然而大家以爲最好還是將牠研究出來。除了日本人在一九三六年的努力鎮壓華北的甘肅和陝西時，放用鼠疫和傷風時症細菌，「以使不致進行極端的手段」外，牠的使用，官方從未允許過。歷史學院的研究告訴我們，負責列強被發覺有意使用的其牠的例，有的是由於部下的熱心但未經官長的允許，有的是由於宗教的狂熱信徒的活動，這些信徒在一九四五年以後的昏亂時期很多。至於使傳染黃熱病的蚊蟲能服印度的水土，在一九五〇年促成了該半島的人口的大大減少的事情，其原因還從未有人解釋過。一般人以爲這是偶然的。

所謂「瓦斯戰爭」就其方法與發明說來，和微生物戰爭極爲相似。牠的開始和完結在人類智慧或意志的歷史中已是告一段落的一章。牠確是最奇怪的一章，牠在那個時代的衣飾和

城市的建築上都發生了影響。牠的可怖與司法上的酷刑或殺人祭神的故事，可以並列。但牠的不人道則更顯著，因牠距我們的時代更近。牠和那些較舊的例子一樣使我們感覺人類皆有健全的常識的觀念，將他們的活動連結起來，牠告訴我們幾千的明白和積極的人，就各個說，無疑地是清醒的，在一個對於愛國的義務和榮譽的觀念見解都錯誤的雰圍中能合作產生一離奇的無效而又殘忍的結果。

從事於微生物戰爭這個業務的人民，整個說來，是非常的莊嚴勤奮和小心的人。假使他們今日以個人資格來周游世界，我們會看見他們都是體面的和氣的人聰明的人但是聯合起來，他們便是一羣危險的瘋子。有人估計，他們的同胞被他們弄得可怕的死亡，而慘的受苦或過苦惱生活的人約有一百萬。

為準備瓦斯戰爭用的那些致死的物質，今日的人們大都完全不知道。牠們在現時代從未製造，或在極稀有的時候被製造出來，為研究生理學之用，且在適當的管理之下。至於為分佈牠們而用的那些舊器械，現在是用以進行大規模的農業的和衛生的工作了。如用空中的進攻來

對付蝗蟲；在森林區域噴灑藥液以克服各種植物病症，定期的清洗和刺激我們的穀物生長，都是失敗時代的辦法，後來合理化了。

費白爾是一個加爾文派的樂觀主義者，他的學說認爲在一個一切世界中最瘋癲的世界，壞的也是有益於好的。他認爲這些大規模的方法是得力於戰爭時期猛進的發明能力的「刺激。」以後牠又指出，如果沒有戰爭的刺激，飛機在許多年來一定不會爲人用得這樣普遍。我們敢信他將他的經過無力以達到智慧的學說說得太過火一點，他實是蘭姆（Charles Lamb）的焚屋子發明燒猪肉的故事的現代化。牠有一點拉斯普丁主義（Rasputinism）的氣味，即是古代的邪說之復活，說人在得救之前須盡量的犯罪。

二〇三三和二〇三五年，清除老鼠的運動，都是照死斯戰爭進行的方法進行的，這運動把橫痃的疫症，即中世紀的恐怖，從世界上最後肅清。在二〇六〇年，有幾個地方允許了散佈「歡樂氣。」用吉祥氣來沖散下降的慧星放出的毒氣，在二〇八〇年亦將在讀者之前發生，會議室，工廠，游戲場，和其他要求特殊的明朗和活動的地方之實行養氣注入，以及在喜瑪拉耶山休息

谷的泰戈爾(Pandanath Tagure)的稱氣之使用，費伯爾也認爲是瓦斯戰爭的遺產之一部分。

爲戰爭目的製造的有惡氣味的物質，有一兩種現時是在我們工廠中利用，受有特殊的保護。其中有些物質的製出來是犯重罪的。這些有惡氣味的物質因成份極雜，在發明牠們時，每一種化學的可能都探索過了。他們中間很少的是氣體。許多是輕浮的液體，有些是很細的固體，這都是灑在敵人所佔的地位上的。革特魯得鄂克爾(Dr.Gertrude Worker)博士關於這個問題，有一篇論文，是對於一九三一年萬國議會聯合的徵求的應徵，關於那時既有的知識狀況作了一有用的概括論述。她和許多同事合著一本書新戰爭的性質將是怎樣？(What World be the Character of a New War? 歷史文件937,205)使我們對於當時軍事專家心中所想的能構成一種概念。她在書中有一張單子，列舉了眞在製造的毒氣材料，除了一個重要的例外以外，一切主要的種類都有了。這個調查是到一九三八年時止，那時候已考查過的全部領域後來雖有些改進，但沒有重要的發明。

一九四〇年以後，軍事的研究，也因爲財政的竭蹶而受了限制。在一九六〇年，爲瓦斯戰爭

能生產充足原料的工廠沒有幾個能夠開工了。

世界大戰中眞正試過的瓦斯，其中主要的是綠氣，和各種綠氣的化合物，綠養化炭，綠十字瓦斯（Chloropicrin），和其他。這些進攻肺部損壞肺臟的綠氣，早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在伊波勒斯（Ypres）一役即爲德人所使用，殺死了六千人。德人後來很快的禁止用牠了，因爲牠是如此刺激人，人能立刻地發現牠，並且能採用預防的手段。屬於這類的其他瓦斯，其作用不是這樣明顯。受了這些毒氣侵襲的人，立即咳嗽，以後當氣管枝和齒槽之破壞繼續時，他作嘔和呼吸窒塞，咳出血及肉臟來。他由吐痰而喪命，臉帶藍色，嘴唇青腫，上面還有血污的泡沫。假使他僥倖不死，他的肺受傷也很重，很容易得肺結核或類似的病症。這一組的瓦斯大都有牠們自己的特殊的徵象。比如有一種，牠曾進攻神經系，引起狂野的興奮和喊叫，恐怖，顫抖，和半身不遂。在世界大戰中有數千數萬人已死於綠十字瓦斯，有些專家並有計畫地要用這同樣惡毒的辦法去屠殺全體居民。一九四〇年五月波蘭之轟炸柏林，也用過綠十字瓦斯但不是使用得那樣充足。而在從德國放到華沙去的空中魚雷，力量是用得更集中些。一九三五年日本人在南京和中國人對

大阪進攻的報復時也都用過牠。

黃十字瓦斯，或芥子瓦斯的害人是陰險得多，也更殘忍和更殺人些。牠實在不是一種氣體而是一種輕散的液體。當牠冷時，牠能在地上鋪成一薄膜爲人所不覺，黏到靴子和衣服上，帶到各處。當牠慢慢地蒸發時，人們就覺得有牠了。那時人就感覺不舒服，可怕的疑心和害怕，以後就是咳嗽和嘔吐。牠使人十分可怖的和無希望的受苦。牠漸漸地殺死同牠接觸的每一種活的物質；牠使這種物質燃燒起泡，和腐爛掉。芥子瓦斯在空氣中有五百萬分之一就足以影響肺部。牠喫進皮膚，使眼發炎；牠使肌肉變成腐爛的肉糊。牠成了身體中的一慢性病症，使每一功能都衰弱，和妨礙呼吸。受到牠影響的人能否完全醫好，是一個疑問。牠的最高的効力，是使人如受刑一樣的痛苦和迅速的死亡。牠的最低的效果是延長的苦痛和短促了生命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七年華北戰爭和中國空中侵入日本所用的瓦斯多屬於這一種。而一九四六年從柏林的撤兵也是由於受了要使用黃十字彈的威嚇

這些彈，實際也投擲過，但或由於偶然，或由於波蘭人僱用的化學家之不服從，牠沒有發生

破壞的效果表面看這是和平主義的怠工幫助中歐戰爭之形式的完結。這是最顯著的一例。有五個化學工人被槍斃了，但關於審訊他們的紀錄却沒有留存下來。

鄂克爾博士又舉藍十字瓦斯一種，是和綠十字黃十字的兩類瓦斯相聯合而不相競爭的。這些物質主要起直接刺激神經的作用，其形式幾乎如觸不到的灰塵，牠們能侵入那時候人應用的毒氣罩，使人這樣疼痛，猛打噴嚏和噁心，失去自制力，因之會拿掉他的罩，暴露自己於綠的或黃的蒸氣的侵襲，牠們常是連着藍十字一道來的。

一切這些瓦斯已在世界大戰中廣試鋒鋩，在大戰完結後，仍加緊地祕密地爲人製造。過了近二十年的時間這些瓦斯的主要可能才被發現出來。有一種元質在當時曾引起很大的討論，卽是路易士原質（L wisite），爲芝加哥的路易士（Lewis）教授的發現，牠出來得太遲沒有趕上在一九一八年前使用，這是砒的化合物中之一。在一千萬分空氣中牠占一分卽足以使人失去行動力。牠是無嗅無味的，只當牠在你身上起了作用時你才知道中了牠。牠之起泡和芥子瓦斯一樣，而且產生一劇烈的病症，

其他戰爭的毒氣，緊接着這個發明而來，比牠還要利害：有立即殺人的溫和的毒氣，有殘忍而緩慢可使腦筋絕對腐壞的毒氣，有些能使人的肌肉搐成一堆，比那在一個時候很爲人所怕的瘟病還劇烈一百倍。在這些研究中，有一段關於殺死一羣羊的試驗的可怕的描寫「一切羊都屈服在瓦斯的威力之下，除掉三隻羊，他們對着圍牆衝去衝得腦漿迸裂。」爲幫助這些化學物品實踐鄂克爾博士所稱的「成羣的屠殺」的任務，於是關於燃燒的物質和高等炸藥，有一種旁系的研究，使其能毀滅和焚燒那躲避瓦斯進攻的處所；這是嚇壞的羣衆會跑去的地方。

鄂克爾博士的概括敍述並未包括科復愛特 (Kovet) 在一九三四年所發明的「永久的死」的瓦斯 (Ferm nent De th G s)。牠的成分還是一種祕密，牠的極複雜的配製是一重大的犯罪。這一化合物，雖非絕對永久，却分解得異常緩慢。牠自身既非瓦斯亦非毒質，牠是一種重的和磨得粗的粉，牠如樟腦一樣的揮發；當牠揮發時，牠和養氣化合構成一毒氣，如果在五千萬倍的空氣量所稀薄化，仍是有效力。牠的作用主要是屬於路易士原質一類。這第一次是在波德戰爭中用的，爲了要從德國切斷東普魯士的聯絡，波蘭的軍隊沿全部前線撤退了一哩至三

哩寬的地帶，滿灑着「永久的死」毒瓦斯，東普魯士就不能與德國交通了，牠成了一半島，只能由立陶宛或者由海路達到。雖然這種瓦斯的顆粒頗重，大風最後將這死的地帶擴爲十五哩寬，死的影響帶到了但澤的郊外。

這種殺人區域，以後再沒有人敢進去了，除了幾個有特殊毒氣罩的探險家。一直到一九六〇年，那時候人們看見在那里地上攤着的，不復是迷路進去了的人，牲畜和犬的屍身，而是幾百萬鼠鳥及此類的小動物的骨骼，皮膚和羽毛。有些地方牠們堆積得近一米突高。戰爭畫片對於這奇異的淤積物有兩張照片：蔬菜尚未完全毀滅，樹木已死掉，樹皮已脫，有些草是枯槁了，但另一些仍很茂盛，矮的和發育不全的蕁草和灰色細毛的土木香如地氈般的鋪在大塊的地域上。

「永久的死」瓦斯的一奇異的副產品是現在人所知道的斷絕生殖的吸氣。這在最初製出來時純是偶然的。一個中國的復仇協會在一九三五年日本人用綠十字瓦斯侵略入南京以後，於同年組織了一進攻大阪和東京的空中侵掠。這是想使日本人心恐怖。他們是準備用「永久的死」的瓦斯粉的，但因爲配製的匆忙和危險，中國人沒有試驗牠出來，在這里，或由於偶然

或由於設計，而將事情弄錯；似乎首先是化學的公式弄錯了，因此常空中侵入完結後，除了暫時的瘧疾伴着作嘔和瀉等以外，沒有別的結果。

日本對於這些可憐的飛行家不勝其嘲笑。只是在幾個月以後，西方的世界根據東京與大阪兩城市的醫生報告，知道了這兩個城市中完全沒有受孕的女人好幾個星期，來小貓小狗沒有出現過，母馬不再生駒，母牛亦不生犢，老鼠與小鼠都不見了。生殖的斷絕都是永久的。但是鳥類沒有受影響，其理，後來是克萊福——赫胥黎（raylor I.Hu.ley）弄明白麻雀增殖得極繁，母雞在這些無兒童的城市得意地咯咯亂叫。

中國的化學家在錯誤中發現了那稀有的稱爲帕布斯特（P.lst's）的 Kinet'g ns 的氣體，牠能影響生殖機能。生物學家現在都知道了此類氣體（主要是由帕布斯特及其助手的工作才知道的）在我們試驗園中許多異常的花和新的變相的獸都是由於使用牠的結果。但在帕布斯特采用其獨到的眼光研究這問題以前，人們只知道斷絕生殖的吸氣。二十一世紀四十年代肅清傳染的鼷鼠的運動，凡在能隔離人之進入的地方，都是大規模使用過這種瓦斯的。

而地在優生學中作重要的應用的日子或亦不在遠。

但是這毒氣在日本的經驗，比起殺死若干人，還要使全世界更爲震驚。日本的軍閥和歐洲的統治者是一樣的感情的，且一樣堅決地主張平民不僅應當爲他們的國家効死而且亦應當替他們的國家生育供戰爭用的新砲灰，愛國者在沒有知道中國的這種材料的供給甚是有限的時節，他們戰戰競競地活着。他們看見他們的臣民快斷種了。他們看見他們的勝利的時辰也就是絕滅的時辰。在戰爭進行得很猛烈的那幾年，世界上頗有人主張大規模應用這新的發現：那些提議中，有紀錄下來的 Hate Eugnics(歷史文件5752890)主張從空中應用牠於帕勒斯坦，阿拉伯，愛爾蘭，中國的全部，非洲的一部或全部。但人類幸而免於此浩劫，這是因爲斷絕生殖的吸氣之製出純是偶然的。牠是被偷偷地配合成的，合配牠的人後來尋不到適當的公式，就沒有定出來能受人的管理。等到再發現牠的時候，我們的瘋世界是已在空中獨裁的羈縻的人類的掌握中了。

新式的一切可厭的器械，應當如何集合起來運用以達到使別的交戰國絕對屈服的目的，

那時的人或者從沒有想到，或者在想到時，計畫是如此嚴守祕密的，現在和計畫的創作者一同死亡了。但是數百萬人已窒息了，城市中已充滿臭腐的死屍了，以後又怎樣呢？

或者，人們對這些事情的藝術的興趣太濃厚來不及作這種遼遠的考慮我們現時關於這瓦斯戰爭所能弄清楚的，也同牠的專家所想的一樣，就是認牠的單純殘酷的和苦刑的計畫而已。這些計畫似乎是無目的的肆意破壞，如像在洛安多——莫比（Loan o M bi）的人猿雜種中間某些小人猿所表現的事情一樣。

然而一些計畫中有些計畫是可驚地嫻熟，但是牠的嫻熟卻在到某一點，如果人們問「為了什麼？」牠就不知所對了。例如在托拤維——拉古恩（Tore lo Lagoon）的海軍戰爭博物院那裏，有為四個強國造的半打之數的攻掠潛艇，都是特別設計得為長距離的瓦斯戰爭的根據地的。牠們不攜帶槍砲和平常的戰鬥設備。牠們有無限的巡洋射程，在牠們裏面有五架至九架的飛機，裝有可長的瓦斯彈，中的一個帶有三十個長射程 空中炸雷以及一切必須的指導方向的器械瓦斯彈內有四種瓦斯的混合物但就性質與效率說則分別其[illegible]這些潛攻機之最小

的所攜的這種材料足夠八百方哩的領土之用。如果牠是完全成功，時牠能使那時的倫敦和紐約經過一些喧鬧，奔跑聲，和窒息變成滿城的怪樣子的死屍。這些船隻使倫敦可從日本東京，可從柏林進攻，他們廢止了世界上安全的最後的角落。

這半打闖大禍的怪物現在是在大博物院中並肩地陳列着，牠們的雙翼垂下來了，牠們已放棄了牠們的使命。失敗時代中有許多使人頭腦痛苦的仇恨與惡行的恐懼，牠們是這些夢魔中之唯一的不朽的見證。牠們就在那里。牠們是人造的——正如人在以前黑暗時期造過用刑的工具一樣。我們現時是過的快樂的和相互信任的生活，我們頂好適應該假使環境不同，和我們在技術上是一樣清醒的人，也能設計和造出這些東西。

這樣詳細的敍述中有些地方是有使人生惡感的。我們爲我們的目的已說得很夠了。歷史不應做成一個可怖的筵席。瓦斯戰爭從開始到完結，極痛苦地毀滅了那些應當是快樂勤勞的人，約在一百萬至一百二十六萬人左右。惡作劇已做得夠多了。他們受過苦，他們也已經過去了。

我們的故事的中心意思是說，自世界大戰的恐妄使軍人感覺羞辱並使他們加緊研究以來，戰

爭的方法與其說是計畫，毋寧是從產生於自己在自己的直接的[illegible]中的[illegible]。牠將可怕的和碰物的機器連續地發明出來，將人類的憐憫和痛苦傳播到寬和危險的地區上來，在種種事件的領域變得不能居住，使團結的人在有秩序的社會中的每一連結都鬆懈，但牠沒有採任何步驟去使戰爭打成一個決勝負的局面。對於這幾千從事秘密工作的專家，這些一可恨的有機智的愛國者，」如厄薩克．柏香蕭（Isaac Bratenshaw 1913—2003）所稱呼牠們的，對將來沒有計畫，不把世界看成一整體，繼續這里集聚一堆可怕的炸彈，那里集聚一堆可厭的病菌，又在那里集聚這種或那種離奇的殺人瓦斯。

當時沒有一概括的計畫，將這些罪惡的中心團結成一預先想好的整體，他們連從未討論帝國都不如，後者的軍事準備是被一種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明顯的和有意的計畫約束着的。在一九一四年，德國將俗的帝制確有一種計畫，想依照條頓族的理想改造世界文明，使其近代化；以條頓族為核心。這種計畫或者有胡鬧的成分，但牠是邏輯的和完全的。但在一九一四年以後，戰爭計畫從未恢復那種的完全；從未恢復到同樣的邏輯的基礎。在一九一四年以後的戰爭好

像失去頭腦似的。牠同那些日子的其他事情的進行一樣，只是惰性。但牠從不知道牠會到那步田地。

然而全世界的各處都安下了各不相關的地雷，假使牠們是同時爆炸，牠們所引起的大混亂，將是不堪設想的。牠們會毀滅人類，並不需要改變主要的條件，只須將一些決定的偶然事件重加安排，即足促成那個最後的大災難。

這種大災禍和無目的的殘忍將降臨的危險懸在一無組織和無保護的世界之上，有七十五年。這是某些歷史家所稱述的最大的不安全的時期，即是由一九三五到一九六五年的時期。怪事到處出現——例如南京，北京，大阪，柏林，華沙，這些事情是可怕得很，是以鼓舞和鍛鍊人類中的較好分子，去為實現那一切勢力所促進的世界和平而努力。幸而在「現代國家」的驕育的長時期中，人類傳統的兩種根本禍害相互是以中和。債權人的貪慾和軍火商的貪慾相互平衡起來當軍火發達得日漸價昂時，可能的購買者就變得日益貧窮，假使節約的運動使人類生活中的許多好事情，都遇到障礙無法進行，牠至少在最後也使人不熱心進行新式戰爭並對之

失去了信仰。化學軍火工業與和舊社會其他模範機關共一命運，即是社會的一切都在消滅，這就是私人利潤的資本主義之破產的結果。

五　世界的和平景象之消逝

我們已經指出，議會的民主主義，必定取消了公共事務中的眞實的領袖，而用一種奇怪典型的假領袖來代替。就是各種勢力相持所生出的一「偶像，」他們什麼也做不出來，創造不出力量，應付不了危局，只有簡單用手段，以獲得地位的尊嚴，和較小的權力報酬。他們跟隨着沒落的制度一道崩潰，沒有方法努力阻止牠的沒落。眞的，他們又為什麼要努力呢？他們是人民意志的代表，假使沒有人民意志，他們能努力什麼呢

我們研究過，這可驚地無力的一羣人，面對着使人類經濟生活窒塞住的金融崩壞，他們的行為是些什麼。他們中間有沒有過一個人，曾用一個月的工夫來連續研究那個形勢的明白現實，眞是一個疑問。在這為凡爾賽的壞整理所創造而日漸積累的困難之前，這一為民主主義所

付託以指導人類事務的可憐蟲的精英，是無力又是難猜的謎，民主主義必然生出來這些可憐蟲，就是這一個民族主要的，不管這個制度，意思是甚好的意大利的和德國的東方疆界都有生潰膿的瘡，地，有人們主持治她們在遠東，日本和中國的衝突，當歐洲不去抗議的時候，明白變成了一形式的戰爭。每一件世界事，都比頭一件高聲要求集體的行動，但沒有集體的行動。國際聯盟任命了調查團對於無希望的形勢，常常作出十分可贊許的分析。

沒有人知道，怎樣能阻遏形勢的黯淡發展。各國的領袖，重複着傳統的姿勢，好像他們曾做的就只是這些事情。但歷史的型式，是不能再供他們運用了。他們已經發覺自己像那些企圖做手勢而肢體忽已變成雲霧和岩石的人們一樣了。

在那時的列強中，日本的行為是最決絕的。一九三一年該國國內發生了一大革命，政權落於愛鬥的軍閥之手。依照日本特有的傳統，他們在外交上是一意的勵行的，憑着感情的缺乏真實的遠見，想對於十九世紀殖民時期的侵略的帝國主義，諷刺的模倣。而且這個統治集團的心理還是強烈地浪漫，整個地為那些民族稱霸光榮的思想所纏住。這些思想已經供基督教國家受

了重大的犧牲。他們的軍事是終會破裂的，他們的外交的野心，總以最好的歐洲先例做模範的。這些現在都「輪到了日本」了。

這些日本的帝國主義者，自己想像着他們在幹什麼，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使我們的歷史研究都很費力。但那時代任何一「強國」，一她的心裏想像着自己在幹什麼，這是一個普通的謎，這不過是一個特殊的例而已。自從日本的軍隊接連侵入中國的許多城市以來，已過了一百五十年了。今日我們的心理學家承認他們實在是不了解，何以同我們一樣的人竟担任去幹這種絕對是瘋狂的事情呢？為什麼這些很聰明的人的行為是那麼樣的呢？

我們的解釋是，不愉快的現實能被人心非常容易地抑壓住，而且這些人是生活在奇怪的而又自然的幻想之雰圍中，正如西方的銀行家，經濟專家，負責的政治家，不到崩潰真正到來時不會了解他們的財政的和金融的方法是明白地往完全的崩潰那條路上直衝的。所以這些日本的軍閥，不能看見他們的大陸冒險的必然的後果。他們不能看見他們鄉間的農民是窮得近於不能生存；城市的無產階級窮得身心都退化。他們不能估量在他們的一切工業城市中被驅

使的和流汗的人的喃喃低語的反叛聲；他們不能了解他們國內的聰明的和進步的智識分子的抗議。

甚至國外，牠的債分大跌，和本國經濟困難的嚴重也喚醒不了他們在幻想中的沉醉。日本在牠踏着西方的殘輪前進時，正迅速地再生產出西方的一切革命條件，他們 領袖把這一切都不放在心上。他們看得清楚的，中國是一個分裂的國家，中國正與極大的困難爭鬥以發現集體生存的新方法代替牠舊日的號稱的帝國主義，照國際把戲的一切規則，這是日本的機會到了。他們以爲正如大英帝國把印度赤裸地交給歐洲人搶掠，讓他們建設了不安定的無目的的英國人的印度帝國，所以現在命運正請日本人去試一下同樣光榮的機會，使日本獲得地統治大部份的或全部的亞洲。誰能說他們的帝國冒險會在那里完結或者牠是否有完結的日子呢？無限的權力與光榮的海市蜃樓在他們之面前開闢，正如自有世界以來牠開闢給一切帝國的建立者一樣。

他們的計算不顧及新式戰法，不顧及現代產業狀況，不顧及私人資本主義自滅的本質，不

顧俄國，不顧美國，不顧中國人口的數目上占優勢，傳統上的統一和精神上的倔强。他們和東普魯士的貴族和英國烏爾斯特（[illegible]）——牠是帝國主義者的巢穴——出來的將軍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那樣的想法那是一過時的自大狂，由這個自大狂引導到了殺死近三百萬的參戰者，中國的社會極端的解體，和日本帝制的最後崩潰。

凡欲知道鬪爭的詳細情形的人，可去研究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的侵略中國本部的專史；上海的試探，滿洲的佔領，傀儡國的建立，一九三三年進攻山海關以至深入關內，從北方侵入中國本部和長驅直入地進窺北平。這都依照一九一四年以前所實習的那種舊式戰爭的型式。中國人的軍備很可憐，現代的材料又缺乏；日本人不費多大的力就可達到他們的目的

戰爭在這早一個階段進行時，日內瓦的無力的國聯尚發出牠的抗議。在歷史文件中，我們找到了一本為調查團所準備的「李頓報告書」。但抵制這些訴寃的話的，有日本外交部的模稜的聲明，法國軍火工業及其報紙的援助，美國有勢力的一組的銀行和他們的報紙的暗中幫助。由於這些分裂，日本的軍閥完全有理由可不顧西方的批評。

一九三五年日軍佔領了北平與天津。他們在北平建立起第一傀儡帝國。但他們覺得維持這個國，特別是維持這些地方中心的南邊與西邊，是很困難的。滿洲，內蒙古和山西的土匪與叛軍猖獗已極，還不能佔據的揚子江流域，更統一在已改組的國民黨的領導之下作戰。無論在中國任何處或在滿洲，日本人無論進行步驟都不安全：一種嚴厲的經濟絕交和排日貨運動爲無所不在的恐怖主義所支持着，仍在繼續。國民黨是爲中國的大革命家孫中山所組織的一指導集團，牠有過種種變遷。牠曾與共產黨和各種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相似，同牠們一樣，牠在整個社會中維持一有自覺目的之核心，牠沒有重要的中心，沒有形式的領袖，牠是一件心中的東西——這就是牠的中心，發軍進行動所不能撲滅的，由於這個抵抗的緊張，牠變成強烈地的愛國而仇恨外人。

一九三六年，日本來華的軍隊散佈在滿洲的國境以及廣州等處有一百五十萬人。牠在廣州的是第三次的上陸，然而牠在中國統制，始終不出大砲射程和刺刀明晃晃發光的範圍之外。牠曾用黃十字彈大規模的轟炸南京兩次，在北平屈服之前轟炸過北平，和轟炸過武昌漢口，

有幾十萬人被屠殺了。但中國這個可憐的無脊椎動物般的巨體似乎能漠然忍受這些損失，這是別的組織更高的國家所不可能的。「中國復興會」在[illegible]報時，突然轟炸了大阪和東京，使世界震驚，且由於毒氣的混合錯誤，將這兩城市的生殖能力都斷絕了。

中國的這些空軍力量在牠們未出現以前是無人知道的。飛機是從瑞典經過俄國運了來，但幾乎西方的每個國家都私運軍火於中國人，不知來源的敵視飛機帶着不可踪跡的炸彈，出現在天空，機聲軋軋的渡海到日本。以後在一九三五年，一隻日本的運送船在渤海被擊沉了。一九三六年，三隻日本郵船在距港五十哩以內為不知來源的地雷所毀滅。中國的軍械在北方的是從蘇俄購入，在南方的是從英法殖民地購入。而日本的領袖的帝國野心愈擴大時，美國的幫助與同情愈益露骨。西方的輿論最初分為兩派：有的是對日本疑慮，有的願意見中國在資本主義基礎上恢復秩序和免於共產主義，但是當日本愈進展時，歐美的感情都回到同情於中國。澳洲和新西蘭在一九三七年向華盛頓政府提議共同對日，以強固英帝國間的聯繫。他們提議太平洋的一切歐化地域作相互的保障。有時候似乎西方各國都為日本的兇燄促進得全體團結

起來。但戰後協約國對於中歐所加的不可忘記的屈辱，還令人痛苦，以致這事不能成功。

日本在其尚未開始確定的征服中國時，已有很大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危機，最初的勝利，攻下北平的容易，和中國適當的軍隊沒有編成，已使島國漲滿了愛國的熱情與希望。戰爭得到了勝利的結果有三次，但每次又是重新爆發，正如從來沒有人能征服俄國到底的一樣，也沒有人能永遠完全征服中國。一個省份被征服，以後別的省份又出現，充滿了敵意。四川及南方各省對於國民黨的抵抗供給了不可耗竭的資源和援助。在那時候看來，似乎除非日本西進到了西藏，在中國永久不會有和平。

戰爭的疲勞降臨於日本了。農民只看見他們的兒子外出，都看不見他們還家，一般的商品之缺乏更加深了飢荒。一九三五年日本已有強烈的停戰鼓動，以後名古屋發生了幾次的罷工，死傷數百人。以後日本開始在國外瘋狂的傾銷存貨，取得現金，不僅購買軍火，而且也購買當時極為主要的輸入如澳洲的肉和美國及加拿大的穀麥。戰爭而國內的田畝荒蕪，飢荒到處，中國的生產力大部份消滅。日本的社會構造是很原始的，不能如德國人般的當世界戰爭中在經濟

上顯示奇蹟。日本的信用和債劵不絕下落，甚至認付一分四或一分五的利息也借不到外債。但我們還看不見戰爭完結的日子。

日本軍閥已愈走愈，欲罷不能了。他們後面受痛苦的人民復仇似的逼迫着，外面俄美及歐洲又正在戰場的周圍注視着，然而日本的軍閥依照他們的文化的最好的傳統，決意圖最後的一逞，以大軍侵入中國中原的湖北省。日本經過了巨大的準備，凡尚未被調集的壯丁也都調上了前線。這是一個「對中國心臟的打擊」。

他們計畫：從南京山東廣東三方面向湖北集中。日本的軍隊所以有這種分散的根據地之必要，是因爲要盡可能地徵發鄉村的物產。從廣東和山東都有鐵路存在，但牠們是很難保護，而且除牠們之外，也缺乏可通的路，於是當日本人在進掠湖北時，其全軍之三分之一不得不像長蛇一樣的從事於軍用道路之修築。他們能運來的重砲、和軍火比中國軍隊的也高明不了多少。此時中國軍的作戰是依仗他們背後的四川的全部財富和歐美的暗中同情。日本的三枝軍隊在武昌周圍連合作一鬆懈的環圍，有時候慢慢緊迫起來，不久便停止了。結果就是一個僵局，即

兩方都耗竭的僵局。無論在長江的上下游，這環是沒有完全閉鎖的。在一九三八年的全年，日本等着從在武昌週圍的長月形的戰壕接到好消息，但結果是徒然。七月間發生了瘟疫，日本的軍醫用盡了能　仍　能控制。所以自一九三九年初，他們便開始退到南京，運輸也破壞了，兵變也鬧起了，在他們四周的鄉下都起來反對他們。

那次退却的可怖情形，從不曾有人說得清楚日本的三枝軍隊最大的軍事實力為二百萬以上的人；但適宜於退却的人只一百萬或更少些飢荒對他們的打擊要比中國人對他們的游擊戰更為利害。耗竭的兵士們多有沿途倒下坐以待斃的。那時中國人願意刀下留情，但沒有食物。也只有死的一條路。在南京集合的殘餘部隊人數不過十萬；從交通線上向北或向南打回去的人則更少。這兩百萬人的其餘部分睡在蕪圻和蘄州的巨塚中，或 他們沉沒於河流之底，或者當他們落後和在中國共致單調的山上蒲伏行走時，躺在地下不能起來。在南京，疲倦的和氣沮的領袖們知道了日本和中國在戰爭。 跟和名古屋是在共產黨委員會的手裏。

有幾個星期，日本的軍隊屯駐在南京的西邊舊日的營寨中，以後軸就發生兵變槍殺軍官，

宣言擁護社會革命，與中國的×軍聯合，×軍是從杭州開來的，佔據了南京。

美國參加東方的戰爭，是由於牠供給潛艇與地雷等軍火於中國，日本抗議無效的結果。由於渤海方面日本運送船的被擊沉，對美國的這種抗議愈趨激烈結果美國的參戰使軍閥的日本軍心完全瓦解。

只是在最近，反對日本的海戰的完全歷史才被寫出，雖也是一累贅的和可議的歷史。每一件當時的紀載都是偽造過的，每一事件都是完全隱藏過或精細地粉飾過。現在是很明顯，不僅私家公司製造水雷和潛艇，但歐洲各國海軍都藉口節省經費，賣出一大部分十分新的和能用的潛艇等物，拆成零件賣給南美的中間商人。這些潛艇或者是整的或者是這樣拆成很容易裝成的零件的，運至秘魯和智利，再由那里渡太平洋運至菲利濱。菲利濱羣島是假獨立的，但是一九三七年羅斯福第二實際已將門羅主義的保護施之於他們，而日本從未有過必需的剩餘精力去對這一非正式的保護國挑戰。現在這些島對於日本的海外商業和交通變成討厭的進攻的根據地。

太平洋中的海軍形勢是很複雜的。在菲利濱之東有噴火山的拉德倫（Ladrones）羣島，其中最大的是關島，（Guam）爲凡爾賽條約讓給美國，且爲牠當着美國海軍的一部來治理。其餘諸島則委任於日本統治。依條約，日本是不能在那些委任統治島上建築防禦工程的，但當形勢嚴重時，他們不暇顧及此限制，至少就建立潛水艇根據地。當形勢嚴重時，在拉德倫，菲利濱和亞洲大陸之間水上和水下的情形變得更黑暗和更危險。美國艦隊威脅着集中在關島和菲利濱之間，保障後者的中立。日本人沿中國口岸巡視集中。營私的潛艇和曖昧的航船在暗中活動，他們偷運軍火和軍需。侵入日本交通中的弱點。

在水上面，一個潛艇和別的船一樣，可以懸起一面國旗，可以獲得其國籍所應得的保護，但水雷則不懸甚麽國旗；在水下面，一個潛艇或能認識其同國人的密碼記號，但是沒有辦法分出中立的和敵人的船隻。錯誤和假的錯誤是不可免的。兩隻美國潛艇在一九三六年不見了。以後幾隻日本潛艇又從拉德倫羣島不見。在中立的咖啡館發生的爭論，達到在深海中殺人的結果。美國海軍自己担負起保護的責任來，一九三七年時，非正式的海戰已在西太平洋上發展。

兩方都不忙着眞正宣戰。在美國，是因爲羅斯福第二的勇敢的試驗，使牠處在深刻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混亂中；而日本則是因爲正竭全力於執行「打擊中國心臟」的政策。但美國的許多保守勢力把太平洋戰爭看成一轉移公共注意和公共精力的救命圈。那時有一種鼓動，想重新兼併菲利濱。在日本失守武昌以後，公開的戰爭運動變成了不可制止。

後來那簡單的，破壞的和不決定的戰爭的詳情用不着我們在此細說。兩方的戰艦在西太平洋相遇，在兩日的砲轟和重大損失以後，就分開了。似乎日本方面的軍火告盡了，無可如何他們於煙幕彈之下，在黃昏後退却。美國人自稱得了勝利，因爲他們能到馬尼拉，而日本退到只能保護他們的水雷和潛艇，又因缺乏材料，不能重現出來。兩國國內的危機現時都在加深，他們的戰爭，就技術的意義說，是從未完結的。換言之，這兩強之間沒有最後的條約，因爲雙方實際上都崩潰了。牠們分開了。社會革命將這衝突掃出了舞台。

〔讀者當記得拜占庭和薩遜尼兩國間的戰爭蹂躪了小亞細亞三世紀，他們沒有達到完結，就被回教徒的海艇從歷史中揩去了〕。

日本的社會瓦解一旦開始，即不可收拾。人口的大羣是農民，他們受西方化的影響甚少，他們容易歸附那一共產主義中不進步的流派，如像在廣東，浙江，福建的他們的同類人所表示的。一小羣的西方化的智識階級，內部既有許多爭吵和學說的辯論，在大城市中爭顯得想將暴動的共產主義依照莫斯科的樣子走。現代的和建設的道路雖不是很有成效，軍閥墮落到成了土匪和地方的封建主義。舊貴族的後裔在這里或那里重新出現，他的侍衞的武士則成為秘密會黨的頭兒。

幾年的期間，全亞細亞從太平洋到波斯似乎退後到政治的和社會的混亂，退到糊口的耕種，貧窮和瘟疫。印度的大部分現在也同到野蠻主義，在那些地方，假使不是共產主義的精神和方法則是牠的術語和反抗，征服了廣大的羣衆，他們完全沒有受其他歐洲觀念的影響。牠是沒有任何五年計畫的共產主義或者就沒有想到計畫。牠是脫離一切文明外衣的野蠻的階級戰爭。牠殺高利的放款者，收稅吏覺得很有滋味似的。牠發展出奇怪的宗教的狂信，牠咒詛和拋棄衞生。印度的帝國權力沒有被推翻，牠寧是被剝奪了有效的威信和退後到非常的遠。王公們在

形式上都是「忠誠」的，雖然有些地方他們暗中使得了距離於他們的領域最近的「擾亂區域。」各地方和地方的冒險家臨時想出一種社會秩序，水平很低，繼續地，和更完全地不顧任何中央的權力。

六　西方的亞洲侵略之鬆懈

半現代化的歐洲帝國主義，在亞洲的領導作用逐漸衰退了。早在一九二九年時，農民共產主義之傳佈已引起了印度政府的大驚惶，因爲牠和正在中國得勢的農民運動相似。在米剌特（Meerut），有一羣英國的和印度的鼓動家被捕，他們在審訊之後，於一九三三年被判的罪異常重，這證明這些恐懼之嚴重和政府應付這個形勢之無知和笨拙。

大英帝國沒有像羅馬帝國那樣的沒落和滅亡，牠對殖民地的侵略只是由日漸鬆懈以至失去所有的殖民地。不幸牠在印度的侵略弛緩以前，在愛爾蘭牠還得短期實行高壓政策……

（拉文博士的原作遺失不全，因之本章甚爲簡略——著者）

七 「現代國家」和德國

人類歷史中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大戰及以後的經濟和社會的混亂的教訓，這麼容易被忘記？這些教訓在我們今日看來是再明白也沒有，何以世界上一些有思想的大國每個人都不來注意呢？英國的思想，法國的思想，美國的思想，德國的，俄國的，意大利的思想，在我們的回顧中似乎都在想改變成見和愚蠢的各種後果。為什麼沒有人繼續着威爾遜的向世界統一所做的基礎呢？何以在一九三二年之後，人們沒有精神去改造國際聯盟呢？我們知道那時候全世界正迫切需要某種集合權力以統一貨幣和經濟的生活，何以失敗時代延到這樣長呢？我們已說過幾個重要的原因，僱傭的輿論機關，反社會的鉅大的私人利益，傳統的沉重壓迫，學校教師的反動性，由經濟破壞引起的社會瓦解。但即使我們將這些惡勢力加在一起，也似乎不足解釋我們人類一般的智慧對於所處形勢以及很明瞭的元素何以這樣的盲目。

在這些促成失敗的條件之後，還有一種別的東西：即是各種建設的勢力中有一內在的弱

點，有一種根本的缺乏。世界之不能脫離牠的困難，是因爲牠對於脫離後要達到什麼，沒有確定的完全的觀念。不錯，世界上是有很多觀念的，而且是未免太多了。但這都是些混亂的和常是互相矛盾的觀念。一個正在沉沒的人要靠游泳救自己，必須先有用游泳能達到的固體東西。缺乏不是在精神上，也不是在物質方面，而是智慧的。拯救的意志和拯救的物質都是有的，但是沒有拯救的計畫。世界並沒有確定的目標。這目標還要世界自己去找。

我們假使研究那時一種極重要的模範的社會文化，即德國的社會文化之心理的和感情的表面，我們對於這點一定能更明瞭。法國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的，俄國的和西班牙語諸國的社會文化，實質上與德國文化是相似的，雖然詳說起來大有差異。牠們共同的地方，就是：牠們不能理解，現在如果沒有一個大規模的拯救，就簡直沒有拯救可說。牠們想各做各的，而且用相互排擠和競爭的手段來做那團結起來有很大困難的事情。這就是各人都感覺戰爭的威脅，經濟的極不安定，應付病態的金融狀況的沒有能力等等麻痺的影響，從這里產生一種「急躁」的心理，使每一行動都不準確和不合時宜。

假使我們理解那個在世界大戰前幾乎將全世界歐洲化了的進取的精力之耗竭，我們就能理解失敗時期何以那樣長久。我們須着重地指出對於世界社會繼續健康有根本重要的某種事實當世界急促地在想有人領導牠到統一的時候，歐洲却不能起領導的作用，因爲歐洲自身已深刻地陷於分裂了。世界戰爭只是世界繁榮第一時期內表層下面的緊張的炸裂。歐洲的人民在一九二〇年時佔全人類的四分之一，他們在兩世紀來已盡了探險，做科學試驗和傳播文明的作用。他們爲要恢復這作用，應當清除一種恆久的心理的病症，即仇恨的病症，但是這個病症在醫好之前，似乎要變得很尖銳，要走盡使牠的機體衰弱和破壞的路。

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雖然歐洲各國間的緊張每年都在增加，只是在一九四〇年戰爭才眞正爆發。那時候以前，歐洲的各處有十年都在「埋地雷」，但一想到這事實，雖然阻止住向戰爭的前進，却增加了牠到來時的猛烈。威爾遜總統的那個高明的處理，即波蘭走廊，波蘭的「出入海口」，是第一個爆發的地雷。但牠只是集累起來的許多爆響之一，這些爆響是準備炸毀那四壁已現裂痕的軟弱的國聯的。牠們也準備着炸毀不幸的凡爾賽和約的每一個遺跡和牠

的附屬的「解決」使牠不復成爲人事重新安排的阻礙。

歐洲那一大羣德語民族的心理，最足說明世界形勢。自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五〇年，歐洲的歷史是以德國的頭腦，德國的苦惱和牠在週圍民族中所引起的反響等事爲中心。牠是一個有異常的活力而又野蠻的頭腦。牠使人稱讚，妒忌和害怕。牠在物質科學中的成就是很偉大的，牠的工業組織的能力是無比的。牠在數學和心理學中是崇高的，但有和他們混在一起的猶太人的智慧補救牠，和盎格魯薩克遜人的頭腦比起來，牠的政治思想是缺乏伸縮性的，牠既無法國智慧之異常明晰的特性，又無意大利的勇敢西班牙和俄國的詩意。這些都是牠的顯著的短處。牠和驕傲得愚蠢的帝制，頑强的聯合在一起，再加上一種豈有此理的民族自大，這就成了牠和其他文化系統善意的合作之障礙。屬於牠政治版圖以內的非德意志人與牠同化的工作，牠也是做得大大的失敗。牠加强了法國的自衛的國家主義；牠的直率的在海上的挑戰，也將英國驚壞和激怒了。牠甚至喚起美國由惡感到了仇視。牠從未戰勝過俄國，但是在那大棺材中的革命前的俄國，也沒有什麼可贏的。（俄國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前，還沒有真正的民族意識；那時只有

杜思妥也夫斯基和沙皇。）不客氣的獨斷獨行，是德國孤立的主要因素，而且是牠在世界大戰中失敗的原因。

然而在戰敗以後，這個受傷了的德國心理，單只就牠所有的一種堅韌性和精神說，仍成為歐洲體系中的中心的現實和中心的麻煩問題。戰爭和失敗的災難不能變更一種事實，即是歐洲最有技能的，可敬的，聰明的一羣人說話和思想都是德國的，他們構成歐洲的脊骨。牠會鬧出什麼事情，將要鬧出什麼事情，應當是每一聰明的政治家最關心的主要問題。因為德國如果進行得好，一切事情都會進行好。但是並沒有政治家有足夠的聰明來考慮這些問題。德國從早就有一種驕傲和妄自尊大的表相。牠已竟清醒得多了，牠已竟拋掉明亮亮的帝王金冠了，牠已竟接受了軍事的失敗，牠甚至已經過了一層屈辱的階段！最初牠並不明顯地怨恨。新共和國在許多困難中，表現創造的勇敢，溫和，開始認識出世界政治之意義。

創造的，向前看的人以完全矜憫的態度來希望德國。「現在我們將看德國能做什麼？」他們說，「對德國要忍耐些。」全世界都責罵法國對德國之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這一大羣的

條頓人，假使對外是勇敢和寬大，對內有領導，那時候或可以担負起「現代國家」的任務，和其餘的清醒的但是新生了的世界合作。牠或者在改造工作中居於領導的地位，一九一八年或者是世界革新的開始的一年。

但事情沒有這樣地順利進行。世界還須分裂下去再經過六十年之久。在德國國內，領導的人是來得太遲了。斯特萊斯曼懂得他的教訓太遲而且死得太早。白魯寧爲興登堡的心理的衰敗所賣。而在德國人看來，外國外交部是些想戰爭和復仇的敵人。他們尋找朋友，但只看見了外交部。我們已經說過凡爾賽會議如何將德國視爲世界的唯一罪人，其餘的國家好像是受他欺凌的聖人。他們要使德國永久地衰弱，受約束和屈受辱。還沒有生出來的德國嬰孩們就要準備在生出後作戰爭的懺悔者。他們在一個不寬恕的世界的打擊之下，最初的呼吸就免不了氣喘。

德國的一切的好的努力如何受阻，猜疑的人如何將牠縛住，這是一很長和複雜的故事。最後；這些在世界大戰中打敗了的人，變得暴躁和瘋狂，像被窒息的生物之爲空氣而爭鬪一樣。我們現在只有用想像的工夫才能處在他們的地位。一切都是爲了絞殺中歐而做的事情。戰敗

國的青年而有能力的人不能參加重建已崩壞的世界的工作，這是保留給勝利者的新時代的人做的。他們只生活在受懲罰，勞動，担負重稅的雰圍中，不得參預推進文明的工作，直到老死。說他們會恢復繁榮或能做出大事，這是得罪人的話。

像這種受限制的生活，生活天然是痛苦的，很容易陷於墮落，消極或盲目的反抗。在歷史文件中有一本可驚的小說（Fabian, Erich Kästner 著，1932）很生動地描寫這個時期德國生活的個人方面。同樣生動和有活氣的另一本小說是一九三二年發拉達（Hans Fallada）著的小的人現在怎麼辦？（Kllner Mann, Wuas Nun?）

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心理的狀況，這種被束縛和壓抑的生活觀念，並不限於德語的民族。聰明的和有野心的印度，埃及或黑人的青年，任何隸屬，受阻礙和被限制的民族或階級，牠的聰明的青年——在這些日子或者包括我們人類三分之二的青年——都是過的同樣固定的卑賤和徒勞的困苦生活。但德國的青年還能回憶到過去了不久的有希望和尊榮的生活，而且憤怒和進取的精力之蓄積比別人的要多些。牠沒有劣等和奴顏婢膝的傳統。

不幸，沒有教師或領袖起來向他們指出，牠在以「現代世界國家」代替目前混亂的制度之工作中應該有的地位。霍亨索倫的政府和戰爭的困難，已成了他達到像英國人和美國人那樣的世界主義之障礙。他的新共和主義是皮面的和不徹底的，在學校中和大學中，還是舊軍閥時代的教員和領袖盤踞着，他們在活動而且含有惡意。輿論和一切教育的組織都立於革命之外，表示他們太急於恢復戰前的兇惡，而且也有恢復的本領。新德國的無用，成爲他們的教材，「這不是德國的，」他們堅持着。「回到德國的帝國主義，」他們說「再試一回。」對於新時代的精神，婦女們無論是母親和愛人，大都表示熱烈的憤怒。

一個銳敏的觀察者，那米爾(L. B. Namier)，指出說，受過戰爭苦痛的和戰敗了的國家在戰爭完結後十二至十五年的期間會重新回到兇猛的愛國主義，這幾乎是歷史的一個公例。他指出這正是那些沒有參加過戰爭的兒童們長大成人的時候，他們受到戰敗後的一切痛苦，對於敵人表示深刻的仇恨。這些兒童們在一九三三年時成了一國人口中有力的一層。

歐洲歷史正是在這個階級，發現了希特勒主義的興起。這是德國在痛苦中的重要的產物，

他是歷史中最不可相信的一個人物，他一定會使那些將他喚起的教師們和作家們驚異。我們可以根據歷史名人傳的3011部，從一百個不同的觀點專研究這一個人。這是一極平凡的人，缺少尊嚴，缺少可吸引人的性格。我們能聽見他的聲音，我們能聽見他的勸說，訓誨，企圖說道理，這是從許多將他的演說灌音出來的鋼片中可聽到的。牠是一個沙音和緊張的聲音，說得很暴躁但是不連貫。牠是一個有限的，庸俗的和不識字的人的聲音，鞭笞他自己得很兇猛地喊叫，威嚇，在窗邊揮他的拳頭，打毀在他周圍的家具，以逃出莫明其妙和失望。他的性格是完全簡單和誠實的，這或者是他的成功之祕密。他發洩的是德國的過於緊張，他是失去了自制的德國的聲音。

他攻擊外國人，猶太人，世界主義者，共產黨員，共和黨員，財產的所有者，和金融界的領袖，是一種沙聲音的公平無私，而對於那些莫明其妙的不快樂的人們，沒有事情有如攻擊別人那樣使他們感覺的。這不是他們的過失而是他們的苦惱，他們是被賣了。對於法泣達的問題「小的人，現在怎麼辦？」——他的回答是；「屠殺猶太人，驅逐外國人！武裝，加緊武裝！德國的樣子，絕對地德國的樣子！增加而且繁殖。」

我們須要記得他從未得到德國人投票的絕對多數。但是人民讓他取得了政權，和毀壞了他們的共和國，壓抑了公共的討論和破壞了他們的自由。他們沒有力量來抵抗他。他們的苦役的和失去希望的頭腦中，沒有剩下別的概念，因此對於他的叫喊的國家主義，他的勇猛的對共產黨和對想像的共產黨陰謀之進攻，他的反對猶太人，投機者和自由派的宣傳覺得有些道理。老朽的興登堡之信賴他的反叛共和國，對於這個冒險者的成功有無限的幫助。

希特勒之攫取了德國和將牠鬧倒車的功績，是模倣墨索里尼的先例。但在智慧上說，他比那個奇怪人物差得多。他採用了法西斯政府中的一切最壞的東西，但沒有墨索里尼那樣真正建設的努力或者幹練的勤奮。一件表示他的無知和軟弱的小事，就是他採用卍字做他的國社黨的標識。這個輕便的愚蠢的小記號是起源很古的，牠之為裝飾之用，是某種新石器時代文化（即混合人種的文化）的特色之一，早年的文明即發生於此種文化。在所謂諾爾特人或黑人中是很少有人知道牠的。牠完全不表示一「亞里安人」的文化，舊日的作家宣稱牠是太陽的象徵，但牠似乎除表示一種歡喜之外沒有別的意義。牠在國社黨迷離惝恍的頭腦中，代替了一種

思想。他們把牠看得無限的嚴肅，在他們的旗幟，衣服，宣言，他們所能做的無論什麽地方都戴着牠。正當他統治的鬬爭在進行時，當牠在歐洲復活時，愛森登（Arden Fessenden）稱之爲「蠢材的商標」。牠對於許多想像力不大行的人們確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

因此，有一個時候，德國在穿褐衫和佩卍字記號的青年的黑衛隊的騷擾之下，脫離了人類的智慧的共同幸福，這正是當牠的頗爲沉重的，耐勞的和忠誠的心靈應當對於人類應付世界問題的鬬爭作極有價值的貢獻的時候。牠的眞實的人才都被流放到美國，英國或瑞士去了，有的是在嘲笑，有的是在藏躲。牠在二十世紀統一人類的運動中失去牠應得的地位，正如牠在十八十九世紀世界歐洲化中失去了牠的地位一樣。在國內，國家社會主義力求以破壞來代建設，企圖以吹牛，教訓人，不容忍，蠻幹和強迫，來恢復牠昔日的科學的威信，和工業的效能。這是可憐而悲哀的階段，一個大國患了失心症。這期間，德國生活的故事是一種諠譁和不快樂的歷史，黨派的爭鬬和街市的衝突，示威和反示威，恫嚇的官吏之複雜的專橫，最後是指揮不善和不成功的戰爭將條頓民族的內在的好秩序的性情挫折了。秘密的罪惡和偷竊的不誠實不斷增加，這

是無希望所生的結果。德國在騷動和人民衝突中死傷的人和因政治關係有被暗殺的，在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之間約在三萬以上。這是最低的估計。

八　仇恨與殘忍

歷史的讀者如果不熟悉在「現代國家」降生以前是仇恨統治着人類羣與羣間的關係，他就幾乎不能理解約在一百年前的政治生活的特殊困難，他也不會了解那些日子所稱爲的教育和我們今日所發展的教育方法之間的重要差異。我們已經說過德國人和波蘭人間的爭端，主要點，但那只是一般狀況的顯著而且有歷史重要的一例。我們能把這樣的事說出五十件來。幾乎各處的人口都是浸透在羣與羣的仇恨中，量數之多與仇恨的頑强誠爲同時代的人類經驗所不能設想。

這些仇恨都起於同一的主要原因。兩羣或兩羣以上的人口，各有他自己的狹隘的和不易改變的文化；有不同的語言或習慣，人類爲了事務之規模的改變，有的被擠在一起，有的竟凌駕

在別一羣的上面，其結果，是成爲一種社會失心症。在缺乏一種共同的社會觀念時，文明化了的動機讓本能的敵視和斷續的衝動佔很大的勢力。

在有混合民族的地方也有這等仇恨，除了在巴斯克人(Basque)的國家威爾斯和拉伯蘭等地方以外，這些仇恨都很强烈的，在政治上很佔重要。在波希米亞的南部和東部，仇恨所統治的領域似乎是漫無界限。匈牙利人恨斯拉夫人；斯拉夫人恨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恨俄羅斯人。宗教的差異，牧師的惡作劇，甚至將種族的團結也破壞了。天主教的斯拉夫人恨正教的斯拉夫人，而馬其頓的正教的希臘人在自己中間幷希望也分成很多的派別。在蘇爾但統治的古代領域，經過波斯，經過印度，仇恨的範圍更擴大了。回教爲兩個古代的仇恨系統所分裂這些羣衆的仇恨竟至爲最聰明的人所難堪地接受，他們絕對破壞了政治家的各種政策，大家認仇恨是不能爲人所制服的。

仇恨之被智慧的消滅以及設法化除是最近的事。我們的祖先並沒有料到那是一可以醫治的心理疾病。他們不知道沒有仇恨可以過活，正如他們不知道使他們受苦的咳嗽和傷風以

及大多數的老朽疾病現象，都是可以避免的。

但我們如果想到，人們如何讓他們的生活爲可以療治的事物所破壞，一直到我們活着的記憶的時間之內，我們誠不能不感覺可驚。他們不僅對仇恨和妒忌沒有努力去消除，他們讓他們的可憐的神經衰弱，受人造的痛苦的無情迫害，沒有設法保護在二〇一〇年以前，他們住在喧囂不堪的城市中，沒法子去制裁討厭的聲音；眩眼的廣告，只是在「空中獨裁」以前的可憐的數十年才設法消失。這個還需要過一百多年，我們才看得見城市中和大道上，有充足的光明，能驅逐夜的黑暗和陰黑的天氣。在北方的氣候，二十世紀以前，人們生活在夜色的黑暗和慘淡的灰色的半光明（他們所稱的白日）之間，常常幾星期看不見可愛的太陽光。

在十九世紀之前，凡能了解字裏行間的意思的人，都明瞭人類是腐敗了。我們只能研究他們的房屋和城市的佈置及溝渠，他們的衞生設備，他們的狹隘的衣櫥，他們缺少適當的洗衣組織和缺乏毀壞垃圾物的器具，我們就明白，他們之不會永久的憎厭和作嘔，只是由於習慣了的關係，假如他們還咳嗽，吐痰，疼痛，盲聾和衰弱（與壞飲食和可厭的烹調有關）時而任其自然，

時而互相生氣，這都是絲毫不足怪的。

這樣的生活狀況，現在已竟都去掉，而且幾乎不着痕跡了。我們中間沒有幾個人知道幾百年以前，做一個人是和我們這樣不同。只是當我們的想像回到過去的時候，才理解那時人類的社會使人的鼻，眼，耳和靈魂感覺得不快極了。而且這是必然的，因爲身體和心靈對於這種生活方式只有抗議，但沒有很好的理解，他們的仇恨幾乎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發作。我們在史維夫特(Swift) 的格利浮游記 (Gulliver travels)(一七二六)中已聽見一個異常靈敏和聰明的人的喊聲，他發現了自己是監禁在十八世紀的生活中，既找不着出路，又不能仰藥而死。但是一個中世紀城市溝渠的氣味比起二十世紀的報紙的仇恨的氣味來，那簡直是不算什麼了。當時的報紙簡直不是什麼新聞紙而是一種毒質的補綴物，每日早晨大家吸收進猜疑和憤怒的新鮮的暗示，用不好的消息和惡意的閒談來滿足他的仇恨心。

我們知道仇恨是一種病態的，傳染的和可阻止的惡疾，這種惡疾是哺乳動物的腦子，尤其社會的哺乳動物的腦子極易於感受的。這是頭腦中的合理的監督之喪失，這是由於對腦的外

層，不斷的小刺激所引起。傳染可在成年以前或以後的任一階級發生，銳利的打擊可使腦子回復仇恨，最後可以完全變成恆久的對一切不滿。

仇恨漸漸在人類的頭腦裏生了根，牠似乎是牢不可拔的頑固了。患者常用最大的機智找發脾氣的機會，而在培養憤怒和尋求報復中得到最深的滿意。他有他所稱道的「正當的光榮」。他不贊許他的同胞們，不願他們快樂。我們今日的教育是預料到這病症的容易傳染性而設法避免牠的，但那時的輿論為了反動勢力的利益，正竭力幫牠傳播。我們現在無論是在心理的或身體的雰圍中，都勤於尋找清潔和空氣。我們同時候的人羣和何甲斯（Hogarth）或拉斐爾（Raphael）所畫的人羣相較；不僅穿得好，長得好，營養得好，身體練習得好，沒有穿破衣服和殘廢的人；而且也在於那種坦白的有興趣的面孔，代替了那些不快樂日子的，有城府的，疑忌的，和小心的虛偽的面孔。只是在我們明瞭了這種普遍的烏煙瘴氣之下，我們才能懂得人類的歷史。

現在，這個伸展於歐洲中心有七千萬頭腦的偉大的德國心靈，不能自動的治療；讓牠的病支配住牠。他不會承認他所受的痛苦不是別的，只是由於偉大的憤怒。他是一切人民中最不能

抱那些世界合作，「世界國家」等觀念的。這些觀念亦正找尋適當的形式和工具。牠比法國人由害怕所生的仇恨，更爲深刻。在這兩個對抗的國家，大同主義是不爲牠們所歡迎，特別是在德國。

三十年代的德國，仇恨的變動，很奇怪地受了不意識的愼重的傾向所影響，雖然德國在精神上是勇猛好戰的，牠的軍備還落在牠的鄰邦的後面。他的希特勒派在狂吠和威脅並反對波蘭而非反對法國。當形勢緊張得太利害時，牠就藉對共產黨，對和平主義者的動武和藉迫害那些代西方文明受過苦的猶太人來出氣。從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執政時起不信對猶太人是搶劫與屠殺，而且法的暴行，在德國猶太人生活中成爲一永久存在的危險。

費伯爾在他的「政治心理學的研究」中說及世界的「憎恨地圖」，這個地圖中憎恨的強度的着色差別很大。英語的許多國家（除掉愛爾蘭，從前是常青的惡毒島，現在是最快樂的夏季休養所）和西班牙語的社會比歐洲大陸諸國人民憎恨的感覺的强烈要輕得多。他的社會沒有那樣擁擠，他們沒有外來的尖銳的干涉，他們在內部有很多的地方可供移動仇恨的

傳染也不是那樣利害。二十年來，西班牙和西班牙的南美洲（在秘魯的協定以後）維持了一種比世界上任何地方之較為自由和創造的心理。西班牙的貢獻，從烏南穆諾（Una uno）和伽賽（Gasset）起，數起來有一張大人物名字的很長的單子，在「現代世界國家」之建立中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可以說，俄國從來不如西班牙那樣的有建設的心理。牠當時沒有那麼多的自由思想的和寫文章的人，牠沒有多餘的精力去講哲學，牠太歡喜說預言或者武斷，牠從前單有過的頭腦的紀律在牠的技術的努力中用盡了。但也不是一個什麼壞的國家，青年的俄羅斯是被教得學習仇恨，但恨那些溶解的敵人，即惡毒的帝國主義者，甚至在那些仇恨中也有一種幽默的諷刺，當某一期間，壞的帝國主義者在相當時期凋謝到成了一寓言中的喫人的巨人時，就連帶地取消俄國的極多的仇恨。仇恨除了在短期的興奮的時候以外，並不是俄國質素中固有的東西。

一九四〇年，很少人理解世界上主要的政治病症，和牠的貨幣病是兩樣的，這是一種風土病，更少的人，心裏有勇氣想到猛烈肅清和破壞那些已被傳染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利益是必要

的，假使我們要將這病連根的剷除。然而在這些時間中，沿中歐和東歐的糾紛的疆界而痛傷在潰膿了。易於燃燒的材料也在增加了。

在受麻煩較多的社會中，宣洩仇恨所最常見的方法是攻擊式的，含有暴力或能引起暴力的示威，進攻代議的機關，使館或領館；汚損旗幟，石像或其他象徵（在印度神聖地方，則殺戮神聖的或禁止的動物如母牛或猪）在咖啡店和餐館的吵鬧，毆擊，暗殺；在討厭的民族的集合中，擲放炸彈，和爆竹，或擲入法庭，宗教的建築和其他不適當的地方，使其爆發，向守衛開槍和越過國境。沿亞得里亞海岸，表面看來似乎有一種非常强的傾向，想對於成爲意大利特色的對石像和圖畫之尊敬，加以侮辱。

這是最近起源的事：在凡爾賽和議中，意大利的要求達爾馬希亞沿海岸的大部分的土地，未爲法國和英國協約國所滿足。這沿海岸線無論意大利，或英法都是無權利處分的，然而在引誘意大利加入戰爭的秘密協定中，英法曾允許過給牠，而後來英法對於這個約言，沒有遵守，這是意大利的愛國者，異常憤怒的。南斯拉夫人保有這個爲人所垂涎的地域，是很害怕武力兼併

的。關於這些爭論、兩方各執一詞。意大利方面的特出的理由是說威尼斯共和國曾統治過這個口岸，而羅馬是威尼斯的天然的繼承者，他們指出爭論區域內城市的公共建築，到處都有意大利建立者的符號，尤其是可令人注意的威尼斯的獅子，可以證明法西斯的幻想。原來是威尼斯的獅子做過窠或古羅馬的鷹投過影的地方，從哈得里安(Hadrian)在英國所築的城牆起，直到美索波達米亞，他們都有要求統治的權利。

這些理由，雖然英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和其他已被解放了的人民都不重視，但是直接受威脅的人們却氣憤得很，尤其引起了沿達爾馬希亞海岸的人們的憤怒和仇恨在那些青年的和易受刺激的斯拉夫人的眼中，那些雕刻的獅子和老鷹，古代的陳跡都失去了他們的藝術的美麗和歷史的價值；牠們現出一種驕傲的樣子，似乎神氣地在向南斯拉夫人挑戰，南斯拉夫人的回答是將這些雕刻塗污或弄壞。

一九三二年，在羅馬和貝爾格勒之間，爲這問題已有激烈的爭論。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新的糾紛又起來了，原來這兩次不僅是刮損和打破那些雕刻和壁畫，而是畫些東西在上面，畫

成使人異常輕視的樣子。暴行不限於壁上的動物，墨索里尼的照像和畫片也是常用鉛筆畫上小髭鬚或可怕的八字鬚，或塗成一個紅鼻子，和使他的那種有精神的人格變成和和劣的怪樣子。

這些惱怒的表現方式在一切人心激昂的區域常發生，在我們看來牠們似乎是瑣屑的，無力的，胡鬧的；但那時牠們却可以闖出大禍來的。

讀者試設想，在這些仇恨區域中，漸長成人的頑皮青年，他們的腦中如何思想，他們受不住種種束縛，在那里動怒，他們限制激怒，有一種想做生動的有表現的事情的衝動；他們深恨壓迫者，想嘲弄他，用可憐的陰謀反對他，或用更可憐的陰謀想侮辱他，他一定想到拿起梯子和盛顏色的盒子，乘巡邏的警察走開的時候將那可恨的物件塗去，因此獲得可憐的興奮和顫動的凱旋。那或者是一種糊塗頭腦的生活的可憐的得意的頂點；以後就是驚惶，衝突，逃遁，槍殺，受傷，坐監獄，挨鞭打和形式的懲罰、繼續抵抗的決心强烈化。那時候就不想別的事情，只想準備下次的暴行和下次的騷動。常常鬧到死傷的肉體，在人行道上縮成一堆，被人放在脚下踐踏，或遭槍殺，

以後就是那有天賦能力的頭腦在土中腐壞和分解，這就是那些幾十萬充滿了仇恨的頭腦的人的生活之下場。他們生存的命運是同那在污雨中盛開的花一樣。

奧托傑斯拍斯（Otto Jaspers）（2083——）最近出版了他的大著，殘忍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Cruelty 他是海德爾堡大學的傑斯拍斯教授的直系後裔，德文特（De Windt）的研究就是受這位教授的指導。德文特受他的 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Gegenwart 一書的影響是很深的。前一本書對於二十世紀的殘忍，研究得極詳細，讀起牠來實在可怕得很。幸而我們現時的人不把研究那時人類心理的黑暗行程，當做普通教育的必修科，這種黑暗行程使人受害和可怕的痛苦來宣洩自己的不可忍耐的心理變態。然而心理學家必須熟悉這一切事實；他沒有這些事實卽不能完全了解我們的複雜的心理，而因為有心的殘忍在我們今日的世界上好像都消滅了，如果要研究牠時，便只有世界戰爭和世界不景氣時期可怖的書籍，做主要材料的來源。我們可以使讀者知道一個大概，假使他有一點想像，他將能為自己把那些暗

示擴大，爲不可勝數的殘虐，苦刑和姿意凶暴的事情。

舊式的心理學家，想認人的性慾失去常態，卽表現爲殘忍。在普通術語中我們仍用一個舊字 Sadistic 以表示這種意思；但這種意見我們同時代的專家已覺得不甚正確了。殘忍離兩性的領域很遠，正如現在的人了解仇恨爲害怕和爭鬬的化合物，卽是一個戰慄的挑戰之强而化可以變成傳染的，所以大家認殘忍爲克服抵抗的努力，在挫折的感覺超過某個限度以後的自然發展。我們首先是企圖將某東西（普通是一活東西）屈服在我們的意志之下，但這些企圖在到眞實的或預料的倔强抵抗而不遂意的時候，就變成了殘忍。

這個解釋可使我們明白，在私人資本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之崩壞以及隨之而來的全世界的不安，失望和缺乏以後，何以有許多空前的殘忍。在一九〇〇年，如果有人從另一星球來拜訪時，他或者斷定他在歐洲或美國所遇見的人是和氣的，仁慈的和寬大的動物。在一九四〇年，他如果再來時，或者會決定這些動物是如魔鬼般的凶惡。然而這都是同樣的動物，不過是處在不同的環境中。

在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之間，有許多萬人自殺，他們都是聰明的男女，只因爲再不能忍受生活的可怕的卑賤和殘忍而出此。然在一九八〇年復興的世界的紀錄中，很少有提到對於人或獸的殘忍的。牠不是一天性的改變而是環境的改變。那幾百萬幾千萬屠殺過人和用酷刑的人都還活着，他們現在的行爲是十分合理和善良，他們的大多數已完全忘記了自己的過去。人類的生活中已有希望回來了。瘋狂的年代已經過去了。

九　最後的戰爭（一九四〇——一九五〇）

自從日本和美國干涉的可能消滅，和英國的精力日益專注於應付印度的混亂及南非洲的黑人暴動以來，歐洲是不可遏止地向戰爭前進了。大陸的各種仇恨的最後約束已竟沒有了。爭點簡單化了。

戰爭於一九四〇年終於來到。那引起歐洲戰爭的，是一個波蘭商人，卽波蘭的猶太人，他在旅行中當火車停在但澤時，十分不幸地鑲得不好的牙齒出了毛病；他的鑲牙因爲不合式，需要

將他的嘴張得很大，用兩隻手插進去把牠處理。由於尊重他的同車的乘客的關係，他當重新安置他的牙齒時，臉孔朝着窗子。他是一個有黑髭鬚的人，鼻子長而凸出，他做出的怪樣子，無意地使人人看見不喜歡。他不曾想到他的那雙笨手是從庇里尼斯山展開到西比利亞的戰爭的導火線。

最初的挑動物似乎是一個橘核或者是一小片胡桃。

恰巧一個青年的國社黨員，正立在外面的月台上，把這個不幸的人的面孔的怪樣子，看做是對於他的制服的仇視和揶揄。因爲這些青年有許多都是異常靈敏的，愛國的憤怒的火燄正在他的心中燃燒，他喚了三個同事的衛兵和兩個警察來，這些青年的英雄們像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一樣，很少有孤單的行動的，他們迅速而且神氣地上了火車，接着的是凶惡的爭吵；因爲這個得罪人的波蘭人懂得很少的德國話或全然不懂德國話，他就變得瞠目結舌了。然而有兩個同車的乘客出來幫助他，別人也捲入了漩渦，叫喊之後繼以相推與相打；國社黨人寡不敵衆，被推下火車了。

於是那個開始鬧這亂子的青年人氣急暴躁，又看見那個完全不可忍的波蘭猶太人，還在用他的手和臉在窗口做那使他不滿的手勢，就拿出手槍將他打死。別的利器也加入行動，這個雛形的爭亂，只在司機的人將火車開出了車站時才告完結。這事件在政治上弄複雜了，因為國社黨在但澤的月台上是沒有開槍的權利的。

這個可扼腕的事件自身，本不用爆發歐洲戰爭卽可解決。那時可以向那不死不活的國聯申訴，或者對那個木乃伊的海牙國際法庭也可通個電流使牠行動起來。無論那個機關，我們可以說，還完全能應付一個波蘭的牙醫，他實在是一個罪魁禍首，應當受緝捕，懲罰，和作為代歐洲受罪的羔羊。但那很需要直接有關的列强的一種好意，那時卻沒有行使出來。

八年以來，德國的人心不斷地被煽動得為走廊而作戰，德國的重整軍備，公開和秘密地已進行了好久。但法國和波蘭對於德國軍事的恢復，頗抱隱憂，兩國的軍事當局急於想在他們比德國還算强些的時候給德國一個打擊。危機似乎時時快來到，而每次的結果不過是證券交易所大震動一下。現在再也忍耐不下去了，緊張已到了極點，災禍的來到反能使擔子輕鬆，歐洲是

自由地將牠自己撕成碎片。

這種形勢在舊的好戰的世界是每一「武裝和平」的必然的最高點。在某一點時，就有一種不可抵抗的邏輯說，「現在在他們還未很強大時就施打擊。」一九一四年英國容易加入戰爭，就是這個極大力量的暗示使然。英國人那時急於要在那日漸生長的德國艦隊還未與他們的艦隊均等時打擊德國，這樣他們使一個不可忍受的形勢完結。他們說，這是德國人「自取之禍。」「寧可現在不要等到明天。」

現在又是德國由咎「自取，」波蘭就出來應付時機。各國軍政部都忙碌着調動人。巴黎，倫敦，和紐約的印刷機還在忙着印關於被殺害的商人各種錯誤記載時，波蘭和德國的空中艦隊已衝突起來了。波德的邊境也像鑲得不好的牙齒一樣，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五日星期五的下午一時顯然開始覺得不好過起來。星期六日下午三時，波蘭的長途飛行家科林夫斯基（Michal Korcnwosky）與三個敵對者作了光榮的戰鬪，以後機中起火，從空中墮落在但澤中擁擠的郎伽寨街上；市政府也連帶地燒了起來。

後來，就是波蘭從空中侵柏林，法國派兩百架飛機列隊在巴伐利亞和西普魯士之上示威飛翔，未遭抵抗。德國人似乎被這個立刻和無限的準備的炫耀所完全嚇住了，他們沒有想到法國人會這麼來的；但他們迅速決定，他們對於太佔優勢的法國空軍不迎戰，法國人又飛回去了。在波蘭德國疆界上的戰爭是繼續着。

巴黎的當局因為他們的世仇不抵抗，一時不知怎樣好，不知是應當失望還是應當放心。對德國如果得到空中的斷然的勝利，一定是極可滿意的和很能決定的，但這些飛機也要留在國內鎮壓那日漸增加的國內不滿。一個勝負不決的戰爭——在空中是永久可能的——會在國內產生嚴重的困難。

一九三三年，德國進行恢復軍備以來已有七年，全世界的外交中心在這時期內看着這個衝突漸漸走近了，不能設法阻止牠。現在，倫敦，華盛頓，瑪德里，和日內瓦突然忙得不亦樂乎，大使們和公使們的來來去去，忙得不堪。日內瓦說：「延緩些時罷」雖然已延緩了二十年。

「衝突就地解決，」這句時髦的話又出現了。牠不僅在中立國得到贊成，而且在巴黎和柏

林，也得到回響。實際上的一衝突就地解決一的意思，就是巴黎應毀棄牠對波蘭的條約義務，讓波蘭盡力在德國和俄國之間周旋，達到任何種的解決。因爲當時的俄國由於繼一般的緘默和紅軍的迅速動員，二者結合，幾乎立刻成爲發展的國際棋局中的一重要棋子。

巴黎很快想出最好的理由，不主張與柏林的衝突走極端，在新戰爭中第一個被殺的法國人已竟被殺了，他是在沿海的阿爾卜斯(Alps)被意大利的一個衛兵的子彈殺死的。

在星期日之夜，一月七日，當波蘭的飛機在柏林投擲毒氣彈時，意大利人也在對貝爾格勒(南斯拉夫首都——譯者)施同樣技倆。同時羅馬照會全體列强，說明意大利決定打擊的理由。似乎在星期五之晚和星期日上午之間，南斯拉夫的不敬又重新猛烈地復活。法西斯的探員們需要常常供給使人不平等的憤怒的材料，他們在做這工作時有點過火，變成一幕滑稽劇。星期六日，意大利的全體人口清早起來正在計畫一日的家用時，突有一可怕的消息驚動了他們：說是墨索里尼被人畫得眼睛和面孔都是紅紅的像吃醉了酒的樣子，威尼斯的獅子被人塗成狗頭猴子，而羅馬的鷹被人裝飾成可恥的怪樣了。能說會道和頭髮散亂的法西斯蒂靑年常是

眼中流淚地在每一街的角落抗議這一不可忍受的屈辱，並且主張戰爭。南斯拉夫對意大利的不公已經夠了，只是在以後幾年那些驚異的學生們追溯到這些暴行的來源時才理解那種不公是怎樣誇大以便作爲法西斯侵入南斯拉夫的理由。

一旦波蘭和意大利的軍隊已過了他們的國境，東歐的其他諸國並不等待有侮辱的事情發生，立刻開始軍事行動。凡爾賽的全部瘋癲的工作溶解於戰爭中，充滿了仇恨和害怕的人民無精打彩地進行瘋狂的戰爭，盲目的前進，誰也不能預見會產生什麼結果。就地解決衝突的理論，使法國和俄國立在戰爭之外足有兩個緊張的年頭。他們找出了一個「公式，」法國可不站在從前聯盟的位置而加入戰爭，但以俄國也制止自已不作任何反對這些聯盟的行動爲條件。而且，軍火的貿易也是「公平無私」地進行。這個公式用爲法國對聯盟者背信的理由本是很弱的，但牠阻止了德國的西部戰線在可悲的兩年內免於戰爭。意大利人之向法國疆界挑釁，是很難有理由解釋的，實際上也並不是解釋得開，而且也是靜默地不管的。法國的空中艦隊隔些時出來示一下威，愈激怒一切他的隣邦，但整個說來這還是約束戰爭的力量。這種示威使外國

人膽寒，並緩和了國內頭腦太熱的人們。

從這時期開始，人們對一九四〇年「地方化的」歐洲戰爭不像一九一四年參戰諸國的人口那樣熱誠。表現熱誠的只限於中等和上層階級的無經驗的青年，法西斯蒂的青年，國家社會黨，「公共學校的兒童」童子軍隊長一類的人。他們到處跑，喊叫着，急處在沉重的，憂鬱的，和擔心的雰圍中。沒有一國的人民是樂意拿武器的，普通的兵士都偷跑開，不斷「落伍」這些脫離的人難以懲罰，因為「脫逃的心理」很普遍，尤其在東歐的農民軍隊中，於是槍斃他們為不可能。波蘭的一旅人在洛茲附近加入戰爭時，只剩了三十九個軍官和五十七個兵士。

從這時開始「節省」與軍隊同時並進。在最初，戰爭的財政就很拮据。軍隊中一般的軍令都堅持「使用軍火須節省。」

然而真實的戰爭比起日本對中國的戰爭來，無論在機械和科學方面，都是在一更高的標準。軍事當局有公路，汽車，鐵路，車輪，電氣材料，各種的槍砲，和偉大的空中實力。在後方，化學和其他種的軍火工廠都是在好好地工作。步兵的戰爭，固然是沒有了，有的却是技術家們的鬪法。用

「永久的死」的毒氣將東普魯士立即從德國本部切斷，這個動作比東方的任何動作的技術標準都要高。牠在戰略上是愚蠢，但在技術上是很成功的。

對柏林的第一次進攻是用現代的技術和用同時代的最高度的軍事科學來計畫的，那是另一個「對心臟的打擊」而波蘭的總參謀部堅決地依賴牠的成功，正如德國人在一九一四年堅決依賴攻下巴黎的成功一樣。波蘭人很不幸，在準備這個進攻時，須要同許多「專家」商量，於是這計畫由法國，由捷克和瑞典的軍火製造者，由俄國，由國內的叛逆洩漏出去，柏林後來知道和了解這個計畫的大綱竟如華沙一樣的清楚。對柏林的毒氣猛攻實是可怕而且破壞得很利害；但汽車運輸軍隊，坦克車，機關槍等却被德國用有效的方法阻止，在距德國首都的六十哩的地方，這是在路上和田野中用一種聰明的體系，內有毒氣障壁——主要是路易士式的和藍十字的毒氣——電線地雷，新式的戰壕。一隊騎兵在柏林之北，卽在柏林與海之間的進攻在電線，毒氣和機關槍之間，潰敗了，死傷和被俘的約有四萬人。而且波蘭軍隊所戴的毒氣面罩，在製造上就有錯誤，有幾旅的人聽了別人的話，認他們是被賣了。波蘭的主力軍從沒有與德國軍

隊有過眞正的接觸，只是他們的飛機數量上的大優勢挽救了他們的失敗得免於崩潰。

波蘭軍隊的殘部集合起來，依照他們預先針對着這類失敗而準備的第二計畫擴張自己，在沿斯特丁和波希米亞的國界間的沿線築壕而守。每一夜在柏林和華沙之上都有空中戰爭。牠常是一種不決定的戰爭。波蘭的飛機在數量上佔優勢，但德國機器的效能更大些，並且會駕駛些，而波蘭人所有的新的空中魚雷比牠敵人的多得多，能跑到二百哩外的一個指定的地方投一個大炸彈然後安全地回來。

波希米亞和法國一樣，也動員了，但是沒有立刻加入戰爭。捷克斯拉夫的軍隊只留住在他們的國境的四邊的山內，或沿匈牙利的前線列陣，等待時局的變化與國也着急了，可是他守中立。

南方的戰爭在開始時意大利人很順利，數星期內牠的進行與波蘭的衝突未發生任何形式的聯繫。保加別亞，亞爾班尼亞和匈牙利也對南斯拉夫宣戰，意大利的空中實力「使天爲之黑，」在克魯希亞和在塞維亞的城市很少有逃掉立中的轟炸的。意大利的海軍艦隊開始去奪

取達爾瑪希亞的港口和島嶼。但意大利的軍隊之侵入斯拉風尼亞和克魯希亞的山中，並不是如預想的那樣的快。過了六個星期，他們才能打到紮格勒布（Zagreb）。

鄉間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不大適宜於使用毒氣或機械。牠那里沒有中央地點可供決定的打擊；而鄉間的人有山中戰爭的傳統。這些城市的人民是否被炸死，並不影響這些强壯的農民。他們從不應戰；他們從不成羣的暴露於敵人之前，但他們的子彈日夜地向着意大利營塞中飛去。他們有許多人在前線和他們的田野之間跑來跑去，他們的軍火是經羅馬尼亞輸入的，羅馬尼亞有一大隊紅軍在比塞拉比亞的疆界。牠自己的農民也不肯服從，立於鬪爭之外，態度不明的，危險的，和有一時候是有利的。匈牙利人過了南斯拉夫的國境，威脅貝爾格勒，但他們的實力則向着捷克斯拉夫，靜待事變之發展。

在那年終了時，戰爭有一個奇怪的停頓。蒲拉格，倫敦和巴黎瘋狂努力停止戰爭，暫時收了效果。侵入德國和南斯拉夫的軍隊留在敵人境內，但臨時創造出中立區，敵對行動停止了。他們最後的努力用磋商來停止戰爭，使這兩個衝突不致連接起來，有幾星期的期間，似乎是可能的。

德國和波蘭，在波蘭的進展停止後，關於是否繼續戰爭尚在猶疑莫決。意大利則希望在佔有達爾瑪希亞，不再進行爭戰。似乎文明的精神已快從幻想中覺醒過來了，開始問道、「為什麼在地球上對我們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英國的內閣認為這時機很適宜於在維維（Vevey）舉行一會議，「最後」修正凡爾賽條約。德夫・古柏爾（Duff-Cooper），霍爾・貝利夏（Hore Belisha），愛倫・威爾金生（Ellon-Wilkinson），和蘭多夫・邱吉爾的和平演說在全歐洲都有回聲，為美國的藍道而夫卡路索（Randolph Caruso），和科里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熱烈地贊助教皇，坎特布雷的大主教，一些小教派的教會，瑞士共和國的總統，和能幹而可敬的本尼士（Benes）總統都加入這個懺悔的合唱，法國在牠的一九三四——三五年的社會衝突以後，逐漸變成和平主義了，牠的能幹的代言人為路歇（Lcuchère）和夏凡（Chavanne）。我們又想起了福特和威爾遜的過去衝動。世界和平的概念又一次地在人的想像中一閃，以後可消滅了。這一次合唱的聲音比一九一六——一七年的要人要多些，唱得明白些，更一致些，然而並不見得更有效些。維維的會議延長

休戰到一九四一年的六月但牠什麼也不能解決。軍事當局過了一休息的時間就變急躁了。相互破壞的惡意既未消滅，戰爭又恢復了「不等上次戰爭的果實的分配。」

羅維失敗了，因爲「現代國家」的建設的概念在那里沒有人代表。那次會議又是各國外交家的集會，努力於尋求和平，然而在解決問題的時候，仍是那些主權國的陳舊觀念，必然會引導衝突之復活。他們一想起和平的觀念時，「勢力均衡」的幻想，就是與他們最相近的思想，這種均衡必然是年年，天天在那里搖動，無論普通人和聰明的人怎樣思想。專家現在願意要戰爭到底，軍火商人，和法國及斯坎突那維亞的輿論對於「德國人還不能打擊夠」「意大利人正有事於南斯拉夫」的意見是十分甘願同意的。

希望始終置身於衝突之外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已經驗到出口貿易的愉快的增加，看見參戰國欠他們的賬很有希望地增加了。泰因賽得造船公司又重新工作起來。鋼鐵和化學工業的股票價格都上騰，鋼鐵的工業像一種患癩瘡的和無牙齒的老虎一樣，只有氣力追逐那唯一的食品——喫人。牠早已不夢想到建造新郵船，或鐵橋，或鐵路，或鋼架的房屋，但牠還能造槍砲和

殺人。牠看不到很遠也不計算一下，是否人的身上最後還剩得有肉給他喫。唯一眞正要求和平的國家是捷克斯拉夫和奧國，牠們介在作戰的兩派的中間，在國境的四週都有可能的敵人。在維維所表現的人類求和平的意志還是一個顧忌太多和無效力的意志。

戰爭幾乎是在波蘭的烏克蘭同時恢復，那里的農民已起了暴動，顯然有蘇維埃的軍官指揮和軍火供給他們作戰，他們對波蘭的戰線作了一猛烈的和出其不意的進攻想使德國的土地脫離侵略者而得自由。德國人在休戰時期內正日夜地在研究如何使空中狀況平等。他們生產了新款而且迅速的飛機和一種特殊有效的機關槍，於是空中戰爭進行了幾星期，其猛烈是空前絕後的事。

德國人逐漸建立起一種優勢，能使他們用出他們的炸彈和毒氣。洛茨和華沙震動，無武裝的人民退出，而且波蘭的戰線也破裂了以便恢復與西里西亞的交通。以後衝突就擴大了，立陶宛顯然是得到了俄國的鼓勵攫取了牠的維里納的舊城市；奧國也做了德國和意大利的聯盟者加入兩方面的戰爭，將南方的和北方的戰爭連結了起來。德國宣布了他與奧國的合併。現在

其餘歐洲諸國都先後捲入了旋渦。匈牙利對東方的捷克斯拉夫不宣而戰，以「恢復牠應有的疆界」牠就牽動了羅馬尼亞的軍隊到沙場來反對牠。於是俄國也宣布牠不能維持牠與法蘭的諒解，對着這些事變，紅軍就向倫柏格(Lemberg)出動了。馬其頓已經是內鬨得不得了，這一鄉村反對那一鄉村。保加利亞加入了「南斯拉夫」聯盟進攻亞爾班尼(Albania)希臘攫取了羅的士(Rhodes)，這島一直在那時候是爲意大利所有的。

法國由此看見了牠舊日的安全政策，(使此國與國之間勢力平衡，同一近鄰的敵國背後的一國聯接起來的政策)工作達到了必然的結論。牠的商人和牠的人民很高與地藏在那堡壘築得無限高的國境之後，和英國人美國人共分販賣軍火的中立的利潤，但牠的條約義務也大擺脫不開了。在倫敦，華盛頓和日內瓦方面最後一次含糊地努力企圖避免大難失敗之後，法國於一九四三年對中歐的同盟國宣戰。

在表面上這次新戰爭與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相同。牠似乎是一推翻或承認凡爾賽條約的企圖。這次戰爭也有同樣一種將中歐包圍起來的神氣。但現在意大利和條頓族

的國家聯合在一起；比利時是在一種極端的工業困難中脫離了戰爭。英國是超然局外。法國既有舊日的聯盟者，還需幫助從走廊到黑海和巴爾幹，由法國外交部所辛苦組成的那些反德國的聯盟國家。牠是處於幫助人的地位，已不是如上次大戰一樣地被人幫助的地位了。

然而俄國是中歐諸國的一不可靠的聯盟者；牠並不是與牠們聯合起來行動；牠不過是贊助東部波蘭和比塞拉比亞的新蘇維埃共和國。紅軍就停頓在那里，擁護世界革命的舊日的熱誠在俄國人心中已消沈了。馬克思主義已俄國化得太利害，怕吸收太大的一羣西方的臨時信從者。克勒謨林宮只願將有關的斯拉夫蘇維埃團結起來就以為滿足而且願意休息了。日本中國和美國大陸立在漩渦之外，專注於處理他們自己的社會的困難問題。

一個膚淺的讀者或者會認這一切為我們已熟悉的主權國政治的棋子的重新排列。但實際上，衝突的各派勢力是深刻地不同。法國雖其內部有社會的困難，還是一十九世紀式的資本主義社會，有民主議會的形式，和不負責任的金融和工業。牠的青年除了受感情的愛國主義的教育以外，心理是無組織的。他的聯盟者是農民的國家，政府是帝制的或議會的形式，就是說此

牠更頑堅的。但是中歐諸國全是新的法西斯的型式，在結構上組織得更堅牢些，被一種自稱為一國精英的青年人的組織所支配。

這些法西斯蒂是强烈的國家主義的，除了這些基本重要的事實外，這些為自己所任命，有自己的紀律的精英份子的治理，是走向我們「現代國家」組織的一明確的步驟。這些形形色色的法西斯蒂，他們的使命就在破壞他們自己的國家，以後就自己歸於消滅，因為他們的頭腦是純粹淺薄和感情的頭腦，他們不能超出國家主義的傳統而團結起來。在他們和我們現代的教育和行政系統之間，沒有相接的連續關係。但在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中，任何地方都沒有像他們的東西發生，而他們之值得注意，正如俄國共產黨（不管牠的無產階級的公式）之值得注意一樣，因為牠們比起民主的機關來，雖是局部的，但却是眞正的進步。在那時的混亂情形中，那五個有組織的「青年的專一」——是中歐諸國的特點，也是支持我們現代社會的中堅勢力的雛形。個人之有紀律的參加人類政府的觀念，漸打入新時代的人的心中。

在沒有更好的東西出現以前，這觀念須佔據在這些奇怪的核心，如好排場的墨索里尼和

有歇斯的里病的希特勒的周圍，這是十分可怕的事。法西斯蒂是愛國主義的，因爲這是那時國家所呈的唯一形式。但這些初次的結晶在現時發生的戰爭慘劫中被擊碎和解消以後，這觀念仍存在那里，這個聯合的合作觀念願供較大的目的所指揮。在一切法西斯國家的青年已不再是那樣不負責任了。

這些新的戰爭，同上次的戰爭相比，不僅不是民主羣衆的戰爭，至少就中歐諸强說，就戰爭的範圍和性質說，也是空前的。我們已指出這新戰爭和舊戰爭之間的一些主要區別。這些不同點由於參戰諸國的疆界的交錯，而更加顯明了。當初次衝突發作時，在波蘭和德國之間確實有一「戰線」，但在一九四三年之後，就沒有了，沒有主要的目標，在普遍全歐的急旋風的毀滅中沒有中心的觀念。

波蘭人在未退回到波森去以前，想經過布蘭登堡佈置一「永久的死」的毒氣區域，但他們潰敗得太快，他們只來得及毒殺三個無關戰略重要的小地域。在一九四三年以後，戰爭變成主要的是空中的戰爭。在地中海有過一劇烈的海戰，企圖切斷北非洲和法國之間的增援和供

給。但對於法國大西洋的交通則很少騷擾。

那時候從無一空中的大戰如像特拉法加(Trafalgar)的海戰或厄克諾馬斯(Ecnomus)的戰爭一樣。立體的戰爭中並不曾有那些海峽，海灣，要隘，主要的路，可使弱些的力量能決定勝敗。實在，我們到今天，還不能確定，那一方面在空中是絕對占優勢。牠是使掠和復仇的戰爭，沒有擴大而堅決行動的企圖。德國一大隊步兵之侵入波森，是被毒氣和戰壕所阻止住了，而法國之侵入意大利沒有超過吐靈。

敵對的一方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完全耗竭，爲任何種勝利的唯一可能的路。受痛苦的人民又一次地被逼得進行「耗竭的戰爭」「凡是比敵人多支持半小時的人才是勝利者」這句話已譯成了歐洲各國的語言。當着任何軍事決定之不可能愈明顯時，人民對於社會制度的進攻也愈猛烈。糧食和森林被人有意的焚燒，堤防被搗毀，低下的地域爲洪水所淹，自來水和煤氣的供給也破壞了。飛行家也動身去找一堆羣衆來炸一下。牠變得和獵鼠的戰爭一樣的殘忍。

歐洲雖然有過十年的金融崩壞和工業的衰落，仍有一大堆機器的材料存在，到處工廠都

是强有力地保護着和聰明地喬裝着以防空中的攻擊。而且一切主要的參戰國都只開放一部份的國境，輸入原料，這時候他們的政府還能用捐稅形式從本國人手中壓搾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來償付這些輸入品。貨物只是在夜中通過國境。貨船是由引港的人引到不燃燈的海港。沒有編入正式軍隊的壯丁被迫須做挖掘工作，以造成避免炸彈的地窖，和重建抵制毒氣和爆炸物的房屋。這些工作很多是在夜間進行。凡違抗和規避的人，即剝奪他當日的糧食。卡勒脫(Eglon Callet)曾畫過一幅黯然的圖畫，稱為「最後的安全」，讀者或已見過牠的攝影一羣帶棘子的瘦弱的和穿襤褸衣服的法國人，在鞭笞之下在隧道中工作，前面有一個人已暈過去了，正在給他興奮劑；另一個人已救助無效而死掉了，沒有人管。

四十年代的戰爭中之交戰者或非交戰者的冒險的紀載，比起世界大戰中寫個人經驗的書籍之豐富來（至少就西方戰線說）是可驚的少。大的空中侵襲似乎是極可怕的，比起世界大戰時的空中侵襲要可怕得多。牠們開始時，就有警告的鳴砲聲，撳喇叭聲，汽笛聲，和自動車偵察隊的尖銳的警笛聲；以後就是成羣的瘋人到處亂跑，找尋最近的避難所和救助，各種尊榮的

樣子都沒有了，這些空中襲擊多數都是使身體極端的受苦，

我們關於那些痛楚的死亡已給了某些暗示。幾乎各處的逃難所的組織和毒氣罩都失去効力了。在許多地方簡直沒有眞正的這類的設備，只是假的面甲和假的防炸彈的建築，以緩和「早熟的」驚惶和「維持人民的士氣。」在那戰爭的幾年有幾家能支持的報紙，對於這些大的空中侵襲，都不敢登載甚麽，甚至在美國，如果將這些情形發表得詳細些時，被目爲「和平主義的反對募兵的宣傳。」

在空中侵襲之後從柏林寄出了一描寫的信，沒有日子，簽的名是「辛克萊，」最幹練的批評家，認這是小說家辛克萊路易士(Sinclair Lewis)所寫。其中的一段可以引出於下：

「我們走過 Unter den Linden 街又沿着 Singes Allee 前行，我們看見到處都躺着男人的，女人的，和兒童的身體，不是平勻地散開，而是很奇怪地集成很多堆，好像他們在最後的時候是在努力爬行以求獲得救助。這種在死的時候之企圖靠近某一個人，似乎是中這種毒氣而

死的特殊徵兆，心中一定想到什麼事情。個個人都是同樣地縮成一堆，口中都吐出血來。這氣味是可怕的，雖然這些人在二十四小時以前都活着的。身體也立卽腐壞了。進公園的那一扇門幾乎走不通了……」

由此我們對於一世紀半以前大城市內的和平人民如何死亡的情形可見一斑。

參加那最後一戰的眞正戰爭的個人，他們的回憶並不比非交戰的描寫更充實些。後來幾十年沒有人關於戰爭的情形想寫什麼，因爲已沒有什麼興趣了。軍隊中識字的人的比例數並沒有大戰中西方軍隊中的比數那樣高；對於發生的事情的興趣也減少，只有脫逃，憎厭，酗酒，强姦，搶刼，和惡毒的殘忍。這類事情在加多，這都不是人能留紀載的事情。全世界比起三十年以前已不及那時候的感覺靈敏了，假使全世界所受的痛苦比以前更多些，但因刺激已不像以前那樣尖銳。在一九一四——一五年，許多英國和德國的兵士每日都記日記，這表示兵士還有個性的感覺，還對於事變起反應，不是抑鬱的宿命主義，日記裏面時時閃出原始的歡欣或原始的憤

怒，而在四十年代軍隊中的心情却只有憤怒。

在歷史文件叢書中有一本是從武昌退却時被殺的一個日本軍官的日記。因為我們找不到與這同類的歐洲的材料，我們可在此引用牠，以表示人類最後一次戰爭中參戰的人是如何感想然而牠不是一很生動的文件。他是一個智識份子，一個社會黨員一個極信仰國聯的人，他的紀錄主要是用密碼文字對高級指揮官作敵視的批評。但在日記的後半，這些發表意見的話也沒有了。日記成了對於他所找到的飲食是什麼東西，他如何與感冒和痢疾鬬爭之零零碎碎的記載。他似乎有一連的人同他在一起，他記下了兩次他設法為他們找到了飲食；他記下了被殺的或遺失的人的名字。有一些數字或可為他的軍火減少的證據。當他被殺的時候他已飢餓得很利害。當他衰弱時他似乎感覺到他的頗複雜的密碼太難用，他首先改用壞日文，以後轉入明顯的日文。最後的一項雜記是一首未完的舊詩，可以譯成下面的話：

「櫻花在春天的陽光中開放了，

可愛的富士山的溫柔的婦人啊，

島國的家中可愛的東西呵，

難道我此後永不能與你們再見了嗎？」

是旁的事情，或者是死，阻止了他做完他的樸素的詩。他和他的一隊人多半是在近開封的地方被迫上刺死的。

關於這次戰爭有許多回憶，沒有一本能使人想到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戰爭時人們的那種奇怪精神：一九一四——一八年出發作戰的人都感覺得他們是從絕對安穩的家鄉和城市出發，在搶得一大宗財富以後，是會回到自己的家裏來，永久過快樂生活的。那時候的心情常是非常地勇取和柔和。至於在這一戰爭循環中的人們，則感覺他們沒有回家的時候，他們知道他們出去是到貧窮那里，也讓貧窮積極地統治着他們的家鄉。他們的戰爭不是一短期的征伐，而是在永久的移動。作過很多破壞的航空的人，他們的回憶錄是可驚的空洞。他們記下戰爭，但十分平淡無奇。例如：「炸死　兩個波蘭人」；「一個徼倖的逃脫了」；但他們似乎一點沒有想到他們所擲的炸彈在下面活人血肉上的效果。這些青年的人有許多活着，後來成了「現代國

家」的飛行家，在一九六九年以後服務於「海空管理部。」但雖然有些人也將他們戰時的經驗寫下來得還好，沒有人對於戰爭時期的歷史遺下任何有用的文件。

在一九四五年以後，衰竭的徵象更增加了。這類的失望已侵入人的靈魂中，甚至使他們自衛的精力也消失了。他們躺在茅屋中和床上挨餓，讓炸彈落在他們的周圍。但他們在嗅到毒氣時仍能驚慌地跑起來，沿街咳嗽，吐痰，一直衝到避難的地窖中。一九四二年以後，感冒帶有壓迫心理的特殊強度常常出現，在一九四五年又出了霍亂。這些疫症在當時雖然已很嚴重，但不過是那一準備降臨在分裂的人類中間的「徵生物侵略」之前哨，這些疫症好像是先來試探一下人類自衛的組織。

除了空中戰爭以外，英國和北歐的中立國所受的痛苦之尖銳，一如他們真在戰爭一樣。他們已輸送了軍火到歐洲，所得的只是收不回的債務。在最初，這類製造軍火的工作增加，頗引起經濟的興奮，但英國的輸出便降到不重要的地位；從前牠是世界上的債權者，因債務之不能收齊，以致對於牠的日漸減少，但仍然過多的人口之糧食供給，也無緣在海外購買。牠從前的衛生

已在一無情的節約的政府之下腐敗成了汚穢。那不快的氣候中的住屋已由擁擠變成不能居住的可怕情形。第一次霍亂的疫症發生時，英國不僅受飢荒的摧殘，而且國內的秩序也大亂，這種飢荒和擾亂只爲牠的極高機械化的軍隊和牠的人民守秩序和服從的强有力的習慣所制裁和壓迫。自十五世紀的黑死疫以來，英倫三島從未知有這樣的疫症過。他們以爲疫症的日子已永遠的過去了，然而那些霍亂只是以後十年接踵而來的更可怕的經驗之先驅，

抗議和兵變的精神在歐洲逐漸普遍了。從前促成世界大戰在一九一八年完結的有力因素，日漸變成失望的不服從，在新形式中重新出現。但因爲現在戰爭已不是步兵的事情，大羣的兵變如一九一七年以後破壞了法國的進攻，使俄國脫離了戰爭和引導德國最後崩潰的那些兵變，此時已沒有同樣的破壞效果。在惱人的軍紀下的和容易與「叛亂」宣傳接觸的人衆不是從前那樣的多了。力量已轉移到專門化的實力上——航空的人和戰爭的技術家他們能藉小炸彈，機關槍，和溫和的毒氣，「對付」和解散羣象的集會，「鎮壓叛亂」的區域，其神速是十八世紀後半期巷戰的革命家所夢想不到的。

甚至兵工廠中的雜工，也不像從前那樣有效力，因爲機器生產的效率增加，已驅逐了大羣比較不熟練的工人。依同樣的理由，暴動的和階級戰爭的共產主義之宣傳，雖然現在支配了十分之九的歐洲農民和工人的思想，在牠企圖將政權攫於已手的時候，却遇到了意外的障礙。牠不能重複俄國的社會革命，因爲新的情形完全不同。布爾雪維克之於成功只是因爲俄國的落後和缺乏一受過技術教育的社會層。中歐和西歐的平民的不靜和不服從，能夠生產而且確實生產了無限的消極抵抗，和地方的革命運動，但反對牠的是全體的飛行家，機師，技術家，科學家，工人，他們從赤俄知道了他們從黨政客所引導的無產階級能盼望到那一種的領導和計劃無論他們關於他們自已的政府有何種意見，——他們已在從新鮮的方面和聚精會神地思想這問題，——這些科學的和技術的工人們並不傾向民主的共產主義。

雖然如此，人類反對新式戰爭延長的抗議，自得到俄國來的組織人材的幫助後，一時候就採用了共產主義暴動的形式。一九四七年，在馬賽，聖曲田，巴黎，塞隆那，米蘭，那普爾士，漢堡，洛濟，和格勒斯哥都有暴動和兵變，組織起臨的蘇維埃來，延長的期限由一星期到一個月不等，形

勢很覺可怕。漢堡和格勒斯哥的蘇維埃組織得最好和支持得最長久，只在極大的流血以後才消滅。幾乎各國都有與此同性質的小事情。各國的負責政府——因害怕一普遍的社會暴動而在形式上停止了戰爭。然而這一體系的物質組織已破壞了，技術家的態度又不明，無產階級對着股票經紀人，戰爭製造者，銀行家，傳統的統治者階級復仇的威脅氣勢一天逼近一天。

過了三年的工夫，最後的一戰爭才完結。一九四七年的倫敦會議破裂了，在凡爾賽條約的原則上作成歐洲的安定的解決。但是政治家和外交家還是不會坦白和大度，對於這些人們保全顏面比保全生命更爲要緊，他們寧讓無目的的敵對行動在一九四八年又恢復起來。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季，在布拉格（Prague）本尼斯總統做成功了一件似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使戰爭完結了。原來他發明了一個術語，他不提議訂什麼條約而只提議「停止敵對行爲。」每一國家留他在所佔領的領土內，不再戰爭，專等一個不確定的和以後組織的會議解決，傷寒，霍亂，最後有斑點的瘧疾，經濟生活之不斷衰弱以及人類關係之新的發展終於使這一會議沒有開成。本尼斯的「休戰」成了永久的休戰，一直延長到今日。

一〇 微生物的侵略

因爲缺少詳細的描寫，人類最後的戰爭的歷史，太黯然無光了。這樣的情形，在關於疫症的紀載中更甚。同時，這些疫症也使戰爭的恢復不可能。日記，書信和描寫的文字都不時行了；那時候的人有勞的許多事情要做，腦中沒有剩餘的精力。微生物似乎也學外交部的榜樣，藉口於人類的混亂，尋找機會以恢復微生物早已失去的帝國。

微生物向人類的攻擊，並不待正式宣戰就全體動員。第一道的進攻部隊爲各種傷風時症和使人衰弱的瘧疾，都極其傳染性的蔓延，因爲在戰爭狀況之下所以不能消除。交戰國人民由於營養不足而精力耗竭，加以衛生事業之崩壞，於是更給這些傳染病以充分活動的範圍；這些病症殺死了數百萬人，並使偉大的人羣之已減少的活力更加減少。一般的活力之降低比其實的死亡率還要重要。霍亂和橫痃疫繼之而生，又過了五年，似乎最壞的疫症已過去了，然而又來了發疹瘧疾。

這個來歷不明的病症，從前是屬於被捕的狗頭猴的病，似乎突然變得能適應人的身體而生存；或者有某種中立的媒介，可供這類的微菌藏身，使牠們準備了對人類的進攻。或者是，以前的瘟疫已改變了人類血液中防禦的元素。我們現在對這些事還不清楚，因爲那時候的醫生或生物學家，都沒有閒暇來觀察，卽使他們有時間來觀察時，也沒有記下來，而且科學的出版物在任何地方都停止了出版。

這些病症首先出現於倫敦動物園的附近，以不可信的速度從那里傳播開。牠使人的面容和皮膚變色，猛烈的發寒熱，皮膚作痒，和心理異常苦惱，引起不可遏制的一種墮落的慾望，以後患者身體的精力於猛然暈倒時消滅，躺下來後卽死亡了。這些發疹瘧疾的傳染不僅可由水來散播，而且患者搔下來的幾乎不可見的痂皮也起傳遞作用。風水和失去理性的病者將此症帶到各處，約有一半的人類容易受其襲擊，就我們所知，凡容易受其襲擊的人終於染上了牠，而染上牠的人必都死去了。

由此，世界的不適，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和一九五六年六月之間的可怕的十八個月達到了

頂點。在後一個日子，造物以殘酷而惡毒的多瘡來搭救殘餘的人類。人們從未想出來過這瘡疾之有效的治療方法和有補益的緩和劑。牠播傳了全世界，但牠是怎樣消滅的卻和牠是怎樣來的同是一謎。現在的病理學家對於牠還是莫明其妙，牠也不再在殘餘的狗頭猴身上發生作用了。所以研究的人無法做任何的培植和任何的試驗，因爲沒有材料。牠來到了，牠盡力地破壞，最後牠似乎是自殺了，大約由於牠自己內部生產的東西的反作用。或者，如麥根王（Mackenson）所信的，眞正的病症，完全不是什麼發疹瘡疾而是由於人當時的身體虛弱容易傳染上牠，他想，那種特殊的虛弱在戰爭的四十年代不知不覺地已在全世界傳播開。眞實的瘟疫不是疾病而是已成的虛弱身體之收穫。

歷史與個人的記憶，有其相似之處，就是牠們都傾向於抹殺不愉快的經驗。最愚蠢的意見莫過於說一個快樂的國家就是沒有歷史的國家。反之，人類只是在眞正安定和繁榮的階段才留下充足的材料爲著述歷史之用。我們知道埃及豐足的幾世紀內之愉快的社會生活；我們知道亞述的偉大和武功；阿占他（Ajanta）和中亞細亞的宮庭生活畫，得供我們欣賞，但是軍事

失敗所留下的往往是一堆劫灰，而瘟疫的諸年却是歷史中的空白。關於倫敦的瘟疫（一六六五）笛福（Defoe）（一六五九——一七三一）曾寫過一篇很好的紀載，但我們必須警告不細心的讀者，這一敘述是事變之後一個智巧的作者所編造的，他並不真是一個目擊者。拉發耶爾（Raphael）所給的羅馬的瘟疫也是回憶性質。歷史上的大瘟疫大都在殺害了無數生命以後，不留踪影地離去了人間。歷史所關心的是社會的和經濟的善後在此克利奧（Clio 司歷史之女神）又變得浩繁了。她又注意到向她前進的事物，但是死了的就讓牠死了。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初極盛的繁榮時代留給我們的是汗牛充棟的書籍，但這些書籍關於人類比較可怕的經驗，只有傳說沒有真實的紀載。那個時候的小說書信日記回憶錄圖畫照片等等以百萬計。但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距今不過一百三十年，我們很難找到有一封信，圖畫書籍，或報紙足以使我們明瞭那兩年的情形，牠雖是我們人類所經過的最可怕的時期。當時所寫的為人認為有傳染的危險而毀滅了。以後，再讓新時代的笛福們和卡倫士（Stephen Crane）們去構思一幅新的圖畫罷。

揆布爾(Caule)，達士(Nath Dana)，波得科(Bordisco)和馬提尼(Martini)在小說中的描寫似十分正確，值得一讀，他們在鄉村和大小城市中宣佈變化快來到了，那時候的鄉村和城市中只有死的男男女女：未埋葬地躺着，爲飢餓的狗和孤寂的貓所嚼食。印度的虎和非洲的獅都跑到荒涼的大街上來，巴西是野豬食人的世界，死的人口滿佈於整個區域，而野豬則過度地繁殖。老鼠成羣結隊，以不慣的勇敢，威脅那些還未受傳染的人。

還有一種不可忽的恐怖，就是被傳染者的游蕩。沒有東西阻止得住他們留在床上或醫院中，沒有東西能禁止得住他們不進防疫的城市和房屋。這些要死的游蕩者成千成萬地被那些恐怖他們走近的人民所槍殺。那個可怕的必要，使我們今日驚心，使我們想起另一種自衛保護的行動之悲慘；這是在一九一二年，有一隻大汽船泰坦(Titanic)號與冰山相撞，有些人下了救生船，當正在溺死的男男女女用手攀援救生船的兩邊時，在船內的人爲避免一道沉沒的危險，竟痛擊這些攀援者的手背。在這樣的時候，在這樣拚命的困難之下，人們不再服從社會動物的衝動。那些抵抗傳染的人口——對於發疹瘧疾，或者是希望免疫，或者是必然死亡——對於在

其周圍的齷齪的患者，漸漸表示失望和仇恨。只是很少有醫藥的；軍事的；牧師的或警察的訓練的人似乎在抵禦那種災難，企圖維持一種秩序。許多人都在搶劫。就我們所能看到的見證看來，整個地說，婦女比男人的行爲要好些，但是那加入搶劫的幾個婦女也是可怕的。

這個夢魘來到了，以後又離開去了。

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月，被遺棄的城市中也有人行走了，他們打進空屋中去，回到拋棄了的故居，街上都鋪滿了白骨或穿好衣服的骷髏，他們還不能理解造物的憤怒業已過去，在他們的前面，還有生活。

發疹窒扶斯代替了瓦斯戰爭。牠將世界上的人口減少了一年。

一一 一九六〇年之歐洲

凡欲進一步了解歷史的人，當有詳細研究以下問題之必要，就是歐洲稱霸時期以內所建立的各種帝國和民族的國家之間的確定的疆界對立的文化和不同的傳統，任各地消失的過

程是怎樣的，自從這些界限泯滅之後，各處志士的努力和忠誠不再是分散的 這一些國家在一九三三年之存在，是一個空殼；在一九六六年牠們已沒有了，已經做一團崩壞了；牠們的種種形式都溶解和消滅了。

爲了一般的教育，我們可以不必注意在這世界崩潰中個人和偶然事件之間的複雜錯綜關係，正如我們忽視大戰中的詳細情形和拿破崙戰爭的詳細情形一樣。或者如吉朋(G.bbon)著作羅馬帝國之衰亡（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出版於一七七六年與一七八八年）時對於拜占庭的朝庭生活一千年都略過不提一樣。在今日，這種的歷史已成了作傳記的參考材料，這些傳記正是成那使我們消遣的舊的浪漫小說的地位而代之，因爲我們的想像已脫離了純粹的浪漫階段。我們現時所需要了解的則爲那些較大的勢力，牠們在人類的複雜反應的背後起着作用。

人類事務的急速進行，是不斷的增加，羅馬制度的衰落和二十世紀的私人資本主義的世界統治由衰落以至滅亡，二者間的主要分別就在於後者的崩潰來勢更猛和發展迅速得多。第

二個重要分別就在於有利害關係的羣衆，對於所發生的事情的了解要清楚得多。人類歷史中這兩次最大的衰落，主要原因是：貨幣的崩壞，崩壞的原因是由於金融和財產的法律及習慣之不顧全體人的幸福而任意發展；以及政治和教育的適應之遲緩，以至整個體系最後完全沒有了辦法。但以前崩壞的速度正和馬路上馬的步行一樣，是說話及書寫所能現及的範圍，那新崩壞的階段是使全球同時受影響，其所激起的反響和思想和羅馬的先例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所以我們所看見的只是懸絀的和簡略的比擬。自從耶穌紀元第二世紀之末的大瘟疫將已瘦弱的羅馬帝國弄得極疲憊以後，回到商業工業，藝術，禮儀當十三和十四世紀在城市重現，這種無腦筋的時代延長了近一千年之久。由德國一九一四年侵入比利時到二〇一〇年以後，在全中獨裁之下，普遍的物質的繁榮之回復只經過了一世紀

心理的過，實是由於這種理由，就可想見其不間斷的連續。牠一邊剛接觸到前提，另一邊就已達到了牠的結論。第一次的世界崩潰延長了許多時代，每一時代都忘記了牠前一時代的經驗，但是第二次世界崩潰較重要和較迅速的部份是一個壽命長的人都看得見的。在一九二

四到一九二八年那是比較豐富和安定的時代，那好似男女的青年時代。在一九六〇年的時候，那是中年的成熟末期。在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Hoover Jump)開始的時候，那好似兒童時代。在第一次國際警察——即空中與海上航路的警察——開始的日子，正是積極做事情的人們對於發生的事情視爲一個整個問題，那是可能的。至於在羅馬帝國時代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有沒有人了解却是一個疑問。

然而在這兩個例中，同樣是舊觀念被掃除，同樣是國界的消滅，同樣受了自古尊敬的傳統觀念的破壞，債務無法償付，也沒有宗教和敎育的組織，有特權的階級貧窮化，不法活動之復活，一切成見被肅清後的大清醒。二者都是破產的文明先消滅，爲激烈改造之前提。

我們現在試將在一九六〇年時候的世界作一橫斷的解剖，考察世界人口的主要部份的狀況以及在他們中間活動的力量。在以後的事變的光照之下，我們能理解，在本世紀的中葉一切狀況都在向着一點集合而前進。但這種事情當時是否明瞭，却是一個疑問。社會生理的基本力量所進行的目的，到處是同樣前進的特殊情形，則以地理的，種族的和傳統的環境而大有不

同，他們的目前的解釋更是十分歧異。

我們已觀察過歐洲稱霸時期的事變，是由於那時候政治和文化方面停滯，經濟方面卻異常澎漲，無節制及不規則的生長之結果。人類社會精力之無限的增加，一部分使牠減輕了人口增殖的負擔（據宗巴特說，在一八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歐洲人口雖有大規模的向國外移民，仍由一萬八千萬增至二萬四千萬）一部分是用於離奇誇大的戰爭，比較小的一部分則用於增進了個人生活，使其更加圓滿和改進。但我們已說過，在債權者的和法律的體系以內原有的保守的勢力立刻能抵抗和停止新鮮能力之宣洩。人類經驗中這是第二次金融的和財產的組織之不善適應的性質，使事業[illegible]；終致自陷於停頓。

十九世紀是繁榮時期，貨幣和信用組織，比較羅馬時代是許多方面都不同而且更為細密，但是其存在的歷史卻要是一樣的。牠的結果也是同樣的。最初是人們財富的巨大擴張和增加，以後就是破壞財富的賦稅，直到這里，歷史是重複自己，歐洲的體系，像牠以前的羅馬的體系一樣，由於猛烈的耗費牠的龐大的驟長的精力，最後使自己陷於貧窮。牠重複演着盲目的浪費的

故事，但科學供給牠以空前的便利牠很快用完牠所有的財富，在幾十年內不得已而負債。牠的耗費的最利害的時候是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五〇年之間。此後的速率要緩和些

新式戰爭若就其破壞說終於證明了牠的失敗。當牠企圖破壞時就自己先粉碎了。牠殺得並沒有如何能夠殺的那樣多。此所以今日還有讀者活着來讀這本歷史。在四十年歐洲大戰中（換言之，即純粹的軍事行動）所犧牲的人類，總共計算起來，不過一九一四——一八年戰場屠殺了的四分之一，然而這些戰爭是人類科學戰爭所達到的最高水平線。亞洲的紛擾是更破壞些，因爲更近於野蠻的水平線，但在那里，在真正的戰爭中死的人估計在九百萬以下。在這九百萬中間，幾乎五百萬是屬於一九三八年日本最後進攻中國之一段，這是在中國中部，最初形成僵局，後來日本軍隊在河口的西部與國民黨的義勇軍拚命死戰，以後日軍因不敵而退却。

人沒有達到他所預料的那些可怕的犧牲。他沒有能將戰爭提高到終極的機械的水平。在這兩個主要的鬬爭以後，政治的和社會的關係破壞的程度，實比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的紛亂要大得多；但戰爭是這種破壞的序幕，並非其原因。據預言家的推測，這種新式的戰爭，是科

學的屠殺人類，可以將人類殺完，但牠（戰爭）不知不覺間轉變成爲一堆大混亂；政治的崩壞，不能償付的債務，及債無人承募，機器被拆毀，暴動，游擊，和土匪的衝突，普遍的飢餓與大瘟疫。瓦斯戰爭和空中戰爭已從人類經驗之前而消逝；在驚恐，災荒，瘧疾等更原始的現實之前變成渺小。二十世紀中葉的最後勝利者是「發疹瘧疾」的微生物。世界人口由一九三〇年約二十萬萬降至一九六〇年時不及十萬萬，其主要原因爲疾病，飢餓，是經濟完全崩潰之結果。戰爭在幾次大屠殺中殺去幾百萬人以後，瘟疫繼續屠殺數萬萬，在那可怖的兩年中，牠的橫行是日以繼夜的。

茵荷夫（I. Hoff）已說過歐洲在緊接着戰爭的飢餓與瘟疫的五十年，已不能構成單個的歷史，而是那時候的歐洲一千萬的歷史。由凡爾賽和約所創造的各種政府在這幾個的時期內大部份還在法律上存在，但在貨幣停止以後，牠們已消逝，和無效能，在日常生活中不起任何的影響了。有些政府如英國的和法國的，將牠們的活動限於收稅的工作，一般的說是徒勞。牠們這樣過下去，最後使人想起希臘臘丁時期以前徵收貢稅的帝國。牠們偶而也管一下地方上的事

情，但大部份的時候是任其自然。假如有地方積極抵抗，牠們也只有不理或妥協。英國政府在一九五二年對於牠還能找着的那些持券人，似乎還在償付牠的各種積欠。歷史是記載得不明瞭，償付似乎是用一種沒有購買力的虛僞紙幣。其他的政府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其行政權力所及的地域，甚爲有限。比如羅馬在佐日諾瓦，佛羅稜斯，和地中海岸所畫的三角形範圍之內，統治是頗爲有效的而巴塞隆那和瑪德里在西班牙半島的大部分，力量足以維持秩序，除掉蘇維埃化的西班牙的里維那拉，葡萄牙和安達盧西亞。

美國情形亦頗與此相似。一旦破產的鐵路在那里不能行駛時，孤立更容易些，因爲城市之間的距離大些，而人民的地方自治的能力則更大。他們距離向西開拓之期還不到一世紀。鐵路在癱瘓之後就沒有恢復，遺合衆國的聯邦政府的權力減縮到了華盛頓，正如東羅馬帝國之縮小到了拜占庭，但華盛頓，沒有拜占庭那樣的活氣，在快到第二千年以前，旅行還未恢復之時，牠僅是歷史上的首都而已。德國之爲統一的國家由於有支持過波蘭戰爭；柏林被波蘭空中轟炸成爲廢址以後，迅速降爲一羣鄉村的地位。

這些破產的政治制度在數年內實際消滅，一般運輸與交通都迅速的乾涸，貨幣崩壞愈趨顯著，軍事組織自行墮落將維持社會秩序之責推到還存在的地方和省區的領導人的身上，這些人出來擔當大任，真是受寵若驚。在這非常的六年，歐洲以及全世界，城市及鄉村區域，都認識了此後的「過活」須得單靠自己了瘟疫只使他們更感此必要。市政機關盡他 的力組織衛生事業以抵抗傳染病，或者他們將處理事務之權交給臨時機關。當瘟疫消滅以後他們好像流落在奇異的島上的觸礁的船的水手，他們須重新組織他們的收縮的經濟生活他們為了新的需要用舊的權力，舊名的稱來稱呼新事物；這裏一個有力的領袖，會自稱為市長或公爵；那裏有一小羣堅決的人自稱為市議會或公民會。另一地方又是先進的術語流行，取得權力的是「工人蘇維埃」。實在後者極與公民會相似，主要的分別就是牠覺悟在新的社會階級。

在這個破壞的階段，各處的政治結構是為歧異，在真實的及合法的「治理」之間有明顯的矛盾。試經過德國南部，波蘭和法國北部，其盛行的印象是一種社會革命。蘇維埃很時髦，但牠們與最初俄國的地方蘇維埃之性質極不相同。我們能找到一個共產主義的區域模糊的稱自

己服從莫斯科，但在牠之旁可以使屬於從前的財產所有者和僱主統治的地域名義上，而且常常是實際上和首都的全國政府有往來。在理論上是敵對的兩種體系之間，是不容易休戰的，在有爭論發生時，例如欠稅，他們一定要派代表到惠斯敏斯德巴黎或羅馬，去請求權力；一如中古初期野蠻的酋長，有時請拜占庭，或羅馬裁判是非。地方的衝突或革命，是常常發生，他們在首都被認為只是地方的騷動和市政的整理。

在這失去連結的歐洲散處着舊的軍國主義的殘餘，零星的欠餉的軍隊，他們的武器已找不着新的代替，他們的軍火供給亦日漸減少，他們內部有以軍隊為職業的官吏和還未被解散或拒絕被解散的義勇軍，因為他們除在行伍之外，在別處找不着職業。這些人頗能操縱他們的軍官，因為他們很容易逃走。在有些地方，這些縮小的軍事實力，和首都及舊日的合法政府有接觸，執行或企圖執行舊政府的徵稅和類此的殘餘的職務，在別的地方，他們公開地成為土匪勢力，雖然有時有堂皇的名義。在六十年代之初，常有侵略的小戰爭，舊帝國和主權國重新出現了一下，以後又消滅，或者變成別的東西。在一九六〇年以後，甚至有假軍事的勢力擅徵捐稅，維持

秩序稱爲「現代國家」的實力。他們占據舊軍營和城市中的居屋，及一切便利。

在四十年代這些兵士們是初招募來的生手。以後的十年間，凡留在他們舊隊伍中的人都成了中等年紀的可怕的流氓，穿的是打補釘的舊制服。其中有些指揮官已控制了本地的飛行場，和本地的兵工廠，但軍人們到處失去技術工作者之同情，而這些技術工作者又是他們不可少的。他們墮落到十九世去了，最後得到了幾千做得很粗的子彈以充實他們的軍實時，也很喜歡。

人們在必須爲自己做事情的壓迫之下，於是自一世紀以來都交給中央政府做的事情，現在都開始自己做了。在大戰之中，以及在大戰以後緊張約一年的期間，法國有幾個地方的商會爲救濟輔幣之缺乏而創造了地方的代幣。現在實行這種辦法的多起來了。今日我們的博物院有幾十萬種這類臨時的歐洲的鉛幣，錫幣，鎳幣以及一切種類，如現金籌碼，和以噸計算的印刷的紙幣，在地方市場上有用，可以交房租與納本地捐稅，但在數十哩路之外就行不通。每個地方的銀行經理常與他的顧主合作，創辦一種臨時的地方信用制度；醫生們想法不經過內政部的

註冊而設立診所。大多數城市還有印刷所開着，在幾年的期間，各地方還有一些刊物，一星期或一月出版一次，紙張很粗而且不同，這就是殘餘的歐洲輿論。但牠們的國外消息，比謠言相差不了好多，一些大通信社都破產和滅亡了，電報組織則沒有聯絡好。

除在很少的幾個非常城市以外，以無線電散佈新聞的方法是完全絕滅了。接收機的製造完全被破壞。由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七〇年，「以太」除了幫助空中運輸以外，對其餘的事情是靜止的。在歷史叢書中有一篇長而有興趣的研究，講一九五〇年和一九八〇年之間的郵政，電報，電話之變遷。顯然，倫敦巴黎和羅馬之間的電話交通還是不停的，關於倫敦大地陷的消息，是一九六八年用電話打到瑪德里，再從那里用無線電話傳到不宜諾斯愛利斯的。但這一個復興，或與新的海空管理部有關。

在世界貿易崩潰之後，不僅無線電用具沒有了，而且很多種類的交通工具和器械之消滅也是非常迅速的。比如照像，幾乎是一下子在世界上被掃光了，自行車也變成稀有的代替；氣胎常越滲有壞東西一重做的「橡皮製的薄氣胎輪，電燈也慢慢熄去和消滅了，因爲缺乏做燈絲

用的適當材料。一切電氣材料亦退化，電車或者完全不開行，或者是回到用馬來曳引。

自世界大戰以來，日常生活的標準正在逐漸的降低，一件一件的東西都變得沒有了。無論在英國的或在法國的行省，平民的住屋從戰爭期內建築停止以後，都沒有恢復過來。只是在柏林和維也納，戰後建築一時曾頗爲活躍，所供給的住屋超過減縮的人口之需要以上。此外，歐洲人羣的家庭狀況比在大戰以前還要擁擠和齷齪，雖然牠們亦從未降至中國和印度城市那樣的汚穢和貧窮。淸潔之退化如此之遠，引起了一九三三年以後報紙的注意。報上常載有關於街道齷齪，路修得不好的怨言，以及將牠們和二十年以前的整齊潔淨作可惋惜的比較。

衣服也隨着住屋退化，裁縫一業，依人口中之每口計算，在近四十年的期間，其活動逐漸縮小。城市的人羣穿制服的日見衆多了（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他們不像舊日的那樣有光彩和歡喜。人們因缺乏新衣服致補過的舊衣服，襤褸的衣服日益普遍。靴子的供給也極有限了，在大戰爆發時，靴的大量生產已被徵調供給軍用，後來因爲金融的完全崩潰亦從未回到商業上來。但是舊式的鞋匠，以前好久在歐洲已被此種大量生產所打倒，因此在饑荒的五十年代，歐洲人

的着鞋問題是苦得很的。西班牙有最好的靴子。法國和英國只好改穿草鞋——由此生了凍瘡。靴鞋的製造在波希米亞的某一城市還在進行，現在是查不出來。次於西班牙的就是中歐在非業中占勢力。禿帽子在各處亦異常的缺乏。

世界上向來習慣了的生活中的一些小舒服，也有一普遍的衰落。除了幾個特惠的區域還在種煙草外，此外都不見了。香煙的大量生產業已死亡，那些抽煙的人改抽煙斗。眞正的茶葉變成一希罕的事情。糖也少了。由飲食不良和營養不足而得病的人，不斷地在增加着。

在世界大戰緊張進行中，大多數歐洲人已學到了製造權宜的代替物，現在他們在十年內，國內事情的管理將很困難。德國人已熟知製造代替物一類的事，在他們中間散佈有很多技術知識與能力。我們努力在這慘淡的幾年要使自己比其餘的世界能過比較近於舒服的生活。他們製出皮革的代替物，棉花代替物，咖啡與茶的代替物，煙草的代替物，金雞納霜與雅片的代替物，還有很長一個單子是其他醫藥的代替物。

另一極端，是缺乏機變的愛爾蘭人，在生產未回復以前，他們身受的痛苦是很大的。有一個

觀察者懷疑在一九五〇年與一九六〇年之間牠出產的布是否有百萬碼？他報告說，「他們生活在乳酪蕃薯，紅酒和政治的刺激之上。他們用草來織成袍子，常染上好玩的顏色，他們因此似過於誇耀他們的聰明；他們以燃燒泥炭，獸糞，和相反的熱罵來取暖。」這說起來是十分野蠻，然而正在這時期他們却建立了一個雅觀的教堂，雖然據最近一個歷史文件的報告看來，牠是並不堅固的，是建在杜柏林皇家科學院的舊址之上，這個科學院因為在一九三九年「教的生物學有使三位一體的理教分崩的趨勢」即為警察廳所封閉了。

讀者一定多少看過那種圖畫，那是搜集在「世史圖畫一百卷」中的；或者也會讀過那時候的許多傳奇和小說。真正的攝影在五十年代後半與六十年代之初是不大多了，世界上的照相機雖還很多，但是軟片的供給似乎在一九五五年以後就絕滅。在那時以後近十年的期間，除濕片的緩慢的曝光以外，沒有別的甚麼了。我們只得到幾十張這類興奮的快照，這在前幾十年來原是極多的。那時歐洲的電影片已經絕跡，除對於單個的人物以外，亦沒有素描由此編輯先生們只有用極細心畫了的圖畫，和以後日子所做的照像的恢復，來補充牠們的材料。

關於里昂一九五九年的情景，有六張有趣的快鏡照片，有些人似乎是找到了一捲的軟片，並能冲晒牠。有一張照的是一個中央的大坪，稱爲 Place Bellecour。這是在市集的日子；從前的照片上，在這一坪中本有一路易十四站立的全身的銅像，但是已竟不見了，多半是因爲金屬而已被熔化。照片的背境是一些大建築的窗戶，從前是旅館和醫院，現時的外觀是沒有窗檻的和內部損壞的空屋。但那情景是十分忙碌的，那或者是每月一次的市集那里有很多的牲畜，有許多馬正在賣，還有各種的羊以及一排的猪欄，這些人多半是些農民，戴着草帽穿着極舊的上衣，也有圍着圍巾的。城市的人所穿的衣服，還是三十年代的，破舊和打着補釘。市集中有三個執事，戴着舊世界的高帽子。在前面一個有鬍鬚的人牽着一對牛，套在一個小車子上，一個肥胖的婦人坐在那里；有一籃鴨蛋，後面是一縛住的小牛；這個婦人在照像機前顯出廣闊的微笑的樣子，不知道是否在笑後人。

另一張照片所攝的是一個空了的火車站上面在作木球戲。這明白的是一個佳節良辰，有幾種競技正在舉行。軌道上的鐵軌已沒有了，軌道亦被剷平以供遊戲之用。玩的人的小馬和騾

子都繫在月台上成 長行。車站上各門的門都已拿走了，但是站長室，候車室，大餐間的刻文尚隱約可見。在一中間月台上有兩隻長桌是供乘客用點心的。第三張照片照有一羣人瞪視一排房子的廢址，他們剛在一個峻險的斜坡上倒下來，這顯然是稱爲佛爾維耳(Tourviere)的一區。在這里有兩個有點鬚的人，穿着舊的阿爾品尼(Alpini)的制服在維持秩序。我們知道里昂的市政府那時候有三旅這類兵士駐在軍營中。他們穿的是草履，有布條纏在他們的腿子上，他們的外衣尚稱完整。

這些照片中另外三張，供給我們關於一個沒有開工的絲廠的情形的一瞥。在經濟崩潰以前，里昂所製造之絲還大部分出自蠶繭，但羅尼(Rhone)河流域的原料供給似乎已完全消滅了，貿易的不景氣以及後來的戰爭減少了纜絲之輸入。但製造炸彈時却需要絲，或者有些特殊的努力企圖維持這一門生產，但這個企業似乎繼續在減少生產，一直到一九五一年里昂公社時，後來牠的維持突然停止了。一張照片攝的是在織機中間大堆的紙散着，還有許多煤油罐子。外表看來像有人在此企圖縱過火似的。另一張照片給人的印象是一個長列的絲車爲蜘絲網和

微塵所襯着。第三張照片上一個蜘蛛伏在一個紡機的許多紡綞中間，向着那不請自來的擅入者之吐嘮。機器是又複雜又笨，確是二十世紀機械的特色。我們可以看出窗子，是在攝影時才開的或者窗簾是在那時候剛拉開，因爲照片被一大羣旋轉的飛蛾弄暗了，牠們的大多數，顯然是剛剛被驚起的。

這些照片之價值，就因爲是真的照片。還有兩個同時代的乾片的照像，即是斯篤霍姆的大旅館的大菜館的照片，這旅館已沒有人住了，但一切都在原處，牠與兩個羅馬 Caracalla 浴室的廢址的照片有奇異的相似，這兩張照片的出現是早一百年。還有一張照片是英國布來屯(Brighton)的中央旅館舊餐室的遺跡，是牠們還未傾圯和墜入海內之前。但整理中的圖畫中的搜集，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之間的，一切其餘的圖畫都是排好了次序的，運輸部正開航數十架飛機；無線電話的交通，亦已恢復，早在複雜的照像機和照像材料開始工作之前。

有些關於倫敦狀況的很有興趣的攝影，表現出瘟疫以後城市中和容貨棧的情形。斯特蘭德(Strand)旅館的走廊變成了醫院的病房，這圖畫是使人印象很深的。有一張素描，講牧牛的

人和稱蕃薯的人之間爲了爭奪海德公園及肯辛頓花園起了一場劇鬪，死了三百人，這一張素描也頗引人感慨關於瘟疫中喪生的屍身沿泰晤士河流下和堆積在倫敦池（Pool of London）的畫片的可怕，現在據說是誇大了的。

我們試在我們現在的安全之中想像歐洲有幾萬萬人從二十年代的一般的舒服狀況，經過戰爭循環的震驚，害怕，恐懼，憤怒和刺激走進這一普遍的乏力與貧窮的階級時，心中是何等着急，失望，不相信而又忍耐的遷就，或者貧民對於災禍的驚恐不及富人那樣靈敏。即在所謂普遍的繁榮的時候，貧民的最好的生活，在我們看來，不過是沉悶的，灰色的和厭煩的生活。雖然他們大多數可以喫飽他們却喫得很壞，他們任何時候從沒有住過普通體面的住屋他們的景況一天比一天壞，他們從勞動轉到失業，由失業轉到麻木但中等階級也是由好景遇變成壞景遇，從人所認爲過得去的生活變成和一般寒素一樣的無希望的貧窮。

在這個時期內到處有一個級階所過的生活是大不快樂，這即是老年的和「退休的」人以及有「獨立資財」（沒有獨立責任）的人所構成的一階級牠在普遍繁榮的第一時期擴

張得很快，這種繁榮的人類的多餘分子已極愉快地散佈於全世界，忘記了維持社會紀律和保障他們的安全的辛苦努力。不知不覺他已變得和舊日的貴族及鄉間紳士一樣。在投資制度頗有效能的時期，這一個社會層對任何事都不問，他們住在快樂的鄉下區域，形成一個「富有的」社會，有美麗的花園有高爾夫球場，跑馬場，山上的體育會，公園，鄉間俱樂部和海濱旅館。牠在世界大戰中已凋謝了一點，但在以後的狂熱的和不確定的膨脹之時期，牠又很有希望地復活過來。以後當經濟恐慌發展出其殘忍的階段時，這種有閑的生活就沒落了。

「經濟的階段」這名詞實在是錯誤的在這一個階段實在什麼也不經濟；由於支出的停止，事業就停了擴張和進行停頓，除非是精小的市場中的一個能幹的投機者，此外就沒有人能變富些或相對地富些。賺錢的只有銀行。當事業停頓的病傳播開來，交新減少，企業消沉時，借入的國家和公司停止了還債，於是這些幸運的寵兒，這些富翁們，一面是本利無着，一面是慈善家向他們募捐，他們的銀行家和他們的律師通知他們首先是這一個可靠地方，後來又是那一個可靠的地方的錢沒有着落。賴債的潮水上昇了，將担保品一個個的沈沒進去。假使他們將財產賣

出和窖藏起來，則匯兌上的變動還是要吞沒他們的資本的一大部份。一個金融報紙在一九二三年即說過，「無論什麼東西都在往下跌，失眠之夜却是在往上漲的」。在別墅中在摺皺了的枕頭上傾側而充滿自責的頭腦，正和那寒冷的貧民窟中失業的人的心焦有同樣的韻律。

我們有一冊柯柏脫的日記(Diary of Titus Cobbett)，他騎在自行車上在一九五六年，從羅馬治里維耶拉到波爾多。他的生活的開始是一種藝術的賞鑒者，在英國的內國徵收局做過幾年的事，充當傢具，圖書，和其他的估價者。他的旅行似乎是好奇的旅行。他非常討厭從日諾瓦到波爾多沿途換錢的麻煩。他似乎暗中有一種外交的或領事的任務，但關於此點，他是謹慎的，所以不願說，或者他被派去是做報告的，但就是這樣，關於他的使命也沒有過紀載。

他關於那一淒涼的海岸之描寫，今日讀起來還很有興趣。他在青年時即交游廣闊，在二十年代已熟知蒙的卡羅，他到的地方常受人招待。他的筆記上說，有幾百個可愛的山莊，被人拋棄了，鎖起來賣不出去，主人留了一個老家人看管。該地的人民有時竟公開對牠們行劫，從前很美麗的花園，不能保持舊觀。玫瑰花，夾竹桃，石榴，松柏，棕櫚，龍舌蘭，仙人掌和雜草，亂糟糟地長

在一堆；不賺錢的旅館慢慢變成了廢址，破了的自來水管流出來爲路，單層的房舍爲農民所占據。在羅馬帝國衰微時，這同樣的荒廢的命運也一定落在坎佩尼亞（Compagna 和那背俯上灣的林立的別墅之上，但這次是一個更快的衰落。他說，道路是極參差，但有很多的道路記號和路旁廣告還在對於已逝的交通作嗚的呼籲。當他騎在自行車上正在詫異，是否找得到一個清潔的和招待過到的庇蔭之所過一夜時，他看見了有凸出的金字的招牌，不過字跡有點剝蝕；正在對他的油燈招呼：

H TEL S LEN ID
CU SINE RENOM
T T LE C N CR M RNE

超等旅館
著名廚師
摩登設備　一應俱全

主人和旅客們離此往那里去了呢，這些別墅和花園的主人和寓主又在什麼地方？這些來此游憩的快樂顧客是到那里去了呢？他們中間許多無疑是死去了，因爲里維耶拉的所有者多

半是中年的和年老的人，其餘的人回到他們自己的鄉間過貧窮的生活去了，充滿了疲倦的回憶，在普遍的赤貧中間，爲人們辨認不出。

柯柏脫去訪問過蒙地卡羅的老跳舞塲的廢址以及較新些的體育俱樂部。英國酒排的天花板在他訪問以前的幾天已跌了下來。「廢墟看來很小，」他說，「當我年輕時，這些地方我記得是極大的。」

這著名的花園已有些賭徒們常在裏面自殺，以完結他們的苦惱，長滿了蔓籐。

然而像這樣普遍的衰落中偏有一個例外，我們的觀察者頗重視這個例外的意義，就是空中的交通還在繼續。在羅馬與馬賽之間他極準確地記下來，他看見了十三架飛機，向東或向西，除掉兩架他在早晨未起來前所聽到的以外。「我懷疑我在二十五年以前是否看見過這麼多」，他寫道，於是繼續發揮——極有意思地——這些軋軋的機械所預示的貿易的恢復，決定秩序的恢復的可能。在尼茨和馬賽，他看到有輪船來往，——「不僅是漁船而且是一噸以上的船隻。」在尼茨他們正建造一個較大的船，他估計可以容納三千噸。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六二年之間，

關於造船業、除此項外、我們沒有看到甚麼紀載。在一九四〇年之前好久大船的建造已再不是「賺錢的生意經了」。我們也頗可斷定在五十年代的初年；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造過無論何種大小的航海的船。這個破產的行星上面的運輸系統，已是一年年地在紊亂，只是現在研究歷史的人正企圖研究出那一個迅速衰落之統計的圖表。

柯柏脫看見在馬賽和某一內地石礦之間有一段鐵路上面有火車行駛，—是用的汽油引擎—他很驚異而且充滿了希望。他明明以為世界上再沒有鐵路交通的了。如果交通已降至不能支付生活的工資，不能維持鐵軌和應付流動的支出投機的購買者也不要這在從前是很有價值的財產了。這種財產在地面上已變成了廢貨爛東西，除了和[illegible]的鐵軌埋在龍舌蘭和野花中。他講到舊日法國南部的棧道的美麗；告訴我們他如何騎自行車沿着[illegible]　里昂地中海岸走人行的小徑而不走大路。農民們已把鐵[illegible]，[illegible]鐵軌[illegible]便利於鐵路；[illegible]其鐵軌已所剩無幾了。枕木多半是當柴燒了的。

在夫賴丘(Fréjus)有一個飛行場。他敘述他在那裏同一個西班牙美國人的飛行家作

了極有意思的談話這飛行家在戰爭中首先在波蘭人那里服役過在德國人那里服役最後又在法國人那里服役。科柏脫的印象是貿易已有顯明的恢復他驚異地看見橡皮，香料，水銀，錫錠等商品，從東方經過空中運來，同樣，他也看見鐘錶，羅盤針，刀，針，鈕扣，硬玻璃和其他東西運回去以爲交換；貿易的大部分是以物易物，利潤頗大，似乎有種種理由可望這種通商漸漸的擴張。

他似乎是第一次知道從戰爭中殘餘下來的飛行家可發展爲空中商人。他們已組織了一個還不大密切的世界聯合以維持空中的航線與空中的燈塔。

柯柏脫說他已看到航運之恢復。

「我們將注視牠，」飛行家有意義地說。

「你們載客嗎？」

「如果他們付足路費。」

「但這是文明回來了」柯柏脫叫了出來。

「不是的！這是新文明在開始。」

他似乎是第一次使柯柏脫睜開眼睛，看到在他那樣的頭腦中已形成的幾個觀念：「世界的帝國嗎？」他說，「那是一個舊觀念！凡掌握了空中和掌握了運輸的人卽掌握了全世界。我們還要帝國一類的東西有什麼用？」

柯柏脫深受這談話的感動，他繼續在法國前進到了波爾多，因爲他需要在那里取一筆款項，他將這問題思索了一下並將他的思想記了下來。他將這新的「世界運輸組織」和那些漢薩商人（Hansa Merchants）比較了一下，這是一穩妥的而且有趣的比較。漢薩商人在羅馬帝國滅亡後，對於波羅的海岸及北歐的文明之恢復曾起過重要的作用。柯柏脫思索了一番以後說，「原來我們在歷史中對於有組織的運輸和貿易從未給以適當的地位。」

在波爾多他出賣了他的自行車，剛夠買一張票乘飛機到勒部格（Le Bourget）（一個起源很久的近巴黎廢址的飛機場）以後又從那里飛到亨登。他的飛機在勸曼司降下以交換貨物。他此後免除在不平的馬路上乘車的顛簸的愉快是無限的。

慮他的描寫破壞了的法國森林正開始恢復爲短短的叢林，他俯視小農的田畝成羣的圍

繞着舊的城市，阡陌井然。他在飛行場，以新的眼光看飛行家和機匠，從他們知道世界運輸如何使較好的五金工廠及電氣工廠得以恢復。他也看到了勒曼司的美麗教堂，還見他在學生時代看見和贊美的那樣完整，深爲喜悅。他描寫在下面坪中對於飛機的先驅者早年曾樹立過紀念碑，至今仍然存在。亞眠斯（Amiens）的大教堂那時也沒有損壞。

他的日記完結時有一種憂傷的調子。大約他有幾年沒有到過英國了，他看見倫敦郊外荒廢的樣子不勝驚訝。他在兒時即在倫敦住的，而且很愛倫敦的。海德公園的一部份，不顧人民的反對，已變成了一個飛機場，但他看出倫敦中心區域的重建是無計畫和不討人歡喜的樣子。他反對建築擁擠在城市中心以及他們的巨大的水門汀的抵制飛機的建築式樣，這都是由於與郊外交通便利衰落之故。他說，這些建築像一堆「有病的」蕈菌。他問道，「我們英國人何時才學習到能計畫呢？」以後他以一種奇異的預言的神氣對於泰晤士的北部斜坡的低下水量之未完全滲乾，地下層的柔軟，懷疑其能否支持住這一大堆不健全的新建築而不墜，舊城市的生活也恰恰收縮到這一部份來。

只在十年以後他的憂慮竟被證實。泰晤士河的河道變彎曲了，整個的斯特蘭德（Strand），佛里特街，昆赫爾（Cornhill），和最可惜的是倫（Christopher Wren）爵士的美麗的聖保羅大教堂（這是我們從那時代的圖畫和攝影中很熟悉的）也傾圯在廢址中，毀滅在大火中了。凡瀏覽過歷史圖畫一百卷的讀者——那一個小孩沒有瀏覽過呢？——將記得老滑鐵盧橋的特殊形狀，皺摺得成了幕帳形，還有那一時頗為有名的姑婁巴針（Cleopatra's Needle）的埃及方尖塔（上刻有象形文字）傾斜成難看的樣子；為空中侵略的榴霰彈炸了一些碎片。牠傾斜着有好幾年，以後就倒在有圍堤的拉謨伯司——拆爾息（Lambeth Chelsa）湖水中。

一二　消滅中的美國

以上諸節關於二十世紀中葉數十年來舊大陸的歷史進程，已給了一個總括的概念。對於這一主要的歷史舞台，甚至在歐洲的某些地域，也是立在外面的；牠們有牠們自己的發展道路不及那些主要國家的悲哀和强烈。例如西班牙，即一九三一年誕生的西班牙，牠所演的是旁觀

者的作用，一個太忙於自己事務的旁觀者。更可注意的，是無論拉丁語的或英語的美洲都沒有參加在這些熱情的和猛烈的事情中。他們也有與舊大陸類似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困難，在他們自己的國境內。當三十年代之初的金融風潮以後，從歐洲的紛擾所生的震慄到牠們那里時的影響也漸漸小了。他們的私人資本主義的沒落有他們自己的特殊形式和他們自己的途程。

然而他們捲入了沒落的旋渦，這使我們明瞭認識一件雖然過去有過爭論的事實！二十世紀世界崩潰的直接原因，首先是貨幣的不適應，其次是社會的紊亂，由於生產率的增加，而第三是瘟疫的流行。戰爭並不是直接的原因。人們的每一日的生活都是經濟的，不是好戰的，而經濟的生活却爲債權人所絞殺。如果世界在一九〇〇年已成了一個國家。假如牠還是一私人經濟積累的通貨是收縮的，則牠之崩潰也一定如牠發生過的那種情形一樣。假如牠那時分裂成一百個好戰的國家，但有一定限制債權人並讓工業無限發展的貨幣制度，牠或能宣洩出充足的精力，雖一面有戰爭的進行，仍可以再過一世紀才達到相互殲滅的目的。貨幣的崩潰是世界紊

禍，實爲和災荒的最直接的原因。沒有這一個崩潰，人或者在到屠殺和窒息之前能永久些和更有力些的進行一點事業。整個地說，如果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人的進步能克服金融的阻障時，他就好了。

往日的一切反對戰爭運動之沒有效果的原因，只在我們了解了一個健全的貨幣制度之重要時，可以理解得清楚。這點我們向來即堅持，我們已從半打的觀點解釋過債權人和傳統對抗的關係。若美洲及舊大陸的經驗之相似更可以着重說明，使我們明瞭這一個教訓。

美洲的社會自從他們首先政治上脫離歐洲的體系以來，已經過了他們自己的一些發展階段，對於離開舊大陸的事變而獨立進行並與前者發展的韻律不相適應的。牠雖是獨立進行，然不是完全獨立因爲牠們是同在一行星上。在整個的十九世紀裏，美國的心理，北方和南方都一樣，都爲孤立的觀念所飽和，學校報紙以及一切重要的政治聲明，都是這樣教他們的人民說，新大陸實是一新世界，牠逃出了舊世界的傳統的專橫，走向和平，自由，機會和人類的新鮮生活。牠避免與舊大陸的諸國家和政策，成立一有連帶責任的聯盟。牠寧願忘記親屬關係，寧願同

共同的文化決裂，以此代價來忘記歐洲內部的爭吵和仇恨，並樹立一種更寬大的生活方法的榜樣。從華盛頓的時候直到威爾遜的時候，雖然有南北戰爭和更嚴重的經濟困難，美國人的心理總以為他們自己的性質是模範的，對其餘國家抱着傳道一般的慈善的態度。他們固然了解他們對於許多事情知道得極簡略，但相信他們要知道得更好點。

在整個的十九世紀，美國和歐洲經濟上和物質上都擴張得異常快。美國發達之速，使牠自己的印象很深，不願顧及歐洲進步的同等速率。由於歐洲大批的移民的幫助，美國人口在一百年之內增加了約八千萬。但歐洲那時期雖有那大的向外移民，自己的人口也增加了二萬四千萬。美國人抱了一種幻想，以為他比歐洲人口增加更有成績些。他的生活事實上也擴張了，和歐洲人的擴張同時得力於思想與發明的進行，並得力於舊大陸輸入的人力之助。在他的無妨礙的大陸，貢獻於擴張的各因素，其增加的速率，是和歐洲的行程不符合的，他生活在類似的進步體系之中，但他與大西洋對岸的發展益加參差起來了。

在那一整個的世紀運輸和交通的發明正「廢止」了距離，將從前是相互間交通須幾個

月才到的地點改變成幾點鐘的或幾分鐘的距離。

由此結果的大西洋兩岸之時而親密時而疏遠遂成爲二十世紀歷史之特出的一面。牠們那兩個大陀螺並排旋轉；牠們接近、接觸和衝突，一會兒又顫動離開了或者也像兩部複雜的機器，終於要結合成爲一個世界機器的；但牠們的旋轉的齒輪企圖聯結而又聯結不成功，兩方面摩擦作響並發出一大陣的火花和流星來，以後又分開。從十九世紀之末起生活中的統一的力量正傾向於將美國與歐洲聯在一個機器之內。在二十世紀的中葉，如果任何觀察者得出結論說這種聯結已失敗了，我們是可以原諒他的。

我們在這本歷史中對於亨利福特，威爾遜，羅斯福第二已給了顯著的地位。我們已說過美國會大模大樣地朝歐洲前進，以後又縮回來和縮在自己的周圍。美國一政論家西蒙茲(Frank H. Simonds) 曾著了一本簡單而扼要的小書稱爲"Can America Stay at Home?"(1933)，將孤立問題在經濟恐慌開始那幾年的情形說得很透徹。這一恐慌將貪得的私人資本主義之野蠻的自由不論是好是壞總算告了一終結。他指出自羅斯福第一(Theodore Roosevelt 1901

—1900）初次發動帝國主義的雄圖以來，與歐洲如何時而接近，時而分開，美國如何不能擺脫舊大陸的事情，又不能坦白地捲入他們中間，發表他的高尚的意見而不作後盾。他堅持道德的裁判而不担責任。在歐洲人的眼中，我們引用西蒙茲新的歷史語句說，美國之關心和平顯而易見的，像是努力將使徒約翰的傳道和派雷特（Pontius Pilate）（即放任暴民害死耶穌的小亞細亞總督——譯者）的方法結合在一氣一樣。如美國的努力的這種矛盾，正因為牠是美國智慧中自由的摩登和樸質的粗糙之混合物。

美國共和國從開始就對歷史反抗，是一種新東西，就牠出現的時期說，比列寧的蘇維埃共和國要新得多。他從一開始卽不能繼續保持舊的新的態度，並不能發揮和加强牠的思想。牠產生了一些高級學校，培植了人。只在獨立以後一世紀，才徹底想一下自己，在此以前他將民家教育交給那薪水不足的男子和愛重複的女子們。牠的身體在生長並且生長得無限在一世紀以上的時期，牠生活在輸入的精神糧食之上。其結果是這樣的生糙，對牠的使命之這樣無限的感覺，却缺乏任何權謀或活力去實行牠。威爾遜的愚蠢的宣道和安排，如此愚蠢，但又如此以世界

和平的智慧自驕，或者是他的時候的美國心理之最高表現。

即在十九世紀的美國心理，亦不是一愚昧的心靈。牠是一大得無限的未受教育的心。牠固然笨拙，但牠也自由。牠的宗教的復興與牠的政治的波動恰相類似。我們在純正的美國生活的故事和研究中，看見為改悔和勸人信教而舉行野營集會，和有組織的感情的宣傳運動的這類事情。我們想起燃火的佈鼓，難聽的講道聲音和興奮的唱歌。民衆由這些感情的浪，這些集會（常是在林中）以及他們的唱贊美詩，他們的訓誨，他們的叫聲，代表改悔和歡樂的信仰以及美國的精神生活，首先無心的膨脹，繼而無心的收縮的這種情形，在美國世界使命的盛衰中正十足反映出來。美國眞正的社會和政治的思想之極有生氣的復興只是在受到世界經濟崩潰的震驚的時候。當經濟衰敗在强化時，美國退出歐洲事務的複雜糾紛，同時有新的和更勇敢的決心去了解社會生活的主要點。

確實，美國國內形勢中一切東西都是在刺激思想。美國經濟崩潰在最初甚至比歐洲還快。工業的建築已被興造到為大量生產的介人量形的高度牠墜下來時更沉重。在一九二八年時，

美國還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一九三三年牠的失業者比任何別一大陸上的更無希望和更可悲。但他們不努力作有組織的反抗；他們缺少革命的公式將他們團結在一起；他們的反抗或者是個人的，或者結成祕密團體，成爲犯罪的人。社會沒有被推翻，但牠迅速崩潰和秩序大亂。犯罪的潮流，金融的困難，求節省的瘋狂努力以及後來國民教育之被摧殘和信任，秩序及交通之解體——那種我們已一般地說過的後果在這一廣大的，比較無歷史的地域，表現得最嚴厲和最典型。羅斯福第二勇敢地與這些現象爭鬥，可惜他來得太遲，阻止不了這種崩壞的趨勢。

在美國和在歐洲一樣，有一分崩離析的階段到來。牠並不是人們能給牠一個確定日期的突然崩塌，但每天總有朝着解體的方向走的事情發生。美國和歐洲一樣，國家的政府變成了倒賬的空虛機關，收稅的能力一天比一天薄弱；華盛頓的聯邦政府萎謝了；雖然不像國際聯盟那樣完全，至少是可以比較的樣子。我們看見同樣的現象：市政府變成了獨立的臨時的統治，公民聯合會，法律秩序保障會，工人保護會，和獨自的工人蘇維埃，（在新墨西哥和加利桑那）這里，

那裏和到處都起來活動。在藍山中和在太平洋岸，於一九四五年有孤立的小共和國出現，正實行一種循道會技術統治，道格拉斯計畫(Douglas Plan)之四不像的混合主張猶太實際已變成一自治的單一稅國家，恢復了牠最初的摩門敎(Mormonism)——一夫多妻敎——爲國敎。但各處都沒有形式上從合衆聯邦脫離的事實。

在史冊中，有關於一九五八年華盛頓的描寫，看那是英國大使館一個從前的參贊寫的。他描寫他有一次的進訪白宮，他在白宮和卡路安（[illegible] Carman）總統共餐，總統還在繼續職務，雖然他的任期已滿，因爲他的繼任者在往首都的程途中忽在亞勒加尼山(Allegheny Mountains)中失踪。關於上次的選舉已有很大的紛爭，兩個分立的總統在關於永刻茲(Yonkers)投票權的衝突以後，正在爭奪紐約的所有權，他們早將紐約與新英格蘭的交通斷絕了。

總統極有禮貌地接見他的來客，問了關於歐洲形勢的許多極同情的和聰明的問題。他談到美國的將來時極有希望。他說「回復原狀」的時日已在不遠了。汽輪交通在密昔西比河上已有恢復，政治雖仍不靜，但棉花又在開始向北輸送。在一九五六——五七年已有一百四十

輛汽車運往南美，面前一年只有七十二輛運去。金鷄納霜——咖啡之類以物易物的新貿易方法進行得還不錯。依他現在觀察，事業前途頗有上昇氣象。他承認，一九二九年以來的經濟恐慌比預料確實延長得更長久些，和下降得更低落些，這次衰敗，已使美國人民厭煩了些，但他們的忍耐堪稱對得起他們共和國的先烈。他的結語是英語民族兩大國中間所當致的親睦。

午餐是普通而豐盛的，有最好的豬肉和形形色色的蔬菜，總統以眞正不假的民主主義的坦白自誇，這些都是他得黑人「秘書廳」之助，自己在白宮背後的菜圃及花園中飼養和種植的。秘書廳的義務似乎是在家事而非在公事方面。這些黑人受任命的政治理由頗費解，其中有這個連字也不識。卡路索夫人是一個愛爾蘭出身的享樂婦人，正要談在華盛頓管家的困難，因爲聯邦收入之日漸不可靠，但總統阻止她，斷然認這些家事是以反映一國的財政實力。

那時各國只有三分之一的州遣派議員出席於國會，其餘諸州或認爲費用太大或認爲無此需要，都沒有派來一個。這參贊在國會中看見一個議員正占據國會的議壇作某種長篇的申訴，他穿得很破舊，嘴裏有[illegible]見有，國會議員也沒有人用心聽他的話。[illegible]這人是在衆議院[illegible]長

時間來打消某種立法的提議，但這參贊找不着一個人能說明實在的情形，

參贊次日和有辯才的精神奕奕的和藹高德勁的愛達和（Idaho）州的波拉（Borah 1865—1940）參議員同餐。他的舉止最好，餐時一直談個不停。實在他總得這樣起勁，他的客簡直不能插言向他問那幾個預先準備好了的問題。他也是對他的國家極有希望。他承認在他一生之中，美國一般人的福利在顯著的減退。他是不和統計爭的，就煤和鋼的噸數，鐵路的哩數，一般的商品和摩托車的大量生產說，與過去比較都是不利的，「但是人並不單靠麵包生活」美國的元老說「我們且嚴密看一下當時的人心。」

人心似乎從未有比當時還更健全了。瘟疫，和一切從上帝那里來的東西一樣，也是有理由的。在他看來生活標準比從前任何時候都高些了，這是指精神方面的高尚事情而言。浴室固然少些，至少就工作的說，是少些，但是心靈是純潔得多了。在他的青年時候，美國的自由人民，耽於奢侈逸樂和放縱，但這一切都成了過去的了。美國比從前任何時候要更近於舊日殖民地的樸質誠實和純潔。

波拉接着攻擊歐洲的不誠實和歐洲的（尤其英國的）外交之不坦白，雖然這有點不相銜接。他假予是在背誦記憶得很久的演說，忘記了英國的外交已完全轉變。他在開始談話之前顯然已聽到了「叁贊」這名詞，這便引他的心思想到舊的時候去了。他回頭又談現時的形勢。他堅持，美國在其早年的歷史中經過了比這時黑暗得多的階級。一百五十四年以前，勝利的英國軍隊曾焚燒過華盛頓。在現在這種衰敗——如果可稱為衰敗中絕沒有這類的事情發生。甚至在自聯邦組織以來的衰敗時期，從沒有人想到要燒華盛頓。

後來這一游歷家又去叁觀芝加哥大學，科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及許多其他文化中心。他的評論是做給西聽聞的，與我們所考察的心理的反應很便利地符合。這些心理的反應即在那時在舊的鬆懈的心理習慣中已迅速產生一種新的和更強健的美國意識來。

這些教育機關之適應新的狀況，天然是有最不相同的方法。不是一切方法都是進步的。哈佛大學使他想起他所讀過的關於西藏喇嘛廟之紀述，在那里我們實際上找不着紙來做筆記或練習，教授完全是口頭的，學問是靠記誦的。關於圖書館有嚴密的保護以防搶刧，比較重要的

書籍只可鎖在很厚的玻璃箱中窺視，每天翻閱一頁。教師的名望的不同是他們的門徒的人數來決定的。他們或坐在教室中或坐在樹蔭下講演，或者在散步時講演。他們不僅名望不同而且身體的健康亦不同，因爲這些學生的任務即在爲他們的教師和他們自己在學校的廣場上種植食物，在技術的及藝術的建築，織布，製衣和製草履。那時也有一些文學創作，比較有才能的學生在石板上寫詩歌，這些詩歌假使爲教員們所器重時即寫在房中的牆上或天花板上。這是極大的樸素和研究的有閑的一種氛圍。參觀的人爲伊里奧校長所招待，他是穿着寬袍，個子高大和有特殊面容的老人，他的位置是承襲祖父的。室中有一隻大火盆，點有兩支油燭，兩個學生在那里不斷地剪燭花。校長在進飲食——簡單的湯曼覺爾的紅葡萄酒，豐盛的水菓及花生，——他談的話極漂亮，談話繼續談得很久才停止。

遊訪的居科爾生發覺的印象覺得這雖是古雅但不實行。他不否認這樣的生活簡單和文雅，但他看來似乎也是深刻的無效。然而他對校長隱藏着這一種意見，讓校長一直說下去不受反駁，他講吟佛如何使埃吉剌闊教的文化最後的淨化和精煉，融古典主義和雅潔的抒情致於

一爐，並且還帶着忠君的思想。

「這里有國王嗎？」造訪的人問。

「不一定是一眞的國王，」校長惋惜地說：「我們已決定了獨立宣言之失效，但我們還找不出英格蘭的合法國王來，所以還沒有將我們的態度對個人而確定。但我們有一種忠君的態度，我們是深自慶幸的。」

研究的主要科目似乎是希臘時代托勒密的天文學，荷馬的詩，莎士比亞的戲劇，神學。學生僅有的閑暇不是用於體育方面的，他們似乎完全拋棄了那些典型的美國大學游戲，如棒球和足球之類。校長說起這些游戲時總說成「新近的發明，」重要的戶外工作似乎是砍樹和割草等。

對於這種文雅的和理想的冬烘教育之一瞥，是有趣的，因爲在以後的日子，牠的蹤跡就絕了。牠和校長自己的人格極有關係。當他年高逝世以後，在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三年嚴寒的時候，這一個舊基礎似乎是完全爲人拋棄和任其荒廢了。

但是科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與哈佛大學相比，是一絕不相同的對照，在此，新的德文特學派思想的影響極爲明顯；杜威，魯濱孫，巴恩士（Harry Elmer Barnes），藺斯簉克（Raymond Fosdick）俾耳德（Beard）夫婦和他們的同伴的種種傳統都還活着。雖然紐約城已爲人所棄，因爲牠的無人住的高入雲霄的房屋不穩固而危險了，但在赫貞江上仍有很多的貿易和製造的活動。大的鐵輪還可供負重的騾馬行走，成爲南北同樣有價值的道路，他們給這地方以一種特異的商業的重要。那里的和芝加哥的產業工人和學校的職員有密切的接觸，他們正以極大精力研究他們所稱的「復興的大問題。」

尼科爾生寫道：「他們都不承認文明已潰崩。他們在這里所談的如在華盛頓談的一樣，都是關於胡佛以來的經濟衰敗問題。我從未曾見過如此樂觀的人，說事情終會恢復過來的。在英國事情不是這樣，有一夜有一巨大的爆炸和地震，一羣稱爲「無線電城」的高大建築，在夜間崩塌了。在晴朗的早晨，我到先賢祠去，那里如實的塵土還在上升，有一羣人正在注視，並傾聽那小屋偶而傾圮的聲音。他們是沮喪嗎？一點也不。「還要多消滅一些，」在我旁邊的一人說，「我們

總要將這些東西脫手的。」一

哥可爾生對於哥崙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課程作了一篇頗爲詳細的敍述。科學試驗室之裝置和試驗工作之相對的重要對他的印象很深。「當我去參觀各大學的化學試驗室的時候，我感覺我幾乎回到了一九二〇年，」他說。但他更感動的是社會學工作已進步的狀況，「他們產生了一種不是爲進行訴訟的律師，」他寫道，「我想他們所發的新法律正是這種方最有興趣的事情。我的父親是不會認牠爲法律的。這是社會生理學和病理學以及整個國家的社會治療法。在此有一兩人，例如哈米爾頓（Hooper Hamilton）和［illegible］（The Kay），他們的學語是一種將來的教育。他們不會［illegible］在英國所說的關於一人頭的夕照」的制度。」

這，他的興趣，亦可說是關鍵的問題，一可注意的就是將基本英語施於實用的企圖［illegible］試過西班牙語和英語正逐漸變成一種可交換着用的文字，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初期還是如此，法文的教授已大大缺少古典文字的時代（希臘文和拉丁文），就牠的完全缺默判斷起來，似已統統地棄了。

我們的旅行家從芝加哥飛到第耳本(Dearborn)的福特飛機場，看見了重塑工廠的廢址以及重造的居留地，在那裏的技術學校中盤桓了數日，和參觀了一下還未完全布置好的「美國生活博物院。」他看見在飛行場空地周圍有數十方哩的耕種得很勤的土地和知道了舊日福特將工作人員的時間劃分為農業生產和機械工作的思想，仍在實行，這都是可驚異的。在第特乃(Detroit)有紡織和靴鞋的聯合工廠。那里每年還有一千有餘的汽車和「幾百架」(一)飛機的出產。那里有一座小而健全的無線電台，

「我們是保持着聯絡的，」經理說，「我們不干涉人民！我們也不被干涉。這道的郵政現在由我們在寄遞……是的，加拿大和墨西哥還能通。現在關於國界，誰也不來麻煩我們了，我們也不管這些。生意壞的時候我們縮小活動的範圍，耕種田莊和做試驗。」

我們在這本歷史中選了福特的和平船的冒險作為我們歷史轉變點的標識。「大創作家」的福特的作用，早已完結了。但這里所講的經理似乎是他的兒子愛德塞爾(Edsel)繼續他的漂亮而誠樸的父親的事業。

至於那地方之能夠「縮小活動範圍和繼續進行，」並非誇大之語。從一汚穢世界來的游歷的人，都注意於每件東西的「清潔。」愛迪生的工廠還是爲福特所重建過的那種狀況；在那里或是在尼科而生博物院，我們看見第一次做的留聲機和第一次做的電話，以及最早試驗的汽車和飛機。

「這也如那時一樣的新鮮，」他說，「在我們自己的和我們父親們的一生，我們已看見了自有世界以來的最大的文明的開始，勝利及其崩壞。我們已瀏覽過機械的大量生產的全部歷史。」

「一點也不是牠的歷史，」經理說，「那冊歷史還沒有開始。」

以後接着的是很長的談話，其要旨，那一個游歷家似乎是用對話式寫下來的。牠對於歷史研究者的興趣，就在於我們現在又有見證，表示全世界陷於貧窮秩序混亂和不一致的變異生活中時，機械運輸系統的活力正表現出來。我們能將第耳本的談話和柯柏脫所報告的遊行家的談話並列出來。這是同樣的舊制度最後死亡的證詞。「那些戰士和國會一類的[illegible]

肉一般的死了，」第耳本的經理說「面銀行的生意更早已死掉。」

「要來的是什麼？」

「這個」經理說，指着一個在上飛的飛機，在藍色空中聽不見和聲音都不見了。